

一个模范丈夫的自白

[以色列] 埃弗赖姆·基雄 著
王佩莉 聂欣如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个模范家庭的趣事》的续篇，由50余则讽刺小说组成，主要叙述“我”同“最佳夫人”以及“我”同亲朋好友间发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以极为幽默的笔触暴露了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弱点和愚蠢。

作为一名被誉为世界级的幽默大师，基雄在他的小说中竭尽挖苦之能事，但这种挖苦是善意的，是不伤人的；他对人们生活中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批评和冷嘲热讽，使人看了往往会为之受到震动，又有所感悟，同时也会从内心深处发出会心的一笑，并在笑声中反省自己，使自己“改邪归正”。

基雄的小说以及以其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获得过国际和他国内40余种奖项，他本人在以色列乃至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定　　价：17.30元

[以色列] 埃弗赖姆·基雄 著
王佩莉 聂欣如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模范丈夫的自白/(以色列)基雄(Kishone,E.)著;王佩莉,聂欣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8

ISBN 7-5327-2572-3

Ⅰ.一… Ⅱ.①基…②王…③聂… Ⅲ.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7325号

Ephraim Kishon

BEKENNTNISSE EINES PERFEKTEN EHEMANNS

图字:09-1999-288号

一个模范丈夫的自白
〔以色列〕埃弗赖姆·基雄 著
王佩莉 聂欣如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4 字数194,000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ISBN 7-5327-2572-3/I·1499
定价:17.30元

前　　言

不久以前，我最最心爱的一本书竟敢羞羞答答地去敲德国文学的后门。其实，这本书里的内容无论是与德语还是与文学都毫不相干——相反——它记录了一位相当有名的夫人，一名在我广大的读者圈子里以“最佳夫人”而闻名遐迩的夫人。

当然，我的一些读者紧张地期待着我妻子的反应。她会对我充满爱心地在这本书中散乱埋下的地雷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她会不会狂怒地以最严厉的报复手段来进行威胁呢？等等，等等。

尽管最佳夫人身材矮小，但是她绝不小气。我最亲爱的妻子以绝无仅有的大度对任何阴险毒辣的讽刺挖苦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她带着明智而又大度的微笑重新循入日常生活。于是乎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当然，对此我并没有感到什么惊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一个像我妻子这么聪明绝顶、充满幽默的人对于任何批评、任何玩笑和嘲讽都会拿得起放得下的。



顺便提一下，她连一句德语也看不懂。

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本书竟然被译成了好几种语言。不幸的是，其中也包括我妻子能够看得懂的语言。

最佳夫人狂怒地威胁我说，她准备采取最最严厉的报复手段。她也准备写一本厚厚的书——而且是一本有关像我这一类“模范”丈夫的书。

“别枉费心机了，”我以安慰的语气对我的爱妻说，“这一切我已经都写好了。”

于是乎，我马上动手在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讽刺文章中翻寻。这些文章是我在所有婚姻港湾中最好的港湾里所度过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写成的。这竟然成了一项非常轻松愉快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平庸的模范丈夫事后所做的积极的自我剖析；这是一种不带任何色情的、金西[①] 似的讽刺报道。最后，我竟然出乎意料地从中得到了一组讽刺文章。

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位具有责任心的丈夫所遇到的最关键的问题竟然与他的家庭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我所写的有关这方面的讽刺文章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家庭用具维修的——这也就是说，我这个当丈夫的主要精力是花在家庭用具维修上的。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一点，是消耗在各种各样的手工匠身上的——这些人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真正主宰。这些人“与弥赛亚[②] 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

① 金西（Alfred Charle，1894—1956），美国动物学家，研究人类的性行为，著有《男人的性行为》及《女人的性行为》。

② 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

我这个模范丈夫另外三分之一的思想——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围绕着理论上的一夫一妻制，而实际上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善于自我分析的丈夫又发现，在履行婚约和交纳所得税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制度都激励着人们出于生存的本能而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

在最后三分之一的文章中，我这位当丈夫的把自己不多的精力用于各种各样爱好上——顺便说一下，即使是在日内瓦战争协议的章程中人们也承认爱好乃是每一个战俘的正当权利。如果说我这个当丈夫的还有一点余力的话，那么我就把它平分了用在远亲和近邻的身上，或者说把这些余力浪费在我这位当丈夫的自己的身上，浪费在我糟糕的性格上。

最佳夫人对我挑选出来的故事进行了仔细的审核，稍加修改之后才勉强同意让我拿去发表。（此外，她坚持一定要我把那篇用于发泄我对热汤的极度仇恨的故事也拿去发表，以此来作为我那不稳定的情绪的见证。）

我那婚姻港湾的女主人说："这样一来，这一篇章就可以一了百了了。"

"我最最亲爱的，你的宽宏大量使我感到羞愧不已，"我感激地对她说。

我所有已婚和离婚的读者都知道，我并非是那种声称婚姻制度只给女人带来好处而对男人无利、因此只有女人应该结婚而男人绝对不应该结婚的男人。

我很清楚，这样的规定是行不通的。孩子们是绝对不会满意这样的解决办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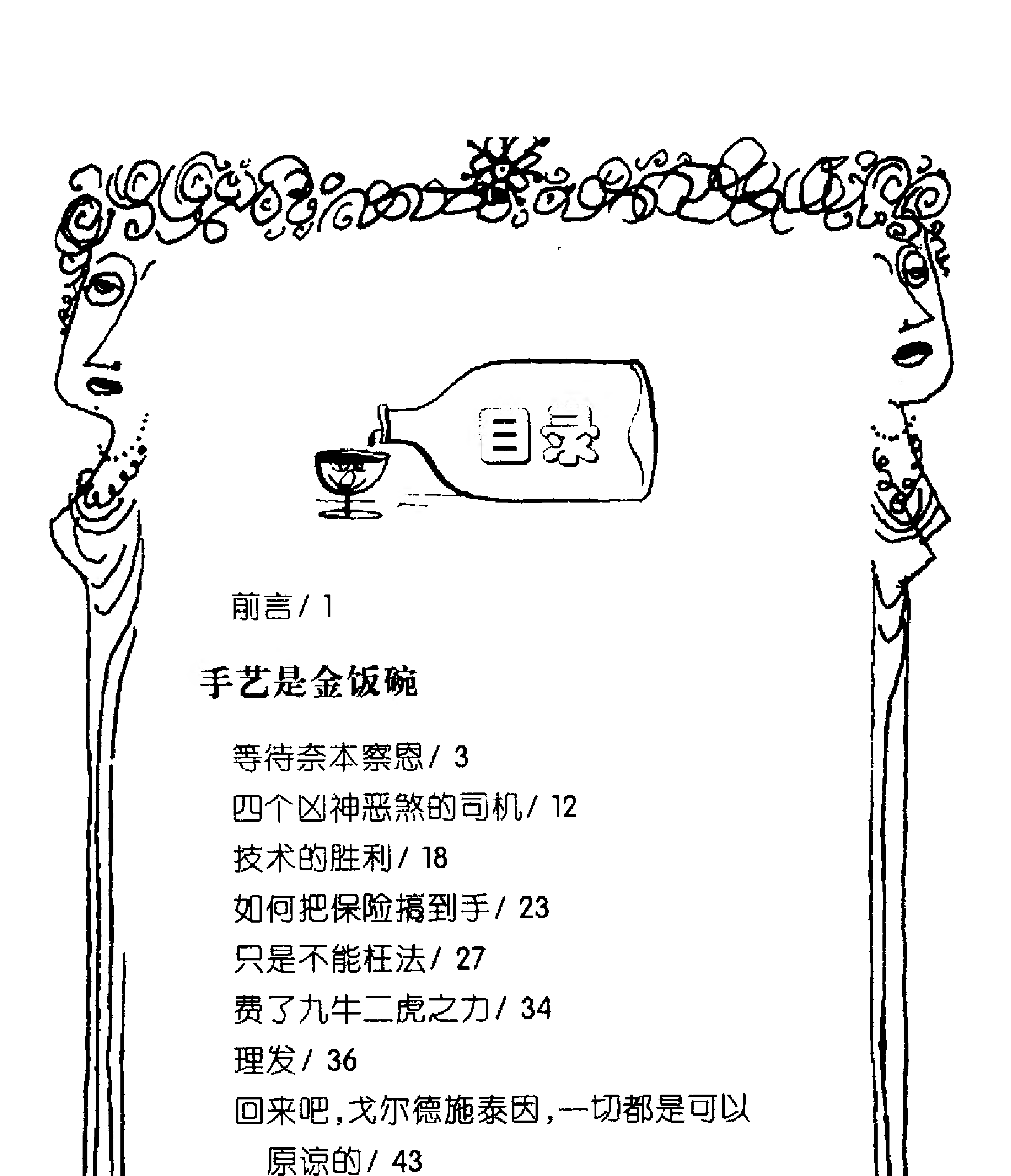
孩子们需要家里有一个父亲，因为比较起来一个父亲更



好对付一些。

最后我提议，在模范丈夫和最佳夫人之间所进行的永久的性别之战应该以体面的“平局”而告终。

不管人们是如何来谈论和描写婚姻的，一如民主婚姻也是一个有着许多缺点的制度——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明出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



前言 / 1

手艺是金饭碗

等待奈本察恩 / 3
四个凶神恶煞的司机 / 12
技术的胜利 / 18
如何把保险搞到手 / 23
只是不能枉法 / 27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 34
理发 / 36
回来吧，戈尔德施泰因，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 / 43
密封的阳台 / 48

从理论上的一夫一妻制到实际中的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

完美的婚姻 /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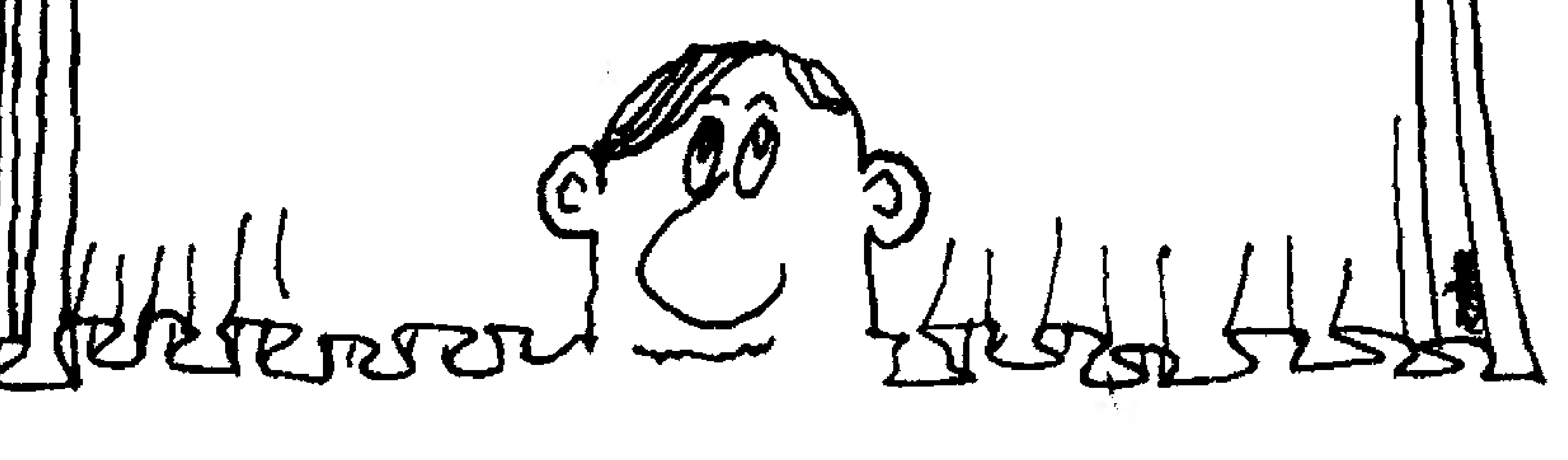
有力的按摩 / 60
土耳其文化之果 / 63
再也不看色情电影了 / 68
女人的直觉 / 74
圣·保利的外来客 / 78
格尔朔恩的遗孀 / 84
女秘书或事情的结果 /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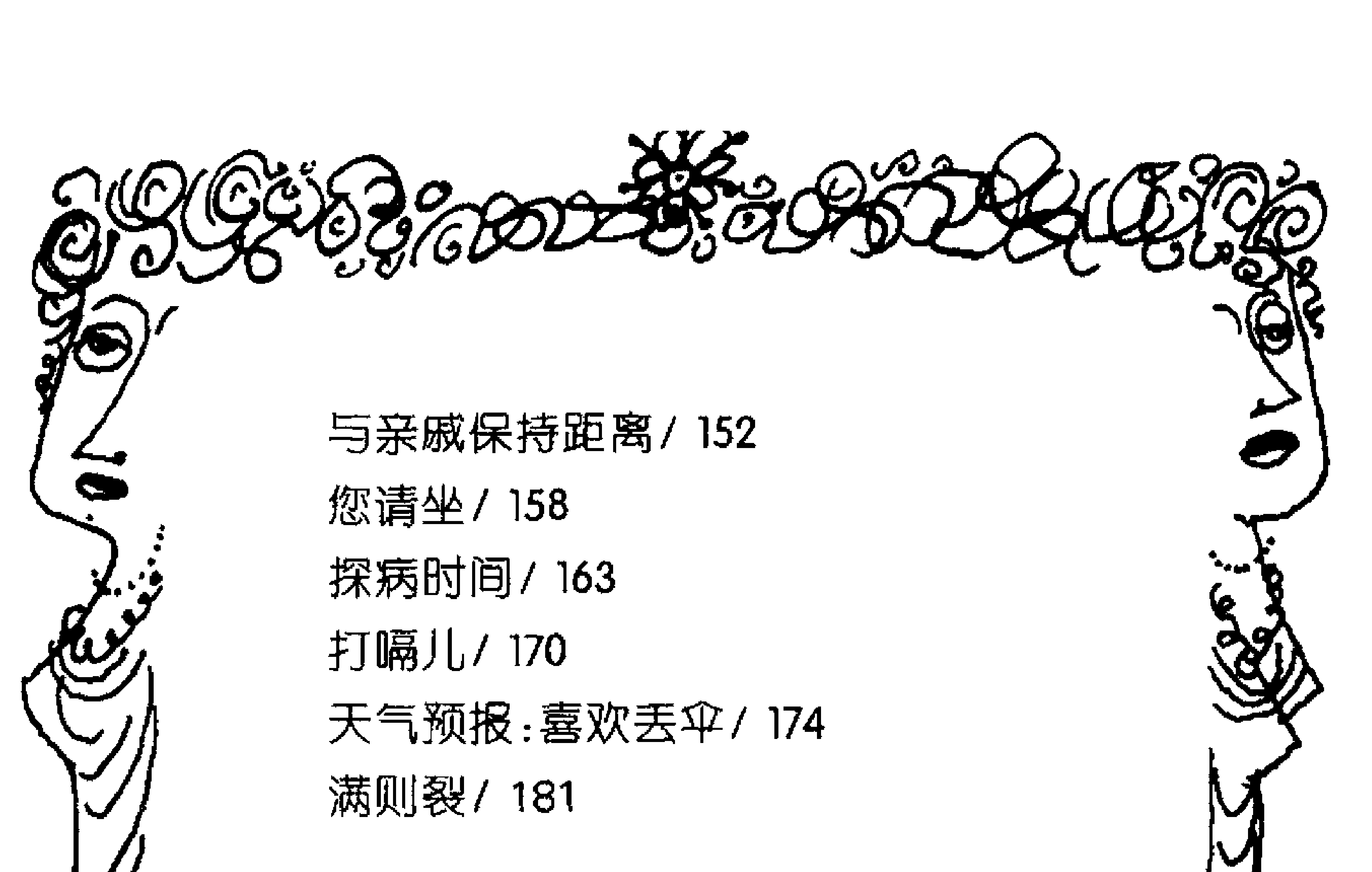
业余爱好之竞争

鱼从头臭起 / 97
鼓和钹 / 106
“沙姆辛”及银色的陶醉 / 111
垒来垒去 / 115
高尚艺术——空手道 / 119
电子科尔奇诺伊 / 125
电话恐惧症 / 131

家庭内部事宜

父子俩收到的小礼物 / 137
为什么这么吵 / 143
警报 /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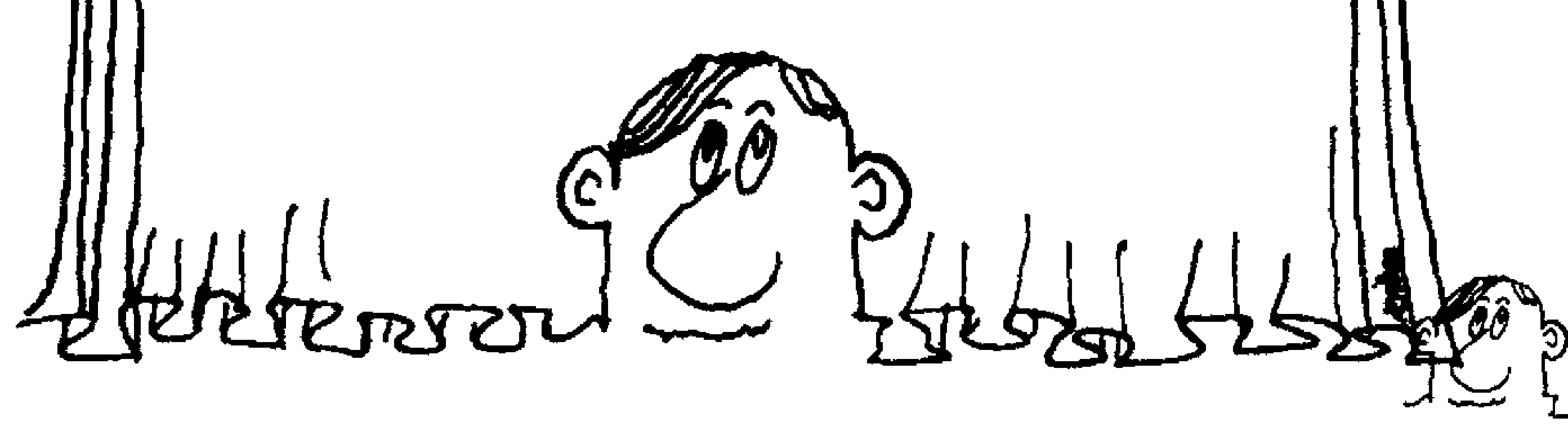
与亲戚保持距离 / 152
您请坐 / 158
探病时间 / 163
打嗝儿 / 170
天气预报：喜欢丢伞 / 174
满则裂 /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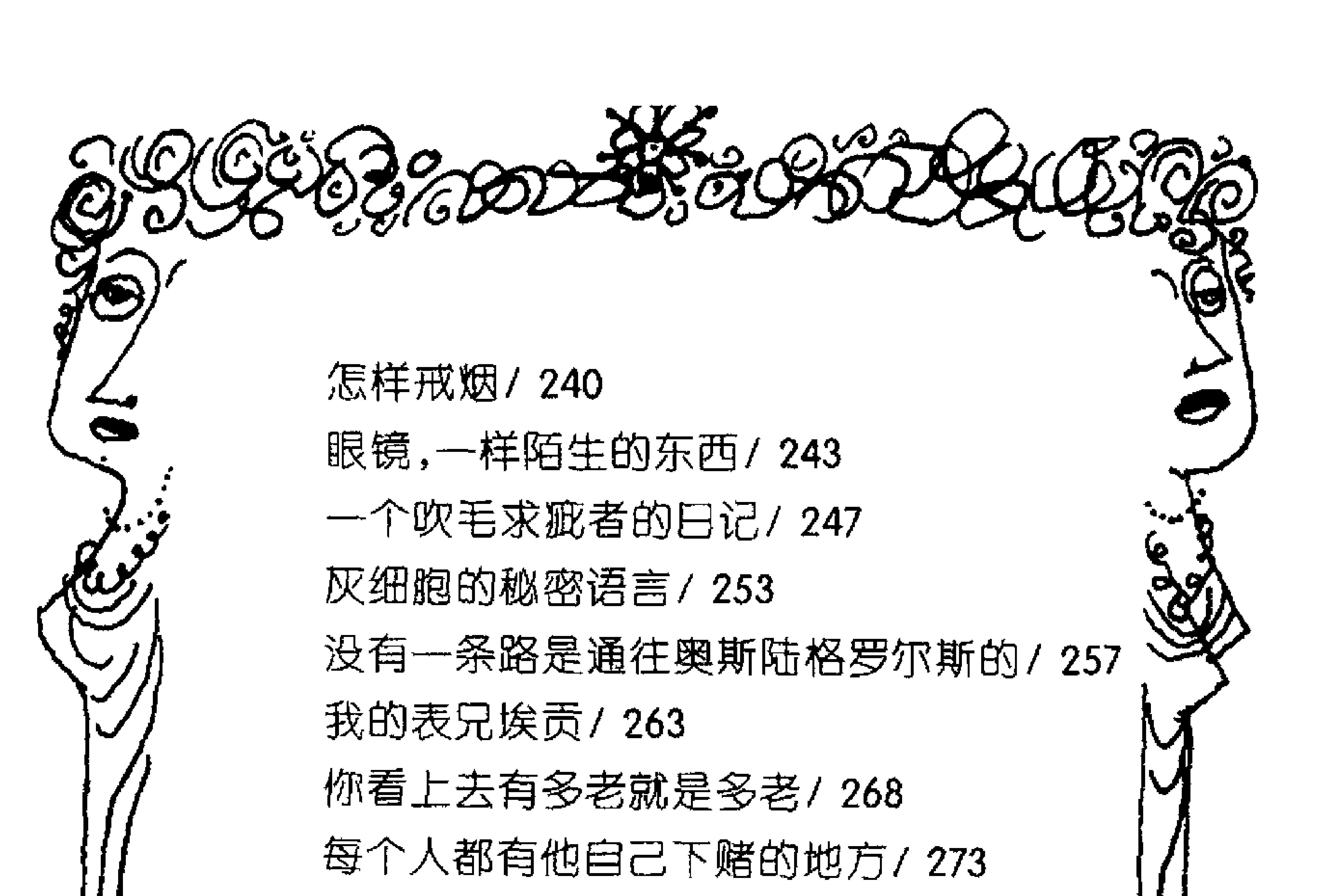
爱你周围的人

一次舒适的聚会 / 187
来自绝对可靠的渠道 / 193
值夜班 / 198
谁有直拨电话，谁就有烦恼 / 203
是温特尔尼茨太太重要，还是科拉姆波重要 / 207
连锁反应 / 212
长刀之夜 / 218
到底有没有典型的以色列幽默？/ 221
硬通货 / 226

婚姻——私人企业中的丈夫

总是太烫 / 235





怎样戒烟/ 240

眼镜，一样陌生的东西/ 243

一个吹毛求疵者的日记/ 247

灰细胞的秘密语言/ 253

没有一条路是通往奥斯陆格罗尔斯的/ 257

我的表兄埃贡/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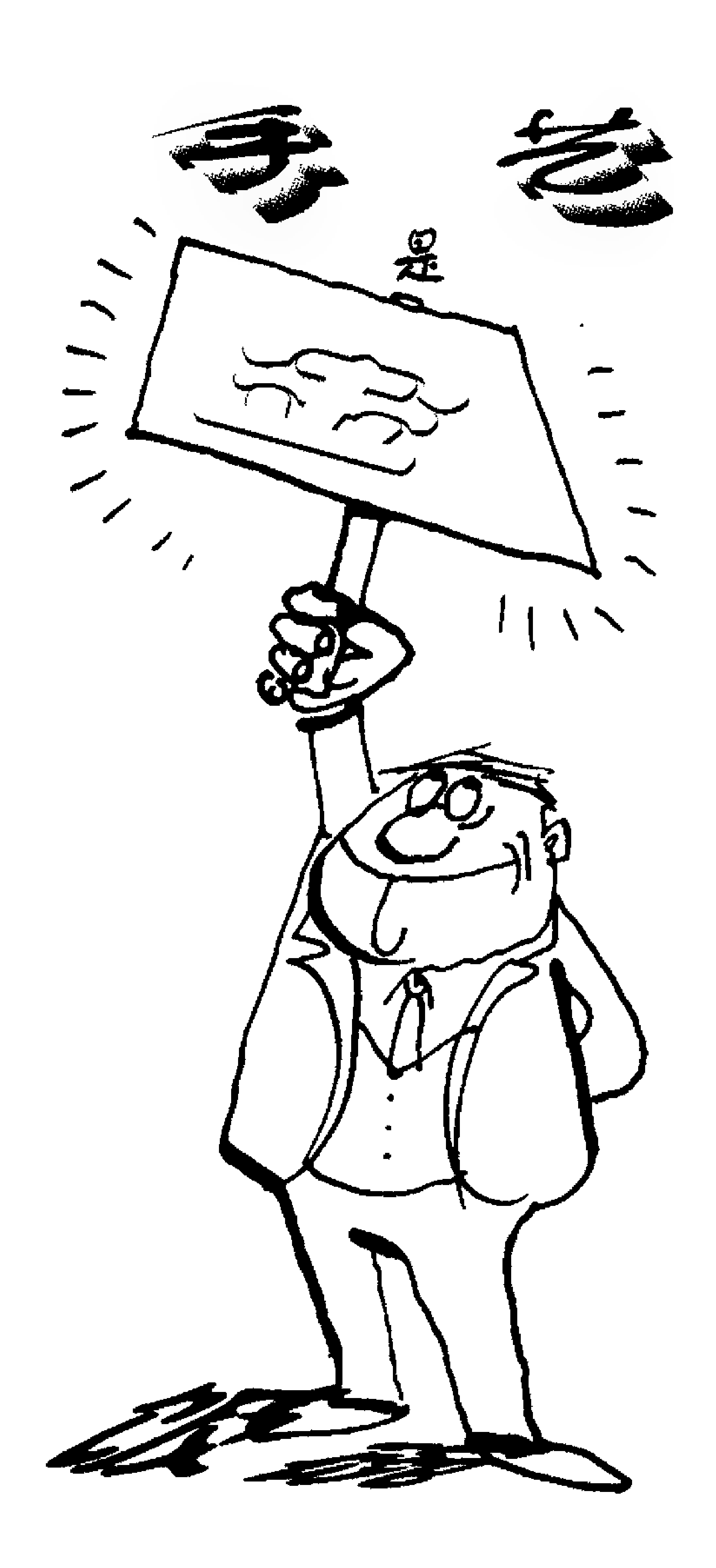
你看上去有多老就是多老/ 268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下赌的地方/ 273

讽刺幽默大师、以色列作家

埃弗赖姆·基雄（代译后记）/ 277

附录/ 283


手 艺
是

等待奈本察恩

4月7日

今天，我们的餐桌终于被丰盛的佳肴给压垮了。我的妻子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其实，她早就想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具给处理掉了。我兴高采烈地把桌子锯开。我们把它变成了一堆漂亮的柴火。

最佳夫人说，我们可以去雅法直接到制造商那儿去订购一张桌子。这样既快又便宜。

4月8日

我们向其订购桌子的那个制造商名叫约瑟夫·奈本察恩。此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比他的那些竞争者要好一些。他是一个属于那种讨人喜欢的诚实、正直的人。我们到他那儿的时候，他正忙得四脚朝天。他正在一块一块地锯木板。他那宽阔的胸脯极有规律地上下起伏，保养得完好无缺的机器极有节奏地隆隆转动着。他收了我们360镑作为订购桌子的预付金。我的妻子试着与他讨价还价，可是没有成功。



“夫人，”约瑟夫·奈本察恩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她的眼睛说，“约瑟夫·奈本察恩的做工好，他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他不会多要一个皮阿斯特，也不会少要一个皮阿斯特！”我们俩想，这很好。这是一个正直的人说的话。

我问，桌子什么时候能做好。奈本察恩从他裤子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的笔记本说，星期一中午。我的妻子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我们家没有桌子的情况，没有桌子我们就得站着吃饭，没有桌子我们的生活就会不成为其生活。奈本察恩到隔壁的工场里去与他的合伙人商量，然后回来说：“星期天晚上。”不过，运输费必须由我们来付。交了一半运输费之后，我们便告辞了。奈本察恩用力握了握我们的手，用坚定的目光望着我们的眼睛，那意思是：你们可以完全信任我。

4月14日

我们等那张桌子一直等到深夜，可是没人送来。今天一早，我给奈本察恩打电话。他的合伙人告诉我，奈本察恩出去办事了，而他本人则不知道什么桌子的事情。不过，只要奈本察恩一回来，他就会让他给我们打电话的。奈本察恩没有给我们来电话。我们的处境有一点儿尴尬。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们是在地毯上吃饭的。

4月15日

我开车去雅法，准备到那儿去大闹一场。奈本察恩忙得不可开交。他那强有力的手握着一把圆锯，把一堆堆的锯屑搞得满地都是。我必须自我介绍，因为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然后他向我解释说，他最好的工人被提前叫去服兵役了，并答应我明天下午四点交桌子。我们最后约定的时间是三点三十分。本来我是想坚持明天下午三点钟的，可是没有说通。“奈本察恩就像一只准确的钟表，”奈本察恩说，“不会早一秒钟，也不会晚一秒钟。”

4 月 17 日

什么也没有送来。我打了电话。我从奈本察恩的合伙人处得知，奈本察恩把手给割破了，所以桌子要到明天才能送来。反正现在早一天晚一天也没什么关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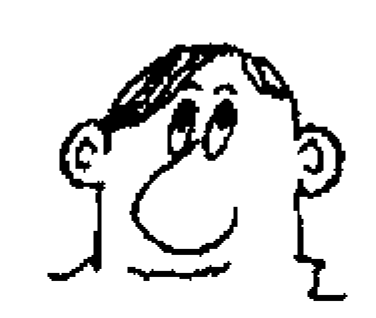
4 月 18 日

桌子没有送来。最佳夫人声称，这一点她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奈本察恩那鬼鬼祟祟、不诚实的目光当时就使她感到厌恶。她打电话到雅法去，是奈本察恩本人接的电话，他以令人信服的语言安慰说，用来做桌子的木料出现了高低不平的现象，这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现在桌子都快做好了，被用东西压着。我妻子问，桌子看上去怎么样？奈本察恩说，这在电话里很难说。他坚决不作任何不确切的回答。再说桌子的脚还没有安上去，但是把脚装上去最多只需要三天，抛光最多只需要两天。

我们早就习惯于盘腿而坐。几千年来，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民族的日本人都是这样吃饭的。

4 月 21 日

奈本察恩的合伙人自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通知我们



说，抛光的师傅得了流行性腮腺炎。最佳夫人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大发作。奈本察恩的合伙人说："夫人，我们可以在反掌之间就把桌子做好，但是我们想交给您的是一件具有一流水平的手工活。明天下午两点我们给您送桌子来，到时候让我们在一起喝一杯啤酒。"

4 月 22 日

他们没有把桌子送来，下午两点没有送来，以后也没有送来。我打电话去，是奈本察恩接的电话。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答应打电话去问他的合伙人。

4 月 23 日

我驱车去雅法。奈本察恩忙得四脚朝天。当他看到我时，竟暴跳如雷地训斥了我一顿：我不该来打扰他，在这样的压力下他根本就无法履行他的义务。然后，他稍稍冷静了一点，说，桌子吗，正在做。我还想要怎么样呢？他带我到车间里去，给我看那些木板。一种优质的、非常特殊的木料。像钢材一样地坚硬。什么时候交货？下个周末，星期天上午。上午十点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5 月 5 日

即使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星期天，我的妻子还要用晦气话来扫我的兴。她说："他们不会送来的。"我说："他们会送来的。我有一种预感，这一次一切都会顺利的。""他们不会送来的。"我妻子用女人特有的固执一再重复道。"你看好，他们的锯子断了。"

中午时分，我打电话去。奈本察恩告诉我说，他们还在忙着干活。他们在桌子的木料中发现了一些小的裂缝，他们不想交二等的手工活。我的妻子这一次又说错了。并不是锯子出了毛病，而是木料中发现了裂缝。下个周末交货。

5 月 12 日

桌子还是没有送来。我妻子已经准备好，我们至少还得等上一个月。我说，最多等十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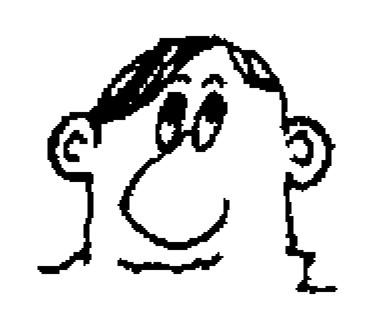
我打电话去，奈本察恩的合伙人告诉我，奈本察恩前天就出去了。到海关去办什么事情。可他曾经清楚地听奈本察恩说过，最多三个星期桌子便能做好。我们不必再打电话去——六月三日上午桌子将准时运到我们家门口。

“你瞧，”我对我的妻子说。“你说一个月，我说十四天。三个星期是最好的折中。”

我们像罗马人那样，斜躺着吃饭，奇妙无比。

6 月 3 日

桌子还是没有送来。打电话去，没有回音。我妻子说：八月中旬。我说：七月中旬。我坐公共汽车到雅法去。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正好停着一辆出租车。出租汽车司机从轿车窗口探出头来吼道：“奈本察恩！奈本察恩！”马上又有两位乘客坐了上来。他们中有一个为了一套沙发椅连着六个月去找奈本察恩。而另一个是一位物理教授，两个月来他一直在等他的写字台。半路上我们由衷地结交为好朋友。在工场里我们只找到了奈本察恩的合伙人。他说，一切都会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他悄悄地对我说，奈本察恩非常明确地说了六月底，那就



是百分之一百的六月底。我朝工场里扫了一眼。那些硬得像钢材的木板不见了。回家的路上我们对奈本察恩这个人，对他这么投入的工作以及对他想使大家都满意的努力展开了讨论。这样下去他肯定要完蛋的。现在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被人追猎的野兽似的。我们决定，下星期仍然在奈本察恩这条线路的终点站会合。

我的妻子矢口否认她曾经说过八月底。我义愤填膺地说，从现在起一切必须以书面的东西为准。

7 月 30 日

我以五个镑打赌说，交桌子的日期将在结茅节[1]。今年的结茅节是在十月上旬，最佳夫人则说是年底（按照格雷戈尔年历来计算）[2]。她的理由是：奈本察恩要生儿子了。我的理由是：工场电线短路。一切都以书面的形式写下来的。在车站又有一个去找奈本察恩催货的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此人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他订购的是书架，已经有两年了）。

车队向雅法驶去。奈本察恩忙得四脚朝天。他从一堆堆锯屑堆和隆隆的机器响声中向我们喊道，他无法与我们每一个人单独交谈。我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被拥为小组的代表。奈本察恩答应——这一回是非常庄严地答应——十一月底将把所有的货都交齐。我的桌子甚至可以更早一些交货，

① 犹太人的收获节，这时期犹太人在用树叶搭成的小屋里生活。

② 格雷戈尔年历是指由教皇格雷戈尔十三世（1502—1585）规定的计时法，1582 年开始实行，至今仍然适用。

大约在犹太人的新年。为什么要这么晚？奈本察恩快要生女儿了。那位物理教授建议说，我们可以互相打赌。有一位排字工人(他订购的是可以摇动的躺椅，已经等了 18 个月)与奈本察恩住在一条街上。由他负责印出我们所需要的下赌用的表格。奈本察恩俱乐部宣告成立。

8 月 21 日

俱乐部会议这一次在我们家举行。总共是三十一个会员。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了奈本察恩俱乐部章程的最后定稿。必须是已经等待了六个月以上的人才能成为正式会员。等待时间不到六个月的人只能成为后补会员。通过了下赌注的表格。需要填写的栏目有三个：一，答应完工的日期；二，借口；三，实际的交货日期(年、月、日)。绝大多数的会员决定，请人去画一张奈本察恩的肖像：忙得不可开交的约瑟夫·奈本察恩用坚定的目光望着看着他的人。俱乐部成员一无例外全是一些和蔼可亲的人。我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吃饭时大家一律席地而坐。

1 月 2 日

今天轮到我去拜访奈本察恩。他为推迟交货期而表示歉意：因为去法庭作证人的缘故而浪费了时间。然后，他从裤袋里掏出了一本小的笔记本，翻阅着，认真地思考着，表示愿意承担义务地对我允诺说，后天下午开始动工做我们的桌子。我们马上填写了下赌的表格。我的妻子填了六月一日。我则填了明年一月七日。



2月1日

奈本察恩俱乐部举行盛大集会。俱乐部成员不断增加。已经有一百零四个人参加下赌活动。一个美容沙龙的老板娘为她所订购的一只抽屉而下了50镑的赌注(答应完工的日期为一月十五日,借口是流行性感冒,交货日期是7月7日)并赢了500镑,因为她既猜对了两个日期,也猜对了借口。聚会是以我们的室内乐四重奏乐队(他们订购的是三把椅子和一张花园里用的长椅)的表演开始的。我们的文化节目中还有一个内容是海法工业技术学校副校长所作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桌子——一件多余的家具》。他以明白易懂的方式阐述了昔日尼安德特人的就餐习惯,从而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宴会之后,三辆公共汽车浩浩荡荡地开往雅法去作传统的朝圣之行。奈本察恩忙得不可开交。他这次答应,星期五下午将交出全部的订货。迟交的原因是,他家里死了人。

9月4日

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准备为奈本察恩的顾客成立一个资助医疗经费的基金会。此外还决定以《永远》为题出一本月刊,专门刊登当前出现的问题:介绍奈本察恩工场里的新机器(附照片),被抽去当兵的师傅、伙计和辅助工的名单,为奈本察恩而下赌的结果,有关雅法的导游,还有一个题为《家具作坊新动态》的定期栏目,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篮球队的训练现在定为每周两次。我们进步得很快。我们将通过贷款来建造一幢属于俱乐部自己的房子。

会议结束之后,按俱乐部章程的规定给雅法打电话。只有奈本察恩的合伙人在。而他本人去外地参加婚礼了。他的

合伙人答应设法加快速度。我的妻子说我们的桌子将于三年后的八月十七日交货，她为此下了300镑的赌注。

1月10日

一件根本就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今天上午，约瑟夫·奈本察恩拖着一张桌子出现在我们家的门口，奈本察恩提醒我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具体什么时候他也记不清楚了——我们曾经向他订购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现在已经做好了。他显然是神经错乱了。他目光炯炯地说："凡是奈本察恩答应的，奈本察恩就一定会交货。请您付运输费。"

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再见了，奈本察恩俱乐部。永别了，理事会会议、文化节目以及打赌活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最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拿这张桌子来派什么用处。我们早就不会坐着吃饭了。最佳夫人说，吃完饭后我们可以钻到桌子底下去休息。

四个凶神恶煞的司机[①]

人在什么时候睡得最香？在办公室里？在看电视的时候，还是偶尔在床上？根据最新的科研成果来看，人在早上五点二十五分这一段时间里睡得最香，也就是说，一到早上五点二十五分，大多数的丈夫就得从睡梦中跳将起来。这时候，由各种各样的声音组合而成的地狱般的吵闹声向他们袭来。最最贴切的比喻莫过于，这种吵闹声就像是由好几盘录音磁带同时倒着放出来的声音的组合。这声音犹如空袭警报，犹如一群蜂拥而来的水牛发出的巨大响声，犹如一群强攻而上的坦克发出的声响，或者说，就像是热带丛林中人猿泰山所发出的吼叫声。

早上五点二十五分。

遭受这一自然灾害侵袭的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把自己埋到枕头里，开始祈祷。而另一些人——大多是被吓得从床上摔下来的人——毫无目的地在卧室和盥洗室之间来回跑动。本文作者在听到最初几声如雷贯耳的声响之后便无言地扑向最佳夫人，扼住她的脖子，直到她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

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并没有人想要谋害我为止。“哎呀，天哪！”有一次我的邻居费利克斯·泽利希早上五点二十五分伏在窗口上问道：“四个男人怎么能弄出这么可怕的响声？”

我们从楼上观察着底下那四个人。这几个人便是为市里开垃圾车的司机、副司机——此人经常站在车外的踏板上——以及另外两个家伙。他们的任务是抓起正在等候的科罗尼亚公司的垃圾桶，以雷鸣般的响声把它们倒干净。乍一看，这四个人普普通通，与一般由卫生局派来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别看他们相貌平平，实际上却是四个精通于制造地狱般吵闹声技术的世界冠军。比如，那位司机基本上只用第一挡，这样他的柴油发动机便发出最响的声音，而那两个搬运工拖着科罗尼亚公司的每一个垃圾桶，让它们在石子路上发出隆隆的响声。与此同时，他们大声地咒骂，听起来好像一场斗殴马上就要爆发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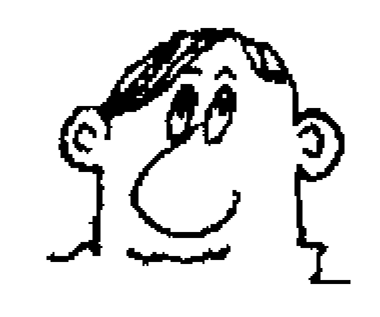
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如果仔细听一下的话，便能从那所能听到的片言只语中确定，他们是在以他们的方式谈论着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所谓他们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谈话基本上总是这样开始的：他们中的一个把已经倒干净的垃圾桶放回房子的走道里，而另一个离开他二十至三十米之远的搬运工则正把一个满满的垃圾桶放到翻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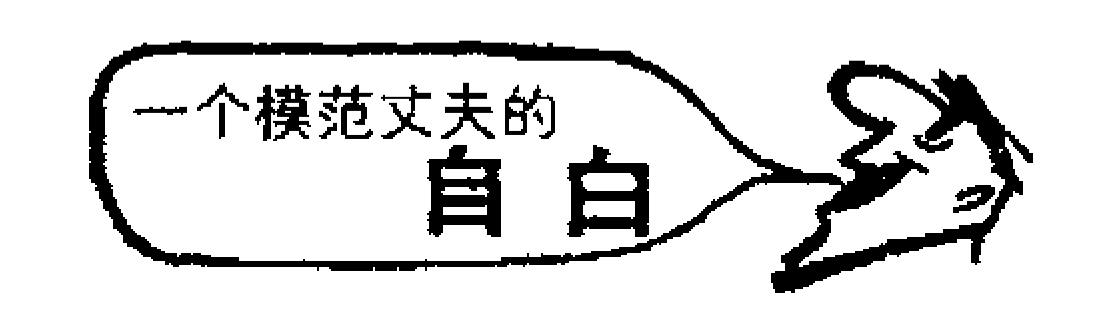
“嘿！”他们中的一个大声吼道。“嘿！你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啊，昨天晚上？”

可回答他的并不是另外那位垃圾搬运工，而是司机。司

---

① 隐喻《约翰启示录》中分别象征着瘟疫、战争、饥馑和死亡的四骑士。





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把手放在嘴边，大声吼道：

“嘿！我们呆在家里了！呆在家里！你呢？”直到这时候，原来那一个被问的人，或者说被吼的人才大吼大叫地回答道：

“嘿！我们去看了电影！看了电影！看的是那部西部片！太棒了！所有的人都演得很好，所有的人！”

即使是两位谈话者并排站到一起的话，他们说话的音量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嘿！难道你不觉得这只该死的垃圾桶今天沉得要命吗？”

“今天确实是沉得要命！再加上热得要命！真是该死！”

命运把卡拉尼奥特夫人的卧室正好安排在我们这幢房子的大门里。为此，她经常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有一回她绝望地拉开窗户，对下面大声喊道：

“请安静！我求求你们了：安静！你们每天夜里都必须这么大吵大闹吗？”

“夜里？怎么是夜里？”那些被祈求的人高兴地重复道。“都已经过了五点半了，五点半都已经过了！”

“假如你们还不停止吵闹的话，我就去叫警察了！”本齐奥·齐格勒也拉开了他的窗户说。那四个凶神恶煞的司机笑弯了腰：

“警察！哈哈哈！去叫警察，去叫呀！如果你在夜里能找到一个警察的话！哈哈哈……”

是的，这就是他们。这就是我们那些长得壮壮实实、肩膀宽宽的、无拘无束、天真无邪的小伙子。他们是新的一代，新的种族，新的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服他们。

这一印象为事实所证实。

在我们这一组房子所召开的最后一次抗议会上，人们把要求由市卫生局出面来制止每天夜里所发生的地震般的灾难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我。我给市卫生局有关部门的头儿打电话，开始陈述我准备得很好的起诉词。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第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他便打断了我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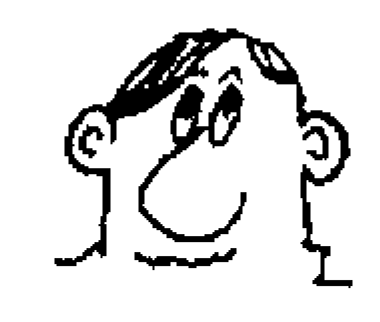
“您用不着向我诉说。我每天早上听到的都是这些话。您说您快要疯了？我才要疯了呢……”

夏天来了，随之而来的夜晚人们总是开着窗户睡觉——如果开着窗户还能睡着的话。我们给当局寄了一份由所有的居民签字的投诉信，寄出后杳无音讯。每周三次给齐格勒家里打扫卫生的女工与站在垃圾车踏板上的那个人猿泰山是邻居。她劝我们不要再采取什么行动了，因为万一这四个家伙对此有所风闻的话，他们便会搞出更大的响声。连我们找的那位律师也只能建议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度周末，因为那儿经常会因为罢工而停止运送垃圾。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

我们试着往耳朵里塞棉花球，刚开始的时候还能起到某种弱音作用。然而，第一声“嘿”的叫喊声就像是用一把锋利的刀来切黄油那样地把棉花球给刺穿了。

在我们最近举行的一次抗议集会上，令人尊敬的医生瓦塞尔劳夫博士作了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报告：

“我们现在所患的慢性失眠和所经受的会导致精神损伤的惊吓迟早有一天会破坏我们神经节的功能。我坚信，在我





们的孩子中，最迟是在我们的孙子一辈中一定会出现某种功能退化的现象。现在这种运送垃圾的方式最后会导致普遍性的智力严重下降的后果……”

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群群的子子孙孙，他们默默地、目光中充满了谴责地望着我们，然后奇怪地像山羊那样一蹦一跳地消失在附近的树林子里。

一定得想想办法。

与那些人谈谈难道不是最好的办法吗？这不仅适合于我们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尊崇了人的尊严，即使是那些运输垃圾的工人也完全有权利享受人的尊严。在我们的内心对那四个正直的人感到肃然起敬。他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开始了繁重的劳动，而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则舒舒服服地躺在温暖的白色被窝中打呼噜，一直睡到五点二十五分……于是，我们便决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能够打动这四个人的心的途径。钱无所谓。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有一天，早晨吵闹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

“嘿！”的吼声从垃圾车的踏板上传到垃圾桶那儿。“天慢慢地要冷了！天要冷了，慢慢地！”

“嘿！”响起了雷鸣般的回答声，“给你自己去买一件毛衣吧！去买一件给你自己！”

“毛衣？你是说毛衣，你说了吗？嘿！我到哪儿去买毛衣啊，到哪儿去买啊？”

我们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我们以子孙的名义，以未来几代人的名义，以近东和平的名义行动起来。卡拉尼奥特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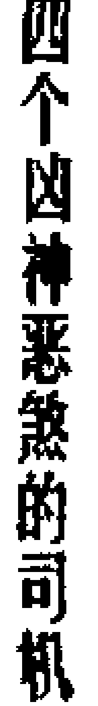
人从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清洁基金会”中取了钱去买了一件鲜红的毛衣(特大号的)。由费利克斯·泽利希率领一个代表团把毛衣送到站在踏板上的那位人猿泰山所住的那幢楼。人猿泰山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费利克斯·泽利希小心翼翼地暗示道:众所周知,暖和的衣服有助于创造一种安宁的气氛。人猿泰山表示完全能够理解,他结结巴巴地用笨拙的语言对代表团表示了感谢,并答应把这些话转达给他的同事们。

第二天早晨五点二十五分,卡拉尼奥特太太被一声史无前例的、让人无法忍受的吼叫声从床上震了下来:“嘿!他们给我买了这件毛衣,是他们买的!这件红毛衣!”

“都是些好人,”有人吼叫着回答道。“他们是好人!确实很好!”

接踵而来的爆炸声盖过了迄今为止的一切声响:站在踏板上的那位人猿泰山因为红毛衣给他带来的高兴而用一个非常花哨的动作将一个刚倒干净的垃圾桶滚回原处,半路上撞倒了另外两只,于是乎三只“手榴弹”在同一瞬间爆炸。

打那以后我的左耳朵听力很差。这样一来我向右侧睡就能睡得很好。而最佳夫人的情形刚好与我相反。这真是一个极好的、又是相当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出这个办法呢。







技术的胜利

吵闹声并不一定非要从外而来。当今，有关方面的专家可以使住宅本身变成制造噪音的地方。最有效的办法是，弄一个奇妙的机器来，把室外的湿气变成室内的噪音。

这是一个秋天，这是一个非常炎热的秋天。实在太热了，以至于最佳夫人在谈话中提到了"空调设备"。"现在吗?"我问道，"都已经是秋天了。"但是，这并没有对她产生任何影响。相反，她起劲地翻阅着桌上被汗水浸湿了的报纸，指着那上面由普隆托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刊登的半页广告。他们用华丽的词藻大力夸耀一种被称作"耳语匣"的新产品：冬暖夏凉，一年四季寂静无声，白天黑夜寂静无声。我只得叹息地表示同意。

"普隆托"公司一个名叫施罗摩的主任工程师亲临我家，为我们查看哪一扇窗户最适合于安装空调设备。此外，他让我们注意机器上一只专门的开关杆，即所谓的"缓和"开关。它的作用是使空调设备在开始起动阶段所可能出现的响声降低到让人听不见的程度。整套豪华设备的价格为 4999 镑，外加 1500 镑的安装费。这两笔费用必须事先以现金的方式付

清。施罗摩对昂贵的安装费的解释是，它包括对墙上所打的洞的一年保修费。

我们付完钱，施罗摩便招来了两个矮矮胖胖的家伙。他们俩在施罗摩的专业指导下撬开了我们的窗台板，装上了一台既能打洞又能焊接的机器。他们又敲又锯的，不一会儿，那台"耳语匣"便成了我们家住宅以及我们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祝贺您，"施罗摩说，"您将会……"

他接下去所说的话被由他启动的机器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给淹没了。这声音犹如一架波音 747 的飞机在启动时所发出的响声。有那么一阵工夫，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我们家的私人飞机场上，倾听着这一由声响汇成的奇迹。然后我对施罗摩说：

"这声音相当大，不是吗？"

"什么？"施罗摩答道。"我听不见您说的话！"

"噪音！"我大声吼道，"噪音这么大！"

"什么？在哪儿？"

他继续往下说着。可是，在我曾经就读的那个文理中学里看嘴唇辨说话的课程只是一门选修课。我没有学过，所以看不懂。我用手势请他跟我到厨房去。从厨房里所听到的由喷气式飞机马达所发出的隆隆声相对要轻一些。在那儿，施罗摩向我解释说，每一台崭新的机器都需要有一两天预热运转的时间，以便使它逐渐熟悉环境。他给我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并补充说，如果明天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他会为此而感到高兴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天夜里我们家所经历的噪音与"音



响和灯具公司”进行生产时所发出的响声相比。每隔十分钟我便从床上跳起来一次，打开电灯，一次又一次地去拉缓和开关杆，以便关掉噪音。然而，这一缓和开关杆根本就缓解不了任何问题，甚至连最佳夫人的怒气也缓解不了，她慢慢地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用最最陈腐的道理来安慰自己，人嘛，对什么都能习惯。可是，当凌晨两点缓和开关杆断在我手中的时候，我便只会说匈牙利语[①] 了——对于我来说，这是神经系统突然失灵的一个标志。

要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时地哭泣着到我们的卧室来抱怨说，他们睡不着觉，因为他们的床不停地在抖动的话，也许我还能睡一会儿。不管怎么说，尽管目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制止噪音，但是这机器总算还给人带来了一丝凉意。

凌晨三点，最佳夫人到各个房间去巡视了一遍，给大家分发耳塞。紧接着便出现了宜人的寂静。波音飞机的隆隆声只是偶尔穿透这一阻音隔墙而已。

清晨五点钟，我妻子在放在我们俩之间的记事本上写道：“早上就把这个怪物退还给施罗摩，知道了吗?”我也同样以书面的形式告诉她，买空调设备的钱已经以现金的形式付清了。当我看到她发出一阵无声的痛楚的喊叫声时，我的心给割成了两半。我突然灵机一动，冲过去，把那个“耳语匣”给关了。

效果之显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航行中的飞机突然停了下来。我们俩就像是两个来自严寒地带的间谍，在从四面八方慢慢地向我们袭来的夏日的炎热中睡着了。

---

① 基雄原是匈牙利人，匈牙利语是他的母语。1952 年，当他二十八岁时，他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之后希伯来语成了他的写作语言。

就在这天早晨，我打电话给施罗摩：

“你听着，”我说，“这个空调设备……”

他没让我把话说完就说：“好吧！好吧！”

“我们收回空调设备并赔偿您全部的购买费用。”

打电话后半小时，那两个矮矮胖胖的家伙便出现在我们家，把那个发出地狱般吵闹声的机器拆了下来并告诉我们，只要出500镑，他们便能为我们把墙上所留下的那个能看得见蓝天的洞重新补上。我一点也没有讨价还价。我是一个很好的认输者。

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又重新习惯于周围安静的环境。但是，正如刚才所说，人对一切都会习惯的。

不久之后，当我们去拜会一对与我们相好的夫妻时，刚一走进他们阴凉舒适的屋子，一架正待起飞的波音747所发出的熟悉的隆隆声便钻进我们的耳朵。

“这东西是今天上午才装上的，”这一家的女主人大声喊着对我说，“但是，我们已经通知普隆托公司我们要退货。我们将损失的是安装费。但总比这样好。”

我走到空调设备旁，那个起暖和作用的开关杆是断的。

作为专家我一眼就把它给认出来了。前不久我不是也有过这样一个空调设备吗？

施罗摩一直退到他办公室底部的墙边。他绝望地想挣脱我扼着他脖子的双手。直到他开始招供，我才松了手：

“光靠空调设备根本就赚不了钱，”他呻吟地说，“进口关税和要缴的税收太高了。惟一能赚钱的地方，是安装和修补墙洞。”

我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押他到仓库去。我的猜疑得到



了证实。仓库里的全部货物就是那台老掉牙的"波音"。那两个长得矮矮胖胖的家伙蹲在一边，咬着夹着意大利色拉米香肠的面包。

施罗摩低下了头：

"是的，我承认我们所出售的总是同一台设备，第二天我们便把它拆了。但是，我总得靠什么东西活下去啊。我有妻子、孩子，还有一个女朋友。"

"普隆托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生意做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要宣告破产呢？对于这件事情刚开始时没有任何人能够作出解释，连熟知内情的人也不知所以然。并不是因为已经找不到潜在顾客的原因。客源是不会这么快就没有的。

经过耐心的调查总算才弄明了以下的事实真相：

施罗摩把他的"耳语匣"卖到了巴特贾姆，卖给了那儿居民区里一位名叫内斯托的德高望重的学者，即一位年事很高的外国移民。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地等候电话，可徒劳一场。当第三天还没有人打电话来时，他惊慌失措地自己打电话去问道：

"这台机器的噪声是否有点大？"

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前辈回答说："可惜，星期五晚上我已经早有约会了。"

原来那老头耳背。施罗摩的那台"波音"，他那惟一的一台"波音"，再也无法在航线上飞行了。

如何把保险搞到手

很有可能会在家里之外遇到一流的专家。昨日夜里当我准备驱车离开停车场回家的时候,竟然遇到了这样的荣幸。一位穿着体面的公民向我走来,对我说:

“对不起,您只需稍稍再往后倒那么一点,便会碰坏我汽车的挡泥板。”

“好吧,”我朝他所指的那块挡泥板所属的又宽又大的美国轿车投去崇敬的一瞥,说:“我会留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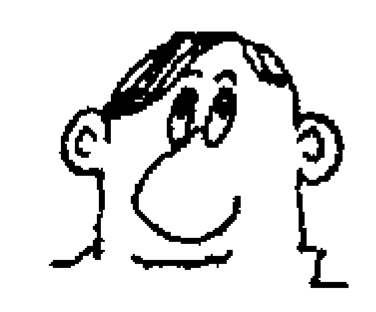
那位穿着体面的公民摇了摇头,说:

“刚好相反,对我来说,您如果碰坏我的挡泥板才好呢。我正在收集车壳的损坏处。”

这话听起来太有意思了。我连忙下车,请他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

我的谈话对手先指了指他车子顶上像脸盆大小的一个凹处。

“我曾经与一个交通信号灯撞了一下。风很大,交通信号灯倒了下来。我马上到我经常光顾的汽车修理站去,汽车修



理站的老板马克斯表示怀疑说：‘韦克斯勒博士，这点儿小毛病不值得修。保险公司是不会付钱的。等您的车壳上再增加一些损伤后您再来找我。’这是马克斯说的，他当然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俩在他汽车上目前还完好无损的冷却器上坐了下来。韦克斯勒继续说：

“每一个保险合同都会有一个附加条款。这一条款规定，一定数目之内的损失费得由买保险的人自己负责。我们这家保险公司规定，由自己负担的数目为 230 镑。因为我这辆汽车现在的修理费只需 200 镑，所以向保险公司报损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我还能向保险公司再报一些损失的话……”

“等等，韦克斯勒博士，”我打断他说，“即使您把您的挡泥板全部弄坏，修理费中所含的第一个 230 镑不也得由您自己来付吗？”

“先生，”韦克斯勒博士说，“这事情您就交给我的马克斯去办吧。”

于是，我便了解到了一个被我称作为“最大限度”的学说。看来，在国际轿车修理工工会（其总会在纽约）和哥本哈根世界轿车司机协会之间有那么一个秘密协定。按照这一协定，汽车修理工可以向保险公司出示所谓“改写过的账单”，在经过改写的账单中自付部分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事实上，汽车修理工可以通过账单上所列的其他款项把自付部分抹去的——其前提是，账单的总金额必须至少要达到 1500 镑。当然，要达到这个数目就得有比较多的损伤。

在谈话过程中得知，我的谈话对象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有一回，他在短短几天里就使修理费达到了 2800 镑。

"可是,这一次,"——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我却拿我车子顶上那个可笑的凹处没有办法。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尝试着给我的车子再添一些创伤——可是没有成功。我曾经在长途车的前面猛地刹车,我曾经试着超市区公共汽车的车,我也曾经把车子停在军用车的旁边——都毫无用处。谁也不愿意碰一下我的车子。所以,现在我只能求助于您。如果能劳您驾……"

"那当然,"我欣然同意说,"人嘛,只要能够,就应该帮其他人的忙。"

于是,我坐到方向盘前,挂到倒车档上,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后倒退。

"停!停!"韦克斯勒喊道。"这算什么?您得好好加大油门,否则的话,您最多只能造成修理费为 60 镑的损伤。"

我集中思想,用尽全力向他的挡泥板撞过去。那响声听起来颇令人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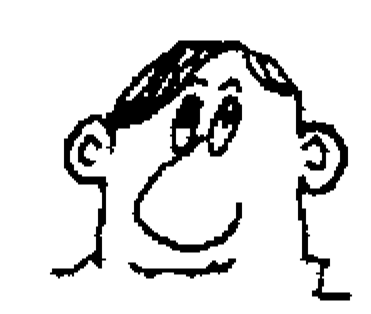
"可以了吗?"我问道。

韦克斯勒从容不迫地摇晃着脑袋。

"不错。但是,至多也只是 600 镑的修理费。以前,当自付部分为 110 镑的时候,只要把挡泥板全部撞坏就足够了,而现在必须得把整辆车都撞坏才能有利可图。是否能劳驾您把我的车门压碎?"

"好啊。"

测了一下距离之后,我便开大油门向他的轿车侧面撞去。只听得一声沉闷的霹雳响,玻璃碎片飞得满地都是,韦克斯勒的车门掉了下来——的确,这是轿车司机互相之间非常感人的友爱精神。



"是不是还要来一下?"

"谢谢!"他说。"够了,我不需要了。"

他的拒绝使我感到有点失望,但是,他毕竟是损失的承受者。我下车观察了自己所做的工作,极其壮观。不仅仅是车门,整辆车的侧面都坏了。需要着实地大修一番。

我回到自己的车边,发现我自己的保险杆弯得很厉害。

"这是新手所犯的典型错误,"韦克斯勒博士充满同情地说。"以后您得记住,撞的时候角度绝对不能斜。可惜,您那保险杆的修理费至多是50镑……您等一下。我再给您加400镑。"

韦克斯勒博士把他那又大又宽的轿车开到一定的位置,然后得心应手地对着我左边的车门撞去。

"现在,我再给您添一盏新的前灯。"

他做得干净利索:只轻轻一碰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不用谢,"他做了一个推辞的手势。"您明天去找马克斯——这儿是他的地址——请您代我向他问好。一分钱也不用您自己来付。"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各种未曾料想到的可能性。或许这只是因为早已成为过去的孩提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破坏欲又向我袭来的缘故?我向韦克斯勒建议说,现在,马上,立刻就让我们的两辆车来一个迎头相撞,但是,他拒绝说:

"亲爱的朋友,别太过分了。干这种事很容易上瘾的。现在,您先让您的保险公司付钱。然后,您再来考虑以后怎么办。"

我们用力地握手告别。韦克斯勒去找马克斯,而我则去找轿车经销商买新车。

只是不能枉法

从结婚到离婚始终向一位有责任心的丈夫效忠的专家无疑是律师。最明智的做法是，做任何事情都得向他请教。不久之前，这一点又一次得到了证实。我们家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不一会儿我们便认出，这人是一个警察。

他递给我一张传票。传票上规定我必须在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到附近的一个警署去。

最佳夫人看到传票，脸色发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急地传唤你?”她问道。“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啊!”我答道。

我太太用审视的目光扫了我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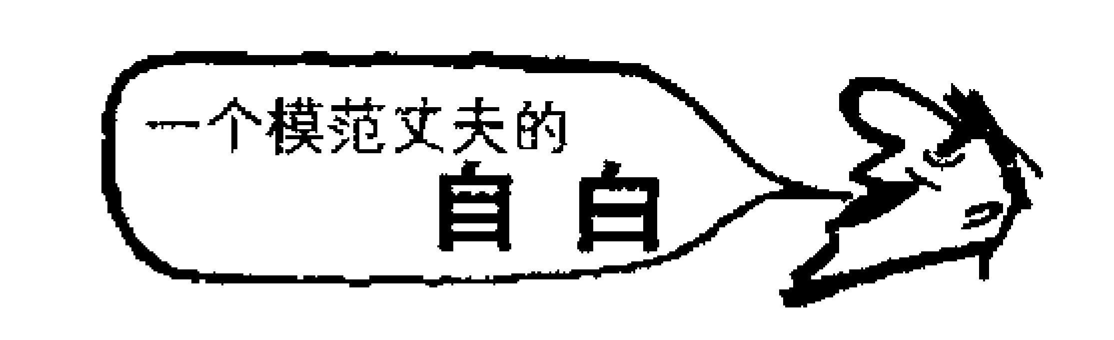
“你不能一个人去，你得去找一名律师。”

“为什么?”

“你怎么会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假设你遇到困难时，就会有人来帮你啊。”

鉴于最佳夫人生平第一次用了“假设”这一个词，对我起到了极大的动摇军心的作用。就在当天下午，我便与约纳汤·





沙伊-沙因克拉格尔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一个堪称我们国家中最能说善辩的律师。沙伊-沙因克拉格尔让我把事情从头至尾详细地说了一遍。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他愿意为我辩护。我在一些立即生效的必要文件上签了字，然后怀着轻松的心情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心情沉重地告别了最佳夫人，在我的律师陪同下来到了警署。正在值勤的是一位警察下士，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友好地接待了我们。

他对沙伊-沙因克拉格尔递给他的传票扫了一眼，便直接去开抽屉，从中取出我前几个星期前丢失的公文包。

"基雄先生，我们找到了您的公文包，"他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说，"这就是。"

我伸手去取公文包，心情愉快地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可惜我打错了算盘，我竟然把我的律师给忘了。

"太令人感动了，"沙伊-沙因克拉格尔的嘴边泛起一丝讽刺的微笑。"可是警官先生，我是否可以请教您，您怎么知道这只公文包就是我当事人的呢？"

下士善意地扮了个鬼脸，笑着说：

"我们在这只公文包里找到了一张洗衣作坊的账单，上面有这位先生的名字。"

"那么您为什么没有想到，"沙伊-沙因克拉格尔继续说道，"这只公文包有可能是洗衣作坊的东西呢？"

"这只公文包是我的，"我肯定地对我的律师说。"我从包左边的酸奶痕迹上一眼就认出来了。"

"请您别插手一件正在审理中的案子，"沙伊-沙因克拉格尔责备我说。

“警官先生，我请您作一个记录。”

“作什么记录啊？拿上您的公文包，走您的路。”

“我们确实该走了，”我表示赞同地说。“这儿没有我们的事了。”

我的律师踱到窗边，把双手背在背后，望着窗外。大约过了一分钟的光景，他转过身来说：

“我的先生们，我会告诉你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哪些事情的。我们得检查一下公文包里的内容。”

大家沉默无语。当然是沙伊-沙因克拉格尔说得对。我竟然会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太笨了。在这一点上又显出了门外汉与训练有素的行家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这就把公文包打开吧。”那位下士叹息地伸手去取公文包。

“我抗议！”沙伊-沙因克拉格尔像一只老虎似地扑了过来。“必须当着一个官方证人的面才能打开这个归属未定的物件。”那位下士捻着自己的小胡子，看得出他花了很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然后他去找他的同事。当他与他的同事一起回来的时候，只见他们俩的脸气得微微发红。

“基雄先生，”只听我的律师说，“现在请您根据您的记忆，把这个公文包里的东西列一个清单。”

“好啊，”我答道。“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那更好，”那位下士说着准备去开那个公文包。可是，我的律师阻止了他：

“我的当事人承认，他已经记不清公文包中的东西了。可是，从官方的角度绝不能把这些话理解为，当时遗失的时候这个公文包里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他说完这话之后，那两位下士望着他的目光怎么也谈不上是“和蔼可亲”的。沙伊-



沙因克拉格尔显然已经习惯于此。他不动声色地将我拉到一旁，再三叮嘱我说："从现在起，在事先没有问过我之前请您什么话也不要说。从现在起这件事情由我来负责。"

然后，他用干巴巴的，但又非常明白易懂的专业术语口授了以下的记录内容：

"根据我当事人的自愿陈述——这丝毫也不会影响预先把他判为这个归属未定的失物的惟一的、法定财产所有人的权利——特此表明：我的当事人因为记忆中所出现的缺陷而无法对这里所提到的公文包中的内容做出负有义务的说明。在作此记录时，这个公文包在作此记录的警署里，而这个警署里的值勤人员诚实地声称，这个所提到的、在若干天之前拾得的公文包是我当事人的财产……"

"等一等，"那个下士打断了我的律师。他站起身来，到隔壁房间里请来了这儿的负责长官。

还没有等负责长官把火发出来，沙伊-沙因克拉格尔便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请求他公正而又客观地来对待这件糟糕的事情。随后，他又一次转身对我说：

"我有责任告诉您，从现在起，您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人用来反对您自己。"

我问他，我是否得为自己辩护？他安慰我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当在场的所有人在记录上签字后，沙伊-沙因克拉格尔缓慢而又大声地说：

"我的当事人并不反对打开这个归属未定的物件。"

负责长官把手伸进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支铅笔。

"基雄先生，"我的律师把每个音节都念得非常清楚地问，

"这是您的铅笔吗?"

我望着那支铅笔。这是一支用旧了的短铅笔,一支极其平常的铅笔。

"现在我还怎么能记得清呢?"我说,"我可不敢发誓。"

在沙伊-沙因克拉格尔的眼睛里燃起了一团神圣的火焰,他说:"先生们,现在的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基雄先生,您是否能肯定,无法将这一书写用具承认为您曾经经常使用过的一件文具?"

"我不是已经对您说过了,我无法确认吗?"

"那么,我要求立即传唤地区指挥官!"

"传唤地区指挥官?"负责长官气呼呼地问。"如果我可以请教的话,这又是为什么?"

他可以提问,我的律师对于每一个问题都采取欢迎的态度,因为他对每个问题都有答案。这一次的答案是:

"负责长官,假如这位所谓的'诚实的拾金不昧者'能够把一支不属于我当事人的铅笔放到这只公文包里去的话,那么他也同样有可能会将一件贵重的物品从这只公文包中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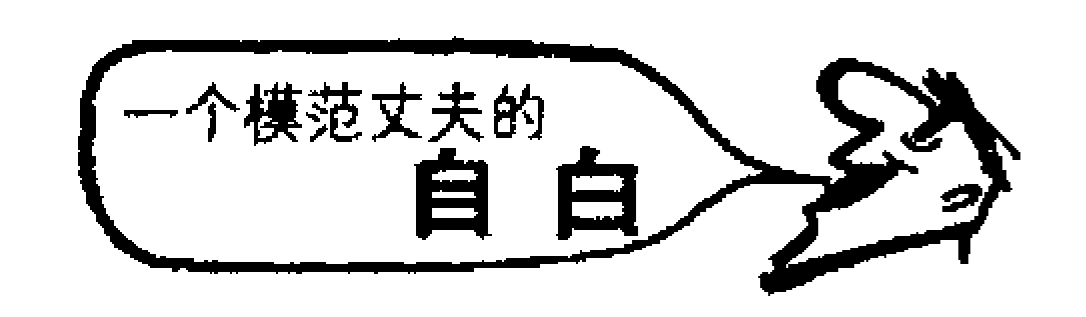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儿,地区指挥官来了。刚一进门,他便吓得退了回去:

"天呐!您怎么也在这儿,沙伊-沙因克拉格尔?又遇见您了,这怎么可能呢?"

即使是现在,我的律师还仍然镇定自若地来回踱着方步。过了一会儿,他挑衅似地走到地区指挥官的面前意味深长地说:

"我以我的当事人的名义特此告发这个公文包的拾主,其理由是:其一,他非法动用我当事人的文具;其二,他有可能从





所捡到的公文包中拿走了东西。"

"这就是说，"地区指挥官以威胁的口气发问道，"您假设这是偷窃？"

"是的。我的当事人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曾经发生过一起与他的公文包有关的、规模不详的偷窃事件。"

"那好吧，"地区指挥官呻吟地说。"是谁捡到这个该死的公文包的？"

一位下士很不情愿地在他的文件中翻寻着："是一位值勤的交通警，时间是前天下午。"

"您想告一位警察行窃？"地区指挥官问我。

"不要回答！"沙伊-沙因克拉格尔一步跳到我的面前，堵住了我的嘴。"您一句话也别说。这些家伙想要加害于您。我了解他们的伎俩。——地区指挥官先生，我们对刚才所说的话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其余的话，我们在有关的法庭上说。"

"悉听尊便。希望您明白，您刚才所说的话诋毁了一个公务员的声誉。"

沙伊-沙因克拉格尔大声吼道："我抗议！这是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地区指挥官的声音也高了起来。"您在污蔑一位正在值勤的、穿制服的警察！触犯了刑法法典第十八条！"

"抗议！我所援引的是《法律公报》第317期附件47上有关公安机关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

"关于这一点还是让有关的法庭来裁决，"地区指挥官气呼呼地说。他转身对我说："我以法律的名义宣布您被逮捕

了。”

沙伊-沙因克拉格尔把我送到关押我的囚牢门口。

“抬起头来，”他说。“谁也无法加害于您。他们没有证据。我们将会证明是那个警察一个人的过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得设法搞到抓主管警察的部长的逮捕令。他得向我们做出解释，为什么不把那位‘诚实的拾金不昧者’抓起来。您放心睡觉。我会去通知您夫人的。”他与我告别时使劲地、充满安慰地握了握我的手。

这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孤独的囚徒的最好朋友便是他的律师。我为有一个这么杰出的人做我的辩护者而感到庆幸。也许，他还能用保释金保我出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三年前，一个沿街兜售的小贩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的门口。他爬上了一层层又陡又窄的楼梯，在每家的门口按铃。一旦有人开门的话，他便小心翼翼地提起放在地上的小手提箱，问道：

"要肥皂吗？要剃须刀吗？"

"不要，谢谢！"这是他经常得到的回答。

"要牙刷吗？"

"谢谢，不要。"

"要梳子吗？"

"不要！"

"要手纸吗？"

问到这儿，一般门总是又被关上了。

打那以后，这个小贩大约每三周到我们家来一次。他按门铃，背诵着他那老一套，等门关上后他才离去。

有一回，最佳夫人动了恻隐之心，想塞给他几个硬币。他非常气愤地加以拒绝。他告诉我们，他不是要饭的，并把门关

上了。

昨天他又来按门铃了：

“肥皂要吗？剃须刀要吗？”

我突然充满冒险精神地说：

“好吧，请给我一把剃须刀。”

“牙刷要吗？”他无动于衷地继续问道。

“我想要一把剃须刀。”

“梳子要吗？”

“难道您听不懂吗？我请您给我一把剃须刀！”

“您说什么？”

“一把剃须刀！”

他的脸上显出非常惊异的神色：

“为什么要剃须刀？”

“一把新的剃须刀！我想向您买一把新的剃须刀！现在就要！”

“手……纸……”小贩用近乎于呻吟的声音说道。

我从他手里夺过手提箱，打开一看，是空的。里面一无所有。

“这——这是什么意思？”

他气得青筋都暴了出来。

“您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来没有人向我买过任何东西。没人买过肥皂，没人买过牙刷，没人买过剃须刀，什么也没有人买过。我为什么要拎着这些东西满街跑？”

“我懂了，”我以平静的声音表示让步，“那么您又为什么要爬上这些又陡又窄的楼梯挨家挨户地去按门铃呢？”

那个小贩说：“先生，因为我总得以什么方式赚钱吃饭啊！”说完这话之后他便转身去按隔壁泽利希家的门铃。



理 发

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一家之长的头上当然还有可能有头发。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挑选专家来进行处理。

我本人经常亲临光顾的理发店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也许算不上豪华，可这家理发店拥有理发所需要的一切：三张椅子，三个洗脸盆，一个小铃铛。只要有人推门，铃铛就会叮当作响，当我第一次使这个小铃铛发出叮当响声的时候，接待我的是一位头顶秃了九成以上的、年纪较大的理发艺术师。他指着三张空椅子中的一张，说：

“请吧！”

当我把自己交到他的手中时，并没有明确告诉他要理哪一种发型，而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齐耳短发！”因为最佳夫人喜欢我留着光滑如丝的长发。他会意地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十五分钟之后，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刚刚开始受训的新兵。这位秃头费加罗的双脚——一直到踝骨处——埋在从我

的头上剃下的鬈发中。他告诉我，他不是这儿的头儿。他把小费揣进怀里，为我开了门。我并没有真对他感到恼火。很清楚，他是迫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心理障碍才这么做的。他的名字叫格里恩斯潘，这也是很清楚的。

大约是在两个月之后，当我刚开始恢复人样的时候，我又来了。格里恩斯潘正忙于接待另一位顾客。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瘦瘦的、戴着厚厚的眼镜片的同事指着一张空椅子，说：

"请吧！"

我决定忠实于那个秃头的格里恩斯潘，再也不让其他人把我当作实验品。我已经习惯于他的变态心理，所以这一回我也许会有对策。

我一边坐下来，一边对那个瘦子说："非常感谢，我想等您的朋友。"

紧接着，那个瘦子把一个理发用的披肩塞进我的领子里，然后去拿剪刀。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情愿等他的朋友。

"是的，"他点头道。他那和气的、苦涩的脸上出现了苦笑。"是，OK。"

"他是上个星期才移民到这儿来的，"格里恩斯潘解释道。"他还不会说希伯来语。"

这时候我停止了反抗。这里所关系到的是为一位新来我们国家的移民铺平道路的问题，关系到各种族之间的融洽和对家乡的感情问题。我绝对不愿意让一个有进取心的手工匠在这方面忍受痛苦。再说，他现在还必须为克服语言上的困难而奋斗呢。

也就是说，我把自己交给了这个移民并搜肠刮肚地找出

我会的所有罗马尼亚语。我试着告诉他：我太太特别喜欢我美丽的头发，所以我愿意把头发留得长一点。我用清楚、明确的手势告诉他，这儿，只需要稍稍修掉一点，这儿需要修剪的地方更少一点，而这儿则一点儿也不需要剪掉。同时，我说得很慢，慢得就像一个不会说罗马尼亚语的人说罗马尼亚语一样。那位移民全神贯注地听我说着，他是从波兰来的。由于这一地理上的误解，他把我的头发剃得短得就像一个水手。他给我倒了香波并给我按摩——这完全是多余的，又倒了半瓶科隆香水洒在我的头上。如果这是出自于一个一般的理发师之手的话，那我是绝对不会罢休的。可如上所述，这是出自于塔代茨之手，他到我们国家才一个星期。对于我的每一种不满的表示他都理所应当地会把它理解为敌意的、不是犹太人应有的态度。

又过了几个星期之后的第三次则让我感到大有希望。我走进理发店的时候，新来的移民正忙着给一位不知姓名的犹太老头剪胡子，而那个值得信赖的秃头格里恩斯潘则站在一旁无所事事。我已经坐到了他面前的椅子上，这时候，格里恩斯潘却突然解下他的白大褂，说了声“今天就干到这儿”。我在镜子中看到，来接替他的是一位我至今还不认识的第三者。这是一位年轻的东方小伙子，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沙巴塔伊。

“您想要什么？”他用喉音说着希伯来语，“先生，是要理发吗？”

我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原本是想要挑选那个移民塔代茨的。他已证实了自己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沉默寡言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一定坚持要塔代茨为我服务的话，就很容易会被人理解为是对在我

们国家生活的东方民族抱有一种成见，而我是很不愿意这么做的。我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格里恩斯潘，希望他能提出一个调停的建议，可他全神贯注地在看晚报。我只得靠自己了。

我对沙巴塔伊说："我喜欢留长发，您尽力而为吧！"

"好吧，上司，您的愿望就是对我的命令，"沙巴塔伊不停地说着。即使在为我剃头的时候他也滔滔不绝地说啊说的。看啊：在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生平以及摩洛哥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阶段之后，居然还在我的头上留下了很多头发，比近年来在他之前为我剃头的所有理发师所留下的头发都要多得多。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惊喜。

四月初，我又来了。我马上就明白自己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格里恩斯潘正忙于对付一个年轻的先锋派那满头漂亮的头发，而塔代茨和沙巴塔伊则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猎物。事实上他们俩同时指着他们面前的空椅子，像二重唱似地齐声说道："请吧！"

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类似的、需要快刀斩乱麻的局面。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不管我选择谁，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除了自杀别无他路。

在这两个人中间必须选一个，或者说，一定得选一个。我选择了沙巴塔伊。

我刚一坐到他的椅子上，就开始为我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塔代茨像触了电似地蜷曲着身子，尽管他自己可能并不知其所以然。他拖着脚一小步、一小步地退到屋子的后面。不久，便从那儿传来了轻轻的抽泣声。我装作一点儿也没有听见。但是，在我紧闭的双目之前出现了一种幻景：塔代茨又回到了他的家乡，他的孩子们围在他的身边问他：



“爸爸，你为什么要哭啊？”

塔代茨答道：

“他选择了另外一个人……

再说，连沙巴塔伊也因为我所作出的这一残忍的决定而感到委屈。他竟然把我的头发剪得像上一次塔代茨剪的一样短。

这一悲惨的事件一直要到不久之后才有可能被弥补。说是不久之后，其实当然也是过了很久，因为我必须等到我的头发重新长长了，才能补偿塔代茨为我所蒙受的冤枉。

当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便上路了。我的行动计划考虑得相当周到。我一直在理发店的门口徘徊，直到我深信，只有塔代茨一个人闲着。就在这时候，我冲了进去，直奔这位移民面前的椅子——可哪里知道，竟然有一位我从外面无法看到的、满脸胡子拉碴的小侏儒排在我的前面，抢走了我的波兰人。

沙巴塔伊以慢得近乎于残忍的速度在一条皮带上刮着他的剃刀，一边始终用眼睛瞄着我，而塔代茨则避开我的目光，好像是惧怕重新受到我的侮辱似的。至于格里恩斯潘则装作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

我就这么屏住气，神经紧张地坐在专供等候的椅子上。谁会先完呢？是沙巴塔伊呢，还是塔代茨。如果是沙巴塔伊将我弄到手的话，那么我那波兰移民兄弟便完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在萨奈山上的卡塔丽娜寺院里住着一位僧侣。这位僧侣以前曾经是一位成就显著的理发师……

只差那么一点儿——这里的只差那么一点儿确实得按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那位摩洛哥人先完了。坐在塔代茨椅

子上的那位小侏儒还剩下剃去一些柔软的毛发这最后一道程序，而沙巴塔伊则已经开始为他的客人刷去身上的头发。然后，他转向我，指了指面前的空椅子说："请吧！"

我鼓足了勇气，说：

"谢谢，我等您的同事。"

那位昔日的波兰人顿时脸上发光，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而沙巴塔伊则感到一阵头昏眼花，不得不抓住他面前的椅子。

"可这是为什么……"他用耳语般的声音说道，而且声音越来越小。"我已经完了……我怎么得罪您了……为什么……"

就在这时候，塔代茨也为那位侏儒搞完了。他为侏儒掸净了头发并把他送出门去。只剩下了我和沙巴塔伊两个人。

以前，我从未像这时候这样清楚地意识到，人只能听凭于命运的摆布。我完全可以想象，尽管谁也没有错，可这一切将以谋杀或斗殴至死而告终，就像希腊悲剧一样。屋子里的紧张气氛简直让人受不了。那个新移民的嘴唇无声地抽搐着，连鼻子也在翕动。毫无疑问，现在只要我向沙巴塔伊再走近那么一小步，塔代茨就会瘫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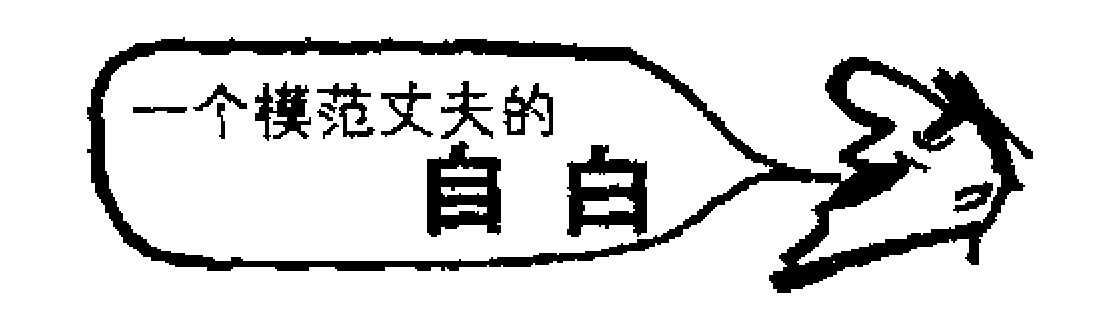
沙巴塔伊用他那东方人火辣辣的眼光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他手中的剃刀在颤抖。

格里恩斯潘把背转向我们，在数收银箱中的钱，可是，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只是装出来的：他突然转过身来，用受伤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然后才又装着继续数钱的样子。他也喜欢我，只是不想表示得太露骨而已。

我用沙哑的声音说："请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不能……"

谁也没有动一下。三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每一双都





好像在说：

"选我……你必须选我……"

也许可以达成某种妥协，也许可以让这三个人轮流来给我剃头，或者，我们来玩俄罗斯的轮盘赌。如果有谁赢了，其他那两个就得开枪把自己打死……只是不要让这恐怖可怕的寂静再持久下去……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也可能是过了半个小时。塔代茨哭了。

"好吧，"我轻声地说。"难道你们无法决定吗？"

"先生，我们无所谓，"沙巴塔伊脱口而出，"得由您来选择……"

那三双眼睛继续盯着我。

我走到镜子前，用手捋着我那雪白的头发。在这半小时内我老了几岁。可还是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那个理发店。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光顾过那个理发店。我任凭自己的头发长长，再长长。我留着嬉皮士似的长发。

我那嬉皮士似的长发居然是因为一家理发店里的三个理发师而蓄起来的，有这种事情吗？

回来吧，戈尔德施泰因，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

专业人员总是期待别人用非常细腻的感情来对待他们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高高在上、站在梯子上展示他们手艺的、来自于手工业行会的魔术家。

至于究竟是谁去请施罗摩·戈尔德施泰因来重新粉刷我们卧室的这一问题，在我们家里总是会一再地引起激烈的争执。最佳夫人声称，因为天花板上的那些斑痕，我把她的生活变成了地狱。而我这方面呢，只记得她那些内容变化不大的叫唤声："你看那墙壁啊！你看那墙壁啊！"

不管怎么说——有一天早上，她在我们邻居泽利希家门口发现了两个扛着梯子、拎着颜料桶的粉刷工人。于是，她马上悄悄地走到那儿，把他们请到我们的卧室来。他们俩，施罗摩·戈尔德施泰因和他的助手马姆德说，好的，他们会来的，如果合适的话就定在星期四早晨七点半。至于付多少工钱的问题尚未谈妥，只约定先预付现金200镑。

星期四早上他们七点十分就来了，真是太准时了。马姆



德仔细地用外国报纸把我们的家具遮了起来，并用“耶路撒冷邮报”铺在我们的地板上。下一步，他们撑起了一个彩色的木头楼梯，用手帕蒙在嘴巴上，冒着灰尘把三面墙壁和半个天花板刮得干干净净，然后便走了。

当然，走的只是戈尔德施泰因和马姆德，至于梯子、报纸和我们脚下的灰尘还留在那儿。刚开始时，我们想，这两个粉刷房间的工人只是去购买颜料等东西了，可三天之后我们有点沉不住气了。在一间铺满了报纸，一起来脚便陷进灰堆的房间里睡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戈尔德施泰因曾再三叮嘱我们不能把它——当然是指灰沙，而不是指戈尔德施泰因——扫掉，因为如果有颜料滴下来的话，灰沙对地板能起到一种自然的保护作用。并没有什么颜料滴下来，可是也见不到戈尔德施泰因的踪影。

“他看上去是那么的规矩……，”最佳夫人摇了摇满是灰尘的脑袋说，“我真不该信任他。”

她到对面的泽利希家里去，发现他们家所处的情况和我们的一样：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梯子、颜料桶，还有很多灰尘，除此之外既没有戈尔德施泰因，也没有马姆德。这两个家伙在泽利希家里也只干了半天的活。在他们离开之前，马姆德曾有所准备地打掩护似地问道，早上能不能总是给他喝一杯牛奶，因为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先说声谢谢。打那以后，他和戈尔德施泰因便销声匿迹了。

上星期六泽利希一家到拉马特甘去看望他们的朋友弗里德兰德一家。他们一进这家的过道，便受到了一架孤苦伶仃的梯子的欢迎。梯子代替了“戈尔德施泰因曾经到此一游”的题词。所有迹象表明，他是在离开我们家之后马上就到那儿

去干活的。几天之后，马姆德来通知我们说，他们的两个妻子，即他的和戈尔德施泰因的妻子都住在医院里。这是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们。

最佳夫人说："埃弗赖姆，我们在和两个疯子打交道。"

这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疯法，也许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而引起的：这两个人都不会说不字。在我们周围所作的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至少在八处地方发现了由戈尔德施泰因-马姆德所留下的踪影。这两个孜孜不倦的手工匠接受每一个委托，总是准时到达，撑开他们的梯子，在这儿刮掉点什么，在那儿敲掉点什么，然后便又去找新的猎物。在与我们家毗邻的那组房子里，有一家人家在由颜料桶和灰浆构成的混乱中生活了三个月。一天晚上，戈尔德施泰因突然出现在他们家里，他摸了摸墙壁，喊了一声"干了"，换上另外一件工作服走了，打那以后又有六个月没见到过他的踪影。这位施罗摩·戈尔德施泰因，他的顾客很多。他从来不留地址。他属于那种老是说："不，不，您用不着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打电话的，"那一类人。而马姆德则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呆视着前方。他一边抽着烟蒂，一边搅拌颜料。

这两个人都精通他们的手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戈尔德施泰因出现的话，那么谁也比不上他。他擅长于油漆门和门框。可是，他总是习惯于把漆好的门搁在两把椅子上来晾干。但是，只要门干了，便可以坐在上面。许多戈尔德施泰因的顾客都有过好几个月在平放的门上吃饭的经历。

几天前，我们去拜访了施皮格尔一家。他们家客厅的一角布置得很有趣味，放在那儿的梯子和颜料不由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那种流行艺术。



我们自然而然地说起了施罗摩·戈尔德施泰因的世界，并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友好可爱的同时代人。他会不会是有点累了？肯定是有点累了，可他不总是在四处走动吗？他是在什么时候走动的？可谁也没有见到过他在路上啊！他会突然地出现，带着他的全套人马：梯子和马姆德。

“他可能是生活在一辆房车里吧，”弗里德兰德想了想说，“这会便于他的行动。”

警察要求一个曾经被戈尔德施泰因拜访过、可又被他遗弃了的顾客描述戈尔德施泰因的外貌，以便捉拿他，但却遭到了那个人的拒绝。那位顾客只记得戈尔德施泰因蒙在嘴上的那块手绢。就凭这一点来怀疑戈尔德施泰因企图抢劫肯定是很不公平的。戈尔德施泰因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他虽然会突然袭击似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可他从未抢过什么东西。相反，他总是给人留下一点诸如梯子、颜料桶和报纸等东西。

目前，戈尔德施泰因的牺牲者已经有上百个。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协会，协会的名字叫做“门桌骑士协会”。我们协会的会长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作家。十八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着戈尔德施泰因的出现，这一点可以以戈尔德施泰因留下的报纸上的日期为证。

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有诸如戈尔德施泰因住在哪儿？他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梯子的，等等。

我们一致认为，他肯定会有一台电脑，否则的话他便无法统观全局。至于他的生活费则来源于别人预付的工资。

我们执行委员会的调查表明，戈尔德施泰因在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同时在七个住宅里出现。其中有一处是在北部的拿撒勒。据说还有人在加利利看到马姆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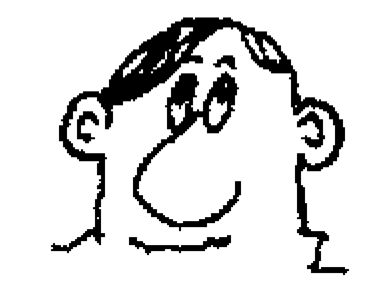
在撬门，而戈尔德施泰因本人则在特拉维夫-雅法的海滩上打乒乓球。

由于我和最佳夫人觉得很难在颜料桶和旧报纸之间继续生活下去，于是乎，我便在我们最近一届的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了通过系统的搜查行动来寻找戈尔德施泰因的申请。我们这些会员互相之间必须经常保持联系，可以通过对讲机来联络。只要戈尔德施泰因在哪儿一出现，我们便派猎狗去搜寻。弗里德兰德是一个中气很足的男中音，因此，他的任务便是负责呼叫："戈尔德施泰因，您被包围了！反抗是没有用的！快投降吧！"

在接下去的几轮谈判中，戈尔德施泰因自然会尝试着用"明天肯定来的"允诺来摆脱包围。但是，我们是不会同意的。我们给他派一辆带司机的轿车。戈尔德施泰因企图支吾搪塞，他想把马姆德留在我们这儿作人质。没门！不，不上他的当。他需要松节油吗？我们会帮他送到工作场地去的。

到了晚上，给他一点吃的，外加两杯牛奶，一杯是给马姆德的。他必须在盥洗室里过夜……

全是梦想。全是幻觉。每当我们发现戈尔德施泰因的踪影，等我们一冲到那栋房子里时，他便失踪了。也许他正站在一所位于海尔兹利亚的住宅起居室的门坎上架他的梯子，而马姆德则正在开始搅拌他的颜料。



密封的阳台

总有一天你会再也忍受不了那些手工匠的。这是在所难免的，再说你也完全有能力自己来毁掉自己的家。

前期工作是由富克斯阳台公司做的。他们的活儿干得干净利索。这个公司在社会上是以“专门封闭阳台的富克斯”而著称的，他们的格言是“由富克斯封闭的阳台滴水不漏”，富克斯来了，他量了尺寸，又走了。一小时后他带来了尺寸合适的全副移窗。在他装移窗的时候，我问道，这些窗户是否真的能够挡雨。

“那自然，”富克斯滴水不漏地回答道，“我已经把所有必要的嵌条都装好了。”

与富克斯联手工作的是市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位特派员。富克斯每天工作时他都跟在后面，并把富克斯在密封阳台的过程中所有违反规定的操作行为都记录下来。等那位监察员一走，冬天便来临了。

只要雨水不从西南方向打来的话，我本人并不反对冬天。然而，只要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防水阳台便会变成一个人工

湖。这时候，所有在和平时期聚集在外面的东西：扫帚、箱子、旧灯罩和放土豆的盒子都会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潮气。到了第三天，水气渗进了我们的房间，水上漂浮着上帝的灵魂。最佳夫人和我手里拿着破布、毛巾、桌布、床单和各种各样的布头站在一扇扇的门边，抗洪抢险。我们干了整整两天。之后便不得不去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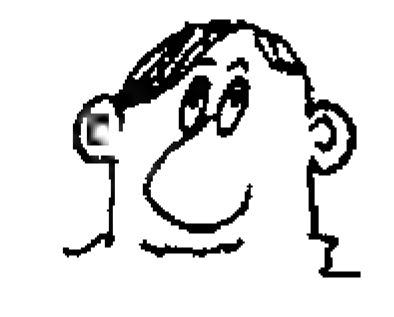
富克斯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便来了。他用有经验的目光审视四周，然后为我们作出了专业性的结论。他说："雨水漏了进来。不过没关系，马上就是夏天了。"

如上所述，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个负有责任心的丈夫一般总会亲自出马来主宰自己命运的。当树叶飘落下来[①]，而"富克斯"又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便自己挺身而出，以便从这湿漉漉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我们首先决定，堵住那些裂缝和空隙，清新的湿气正是从那儿钻进来的。我们搬来一张椅子，在椅子上再叠一张椅子，登上去，摔下来，从地上爬起来；搬来一张桌子，把椅子放在桌子上，再登上去（最佳夫人在下面扶着），去找那个漏雨漏得最厉害的地方。

只见雨水滴进来，可根本就找不到什么漏雨漏得最厉害的地方。

所有该密封的地方都封住了，所有的嵌条都嵌得好好的。一切漏洞和空隙都被玻璃和嵌条堵得严严实实的，连能够钻得进最小的蚊子的最小的缝隙也不剩。可尽管这样，那上面还是会积水，然后汇成一滴水珠——滴答一声——每四秒钟

① 指秋天已经来临。



有一滴水落到土豆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豆上已经长出了最最可爱的绿芽。至于这雨珠究竟从何而来，则实在是不得而知。它会突然出现，然后滴落下来。

我们的一位女邻居声称，在我们的玻璃上肯定有什么地方有一些细孔，雨水便是从那儿渗进来的。

我让她一边歇着去。假如她再说出这一类无聊话，我就要堵住她的嘴。

毫无疑问，我的想法是好的。必须把可能的裂缝都堵住。可是，用什么东西来堵呢？我们家里可没有什么材料可用来堵的。噢，不，等一等，有了！就是那种令人厌恶的东西，那种我们最小的孩子用来捏各种各样的动物、尤其是用来捏蛇或其他什么幻想动物的那种材料——橡皮泥，对了，就是那种用来捏模型的橡皮泥。

我一只手拿着一团令人恶心的、黏糊糊的红色东西，另一只手打开窗户，开始顶风冒雨飞快地用柔软的陶土把整个窗框都封起来。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水手，爬在高高的桅杆上，我的脚下是汹涌澎湃的大海，而我的头上则是电闪雷鸣、布满乌云的天空。但是：嘿，终于大功告成了。我的眼睛因为得意和激动而闪闪发光。

仍然在漏水。

从一开始起就很清楚，用橡皮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要不了十分钟，橡皮泥变硬后便会掉到马路上去。

第二天早晨，最佳夫人搞来了一种专门对付这种情况的材料，它的名字我给忘了。这是一种潮湿的、液体状的物质。它粘在我们的鞋子上，被我们带到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也带到了那些绝对不可能漏水的地方。稍稍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

们又重复地干了一遍，然后我们便去睡觉了。现在，漏水的地方至少是换到别处去了，它显然是因为我们的勤奋而让步了。总算还好。

翌日，我们又从另一家专卖店买到了专门对付这种情况、叫做"塑料水泥"的材料。这是一种经过科学检验、有官方鉴定的、保证防水的材料，我们的密封阳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材料。我们把它弄成一层层的，在窗框和玻璃之间以及玻璃和镶条之间各嵌上一层，总而言之，到处都给它嵌上一层。等搞完之后，哪儿也别想渗进一小滴水来，除了下雨。

当然，不能把接踵而来的全线崩溃理解为这个词本来意义上的那种崩溃——我们宁愿把它称作人的健全理智的一种精神胜利法。雨水想要到我们家来吗？那就欢迎它来！请进！可只能让它到那间最好的房间里！哪儿有漏水的地方，我们就在哪儿放上锅碗瓢盆，不一会儿，我们就把水给制住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它给包围了。我们的阳台不再是一个积水潭了，除非是那些锅碗瓢盆里的水盛满之后往外溢出来。到那时候，我们又拿出了更大的锅碗瓢盆。由于巧妙的安排，水从小盆流进了大盆里，而再也不会流到旧灯罩里去。可惜的是这套方法有一个致命伤。也就是说，过了一阵，等那些大一点的盆啊瓢的装满了水，照样会往外溢。这下就再也没有办法了。

可是，要让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丈夫想出一个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般大约需要一个星期。对于上述情况的解决办法是，住房和阳台之间有一道门把两者一分为二。假如把这道门关上的话，就看不见另外一边所发生的事情了。于是，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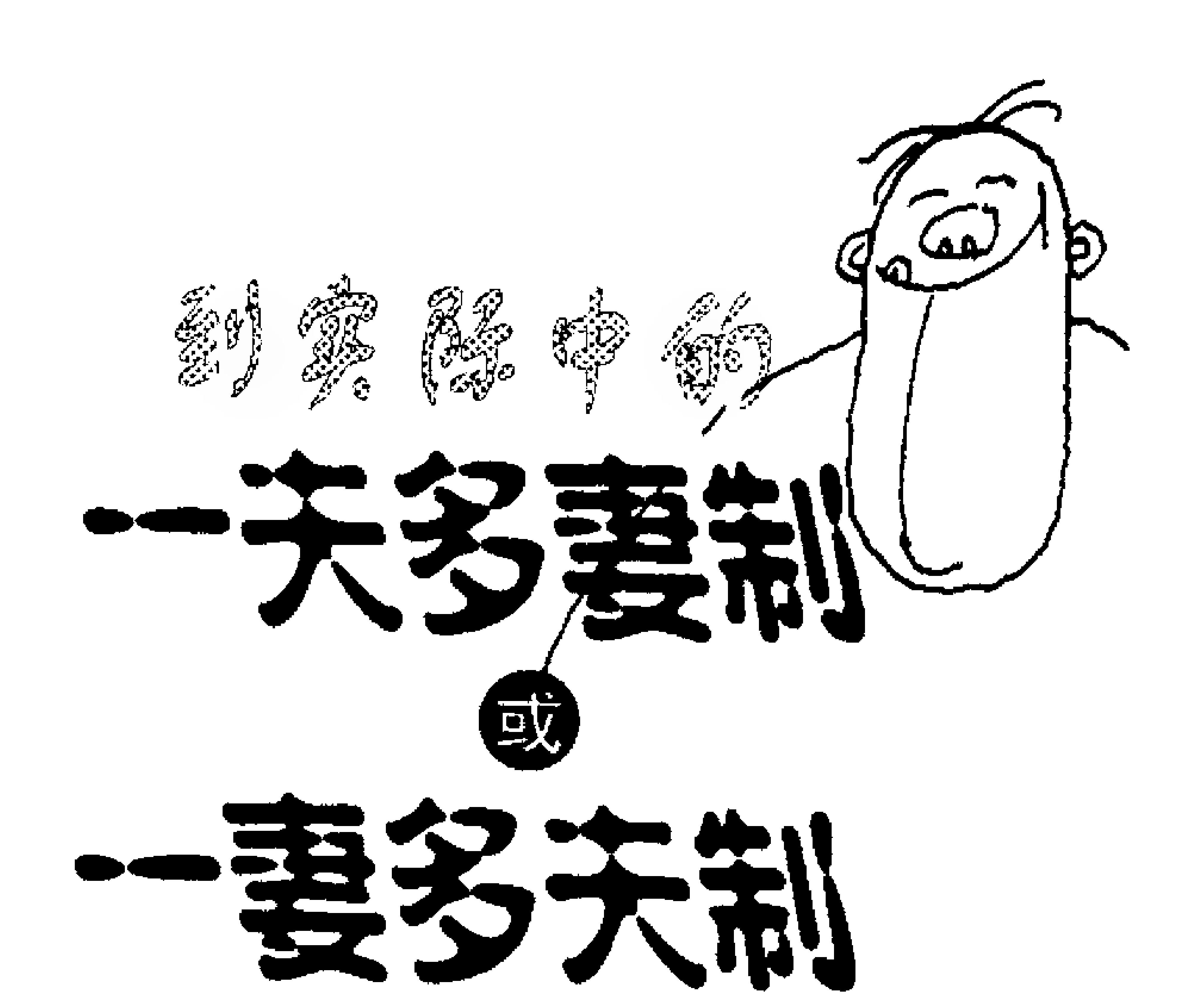


水尽管可以进来，但仍然是在外面。与阳台之间的联系被隔断了。从现在开始，那些锅碗瓢盆、扫帚和土豆之类的得自己看着办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阳台被封得水泄不通。



从理论上的
一夫一妻制



到实际中的
一夫多妻制
或
一妻多夫制

完美的婚姻

在模范丈夫所遇到的问题中，不可避免地也包括婚姻本身，这是我们这个注重效率的社会中最为流行的谈话资料。在最近一次朋友聚会中我们便谈到了这一话题。

像寻常成年知识分子聚会时那样，夫人们退居到沙龙的一角，而我们这些先生则在这一晚余下的时光里聚在一起。我们从所得税谈到最近几次选举，然后话题又转到伊丽莎白·泰勒的第八轮丈夫。在这个话题上我们所停留的时间稍稍长了一点儿，这也许是因为在坐的大多数人都与这位幸运的第八轮丈夫的年龄相仿的缘故吧。

工程师格利克直言不讳地说："一个男人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迟早会认识到，婚姻是一场灾难。"

当场所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85%的婚姻糟糕透顶，11%的婚姻令人难以忍受，3%的婚姻还算过得去，剩下的1%则不得而知。

于是乎，我们便扪心自问，出现这一令人沮丧的数字是不是因为我们男人的过错？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有



人讲起了他的邻居。此人结婚三十二年来一直很幸福，不过，他先后与五个女人结过婚。

“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一位名叫古斯塔夫·施莱辛格尔的来宾说道，迄今为止他尚未开口说过话。“不断地离婚，再与另一个女人结婚——用这样的伎俩自然是谁都能做到婚姻美满啦。然而，以我和克拉里塞为例，我们结婚二十年来一直都非常和睦。”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说话的人，他英俊潇洒，两鬓稍稍有点白发。

他继续说道：“这并不是因为克拉里塞是上帝的宠儿，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特别有教养。不，原因并不在这儿，而是我们发现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婚姻会离异的原因。”

“为什么？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从四面八方向他发出这一急切的问题。“请您解释得更加清楚一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绝大多数的婚姻失败的呢？”

“先生们，全是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是日常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日常的磨擦使两个紧密相连的人的生活变得痛苦不堪。让我来举几个例子吧：

“我想去睡觉，而我的太太则还想看书；早晨醒来时我精神十足，很想干点什么，而我的太太则依然感到困倦，还想睡一会儿；早餐时我喜欢看报纸，而我的太太则喜欢在这时候与我聊天；我喜欢吃小的红萝卜，而她则无法忍受我嚼萝卜时发出的响声；我喜欢散步，而她则喜欢听音乐；我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来自纽约的有关生意上的长途电话，而她则一连几个小时与女朋友闲聊什么佣人的问题；我看重……”讲到这儿，他的话被好几个来宾打断：“请别说这些具体的事情。您的谈

话对象都是一些有经验的丈夫。那么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是双方都得有良好的愿望,都必须本着宽容、善意和互相谅解的精神来克服夫妻间所必然会产生的那些小小的矛盾。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克拉里塞想看由我们本国电视台播放的电影《人猿泰山》,而我则想看由约旦电视台转播的、在座的各位可能也熟悉的跳肚皮舞的舞蹈演员法蒂玛的表演。当时,我们俩几乎要吵起来了。可是,争吵并没有发生。吵到一半我们俩突然停下来笑了起来。‘为什么,’我们互相问对方,‘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毛巾?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一方法推而广之地用到其他方面去?’就在第二天,我又为克拉里塞买了一台电视机。打那以后,在谁想看哪一个频道的节目方面所发生的麻烦便彻底解决了。”

古斯塔夫·施莱辛格尔停顿了一下。

“就这些吗?”有人问。

“不,这才开了一个头。这种二元制的原则逐渐地被推广到我们共同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我们所喜欢的报刊和杂志我都各订两份。我们家有两台晶体管收音机,两架照相机和两个孩子。我送给克拉里塞一辆轿车,这样她行动起来便更加自由了。我们在阳台四周砌了墙,这样我便有了一个自己的卧室。”

“啊哈!”围在四周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啊哈!”

“没有什么可以‘啊哈’的,”施莱辛格尔答道。“恰好相反,我们的婚姻因此而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自从我们买了第二个电话以后,阻碍我们和谐的最后一道障碍也被消除





了。”

“可是，购置所有这些东西不是要花很多钱吗？”这时候有人向施莱辛格尔提出了这一问题。

“对于一个美满的婚姻来说，任何代价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有良好的愿望，那么任何由于良好的愿望而产生的财政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我租下了我们住的那栋楼顶楼的一个工作室，尽管我为此而必须接受银行的贷款。”

“工作室？什么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啊。毫无疑问，改建了的阳台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但是，总还是有些地方会产生小小的磨擦。比如说，我们共用一个浴室，共用一个衣帽间，还有我们之间的谈话等等。当克拉里塞得知顶楼有一间工作室空出来时，我们便马上下了决心，一周后我便搬到楼上去了。你们一定很难想象，这对我们的婚姻来说有多大的益处。早晨，我们再也不用无聊地面面相觑了。我爱吃多少小红萝卜便吃多少。我们的邮件也是分开送的……”

“怎么会这样？”

“克拉里塞重新又恢复了她的娘家姓。于是，我们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阶段开始了。不过，还没有好到不能改进的地步。我仍然得考虑到，在我太太和我的心理状况不利于会面时会与她在楼梯口不期而遇。还有，孩子们的吵闹声也会打搅我。所以我们便决定，我搬到城市的另一头去住。”

“这对您的婚姻生活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吗？”

“您是指……”

“是的。”

“好吧，不是还有旅馆吗？我们还不时地会在电影院和马

路上碰面。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我们便互相友好地点点头。最主要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再也不紧张了。我们已经永远地超越了这个阶段。惟一可能会引起争执的是孩子。可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我把我的住所搬到耶路撒冷时,我带走了我的儿子,女儿则留在克拉里塞那儿。我可以向您保证,这样的安排是最佳的。"

"您太太对这一切感到满意吗?"

"她很高兴。今年夏天她给我写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完全是由衷的。我们为之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用理智和良好的愿望成功地解决了我们在共同的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的朋友们,我得给你们一个忠告:在你们产生离婚的念头之前,当你们考虑离开婚姻的港湾之前,或者是当你们在想出其他花里胡哨的解决办法之前,你们必须共同努力,在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去克服你们所遇到的那些小小的、无关紧要的困难。这样的话,你们便会和我一样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古斯塔夫·施莱辛格尔靠在他的椅子里,在我们羡慕的目光中显得扬扬得意。

"尽管如此,"工程师格里克说。"我仍然认为,婚姻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很不正常。您的情况是一个例外。"



有力的按摩

“在婚姻之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婚姻?”连最最模范的丈夫也时常会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就我这一方面来说,我定期看广告。这些广告在我们日报“小广告”栏目中《保养身体》和《拾零》的小标题下犹如野草似地越长越茂盛[①]。“野草”这个词也许用得不太贴切,但是“丰满”一词则在好多广告中都被特意地加以强调。比如,一个“胸部丰满、有着异国情调的姑娘”告诉我,她正在等候我的电话,或者,与之相反,“长着一头金发、身材苗条、腿特别修长的马丽莲”向我毛遂自荐,愿意做我的按摩女郎。我冥思苦想,马丽莲长着一头金发而不是深褐色的头发,这会对她的按摩产生什么影响呢?那位具有异国情调的女子有着丰满的胸部,这与她的揉捏技术又有何相干呢?我扪心自问,这一切何以致此?为什么没有读到过类似一个身材修长,脸晒得黝黑的会计的求职广告?

这一切都显得非常神秘。身材极其苗条的赞德拉愿意向我提供“具有私人气氛的个别治疗”,这究竟是指什么?她的意思是不是,只要我在她那里,她就不给别人揉背?什么叫做

"私人气氛"？难道她想在大庭广众面前替我按摩吗？皮肤黝黑的苏莎娜则向我大喝一声"停下，这儿有个惊喜！"——她想吹鼓一个纸袋，然后突然放到我的耳边拍爆？还是想送给我一阵恐怖阴森的口哨声？

那位身材柔软的莉莉小姐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在我用早餐喝咖啡的时候，她就让我知道，她准备在午夜之后为我提供特殊的按摩。请您设想一下，这一充满人道主义的恭候在实际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比如，你会因为关节疼而突然在凌晨三点钟醒来，你一边穿衣服一边还得安慰被你吵醒的太太："亲爱的，关节炎这一老毛病又犯了，都是因为办公室里那个该诅咒的电风扇。我得到那位身材柔软的莉莉小姐那儿去走一遭。你好好睡吧……"

迟早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一位真正的女按摩师得如何来向别人解释她确实是作按摩的。也许她得登一条广告，措词如下：泽尔玛·弗里德伦尔女士，五十岁出头，戴眼镜，提供按摩治疗，不带任何惊喜。或许她得去找一份其他的职业？

我们必须得清楚地意识到，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就已经有按摩这门艺术了。当夏娃刚一离开亚当的肋骨，亚当便开始寻找一位女按摩师，以便借她的手来为自己减轻肋骨处的痛楚。换一句话说，按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所以，毫不奇怪，女按摩师们也想以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

如果两个不同性别的成年人迫切地需要利用各自性别上的差异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这段所需要的时间里结婚，然后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后再离婚呢？

---

① 原文"üppig"系德语，有茂盛和丰满两种意思。





这一点就我个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这究竟会给谁带来坏处呢？我们这个虚伪的社会允许每一个愿意把她的灵魂出卖给某个魔鬼或某个政党的女子根据对方开价的高低来调换买主。但是，如果一个女子想要出卖自己身体的话，那么她将终身为此而承担义务。社会等级问题在这方面也会起到作用。假如那位胸部丰满的姑娘和一个男人睡觉的话，她会被指责为秘密卖淫。假如是雅基·奥纳希斯① 带着胃炎上床的话，她便会成为报上的醒目标题，而蓬帕杜尔夫人② 根本就不知道，她自己其实也是一位按摩女郎。

经过几千年的奋斗，人终于能够掌握自然——只是还不能掌握他自己的自然本性。而对于自己的情欲，对于自己的性冲动人却无能为力。于是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在反抗最弱的地方行使自己的权力。他监禁女按摩师。50%的警察对渴望爱的男人进行大逮捕，而另外的50%则去追捕那些愿意满足任何爱的渴望的女孩子。毫无疑问，这对于每天上班履行老一套公事的人来说是一个极有刺激性的调剂。

不过，为什么只有按摩沙龙要为我们这个虚伪的社会而受到处罚呢？为什么没有人去监督那些在“轿车服务”栏目中招徕顾客的车库和汽车修理站呢？谁知道，也许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广告，比如：“把您的轿车送到我们这儿来检修！服务周全！服务到家！价格优惠！”的后面也隐藏着罪恶。

这些广告听起来难道不会使人产生个别服务，私人气氛和丰满的胸部的嫌疑吗？

---

① 希腊船王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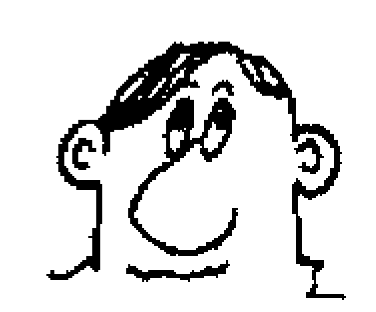
②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

土耳其文化之果

从按摩沙龙的职业到另外一个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重要社会政治问题之间只差那么一小步。换一句话说，我指的是伊斯兰国家的后宫。说实话，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可以亲眼目睹一下伊斯兰国家后宫的机会——既然我无法拥有后宫，至少想参观一下。今年夏天我终于得到了后宫，我是说得到了一个参观后宫的机会。这件事情当然是发生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大都市，其居民人数几乎与以色列相当。尽管如此，在有关这个城市的电影拍摄之前，并没有人谈起过伊斯坦布尔。也许您还记得，这是一部以"托普卡皮宫"为题的恐怖电影，讲的是由彼得·乌斯季诺夫[1]饰演的男主角偷皇冠上的珠宝的故事。毫不奇怪，当我们来到这个城市时，最佳夫人迫切希望参观一下发生这件事情的所在地。

我们请了一个导游，动身去托普卡皮宫。现在，这个宫殿已经被变成了一个民族博物馆。我们万分惊异地游历了这个由许多漂亮宫殿构成的迷宫。我敢说，就其辉煌程度来说，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宫殿了——也许今天的克里姆





林宫是个例外。

“这些宫殿是古代文化和文明的真正宝库，”官方的导游介绍道。“汇集在这儿的艺术品是无价之宝。这儿有著名的皇家博物馆和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小装饰画收藏处。您二位想先看什么？”

“后宫，”我答道。

最佳夫人气恼地说，我像往常一样的俗气。但是，导游自然知道事后他将从谁那儿得到小费。他带着我们直奔这一豪华奢侈的建筑中最最漂亮的一个部分。

整个托普卡皮宫好像都只是为了这个部分而建造的。后宫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珍宝。放着波浪般又大又软的枕头的软床和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闺房同样使我感到惊叹不已，那些伶俐可爱的小妞儿——如果轮到她们值班的话——就是在这儿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这儿，便是苏丹经常站立的地方，”导游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一扇窗户。“他站在这儿观看下面浴场里的姑娘们，如果他刚好想挑选姑娘的话，他就在这儿为自己挑选。”

我走到那扇窗边，浮想联翩，直到最佳夫人把我从一夫多妻的美梦中唤醒为止。她告诉我，现在她想去看马赛克镶嵌画。我回答她说，她不能这么没有耐心，我们家里有的是镶嵌的东西，再说，我得好好体会后宫这一设施的社会政治意义。我站在窗边，眺望着窗下那个古代的游泳池。这个游泳池之大，足以容纳一千零一个姑娘。我思考着，当时苏丹究竟是怎么来向他的妻子解释这一切的。

---

① 德国著名电影演员。

“阿卜杜勒·哈米德，”肯定有那么一个晚上，他的夫人对他说，“你是否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站在那扇窗边？”

“谁？你是在说我吗？”苏丹问，“我只是看看天气怎么样而已，宝贝。”

“这些女人是干什么的？”

“看来天要下雨了。”

“我在问你，下面那么多姑娘是干什么的。”

“姑娘，哪些姑娘？”

“这些洗澡的女妖精。可别对我说，你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她们。”

“我总是只朝天看的，宝贝。你知道吗，我所关心的是晚霞预示着好天气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过，现在你倒提醒了我，那下面果真有一个土耳其浴场。我想，人总得洗澡，如此而已。”

“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的内宫宫殿里有了一个公共的浴场？”

“不知道，我亲爱的宝贝，不过，我会去问的。假如是建筑师胡闹的话，我会砍他的脑袋的，请相信我。”

“阿卜杜勒·哈米德，你一定是对我隐瞒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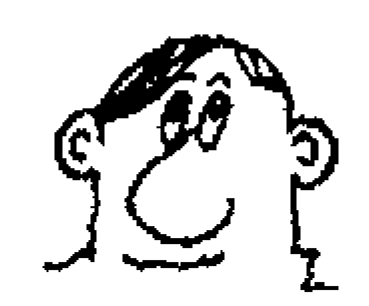
“别这样，别这样，我的小宝贝，我们可不能又互相猜忌啊！”

“那么，请你向我解释一下，你每天晚上从这儿溜出去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我？”

“是的，就是你。你抓起浴衣便走。”

“我亲爱的，我是去上厕所的。”



"一上就是三天?"

"一切事情都需要时间么。再说,假如我睡不着觉的话,有时候我就与太监们下棋。你认识那个佩剑的胖子太监。最近,我与他下了一盘平局。尽管他比我多了一个子,而我又丢了一个车,你知道吗……"

"下了三天?"

"我因为我的皇后[①] 而遇到了麻烦。"

"然后你便精疲力竭地归来,连站也站不住。"

"他多了一个马……"

"那么音乐声呢?"

"什么音乐?"

"至于究竟是什么音乐你自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在这连续不断地跳肚皮舞的吵闹声中,这个宫中谁也无法合眼。"

"你总不会想到我会去跳肚皮舞吧?"

"不是你。是她们。"

"谁?"

"你那些卑鄙下流的荡妇。"

"亲爱的!请你不要再往下说了!"

"昨天夜里我走到窗边,向下面喊,请她们停止吵闹,我犯偏头疼。你的那些女人中有一个恶狠狠地向上面嚷道:'上面的人请安静,您打扰了苏丹!'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知道呢?也许是哪一个姑娘嫁给了一个名叫苏丹的家伙。也许这个苏丹是浴场的管理员……"

"那下面我连一个男人也没有看见。"

---

① 此处为双关语,既指国际象棋的皇后,又指夫人。

"那么这些女孩子肯定是很贞洁，很害羞的。"

"你说她们贞洁？她们一个个都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

"谁？"

"你那些最下流的淫荡妇！"

"别开玩笑！你是说连一点衣服都不穿？"

"我的话你听得很明白。"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得通知保安部门。在我自己的宫里竟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我真得感谢你，亲爱的。赤身裸体！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我马上就去，我得亲自去调查这件事情，如果我发现她们的裸体浴场没有得到准许的话，那么我就将要……"

"阿卜杜勒！！你穿着浴衣想去干什么？"

"我得走了，亲爱的。我得知道，那些女孩子在干些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会马上回来的，我的小鸽子，也许就在这个周末，最迟不会超过明年春天。"





再也不看色情电影了

能享受参观后宫的机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在不惹怒最佳夫人的情况下，一个普通的、迷恋于色情的丈夫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不久前，当我脑子里装满了类似的想法在大街上闲逛的时候，突然发现洪水竟然泛滥得那么厉害。这里所说的是由瑞典女妖发起的洪水。

快要寿终正寝的电影院终于发现了性欲这个玩意儿。电影院不再向我们播放浪漫主义或异国情调的东西——尽管有些晚了，可还是——向我们展示了赤裸的真实。在大街上每走一步，便会看到一枚金发性炸弹，一个大猩猩正想征服她。有时候仔细一看，便会发现这个大猩猩原来是个人。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枚性炸弹。

在闲聊中我曾经向我们的邻居费利克斯·泽利希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是的，这种现象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每天早上，他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总会看见那些赤裸的女人身体，有真人那么大，比真人看起来还要清楚。你真不知道眼睛该往哪

儿看。

毫无疑问，我得自己来作一个判断。首先，我仔仔细细地观看了一张印得相当清楚的电影招贴画。这是一张半身像。然后，我又去看专门张贴广告的窗口。那儿也贴着一些半身像，只是像片的尺寸小了一点。我想到这些照片会对我们的青年一代产生恶劣的影响，于是我决定让整部电影的恶劣影响冲着我一个人来。过了一会儿，我站到售票的窗口前。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一个受到各方面尊敬爱戴的父亲在想看色情电影时该怎么办呢？

这样的事情我已经做过一次了。那是在远离家乡的纽约，我在赴一个工作约会期间突然有一个小时的闲暇。于是，我便进了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碰巧那儿刚好在放一个色情电影。太拙劣了。我进去的时候正好赶上银幕上在放一个近镜：一张女人的嘴，足足有六米长，张开来有两米大，以色彩来展示性欲。我闭着眼睛冲到大街上，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我患了严重的神经性阳痿并下定决心，再也不看色情电影。

而现在，我站在本国的电影院门口，考虑着如何来买票。

不得不承认，全世界电影院的老板都很照顾当父亲的：上午，当有上进心的儿子们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有第一场电影了。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稍稍等一会儿比较好。

第一道难关便是售票处的那个女郎。我怕她在电视里看到过我而把我认出来。我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外貌，友好地望着她，成功了。

我毫不费力地在黑洞洞的观众席里找到了一个好位子。我坐了下来，饶有兴趣地看着：一个金发的性炸弹搭拉着脑袋，身子靠在墙上，一个大光其火的黑人使劲地在扇她的耳



光。正当我开始进入情节时，银幕上出现了“这个剧院不久将放映的电影”字样，灯光亮了起来。

这些电影院的老板全是些无赖。出于一种卑鄙的贪婪，只是为了想卖掉几包巧克力，他们竟然中止放映，置观众于最最糟糕的危险之中而不顾。正是这种糟糕的经营管理方式促使经济每况愈下。我让自己尽量地在椅子上往下滑，并小心翼翼地朝四面张望。整个放映厅只坐满了一半，而这一半座位上坐的人全是中年男子，只是坐得非常分散……

噢，天呐。吉奥拉，我儿子阿米尔的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他俩都是十四岁，他就坐在那儿。他没有去上学而坐在这儿看色情电影，尽管青少年是严禁入内的。呆会儿我怎么离开这儿呢？

我摘下眼镜，翻开一张大报纸，把自己藏在报纸的后面。想象中在我的耳畔响起了阿米尔的声音。我一回家，他便拉长了语调用下列这句话来欢迎我：

“爸爸，你知道我听说了什么？”

说着，他还做了一个怪脸。

要是现在休息的时间过去了该多好啊！只要灯一暗，我便设法溜走。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在这时候电影开始了，而且不错，甚至还可以说挺好，不管怎么说，开头的几个镜头给人以很大的希望。这一组镜头描写了一家普通瑞典人家的日常生活。这一家的女儿给一位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的男青年送早餐，可这位男青年宁愿要这位裸体的青年女郎；这一家的母亲在门口把一个邮递员拉到自己的怀里，邮递员脱去了衣服。这一家的父亲到哪儿去了呢？

做父亲不容易。连吉奥拉的父亲也不值得羡慕，更何况我呢。

吉奥拉——我的眼睛斜过去瞄了他一眼——没有看见我。我可以完全肯定，他还没有看见我。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银幕。他不想错过什么，他觉得这些东西对他有用。他的脑子里有一个纸条盒。真是一个耻辱。下一张纸条上记载的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在乘电梯的途中，电梯里的一个男服务员使她改变了同性恋的观念。到了上面，她心烦意乱地把一个穿着晨服正在等她的女同事往旁边一推。这位女同事踉踉跄跄地跌入开电梯的那位男服务员的怀里，在电梯下去的时候这位女同事也同样被导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但愿吉奥拉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但愿他目不斜视。

坐在我周围的那些男人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听上去他们好像都在患气喘病似的，而事实上他们都在自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是那个开电梯的男服务员？我为什么从未遇到过这种小小的历险。

至于我则曾经经历过一次历险，一次小小的历险。在一个马路的拐角处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向我走来。她甩着手提包问：

“亲爱的，你上哪儿去？”

“到格吕费尔德博士那儿去，”我如实地说了继续走我的路。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的问题是我必须设法离开这儿。

当我开始制定逃跑计划的时候，我的眼睛一边盯着银幕，



一边观察着观众……现在，吉奥拉看见我了。现在，正当这一家人家的女儿与那位失去了男朋友的女同性恋者一起坐到浴缸里去的时候，这个卑鄙的无赖突然转过身来盯着我看。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我感到了一种威胁。等到下一次强奸结束时，我便小心翼翼地摸着座位一直溜到这一排的末尾。我差不多成功了，只剩最后一位哮喘病人把我和能使我得以逃脱的中间那条走廊隔了开来。这个人便是费利克斯·泽利希。

我别无他法，只能重新退到我的座位上。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费利克斯没有把我认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他忙得顾不过来。我一向以为自己居住在一个富有的中等资产阶级的居民区内，而事实则不然，都是些想借着黑暗的保护来满足自己性欲的好色的伪君子。当然，前提是，黑暗确实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我盯着银幕，再也不敢东张西望了。那一家人家的女儿和她的女朋友一起又重新走进卧室，非常明确地要求那个男青年——他还没有用过早餐——去把她妈妈身边那个没有后劲的邮差换下来，以便她爸爸先生可以好好教训教训那位女同性恋者。可不知怎么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大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整个故事变得越来越杂乱无章，越来越无聊。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性欲在一点点地减弱。这一次将会持续几个月。

我让自己滑到地上。我在地上摸索着，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我手脚并用，摸着座位从费利克斯和吉奥拉的身边爬过，直到溜到出口处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再也不看色情电影了。这玩意儿不适合我。这是最后一次。我还可以呆到这部电影结束的，然后：永远不看色情电

影。

为了使自己从精疲力竭中缓过劲来，我回家的时候绕了一段小小的弯路。我的儿子阿米尔站在门口，向我做了一个无耻的鬼脸算是对我的欢迎。

“爸爸，”他拖长了声音说，“你知道我听说了什么？”

“你都听说了什么？”我向他严词训斥道。“什么？我去看了电影？那又怎么样呢？我虽然用不着向你做什么解释，可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是一个著名的作家，所以有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有关色情电影的文章。为此我去了电影院，纯粹是出于工作上的原因。为的是给你挣教育费。你可以在下一期的杂志上看到我的文章，你这个厚颜无耻的无赖。”

女人的直觉

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是最最完美无缺的丈夫也会显得滑稽可笑，即如果他想欺骗他的配偶的话。

我说的是格罗莉亚，我们年轻时代最要好的女朋友。在那个星期三，她扑通一声坐到我们家那个最最舒服的圈手椅中。她坐在那儿，脸色苍白，蜷曲着身子，一副可怜相。看着她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太悲哀了。坐在我面前的真的是那个昨天还堪称为特拉维夫-雅法最漂亮、最时髦的格罗莉亚吗？真的是那个曾经被人称为全国最富有生活情趣、最有魅力的姑娘格罗莉亚吗？从那时候到现在最多只有三十年的光景。她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她为什么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格罗莉亚·比恩鲍姆的青春年华就这么消失了。我在想，她名字被滥用了，比恩鲍姆这个姓与之不配。这是她丈夫的姓。

事实表明，因为她丈夫的缘故她才到我们家来，同样也是因为她丈夫的缘故她才感到绝望。

“我得与你谈谈，”格罗莉亚开始说话，“我丈夫欺骗了我。”

我听了目瞪口呆。纳旦·比恩鲍姆欺骗他的妻子？这个沉默寡言、总是表现得无可指摘的戴眼镜的家伙，这个堪称遵守秩序和法律、正义、胆小的楷模也会有外遇？完了。要是纳旦·比恩鲍姆也……那便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崩溃。我要哭了，可是我振作了起来，说道：

"格罗莉亚，你有证据吗？"

"证据吗？啊？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对于这种事情女人是不需要证据的。她会感觉到的，她会从上百种小小的迹象中感觉到的。"

她把上百种迹象中的第一种告诉了我：纳旦对她采取了一种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几乎不与她说话。"他至少应该经常想到向我献一点小小的殷勤。比如像送一个小礼物啦，送一束花或者是送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可是，这一切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几个月以来我深信，他有了另外一个女人。上星期我的猜疑得到了证实。"

"证实？怎么证实的？是用什么来证实的？"

"纳旦突然变成了一个最最温柔体贴的丈夫，充满了爱心和关怀。他给我带来小礼物啊，花啊，等等。他是不是与我说话？他不停地对我说啊说的。这是很典型的。这样一来我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可是，格罗莉亚，这一切……"

"对于一个充满爱心的女人来说，这一切已足以使她明白了。还有，他突然像一只年轻力壮的狼一样胃口大开，他变得特别喜欢吃鱼。众所周知，鱼含有某种蛋白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蛋白质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现在我问你：一个结过婚的男人为什么需要蛋白质？我可以告诉你为什



么。他要为他的那些婊子保持良好的身体。所以他才吃得那么多。”

“我倒觉得最近他瘦了一点。”

“他当然是瘦下去了。他在严格地节食。他只吃水果，其他东西连碰也不碰，为的是要让他的肚子消下去。他去洗桑拿浴，每天早晨吃早饭前围着我们那组房子跑五圈，还进行体操锻炼。为了把自己晒黑，他白天黑夜地晒太阳。这个年龄的男人还要把自己晒黑干什么？”

“我最近碰到他时，觉得他脸色苍白。”

“是的，别以为我没有看出来。苍白？简直是病态的惨白。看上去就像是一具僵尸。走起路来吃力地拖着脚步，累得精疲力竭，连围着我们家那栋楼转一圈也走不动，连体操锻炼也停了。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他的艳遇上了。这是明摆着的。”

“格罗莉亚，你有点太夸张了。”

“我并没有夸张。我吃醋了，这我承认，当我听到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时，我那最后一点怀疑都消失了。他睡不着觉，那是因为他在想他的桃色事件。前几天我差一点用拖鞋去敲他的脑袋。”

“天呐，这又是为什么？”

“你想一想：我一觉醒来——我的目光落在睡在我身边的丈夫身上——我看到了什么？他在睡觉。睡得就像一个吃饱了的婴儿。他的妻子我则整夜在床上翻来覆去，嫉妒得快要生病了——而他却在酣然大睡！只有一个找到了幸福的人才会睡得这么平和，这么轻松。也许他在梦里遇上他的那个情妇，或者是梦见了他的许多情妇。”

格罗莉亚开始轻声地哭起来，在我的心里也慢慢地开始对纳旦形成了一种懵懵懂懂的愤怒。这家伙不能谨慎一点吗？他一定要让别人觉察到这一切吗？

这时候，格罗莉亚又重新镇静了下来：

“你知道我昨天在哪儿找到他了？我是在车库里找到他的，他正在洗他的轿车，他把轿车擦得锃亮锃亮的。他这么做就等于是向我坦白他有女朋友了。不，亲爱的，即使你不是天才你也能识破这一切的。你肯定知道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丈夫。他们突然之间一天刮两次脸，收紧肚皮，戴上新领带在镜子前左照右照，为的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魅力？”

“是的，”我答道。“是的，格罗莉亚。我知道有这种类型的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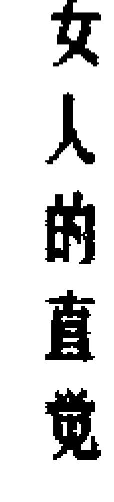
“你瞧！”格罗莉亚得意地说。“而我的纳旦则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我的强迫下他才会去洗车，在我的再三劝告下他才会去刮脸剃胡子，否则的话他会满脸胡子拉碴地到处乱跑。他这样做是想骗我，这个精明、无耻，自私自利的无赖……”

说到这儿格罗莉亚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我爱我的丈夫！”她大声喊叫了起来。“我该怎么办呢？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格罗莉亚，你得引起他的嫉妒，”我说。为了避免误解，我又非常明白无误地补充道：“你得欺骗他。”

“这个办法不行，”格罗莉亚抽泣地说。“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欺骗他。”







圣·保利的外来客

独自在外旅行的丈夫有这样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得到解决。为了探讨这一问题，让我们以古老而又美丽的汉堡这样一个中立的地区为例。晚上九点以后，一个外来客走在这儿的大街上会有一种沉闷的感觉，仿佛自己是这个空荡荡的地方惟一的一个幸存者。或许他会在某个角落里遇到几个摇摇晃晃、穿着水手服的人，但是这些都是外国人。在这个具有二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里，晚上九点之后居然显示不出任何生机。除了……

除了圣·保利。在那儿集中了在其他各大城市中分散在各个区、各条大街上的现象。在那儿有人，有音乐，还有吵闹声，一直要闹到翌日清晨。

圣·保利是拉斯维加斯和塞多姆的有趣结合。兴旺发达的赌场和有脱衣舞表演的夜总会鳞次栉比，那儿的性启蒙表演甚至会使一个来自新加坡的老于世故的太监的那张黄脸变得面红耳赤。有专门为男扮女装的人而设立的鸦片屋，也有供鸦片鬼经常出入的男扮女装的场所，由专业人员为那些失

意水手而组织的集体狂欢使圣·保利所提供的节目应有尽有。

那些令人尊敬的汉堡市民对圣·保利自然是不屑一顾并对它只字不提。对于谈论圣·保利的外来客他们则表现出父亲般的宽容。他们以开脱的口吻指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对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变态现象——不管是你觉得舒服也好,厌恶也罢——你都必须忍受。

以我下榻的那个旅馆老板为例。因为没有最佳夫人作伴,我的欧洲之行显得百无聊赖。

"就我个人而言,"他说,"我是绝对不会去雷帕巴恩[1]的,而先生您则另当别论。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您有责任去见识我们这个城市所提供的一切。可是,您千万不能,"他以告诫的口吻补充道,"独自一人到圣·保利去。云集在那儿的歹徒和黑社会的人会把您拖进最最黑暗的门洞里,把您抢得分文不剩。"

我以动听的言词向他道谢,然后问,我是否能找到,在哪儿才能找到这么一个愿意陪伴像我这样独自一人在外旅行的丈夫前往圣·保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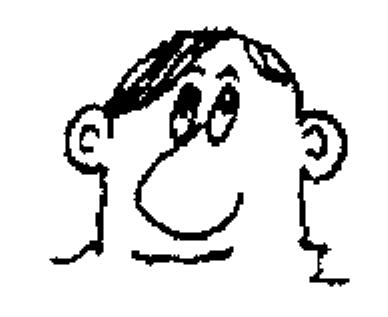
"嗯,这是一个难题。当然得物色一个有经验的、善于交际处世的人来作陪同,一个像我这样熟悉这儿的人。"他考虑了几分钟之后转身问他的太太:"亲爱的,你的意见呢?"

"我觉得,你应该陪这位先生去那儿,"他太太立即答道。

"不,格特露德,不,"老板极不情愿地摇了摇头。"别的都好说,只是这件事不行。"

格特露德反驳道:"有时候你也得为你的客人做出点牺牲

① 圣·保利是汉堡的一个区;雷帕巴恩则是该区有名的红灯区。





啊！"

经过一番推辞之后，老板终于被说动了。他查阅了一下记事本，看是否能抽出一两个小时可供自由支配。然后他告诉我，他能抽出时间来。

"什么时候？"我问道。

"现在，马上。"

他急不可待地从一个脚换到另一个脚。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一时竟无所适从。再说，我还得克服因受了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产生的顾虑。男扮女装，而女的则赤身裸体，还有轮流抽鸦片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合我的胃口。我告诉我那位好心的旅店老板，这件事情我还得好好考虑一番。

"随您的便，"他说。"那么明天？或者是后天？究竟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幸运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来叫我去听电话。在电话线那一头的人自称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在汉堡做生意，来了很长时间。他自认为完全有理由可以说熟悉这个城市。"您肯定很想认识一下这个城市吧，"他继续说道。"您得听一下经验之谈，千万别独自一人去圣·保利！昨天我还和我太太谈起过这件事情。她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同胞遭到汉堡黑社会的抢劫。只要我在这儿就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我虽然忙得要命，几乎喘不过气来——不过，假如您坚持要我作陪的话……"

"非常感谢，"我说，"我总会有办法的。"

"绝对不行！您千万不能小视在街头窥伺您的那些厚颜无耻的女人。她们会突然把自己的衣服脱光，然后大喊大叫，说是您把她们身上的衣服剥光的。转瞬之间，她们的皮条

客——那些动不动就会拔刀子的歹徒——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不，我决不会让您一个人独自前往的！您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我们约好，每隔十五分钟通一次电话。旅店老板就站在我的身边，他一再关照我，除了他我谁也不能信任。在我与我的那位同胞通过四次电话之后，旅店大堂里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匆匆走来告诉我，某一个广播电台的人到了。他们想对我作一次特别采访，不是在旅馆里，而是一边散步一边采访。不管去哪儿，总是在市里，也许可以去圣·保利。我们可以参观一下那儿的某个脱衣舞夜总会，这样我们录音时背景声音就会显得比较热闹。

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可却有人——这一次不是老板，而是那位服务员——急切地告诫我，那些广播电台的人只是想以此为借口逛一次窑子，我绝对不能跟他们去。服务员说他夜里十一点钟下班，这正是去圣·保利的最佳时间。

“您可一定得找一位可靠的陪同，”他说。“只是我得赶快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告诉她有一位外国记者急着要我当导游，所以得晚回去半个小时……”

就在这时候我收到了那位以色列同胞发来的急电，上面写着：

“有必要的话我可以马上到您的旅馆里来把您接走，过十分钟到。”

旅馆老板默默地用目光恳求我，对他从一而终。

一家举足轻重的日报编辑部答应对我进行采访并在报道中配以相片。两位先生将带我去逛汉堡最有意思的地区，最好是去逛圣·保利，然后将用文字和相片将我在那儿的经历记



录下来。这家报纸的主编以及体育栏目的负责人也要来。文学版的编辑将带上他的那拨人马。碰巧印刷厂的老板也刚好在场,他很高兴能带他的女婿一起去。

情况变得越来越危险。我不知道该选择谁,该放弃谁。在旅馆的门口已经聚集起一群富有牺牲精神的陪同人员。

我走到他们的面前。

"你们看,如果我留下来,你们自己去圣·保利怎么样?"我问道。

"不行,"代表团的发言人答道。"我们都是些正派的市民,我们对圣·保利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们只是不想让一个像您这样有知名度的客人对我们这个城市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那位从未见过面的以色列朋友从停在旅馆大门右边的一辆豪华型小轿车中向我招手致意。他用手势告诉我,我们可以马上出发。毫无用处,我必须作出决定,否则的话半个汉堡便会处于瘫痪之中。

"那好吧,"我大声地说道,"那就星期四吧。"

一大群人欢声雀跃,我的决定迅速传遍全市。电传滴滴答答地响着,被译成密码的消息传播出去,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在其晚间新闻中对即将到来的星期四宣布了一系列交通管制措施。

到了约定的时间,由十几辆私人小轿车和几辆大公共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车上满载着勇敢的汉堡公民,他们决定要为我当警卫。我明显地感觉到,这些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次到圣·保利。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领着他们穿过黑乎乎的大街,蛮不在乎地穿过挤满了妓女和

皮条客的地方，这些人并没有把我拉进任何门洞，因为我被看护得太好了。走在我身边的旅店老板拍着手，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我其余的陪同逐渐地根据自己的喜好走散了。

当我们重新在我们的车队旁集合时，发现少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位音乐评论家和他的表兄。他们在一家为男扮女装的人开设的脱衣舞夜总会里找到了一份报酬可观的活儿。

我自己也与一家旅游社签定了合同。打那以后我在“圣·保利一夜游”的节目里为当地人当起了导游。



格尔朔恩的遗孀

“当丈夫的生前极度遭人猜疑，而死后则受人无限崇拜”，这是由我发明的一条古老的波斯谚语。能为此提供佐证的是特拉维夫-雅法附近的一家饭店。最佳夫人因为要擦窗子而把我打发到外面去吃饭。当我刚开始吃小牛排时，邻座的一位娇小但已经不太年轻的妇女站起身朝我走来。她问我是不是为《每周画报》画滑稽漫画的那位画家。

“我那已故的丈夫一向都很喜欢您，”她说，“尽管他自己连直线也画不了。他也很喜欢音乐。他还喜欢每星期打两三次牌。与拐角处的那个药剂师一起打。那个可怜的家伙一条腿短了一点。我指的是那位药剂师。不过，他最最喜欢的还是您的画。”

因为我并不是为某一画报作画的，而是为一份没有插图的日报写文章的，所以我无法接着这一话题编下去，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喜欢我漫画的那位读者的遗孀也向我点了点头作为回答。她那微红的脸上浮现出友好的微笑。除此以外她还拥有一双乌黑而又活泼的、圆球似的大眼睛，她那一头白

发在脑后匀被绾成一个发髻。她拎着一个黑色的钱包。手里的一块手绢被揉作一团。每当提起她那已故的丈夫，她眼睛里总是湿漉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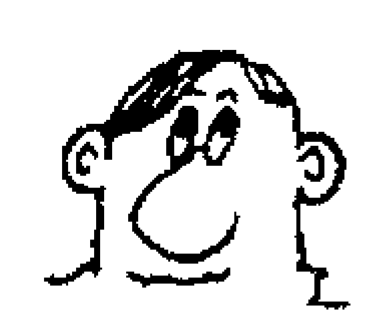
"多可惜，"她叹息说，"格尔朔恩现在无法与我们在一起了。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很高兴认识您的。您知道，他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人。他总是说：'贝尔塔，人是各种各样的，你得去认识他们。'他还喜欢从笔迹来研究人的性格。当然并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只是作为一种爱好而已。"我邀请这位伤心的寡妇坐到我的桌边来，问她，是否可以给她点一点东西什么的，比如像糖煮水果。

"好的，您太客气了。这不禁使我想起，格尔朔恩非常喜欢吃甜食。每当我提醒他要他注意健康时，他只是说：'贝尔塔，我根本就不去理会那些医生的话。'我的格尔朔恩，他总是那么乐观，心情总是那么愉快。他有那么一点儿轻度晕船，当然只是在坐船旅行时才会晕船。至于其他的，说到生活情趣，那您得绝对地相信我。电视里转播的足球赛他一场也不会落下，绝对不会落下。他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比如，他是绝对不会吃鱼的。"

出于礼貌的缘故，我觉得这时候得向她表示一下自己的哀悼：

"您是什么时候失去他，失去您丈夫的？"

"十八年前。可有时候我觉得这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这可能是因为他很有个性的缘故。他很有气质，您一定能理解我。他每天读报，不仅仅是读报——他还买报纸。每天都买，尽管我们当时并不富裕。这也是他小小的怪癖之一。还有，他从来不坐公共汽车，他总是坐出租车。即使身上没带钱



他也坐。有一回，他险些被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打死。他叫西尔伯曼。我说的是那位出租汽车司机。还是叫什么西尔伯施泰因来着？好吧，这无所谓。那一次，格尔朗恩回家时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他说：'贝尔塔，你简直想象不出我受到了多大的惊吓。'感谢上帝，这一惊吓很快便过去了。"

我一边沉思，一边专心吃我剩下的小牛排。在我的眼前格尔朗恩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换一个话题。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说：

"您知道，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

"您说得太对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这正是我的格尔朗恩一直说的话。他老是说：'贝尔塔，得看到将来。'从这一点上您便能看出他的禀性。他与所有的人争吵不休，也与政府吵。只有当他看到他的那些邮票时——他才会像孩子似的。多么漂亮的收集啊！现在我告诉您：他并没有把他的邮票放在集邮本里，而是装在一些小的硬纸板袋袋中。您觉得如何？"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答道，表示了惊异后，我稍稍停了一下又接着说："现在，我已经占用了您很多时间……"我所担心的事情马上便发生了：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已经习惯别人对我的格尔朗恩感兴趣了。他自己老是说：'贝尔塔，事情得一样一样地来！'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对自己诚实，对别人也诚实。他喜欢看电影。对他来说，没有比看电影更喜欢的事情了，还有纵横填字字谜，波兰语的，我是指波兰语报纸上的纵横填字字谜。"

我试着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佯攻："看上去秋天快要过去了，接下去便是冬天了。"

“我的格尔朗恩会从骨子里感觉到的，”那位寡妇表示赞同地说，“每一次他都能事先预感到气候的转换，他只相信他自己。‘贝尔塔，’他说，我才不会去理会那些医生说的话……”

这句话我已经听到过一次了。格尔朗恩开始重复自己已经说的话。坦率地说，格尔朗恩慢慢地使我感到难以忍受了。特别是他每说一句话总是以“贝尔塔”开头。是把他的灵魂从餐桌上赶走的时候了。

“您对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即将举行的会谈是怎么看的？”我直截了当地问。格尔朗恩的遗孀仔细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答道：

“假如我的格尔朗恩还活着的话，他会说：‘贝尔塔，我希望双方都好。’他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事物的。如果必要的话，他会一天刮两次脸。他总是说：‘贝尔塔，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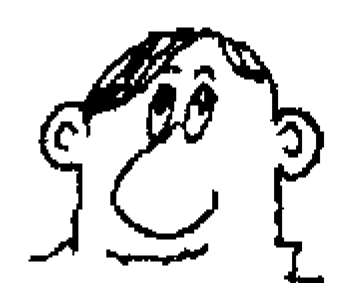
我越来越想让格尔朗恩的遗孀说出一句不带格尔朗恩的话来。我想方设法，从政治一直谈到通货膨胀（“贝尔塔，金钱并不是一切。”）谈到体育（“格尔朗恩可以走好几里路。”）谈到三十五周年国庆（“贝尔塔，我穿裤子时情愿用背带而不愿意用皮带。”）——毫无办法。

不知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与他说话时是否也经常引用他的话？“贝尔塔，不久前你曾经对我说过……”

见鬼，为什么命运竟会安排我在贝尔塔和格尔朗恩的陪伴下来吃小牛排？我再也不会给《每周画报》作画了。

这时候，我的那位寡妇朋友已经订了第二份糖煮水果。

“格尔朗恩情愿吃糖煮水果而不喜欢吃新鲜水果，”她回



忆道。她那大得像圆球似的眼睛上蒙上了一层泪水，伤心地盯着面前的盘子。她突然抬起眼睛说："我们光顾说这说那的，我还没有作自我介绍呢。我叫贝尔塔。"在她继续往下说之前，我很吃力地说了一句："认识您很荣幸。"

"奇怪，您知道，您看上去像谁吗？您肯定不会相信我的话：您像我那个已经过世的丈夫。特别是嘴巴部分。他的下嘴唇有那么一点儿往旁边去，只有那么一点，绝大多数人是觉察不到的。格尔朗恩自己当然知道。噢，他知道得很多。'贝尔塔，'他对我说，'人只活一次'。正是那天，他和那个洗衣坊的胖老板娘一起私奔离我而去。他得了肺炎，也死在肺炎上。我还说：'格尔朗恩'，我说……"

现在我算听够了。我俯下身子，咬牙切齿地说：

"贝尔塔，您再提一次'格尔朗恩'，我便让你和他一同见鬼去！"

贝尔塔无动于衷，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惊异的神色。

"呐，呐，呐，"她说，"怎么能这样与一个寡妇说话呢？如果我的格尔朗恩还活着的话……"我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明白了格尔朗恩究竟是为什么死的。他并不是因为肺炎而死的，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确定无疑的。我吓得从饭店里冲出去直奔家门……

这天夜里我梦见了格尔朗恩。他默然无语，充满同情地向我伸出一只手，然后与那个洗衣坊的胖老板娘逃之夭夭。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犹如亲兄弟。

女秘书或事情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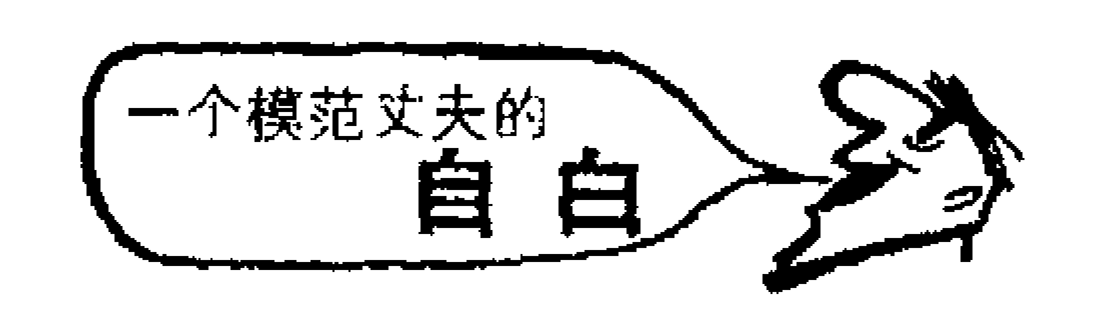
自从人类有思想以来，最好的妻子们最值得怀疑的对象便是长着一头金黄色的鬈发、穿着黑色高跟鞋的女秘书，这种猜忌多少是有那么一点理由的。

关于这个题目我沉默了整整二十年，现在是我开口说话的时候了。

我并不反对秘书这一职业，并不反对她们个人，也不反对她们的工会。与此相反，我非常看重由长着一头金黄色鬈发的女秘书们给予我们这些作家的帮助。我对她们的惟一不满纯粹是心理上的。

你坐在家里，写了一个有关以色列镑贬值的非常有趣的故事。你为这篇短小而内容丰富的文章花了三天两夜的时间，希望它能成为一篇杰作。你在修辞上精雕细琢，你删啊，涂啊，做一些补充，考虑来考虑去又把它删去不用。在这篇文章成为完美无缺的杰作之前，你是不会罢休的。然后你带上改得面目全非、几乎无法辨认的稿子来到编辑部里，展开手稿，叫来秘书主管莉莉，开始向她口授，一边为自己的绝妙想





法忍俊不禁。

“贬值……”你开始念道。

“什么?”莉莉说。“怎么又是贬值?”

于是一切都完了。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便已经结束了。满头金黄色鬈发、穿着黑色高跟鞋的莉莉这么一打岔便在我这个非常美妙的、互相牵连的故事中渗进了毁灭性的沙子。我花了三天两夜的工夫以孜孜不倦的劳动建造起来的这栋完美无缺的大厦顿时变成了一堆废墟。“怎么又是贬值?”莉莉这一问使我恍然大悟,我这篇文章的主题太不精彩了,谁也不会对此感兴趣的,贬值这个题目已经写滥了,已经没有人想要了解这件事情了,它会使人感到无聊。总之,这一题材不适宜。

怎么又是……

我可以肯定,莉莉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想谋害我,只是她并没有意识到:她是第一个读我这篇文章的人,她与观看一出戏首场演出的观众一样肩负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她对此一无所知。她想五点钟下班回家,她希望准时结束听写。

我尽量使自己表现得自然。我以专业小丑般轻松愉快的声音继续往下念着。不过,我的心在流血。连我自己也不再相信我写的这一篇有关贬值的故事。“怎么又是贬值?”莉莉的提问使我丧失了自信心。

我心里默默地希望能通过我文章里的某个噱头来与她讲和。当我读到提高税收的地方,她也许会大笑起来,或者至少是微笑,那个地方写得确实很滑稽……

我念到了那个有关提高税收的地方,这时我从一个难以令人觉察的角度,尽量不引人注意地从侧面打量着莉莉。

莉莉既没有大声地笑，也没有微笑。她脸上毫无表情地坐在打字机前，瞪着眼睛呆视前方，开始用手指轻轻地敲桌子，因为她觉得停顿的时间太长了：五点钟我们得结束，请继续……

我站起身来，走到她的身后。我俯下身去，看着卷在打字机上的那张纸。

"如果按照税务局的意思去做的话，那么我们打洛梅牌[①]赢来的钱也得涨价，"我念道，"为什么是涨价，莉莉？这句话毫无意义。"

"不对吗？为什么不对呢？"

"这儿应该是'上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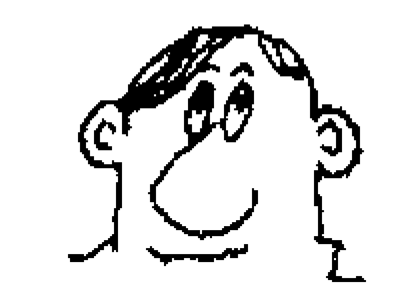
"那您为什么不说呢？"

莉莉只管把她所听到的，或者说她以为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写下来。至于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无关紧要。她的工作纯粹是听音练习。她甚至会连假睫毛眨也不眨地把一些毫无意义的句子写下来。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像横梁那么粗的报上的大标题。主标题是：女秘书在听写时被谋杀。下面的副标题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作家呻吟道："她不听我念！"——这是他今年以来的第三个牺牲品。

我忘了说明，在我们编辑部里一共有三位女秘书。莉莉是这三个秘书中最差劲的一位。巴特舍巴还过得去，埃斯特尔则是个宝贝。与埃斯特尔一起工作完全是一种享受。她对每一个故事都表示出兴趣，那种浓厚的、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

① 一种三至六人玩的纸牌游戏。



兴趣。

我想象着，假如我把这篇有关贬值的故事念给埃斯特尔听的话，情况会是怎么样的。

"贬值……"我开始念。

"贬值！"埃斯特尔高兴地欢呼道，然后又叫了一声"贬值！"她一边拍手，一边露出洁白的牙齿大声地笑。"您怎么总会想出这么绝妙的主意来的！贬值！"

我喜欢埃斯特尔。每次听写完毕她站起身来时总是容光焕发，她的声音因为高兴而发抖："太妙了！史无前例！得让别人学学您的样！"

埃斯特尔的直觉是很令人钦佩的。你只需略微提高一点嗓音，在嘴角边稍稍挂上那么一丝微笑，或者用臂肘轻轻地触一下她的肋骨——埃斯特尔便马上理会了并爆发出一阵格格的大笑声。一位有写作经验的作者——假如他需要的话——一般每一页稿纸可以引起埃斯特尔十几次大笑以及至少五次令人陶醉的叹息声。最后还能从埃斯特尔的嘴里听到十次带有形容词最高级的赞叹声。与埃斯特尔一起工作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一场胜利大检阅。

可惜她没有时间。主编和所有部门的头儿都争着要她。等着要埃斯特尔的人的名单每天早上就列出来了，长得令人看了眼花缭乱。

假如我抱怨埃斯特尔总是被人占去的话，就会有人假仁假义地为我出主意：

"你为什么不去找巴特舍巴？她也很不错。"

当然，巴特舍巴也不错。如果她这一天心情好的话，她的反应也会令人满意的。她时常会发出爽朗的笑声。有一次，

当我念到一个故事的高潮时，她笑得痉挛起来了。她笑得停不下来，我则洋洋得意地听着她笑。

“笑够了吧！”过了一会儿我问道。“什么东西竟然会这么好笑？”

“是您的口音！”巴特舍巴擦去眼睛里的泪水呻吟地说。“您那滑稽的匈牙利口音。”

一如你所见，巴特舍巴的智力不尽人意。前几天，我曾经向她口授过一篇讽刺性的杂文。这篇杂文是针对一个学生组织领袖的，他曾以恬不知耻的方式攻击过我们的总理。

“指责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谎，这无疑是一项英雄之举，”我口授时声音中带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冷嘲热讽。

巴特舍巴说完这一句话后，入迷似地望着我：

“太伟大了。是为这位了不起的青年人说话的时候了。”

我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您听着，”我说，“这是讽刺。您不知道什么叫做讽刺吗？”

“知道，当然知道。您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说着，她低下头等着我往下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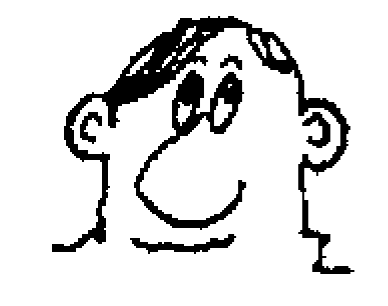
不过，与我正在向她口授的这位莉莉小姐相比，巴特舍巴简直是块金子。现在是五点差二十分。莉莉已经开始利用我口授时的小间歇，理一理她的鬈发，拉一拉她的衬衣。

她刚给一个什么家伙打过电话，告诉他她将于五点零二分准时与他会面。这便是她脑子里所想的全部内容。

我问自己，她究竟是否知道，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她。

她脸上毫无表情地坐在打字机前，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的口授结束了。



莉莉仍然坐在那儿,好像还在等着我往下念似的。

一片寂静。

“完了吗?”莉莉问。

“是的。”

莉莉一声不吭地站起身来,在镜子前打扮了一番。我最后一次尝试地问道:

“呐,您觉得它怎么样?”

“谁?”莉莉手里拿着粉盒问道。

“这篇文章。”

“喜欢,”莉莉说着,一边把打字机的盖子盖好。“有的地方有点淡了。我们得去买一盘新的色带了。”

随后,她穿着高跟鞋匆匆忙忙地走了,她那金黄色的头发一掀一掀的。

真是令人厥倒,不是吗?


业余爱好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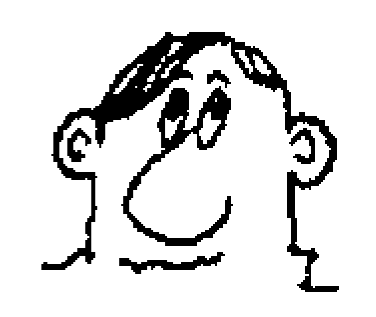

竞争

鱼从头臭起

一个美满的婚姻会促使人去从事其他的活动。一个糟糕的婚姻更会促使人去从事其他活动。爱好是一个一筹莫展的丈夫对他与妻子之间所发生的矛盾的最好回答。

平心而论，哪一个结婚多年的丈夫在他的一生中没有收集过邮票、烟斗、钱币或其他纸币等？谁没有产生过类似用大头针把摩西的五部书刻写在像指甲那么大小的纸上，或者说尝试着用土耳其的蜂蜜来复制泰吉·马哈尔陵的愿望？

至于我们，假如施托克勒一家在那个倒霉的星期四没有向我们发出邀请的话，那么我至今还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丈夫。然而，施托克勒一家邀请了我们。我们走进他们家时所看到的景观使我们惊讶得瞠目结舌。到处都是梦境般美丽的鱼缸。鱼缸里亮着五颜六色的灯，鱼缸里的小居民们显得非常悠然自得，如鱼得水。"这使我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施托克勒的声音因为油然而生的感激之情而颤抖着："你们不知道，每当我坐在鱼缸旁，看着这些小生物时……就只是这么看着……什么也不做，心里是多么地心旷神怡啊……"



我们就这么坐在鱼缸旁，看着那些小生物，什么也不做。我们在右边第二个鱼缸里发现了一条漂亮非凡的鱼，它身上的鳞片像彩虹般闪烁发光。

“那一条鱼吗？”施托克勒做了一个不屑一顾的手势。“这是一种很低劣的品种。每一个有这种鱼的人都想要摆脱它。”

“为什么？”最佳夫人问道。

“因为这种鱼饲养起来太容易了！相反，”施托克勒用充满爱恋的手势指着另一个鱼缸里一些普普通通、毫无魅力、身上有条纹的鱼。“相反，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究竟该如何来饲养这种著名的睡衣鱼。”

我逐渐了解到，他家里的鱼都是由施托克勒亲手饲养大的。他当然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更不用说他早就向在这个城市经营动物行业中的佼佼者马萨尔戈维奇提供过大量的鱼苗。这一副业经常使他能挣到二百镑。在最近一次产卵期之后，这肯定是很热闹的一次，他每周的平均收入甚至可以达到三百镑。

我开始喜欢上这些鱼。养鱼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嗜好。它使人心旷神怡。

“半年前我只有一个很小的鱼缸，”我们的主人带着梦幻般的微笑回忆道。“而现在我有二十八个大大小小的鱼缸。等我们办完离婚手续后隔壁的房间便会空出来。下一步我想在隔壁房间里再安置十二个鱼缸。”

“养鱼的工作量是不是很大？”

“工作量？”我那目光短浅的提问显然使施托克勒感到不可思议。“每天最多花五分钟。这些可爱的小家伙需要什么呢？一点儿理解，一点儿关注，就这些。我认识它们中的每一

条，每一条鱼都是我的老朋友。”

说到这儿，施托克勒把他的食指伸到旁边的一个鱼缸里搅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所有的睡衣鱼都吓得逃到鱼缸最远的角落里。有一些鱼试着把自己埋入鱼缸底部的沙子里去，它们的鱼鳍在发抖。有两条准备跳出水面。“它们怀孕了，”施托克勒说。“我估计大约能产一千条鱼苗……”

还用得着我继续往下讲吗？第二天，最佳夫人和我一起去找马萨尔戈维奇。

“欢迎你们来到热带鱼爱好者这个幸福的大家庭里！”马萨尔戈维奇向我们致了欢迎词。“在我这儿你们能找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且是你们所能找到的最上乘的质量。”

事实上，整个商店确实洋溢着一种专业气氛。各式各样的鱼缸及鱼缸的配件和鱼缸里面的摆设，攀缘植物、水草、珊瑚礁、电动清洗设备和水下电热垫等等，只要你能够想象得到的，这儿几乎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使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我们很难挑选出一些与我们拮据的经济状况基本相符的东西。最后，我们买了一只中等的鱼缸，并配备了一节彩色电池和一个电动气泵。当然我们也购置了专门的清水用的过滤器，所需的清洁用具以及一张可以调节的鱼网。马萨尔戈维奇使我们相信，我们还需要一个专门用来刮鱼缸边上水草的用具，足够的很细的白沙，容量为二十五升的烧水器和一小篓蠕虫。

一篓蠕虫，因为蠕虫是鱼最喜欢的食物。

“你可别对这些蠕虫产生什么反感，”我安慰我那娇小玲珑的太太说。“爱斯基摩人也吃蠕虫。在中国的某些省份它们还被当作美味佳肴。当然是指蠕虫而不是爱斯基摩人。”





我那娇小玲珑的太太很少像现在这么沉默寡言。她只说了一句，她不是爱斯基摩人，也不是生活在中国。说实话，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蠕虫——至少是第一眼看上去——确实像蠕虫：很像红色的、肉鼓鼓的长面条。它们不断地弯曲着，不断地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好吧。今天天气很好。您喜欢莫扎特吗？

当我们准备把我们购置的货物运走时，马萨尔戈维奇低声提醒我们，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买几条鱼。我们所带的现金刚好还够买两条睡衣鱼。马萨尔戈维奇非常内行地从他的鱼缸里捞出一对幸福的睡衣鱼，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递给我们："它们很容易区别。雌的总是比雄的要大一点。"我们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一对鱼，发现那两条鱼大小完全一样。

"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马萨尔戈维奇笑着说，"这是一条特别肥的雄鱼和一条特别瘦的雌鱼。不过，你们别担心——它们会给你们生下一大批小睡衣鱼的，这两个调皮的家伙，哈哈哈……"

回到家里，我们严格地按照使用说明把一切都安装了起来。对于一个有技术天赋的丈夫来说，使一个会发出一点儿响声的电动泵转动起来简直是小事一桩。我拧开烧温水的热水器，为的是使我们的那些小东西不至于感冒着凉。难的是如何来安置那些蠕虫。马萨尔戈维奇认为，最适宜的地方莫过于冰箱，可最佳夫人威胁说，如果我把它们放在冰箱里的话她就绝食。她曾经是一个备受溺爱的孩子，一种彻底错误的教育方法所导致的结果迟早总是要显示出来的。床底下有足够的地方，不过我太太一定要知道——这并不是她的过错，而

是她父母的过错——是否能绝对保证，这些蠕虫到了夜间不会从小篓子里钻出来爬到我们的床上来……最后，我们只好把蠕虫发配到浴室里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等不及了，很早就起床了。我们坐到鱼缸旁，看着那些小生物，什么也不做。看着它们真让人心旷神怡。可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它们一动也不动。它们躺在鱼缸的底部，腹鳍往上翘着。它们——过了一会儿实在无法否认——死了。当仔细研究其死因时，我们发现，鱼缸里的水是滚烫的。一夜之间我们把这两条睡衣鱼给烧熟了。

这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每个热带鱼爱好者都一再会遇到的问题：怎么来处置这些死鱼？是否可以把它们与厨房里的垃圾扔在一块儿？不行，最佳夫人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就会脸色苍白。是否可以把它们埋在院子里？不行，我们住在四楼。是否可以把它们送给邻居作猫食？不行，我们的邻居不养猫。那么，只能试着把它们从能够冲下去的地方冲下去。

我们试了，也成功了。然后我们去找马萨尔戈维奇，把我们的厄运告诉了他。

"你们是怎么搞的？"马萨尔戈维奇怪罪道。"从什么时候起可以让加热器整夜、整夜地开着？你们听说过这种事情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必须每小时检查一次水温吗？"

我迅速地心算了一下，结果是由他这句话所引起的恐惧顿时减少了许多。假如每一次查看水温所用的时间不超过十秒钟的话，那么正如施托克勒所说的，一天只需花五分钟的时间。于是，我又放心地买了六条睡衣鱼，这样便大大地提高了至少能使一对睡衣鱼活下来的概率。至于水温，我与最佳夫人约定，由我们俩轮流来查看。白天的水温由她来监督，夜里



则由我来负责。其余的工作我太太一概推却不管，她甚至还巴不得新买来的这六条睡衣鱼马上就完蛋。我已经说过了，她是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孩子。

于是，我独自一人坐在鱼缸旁，观察这些小生物是如何繁殖的。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繁殖，但是从现在起，快了。

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不幸事件。不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提这件事只是为了把事情说完整了而已：一天早晨，我们睡衣鱼的身上出现了一些白的斑点。它们像发疯似地蹭痒，明显地向左侧着身子，在鱼缸里游来游去。

"很抱歉，孩子们，"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一点儿也帮不了你们的忙。"

两天之后，当它们失去了任何鱼的特征只能背朝下在水里游动时，我决定采取一个措施。我向水里打进了一点儿敌敌涕。显然，我这个绝妙的主意想得太晚了一点。因为两分钟之后睡衣鱼便灵魂出窍，浮出了水面。我冲到马萨尔戈维奇那儿，又买了五对睡衣鱼。在我巧妙的盘问下，他从他那丰富的经验中向我吐露了一些秘密。

"您必须把几对鱼分开来饲养。在每一个鱼缸里放一对，否则的话，它们是不会繁殖的。您和您太太是否愿意和十个陌生人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呢？"

这个比喻很不恰当。最佳夫人早就不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了。那一天她在我的写字台上发现了蠕虫，打那以后她便不与我住一个屋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谢马萨尔戈维奇所提出的使人茅塞顿开的建议，我为那些结成伉俪的睡衣鱼买了四个舒舒服服的鱼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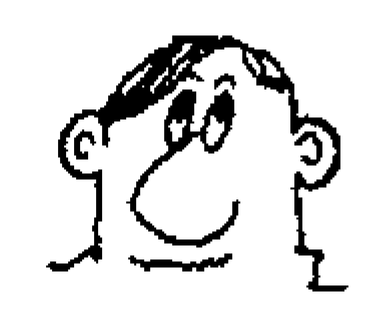
回到家里我小心翼翼地为它们配对，总是一条肥的再加上一条瘦的。然后我便期待着它们开始繁殖。它们调情，拥抱和狂吻，可并没有真正地发生什么关系。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睡衣鱼好像都是雄的。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沮丧的感觉。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施托克勒成了我真正的精神支柱，是他给了我安慰和信心。他恳切地希望我不要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并向我传授饲养睡衣鱼的宝贵经验。比如，我得在每三立升水中加上两匙细盐。我加了，毫无结果。只有一条对盐敏感的睡衣鱼把我的手指给咬了一口。马萨尔戈维奇向我指出了一个将会引起严重后果的错误：我忘了把沙子放在雨水里泡一下，而且必须用丝袜来过滤。于是，我这样做了。最佳夫人从我们共同居住的住宅中搬了出去，而睡衣鱼的繁殖则仍然八字还没有一撇。施托克勒向我透露了一个饲养日本珍珠鱼的诀窍：在鱼缸的底部洒上一些五颜六色的玻璃。然而，睡衣鱼并没有去关心它们的下一代，而是十分高兴地在彩色的玻璃中嬉戏。

尽管如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有许多小鱼问世了。不过，这是由于一个极大的疏忽而造成的：两条极其普通的金鱼混进了一只鱼缸，这件事情大约是在最近一次我买三十条睡衣鱼时发生的。结果是大金鱼生出了一群小金鱼，至少有五十来条。我把它们倒入抽水马桶中抽掉了。难道我想养金鱼吗？不，我想养的是睡衣鱼，只养睡衣鱼，而且要养许多睡衣鱼。

然后，发生了一件震惊养鱼界的大事情：施托克勒踩在一块香蕉皮上，摔断了一条腿。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看他。当我看到他家里除了新生



的睡衣鱼还是新生的睡衣鱼时，我居然失去了最后那一点自制力。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施托克勒，”我抽泣着说，“亲爱的，亲爱的施托克勒，一定是有那么一个秘密，一套那么古老的礼俗，德鲁兹[1] 早就知道了，你和马萨尔戈维奇也知道。可你对我隐瞒了。是啊，你为什么要把你经过好多年的科学研究才发现的东西告诉我呢？尽管如此，施托克勒，我还是请求你把它告诉我。可怜可怜我吧！奥秘在哪儿？究竟该怎么样才能使睡衣鱼繁殖呢？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吧，施托克勒！”

施托克勒长久地注视着我。他很难抑制他那内心的激动。最后他终于说：

“你回家去吧。把一块快要烂了的香蕉皮放在汽油中化了，让水分蒸发掉，等余下的东西干了，把它磨成粉。在每两立升水中掺上一匙半这种粉状物……”

就像受到复仇女神的驱使似的，我风驰电掣般地冲回家去——不，首先是冲到马萨尔戈维奇那儿。他店堂里的卷帘门已经被放了下来。于是我冲到店的后门。后门关着。我从门上的窥视孔向里望去，昏暗的光线中只见马萨尔戈维奇站在店堂的一个角落里。他正在从一个写着“德国制造”的大盒子里取什么东西。他从那个大盒子中拿出来的是一个个小的尼龙袋。那些小尼龙袋里装的全是小睡衣鱼。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朝门撞去。门被撞破了。马萨尔戈维奇吓得脸色苍白地望着我。

“这——这不是我的过错，”他结结巴巴地说。“谁知道这

---

[1] 十一世纪创立的伊斯兰异教教派。

些畜生是怎么繁殖的……可是在汉堡有一家邮购商店向全世界供应这种小鱼。他们也供应给我。昨天，施托克勒先生向我买了二百五十条小鱼。如果您愿意的话，您也可以像他那样给我一张汇票。我对所有的人保密……”

这便是古老的德鲁兹的礼俗，这便是施托克勒的秘密，即通过邮局来繁殖小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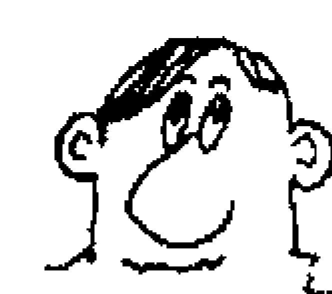
“这一整盒要多少钱?”我问道。

没过几天施托克勒来看我。我一把抱住他的脖子，高兴得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我的朋友，我太感谢你了。我由衷地感谢你。香蕉和汽油的混合物产生了奇迹!”

施托克勒默默无语地站在那儿。他的目光慢慢地巡视着塞满了我屋子各个角落的十六只鱼缸。鱼缸里有无数条睡衣鱼在玩耍嬉闹。他的眼睛突然之间变得溜圆，就像癫狂病快要发作似的。然后他带着含糊不清的呜咽声冲了出去。

昨天我在马萨尔戈维奇那儿遇到他，他根本就没有理会我的招呼。一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养鱼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地被别人伤害的。为了表示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一下买了七只鱼缸，像一个非常懂得如何买鱼、如何饲养鱼的专家那样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店堂。



鼓 和 钹

这一次我们受到了施皮格尔一家的邀请。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富朋友。当我们咀嚼着美味的晚餐时，女主人问我们是否愿意听一点立体声音乐。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便打开了立体声音响，接着音乐从屋子的四面八方涌过来。从放在屋子右边的喇叭箱里传来了巨大的管弦乐声，而从左边的喇叭箱里则传来了弦乐器和鼓声，其响声大约达到十二个兆吨。我们赶紧吞下最后几口饭，逃之夭夭。隔了好几条马路还能听到定音鼓的声响。

回到家里，最佳夫人问我："埃弗赖姆，我们家为什么没有立体声音响？"

"第一，"我答道，"我们的唱机还是好好的。第二，你显然是忘了，我们并不打算在最近添置什么多余的奢侈品。"

第二天，我碰巧在由音响技师阿维克多尔开的店里遇到了他本人。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礼貌和专业知识。他向我例举了那种可笑、过时的唱机的缺点。这种唱机只能播放出单一的声音——在我们这个技术进步的时代里这简直是太可笑

了。他说，就连国家广播电台也早就已经播放立体声音乐了。然后，他向我展示了刚到的最新模式的音响设备，他把它称之为“全自动立体唱机”并递给我一本彩色的小册子。那上面对这一小巧的、奇迹般的音响设备作了详尽的介绍：

“可对唱头臂进行纵向和横向调节，具有伺服系统，数码式电脑，备用电磁盒以及光电示波系统。”

我对阿维克多尔说，我并不想购置什么飞机装置，而只是想买一个唱机。他回答我说，这种式样是目前市场上供应的唱机中最简单，同时也是最便宜的一种。我把它买下来了。光定金就花了不少钱，其余的分三十六个月分期付款。

回到家里，我把我们家仅有的一张立体声唱片《检阅纳哈尔军团》放到全自动立体声唱机，简称 ASP 上，然后等待着——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得见由唱针所发出的轻轻的嗡嗡声。

我们家里的人对这个默不作声的立体声音响的反应很不友好。我那长着一头红头发的儿子阿米尔——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猜测道，我买的是专门为聋哑人制造的唱机，哈，哈，哈。

我给阿维克多尔打电话。我告诉他，ASP 在他的店里听起来声音很美妙，可是到了我们家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

“亲爱的先生，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阿维克多尔教训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机不带喇叭和放大器会发出响声？”

一个不带喇叭的立体声音响就像是乒乓球只有乒而没有乓。结果是我在阿维克多尔那儿又订购了一个放大器和左右



两个喇叭箱。这些东西所附带的、启蒙用的小册子上印着红字："每一声道各 18 瓦"；绿字："失真率为 0.03%"，佛青色的字是："接受频率为 20 至 500 赫兹"。对于最后这一条阿维克多尔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个设备可以保证达到无比丰富的音响再现力。您可以辨出每一种乐器的声音，既可以听到低音提琴所发出的嗡嗡声，也可以听到横笛高音凄厉的呻吟。"

有了这些装备之后，我又重新来开动这一奇迹般的音响设备。不管我怎么伸长耳朵去听，其结果与上一次并没有什么差别。结果是 0:0。

我又给阿维克多尔打了电话。

"毫不奇怪，"他又一次说，"你还需要一个前置放大器。"

"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

"这些其他客人自己都知道。我不可能什么都想得那么周到啊。"

前置放大器虽然使音响强度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是却在我们这个迄今为止一直听惯了单一声音的家庭预算中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再说，就《检阅纳哈尔军团》这张唱片而言，还需要配一个声音调节开关，以便把音乐的敏感系数提高到 180000 赫兹——一个如此巨大的数字，与不断进步的技术正好相适应。

"现在，"阿维克多尔说，"您已经逐渐接近于完美的音响效果了。"

他说得并不全对。还缺一些东西，比如缺一个两侧喇叭的平衡调节器。平衡调节器买来了，并被接在我们起居室里不断增加的、多如乱麻的电线上。然而，由 ASP 及其他设备

播出的声音仍然还是很单薄。虽然鼓声是从左边，钹是从右边传出来的，可我们还是无法得到安慰。最为糟糕的是，我们无法将这么昂贵的设备向我们的客人展示，而从一开始起，这便是我们投资购买这一套立体声音响设备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我们开始做起试验来。我们把传出鼓声的那个喇叭放到书架上，而把传出钹声的那个喇叭放到桌子底下，我们很艺术地把两个喇叭与厨房里的电动搅拌机连在一块儿，甚至还把洗衣机给打开了——可仍然无济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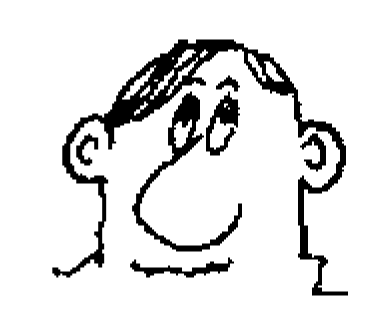
在与最佳夫人举行了一场简短却卓有成效的会议之后，我去找阿维克多尔。我用坚定的声音对他说，我希望把全套音响设备退还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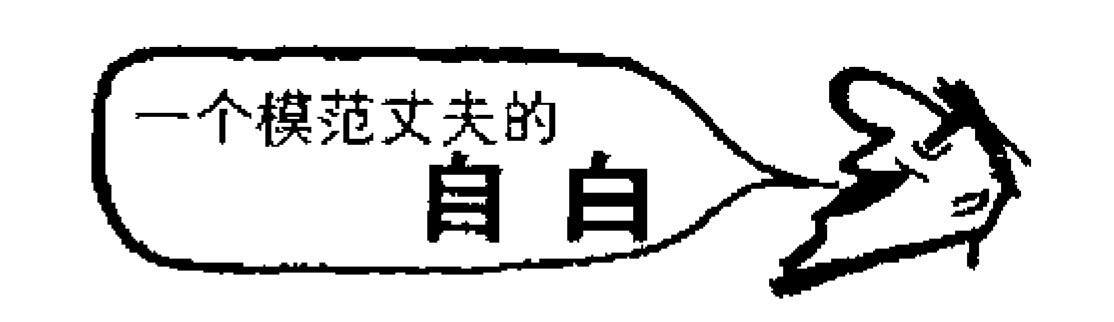
阿维克多尔建议我，别这么急就作决定。他说他刚进了一套四通道的检波器装置，加了这玩意儿，目前的状况便会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皮带，他挣脱后终于小声地说：

“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改善了，”他承认道。“只是对现有的产品进行名字上的翻新而已。比如，同一样产品从星期一到星期四叫‘Panascop - Supersonic’，而在一周中其余的日子里则被叫做‘Superscop - Panasonic’。至于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也不得而知。”

阿维克多尔引起了我的同情。我让他去对付他的立体声困境，而我则回到了自己的立体声困境中。它大约占去了我们家起居室的一半地方。这一巨大的装备与其说是娱悦耳朵，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娱悦眼睛的。自从我们为所有的部件买了有机玻璃盒——一共十二个——之后，起居室内这一整





套洋洋大观的音响设备成了我们家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便是被人们称之为全面的动态平衡。

这套设备对我们的家政预算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前后支出总共为 8734 镑，而我们的收入是鼓和钹。

“沙姆辛”及银色的陶醉

绘画也是一种很好的爱好，特别是在夏季。

有一天，刮着灼热的沙漠风。这种沙漠风被我们称之谓“沙姆辛”，空气就像是由滚烫的沙子构成的。最佳夫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噢，天哪，多热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的煤油炉锈得简直不成样子了。每当我们家来客人时，我惭愧得真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我没有回答她。一个喋喋不休的丈夫就好比是一口没有水的井，或者刚好相反。

我决定要让我的太太高兴一下，给煤油炉子涂上一层银色的漆。当然，这一切都将由我自己亲手来做，一如时下流行的风尚那样。

我从雅法的一家颜料店里买回了一大罐“防火银漆”，一把中号的漆刷以及能够确保我的计划得以实现的一切技术上的装配。

第二天早上，仍然持续地刮着“沙姆辛”，在最佳夫人出门

去上班之前——总得有人去挣我们每天的所得税，我一直佯装睡着。然后我起床，按照说明书上的规定打开了锡罐。里面装的是闪耀着银光的液体。我很仔细地把煤油炉油漆了一遍。这种漆与我们煤油炉很相配，把所有的脏东西和铁锈全部盖住了。我那与生俱来的谦虚使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是一个智力平平的学生也能取得我这样的水平，因为这种防火银漆是一种非常绝妙的产品，好得不可能会让你犯什么错误。

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根本就等不到"第一层油漆完全干透以后"——按照那份官僚主义的说明书，得等到第一层漆干透之后才能涂第二层。为了保险起见，我马上涂了第二层，紧接着又涂了第三层。

因为干这个活我的手上沾了许多漆，而漆罐里呢还有不少漆，于是乎我便开始东张西望，看我们家里还有什么东西需要修理的。我找到了两个用旧了的门把手，一个滴水的水龙头和三只铝锅。我把它们全部油漆了一遍，看上去就像新的一样。我还找到了一只种着仙人掌的花盆，一张厨房里用的桌子，两只踏脚凳，一只烟灰缸，一只鞋拔和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想就此打住，因为我觉得做得有点太过分了。

可就在这时候，我的目光碰巧落在我那亲爱的、忠诚的摩托车上，因为油漆剥落的缘故它的车架显得丑陋不堪——转瞬之间它又变成了一辆闪闪发亮的流线型的新车了。毫无疑问，是灼热的沙漠风"沙姆辛"使我失去了任何自制力。我想实现自己好久以来的宿愿：把我们那难看的、线形花纹的地砖变成漂亮的、不规则的菱形图案。我大脑的控制力越来越差，我又一次跪倒在我们的煤油炉前，给它刷上了第四层漆。现在我才注意到，只把两个门把手漆成银色是多么地杀风景，于

是我便把其余所有的门把手和窗把手都漆成了银色。接着便轮到镜框，这时候我禁不住对我们的彩色印刷版蒙娜丽莎也做了一番修改；我把她的连衣裙涂抹成了银色织锦缎的颜色，这与她那张微微笑着的脸更加相配。我在油漆收音机时发现，我的皮鞋上溅上了银色的斑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漂亮，于是我便把它们全部漆成了银色的。它们闪闪发光，多么漂亮。啊！使人感到惊异的是，怎么居然还没有人想到生产银色的皮鞋。银色的鞋与深颜色的西装配在一起相得益彰。

当我把十八卷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统统刷成银色之后，我确实想住手了。只剩下几个立体台灯还得美化一下，我觉得它们有权利向我提出这一要求。为此，我必须站在一个梯子上干活。真奇怪，尽管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木头梯子，而事后我竟然可以发誓说，这是一个铝制的银色梯子。我站在梯子上，朝我们的波斯地毯洒了一点儿油漆。我高兴地发现，我们的地毯对银漆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吸水性能——这是对我们以色列集体农庄工业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这样一个事实的又一个新的证明。

当我油漆煤油炉的计划发展到这一地步时，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地把我们厨房里的几个架子，我太太的手提包和我的几条领带刷成了银色。我还把我岳母大人的一张兔皮变成了银狐皮。这时候，我在屋子里再也呆不住了。我高兴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花园里把几枝幼小的插枝变成了可以乱真的小小的、银色的白杨树并培育出了第一批银色的丁香树。当我用银漆来油漆我们的窗框时，邮递员闯进来吓了我一跳。我想在他的两鬓涂上一层薄薄的银漆，使他的外貌显得非凡脱俗。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一点也不领情，他吓得用嘶哑的嗓



子大喊大叫地逃了出去，匆忙中在我们家银色的台阶上洒落了一堆挂号信。

我正在使我们家的墙壁一扫寻常人家墙壁的风格时，我们家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最佳夫人站在门坎上。

"对不起，"她很有礼貌地说，"我肯定走错了门。"说着她准备走了。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她留了下来，然后慢慢使她相信，她确实是在我们家。我之所以做这些小小的修复工作为的是要给她带来一个惊喜。她确实惊讶不已，不过并不是出于高兴的缘故。她告诉我，她准备搬到旅馆里去住，直到法庭作出最后的判决为止。幸亏她无法将她的那些家当打包带走，因为所有的箱子都被涂上了新的银漆，打不开来了。她一下子瘫倒在地，束手无策地哭泣着。就在这当口我把所剩无几的那一点点银漆涂在她的手指甲上。然后，油漆罐便空了。

量来量去

有一种特殊的、只在某些地区流行的爱好。这种爱好必须由一群人，一群结过婚的人来进行，并且大多数是在我们家里。

一些经过精心筛选的客人在我们家客厅里聚会，全是些极有教养、极有才智的名流，其中有很有名望的内科医生朔沙纳博士，受到各方面推崇的美学家约瑟夫·莫吉勒夫斯基，著名的报刊发行家伊凡·贝雷兹-塔普以及我们的一位来自集体农庄的朋友，他刚在特拉维夫念完军官课程。

几年来，最佳夫人总是用想请一些可爱的重要人物到我们家作客的想法来折磨我。"否则的话我们会失去生活的乐趣，"她总是这么说，"我们必须与由权威人士组成的圈子接触。"现在，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朔沙纳博士一开口说话，马上便让人觉察出他深谙人情世故：

"你们家的这个客厅既漂亮又宽敞，比城里一般人家的客厅要大得多。老房子里最大的房间最多是 4.5 米乘上 4 米再



乘上3.5米，而其小房间一般不超过3.2米乘3米乘3.5米，然而在我看来，你们家的这个客厅至少是5米乘4.5米再乘上3.5米。"

"我不信，"伊凡·贝雷兹-塔普反驳说，"我们家的客厅是4.5米乘4.5米再乘3米，我觉得它比这个客厅要大得多。但是没有关系，这是可以确定的。"

说着，他站起身来，把一只脚小心翼翼地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他用脚步来测量这个房间的长度，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一点，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沿着房间的长度疾走。我们大家屏住气看着他。他满怀胜利喜悦地宣布说，结果是十六只鞋的长度加上一个脚后跟。

"我鞋的长度，"他说，"是28厘米。这就是说，这个房间的长度只有4.5米。"

我们对这位著名的出版商为我们提供的这一信息感到很满意，可是他的太太泽尔玛提醒他说，事实上他今天并没有穿他那双28厘米长的蛇皮皮鞋，而是穿了一双新的、特别能防雨的至少是29厘米长的黑皮鞋。

约瑟夫·莫吉勒夫斯基打破了这一令人难堪的沉默：

"我们可以简单地数一下地砖。不管天气如何地砖总是一样的。1,2,3,4……"

结果纵向总共是二十二块瓷砖，横向总共为十九块半瓷砖，瓷砖与瓷砖之间的那四分之一块瓷砖还没有包括在内。我们不得不又数了两遍，因为贝雷兹-塔普得到的最终答数是四百十九块，而莫吉勒夫斯基得出的答案则是四百十八块。

"这样的话总共是48立方米，"后补军官加德总结道。"我们的餐厅是225立方米，大约可以装得下五个这样大小的

房间。”

“别忙！别忙！”朔沙纳博士面露愠色地纠正这个嘴上没毛的军校生说。“这房间与48立方米还差得很远。它与我那52立方米的玻璃阳台无法相比。这个客厅到底有多高？”我们取来一把扫帚，用它来作量尺。这间房间的高度等于两把半扫帚。一把扫帚的长度等于六块瓷砖和七只鞋的长度，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一块瓷砖算作20厘米的话，那么这间客厅的高度大约为3米。

“不可能！”贝雷兹-塔普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绝对不可能！这肯定是个错误。我们再来检查一下答数。假如我太太泽尔玛抱着我的髋部把我举起来的话，我伸直的手臂可以碰到2.70米……”

当泽尔玛抱住他的髋部把他举起来时，贝雷兹-塔普伸直了手臂，在他的手指尖与天花板之间确实刚好是一把扫帚的长度。

于是，这间房间的尺寸终于被弄明白了：高度是3.5米，大小是56立方米。

最佳夫人用一个尺寸为55厘米乘25厘米的托盘端来了饮料，谈话继续下去。

“我昨天的经历相当有意思，”莫吉勒夫斯基叙述道，“我去拜访了一位我们最有名的画家，恕我不想把他的名字告诉大家……”

“停一下，”朔沙纳博士打断他的话说，“他的工作室是不是8米乘6米再乘上4.5米？”

莫吉勒夫斯基点头确认道：

“那您就知道我指的是谁了。我正在调查我们艺术家的



工作条件。所以我对他工作室的大小感兴趣。我把它的尺寸记了下来：长 48 米，宽 37 米，高是十二只鞋的长度。"

"您是否从他的墙上爬了上去？"

"太可笑了。我当然不会去爬。我脱下了一只鞋，是站在一个单人沙发上量的。这么说够清楚了吧？再说我的鞋是 29 厘米长。"

"这个工作室的大小为 169 立方米，"加德又开口说话了。"比这间房间大二倍。"

"再也别谈这间客厅了！"朗沙纳博士的话里带有明显的不悦。"对于不够聪明的人来说还是谈论其他话题为好。再说连小孩子都知道，位于特拉维夫北部房间的长度至少是 5 米！"

转瞬之间，那位有名的内科医生趴在地上，用脚底板蹭着往墙边爬去，一边在地砖上用钢笔在他头部做记号。这样的过程重复了两三遍之后，他爬到对面墙边重新站了起来：

"这个问题终于被我们解决了。我的高度是 1.65 米。三个 1.65 米等于 4.95 米。我们错算了 5 厘米，可还是在允许的误差之内。你们大家都看到了，继续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毫无意义。"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的客人被搞得郁郁寡欢，兴致全无。谈话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再说时间也太晚了。

等客人们离开之后，最佳夫人摇着头说：

"这便是我们国家的精英，"她含糊不清地嘟哝道。

然后，她伸直手臂躺在地上，匍匐爬行到地上做了第一个记号的地方。

我说过这是癖好吧？

也可以把它称为其他的什么……

高尚艺术——空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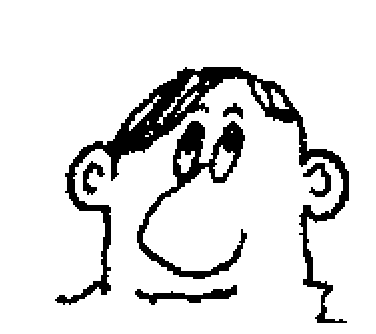
对于一个婚姻来说，体育是非常重要的。它给人以健康、力量和不在家的托词。对于像本书作者这样的真正男子汉来说，空手道无疑是很适宜的。

至少得练上那么一天。

这一天我踮着脚尖走进了吉德翁的空手道武术馆，因为事先得脱去鞋子。地上铺着用蒙古草编成的席子，给人以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四周的墙壁上挂着吉德翁摆出各种空手道姿式的照片，还挂着朝鲜空手道冠军的照片，他们只用一只手就把公牛的牛角给折断了。照片还展示了无助地瘫倒在地的公牛。

正在草席上进行锻炼的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小组"，他们中有一位数学老师、一位歌剧演员、一位室内装饰设计师、以及大工业家茨威克尔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新来的人。吉德翁的其他学生都在家里休养。

所有在场的人都打着赤脚，在白色的和服外系着各种颜色的腰带。腰带的颜色因他们所达到的不同级别而异，有白



的、蓝的和橘黄色的。有人告诉我，阿历克斯已经达到了绿腰带的级别，可他还上着石膏绷带。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坐在大厅最远一个角落里的一张长凳子上。

十七点刚过，我们脚底下的地便开始颤抖起来。吉德翁走了进来。他系了一根黑腰带。

他的学生们马上展示了他教给他们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纪律。他们跪倒在地，上身前倾，大喊一声"嗨"，这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哈罗"。

吉德翁说，一开始他想展示一下"手刀打"，这个招式是从斜的角度向对方的喉咙口进攻。他迅速地疾步向前走了两步，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他的手像斧头一样地从空中往下劈去。

那位室内装饰设计师从学生的队伍中走出来，请求免去他今天的锻炼，因为他的关节炎发作了。

吉德翁免去了他的课。室内装饰设计师松了一口气，在我身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这时候，吉德翁那老鹰一样的目光向他的学生投去。每个人都蜷曲着身子，每个人都试着想躲在其他人的身后。每个人都想说："为什么要选我？"

吉德翁选中了那位年轻的大企业家：

"请您站直了，不要动。我不会弄痛您的。我只是想展示一下这一招式的理论。请您别出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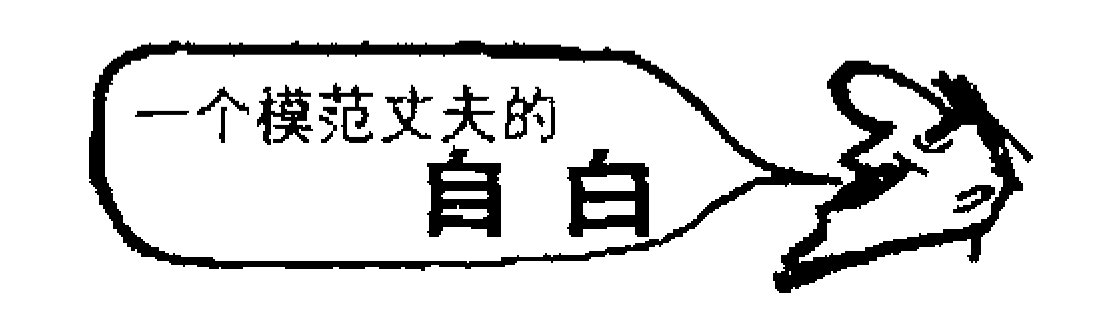
他目测了一下，屏气凝神跳将前来，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喊声"哟哈！"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那个毫无防备的大企业家的脖颈上劈下去。那位大企业家吓得目瞪口呆，向后

退去。可说时迟那时快，吉德翁的长手臂又一次向他劈去。只听得一声沉闷的霹雳声，他的牺牲品瘫倒在地，手脚并用地朝着浴室爬去。“必须得学会忍受砍击，”那位被免去锻炼的室内装饰设计师以内行的口吻和不无幸灾乐祸的神情悄悄地对我说。“谁不能忍受砍击，谁就学不了空手道。”为了强调起见他指了指系在他肚子上的那根黄腰带。接着，我得知吉德翁的屋子里没有暖气，他睡在地板上，喜欢吃肉，没有电话。他的学生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是自从他向他们展示了攻击眼睛的“双手突”之后。无论他走到哪儿，他的学生们便跟到哪儿。他们暗暗地希望在什么地方，比如在超级市场或在电影院里有什么人或者是一群什么爱打打闹闹的歹徒来袭击吉德翁。可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无赖都认识吉德翁。有一回，一帮由八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组成的歹徒在一个九柱戏俱乐部里闹事。有人急忙把正在附近一个咖啡馆里的吉德翁请来。他进门的时候，那些好斗之徒准备空手赤拳地，或者是用椅子腿，用指节连环铜套等一起向他冲过来。看那架式，似乎马上将会发生一场恶斗。可吉德翁非常镇静自若地说：“我叫吉德翁。”这伙人一听马上散开了，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

这时候，吉德翁正在展示“单脚踢”的招式。他的绝大多数学生已经都贴在墙上。他们的童年像万花筒似地在他们的眼前掠过。只剩下那个新来的人了。吉德翁对他说：

“请您注意看。我的肩膀和我的髋部成一条直线。我这条用来支撑身体重量的腿向右弯曲，而我跨出的那条腿是伸直的。您别动。我不会碰到您的。我只是想演示一下，这一招是怎么做的。您别出声。”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个新来的人便开始乱跳乱蹦地向后退去，吉德翁跟在他的身后大喊一声“见招”，这时候，他的肩膀与髋部在一条直线上，他伸出的脚却触到了那位新来的学生。他用力对着学生的屁股蹬了一脚，那位学生顿时朝墙边倒去。因为那地方碰巧是一扇门，于是，那位学生便一去不复返了。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一班的学生会这么少。

“吉德翁是带着闪光丝手套给我们进行训练的，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那位室内装饰设计师告诉我说。“您得去看看他是怎么来调教那些从集体农庄来的人的……”

我对吉德翁观察的时间越长，便越是自以为发现了空手道的秘密之所在：这便是日本式的大喊大叫。我想起了我上小学时的情景，想起了一位名叫带伯·贡多斯的男孩，每一个年级他至少得念两遍。他连一个特别出色的足球队员也算不上，可却是一个打架的好手。如果他准备打人的话，他便扭曲着脸，眼睛充血，露出一副可怕的怪相。当真的出击时，他会发出一声可怕的喊叫声，以至于他的大多数对手马上认输。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败在一名天生的空手道大师的手下。一个怒发冲冠的人，或者说，一个能够把发怒学得惟妙惟肖的人从一开始就能胜过他的对手。而腰带的颜色也正是以这一点来区分的。比如像这个新来的小伙子，他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系白腰带……

一切都取决了如何大喊大叫，我还没有把这一信念确定下来，那位室内装饰设计师则告诉了我另外一条道理：

“关键在于聚精会神，”他说。“说到底，整个空手道的奥秘便在于聚精会神。上个星期我们的重量级摔跤冠军约比·

卡奇克斯在雅法的一家饭店里惹起了一场争吵。他已经有一点喝醉了。您猜，他遇到了谁？他遇到了日本商业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这个商业代表团是到特拉维夫来参加样品展览会的。他把这位代表团成员叫做黄毛猴子，把啤酒倒在此人的脸上，做鬼脸，简直像个疯子。那个日本人礼貌地微笑着，默不作声。您知道，日本人长得矮小，看起来就像个孩子，一副弱不禁风、皮包骨头的样子。当你吹汤的时候，假如有一个日本人在你身旁的话，你会担心也许会把他给一块儿吹跑了。如此这般。突然，卡奇克斯对这个日本代表团中的一名妇女讲了一句粗话。这时候，那个小日本站起身来，非常镇静地往后退了一步，把他的重心放在左腿上，把他的右手抬到髋骨的高度——还没有等别人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位小日本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支手枪，把催泪气向卡奇克斯喷去。我用不着再向您讲下去了——我们的重量级冠军倒在地上，哭得像孩子似的。太可爱了，不是吗？”

“非常可爱，”我确认道，“可是，这与空手道有什么关系呢？”

“卡奇克斯学过空手道，可是他不能聚精会神。一如我所说的，一切都取决于聚精会神……”

就在这时候，那位室内装饰设计师被吉德翁叫去做一个小小的演示。已经顾不上他的关节炎了，因为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躲进了冲淋房，希望呆会儿能在那儿遇到他。他没有来，也许是因为演示太激烈了一点的缘故。

我离开了这个武术馆。透过另一个班级敞开的大门，我看见鲁本·勒夫科维兹的肚子上系的蓝腰带。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瓶喷洒用的杀虫剂。现在，我在家里训练。我大叫一声“啊呀”，一边把杀虫剂喷到窗上。与此同时，我的右肩和我的髋部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我那伸出的左腿不断地转动着。从昨天起我戴了一根绿色的领带。它表示我已经达到了“合气道”——一种用于对抗空手道的古老、高尚的自我防范拳术——的第四级。

电子科尔奇诺伊

假如一个寻找爱好的丈夫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叔父本诺从美国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礼物，于是乎我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我打开了他给我带来的礼物，只见一个像袖珍书那么大小的扁平盒子，上面有十六个光洁发亮的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无聊了。”

叔父本诺扮着鬼脸说。

“一副电子象棋。”

从青年时代起我便喜欢下棋。远东的全部智慧都集中于此。就像政治家喜欢玩扑克那样，作家，特别是讽刺作家喜欢玩的是象棋。在四十年代初期，我甚至打算写一本有关象棋的书。可惜纳粹来了，那时候我险些儿被“将”死。

现在，我平均每天在叔父本诺带来的礼物上花三十六个小时。每天早上，当我刮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玩，一直玩到我用手臂夹着这个扁平的盒子上床去睡觉为止。这是对性欲的一种抑制？还是像最佳夫人所怀疑的是一种同性恋的倾向？



也许是吧，我必须承认，我对我那漂亮的、有着可爱的闪光发亮的按钮的棋友非常依恋，并对他充满了热情……

他不仅漂亮，而且聪慧。我每走完一步棋，他便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轻气地——假如我在理论上走对了一步棋，他便叫一声；假如我犯了一个错误的话，他便叫二声。他每走一步棋，为他设置的那个范围内便会显示出红色的数码。

我管它叫电子科尔奇诺伊[①]，因为他是一个棋坛高手，另外，他也输得起。假如他明白我赢了的话，它便悲哀地闪亮着灯光信号，用英文表示"我输了"（我已经提到过，它是从美国来的），有时候情况恰好相反，假如棋局对他有利的话，他便会藐视我，在他的区域里亮起红灯用英文表示"你并不高明"，或者"你这个错误百出的人"。一旦遇到困境，他便需要更多的思考时间。他的行为与人一样。我的科尔奇诺伊，他是否有一天会开口说话？说俄语？还是说依地语[②]？

最佳夫人以为我疯了，这当然只是出于嫉妒的缘故。她根本就不懂得象棋。她对远东思想界的了解仅局限于瑜伽和酸奶。

与科尔奇诺伊对弈时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在下棋下到一半时改变他的智商。确切地说，你可以提高或降低他下棋的能力。他一共有十个能量级。在第一级上，他总是只考虑一秒钟便出棋，完全像个初学者。在第十级上他每走上一步

---

① 前苏联著名的国际象棋棋手。

② 又称犹太德语。这是一种在中欧和东欧各国犹太人中通行的一种中古高地德语、希伯来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

需要考虑1个小时，简直战无不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总是把他调在三级上。假如他想向我耍花招的话——在芝加哥人们为他设置了许多这种卑劣的伎俩——我便不怀好意地微笑着把他降到二级。对此他毫无办法。假如真正的科尔奇诺伊在关键的一局棋中对着他的对手卡尔波夫斯[1]的西装上衣一鞠躬，旋即按动一个小小的旋钮把这位以后的世界冠军变成一位中等水平的棋手的话，那么又有谁会知道，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冠军赛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还必须说明的是，假如我走错一步棋的话，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按动一个专门的按钮悔过，他则不能，因为它不可能去按自己的按钮。也就是说，人总是比一部没有灵魂的机器要高明得多。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我每次都能赢他。

最近以来我已经习惯于与他说话，就像那些在咖啡馆内下棋的人那样。

"呐，"我下完一步好棋说，"现在看你怎么办，你这个愚蠢的小玩意儿？"

我知道，把他称作小玩意儿会惹他生气，可是像袖珍书那么大小的小玩意儿的恼怒根本就吓不倒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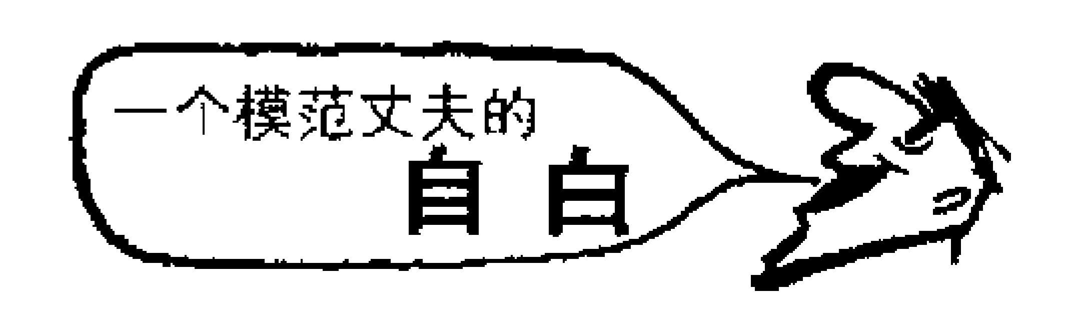
"再走三步想将死我吗？想得倒美，别和我来这一套，你这个小家伙！"

我已经把他的智商往下降了一级，打开了他的将身边的防线，使他变得耳聋眼花。

在我周围有一些人与我一样迷恋于电子科尔奇诺伊，可另外有一些人则不然。比如，最佳夫人对我说，我必须在她与

① 前苏联著名的国际象棋棋手。





“这个讨厌的象棋盒”之间作出选择。“有它没有我，”她说。她威胁我，要搬到她母亲那儿去住。这是一道真正的最后通牒，也是开局时举足轻重的一步棋。

对于这种在日常生活方面所出现的意外事故我是很超脱的。我经历了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这样的大事件，我接受了彩色电视机，我会使用录像机，我差一点弄清了拉链的秘密，我甚至搞懂了电脑是如何工作的。可以说，或多或少地懂得那么一点，这就是说，差不多懂了。离开完全的理解还差那么一点儿。一个 10×18 厘米大小的、扁平的小匣子怎么会知道，兵一旦越过“E5”的话就必须用两个马中的一个来保护车；它又怎么会知道，我再走三步就能用我的象来阻止他王车易位？我问：这是为什么？是怎么将有关的数据灌到一个电脑中去的？是不是有人在厂里对他说：“注意！只要国王不安全，王后就不能轻举妄动！”他答道：“别担心，头儿，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了。”到底是怎么弄的呢？

有好几次我真想用一把起子把我的电子科尔奇诺伊打开来，看看他的内部结构。我没有这么做。也许，除了一块薄薄的、布满了点和线的线路板——类似用塑料做的、犹太人在逾越节吃的未经发酵的面包——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

上星期我有事飞往欧洲去。在飞机上我有幸坐在一位中年男子的身边。言谈中他声称自己是一位电子专家。

我马上把随身携带的电子科尔奇诺伊取了出来。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这东西是怎么起作用的！请告诉我！一如我们现在离天特别近一样——我是绝对不会忘记您的！”

那位专家内行地把我急于想了解的那个东西拿在手里掂了掂。

“很简单，”他说。“电脑把每一局棋的每一种可能的方案直至按照二进制小数计算出来的公式储存在一个算式图表中。然后把这个算式图表与一个二元的晶体管连接起来。它的脉冲是自动传递到一个由二级管控制的记录器中去的。”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关节向内扭，直到他的上身被拧成一个几何螺旋形为止：

“这些宣传用的文章我早就听腻了！我想知道的是，一只塑料的、未发酵的面包是怎么会识破西西里人似的防御的！”

“再确切的我也不知道，”他痛苦地小声说。“谁也不会知道得那么确切。也许日本人……”

“电脑象棋究竟是怎么起作用的？”我盯着他问。

他痛得从张开的嘴巴里发出嗞嗞声，他以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

“这是一个奇迹，奇迹是无法解释的。”

我松开了他的手。我们跪在地上祈祷。我带着感激之情，眼睛望着高高的天空。一个奇迹，是的，这是一个奇迹！这种说法我可以接受。不过，千万别用记录器，二极管和脉冲等废话来困惑我。我毕竟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是一个成年的父亲。我相信奇迹。

从那一天开始，从得到上天的启示的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去追究电脑象棋是怎么起作用的了。并没有人为了要了解博比·弗舍尔① 身体内部的结构而去把他肢解开来。

① 美国国际象棋棋手，曾获得过世界冠军。





我马上又去买了一副电脑象棋，圆了我的一个旧梦：我让两只电脑对弈。这样我终于有时间去看望我的太太和孩子们了。现在他们住在我岳母的家里。

电话恐惧症

现在，除了女人之外，也可把电话归于那种有它没它都让人不得安宁的范围之内。电话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虐待狂似地折磨着我们。它那滴铃铃刺耳的响声把我们的家庭生活变成了地狱，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一天也离不开它。如果有谁几个小时没有去拨动一下它的拨号盘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急迫的恐惧感，好像他与外界隔绝了似的。他的手会开始抖动，用来拨号的那只手指像受魔力驱使似地指着那个特定的方向，并情不自禁地走到那儿去。

这已经不是什么爱好了，而是走火入魔，甚至比走火入魔还要糟糕。

任何一个剧院经理都不会对我所观察到的、令人惊恐万分的现象感兴趣的。这一现象是我在我们家里，在从我的工作室通往浴室的那条窄窄的走廊里观察到的。我走进浴室，关上门，脱去衣服，打开淋浴器。正好在我开始往背上搽肥皂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对于这样的心灵感应我已经习以为常。每当我搽肥皂搽到一定的地方我便会停



下来，倾听有没有电话铃声。这时候电话铃声总会很有规律地响起来。我当然可以不去理它，当然可以装做因为潺潺的流水声而听不到其他的声音，然后对自己说：“不去听电话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现在不在家呢？”可是，我在家里，我听到了铃声。我仿佛看见电话线的另一端是一个胖乎乎的纽约某剧院的经理，他嘴里叼着一支很粗的雪茄烟。他想约我为百老汇写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音乐喜剧剧本，并能给我预支一大笔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具有心灵感应的丈夫该怎么办呢？他十万火急地擦去背上的肥皂，把湿毛巾搭在肩上跑步前进，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一点，他赤着脚用脚后跟滑到放电话的那间房间里。那儿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可是，当他终于赶到那儿抓起听筒时，根本就没人应答。或者是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声音，问：乌齐在家吗？如果我反问一句“谁是乌齐？”的话，那么电话线另一端的听筒就被挂上了。于是地上留下了一摊水。

紧接着我又回到浴室里，把湿毛巾扔到墙上，打了几个喷嚏，重新又站到淋浴器下——当你刚开始重新在背上搽肥皂的时候，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铃声。现在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你不去理它，这样的话那位胖乎乎的百老汇老板就会把那份委托以及预付金给别人；要么你去接电话，然后就是有人问乌齐在吗。

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电话恐惧症，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通过搽肥皂来运动人体的艺术。

经历过各种各样磨难的最佳夫人认为，这纯粹是胡扯，这与心灵感应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她认为，没有人会因为我恰好在背上搽肥皂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而是刚好相反：是因为

我感觉到有人会给我打电话，所以马上在我自己的背上搽肥皂。

可这还是一种互相感应，难道不是吗?

我绝不会忘记十月十二日夜里到十三日凌晨的那段时间。我在等一个来自伦敦的重要电话，一直等了好几个小时。我如坐针毡。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话机，可它毫无动静。为了使自己不至于睡着，我喝下了各种各样提神的饮料。可是电话还是没有来。

凌晨时分最佳夫人居然对我动了恻隐之心。

她说："你也许应该去冲一个澡。"冲个澡怕什么。于是我脱去衣服，打开淋浴龙头，开始搽肥皂。当我刚搽到背上的时候……

是伦敦来的电话。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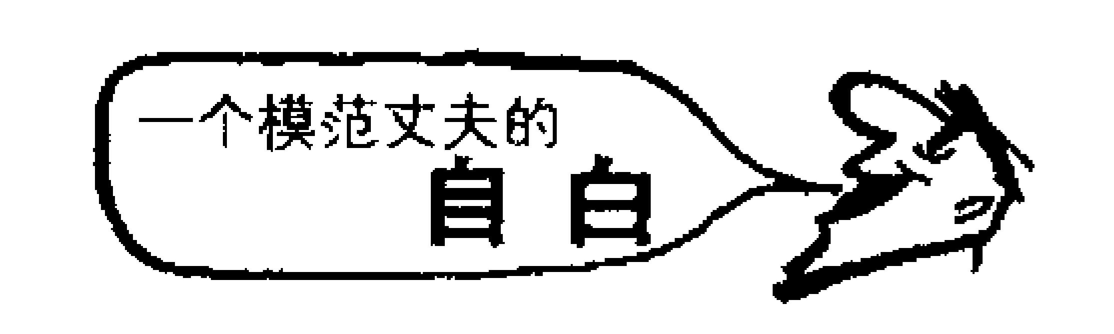
再说，我这个媒介体也会主动产生效应。有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我会突然毫无理由地产生一种不可抑制地一定要给某人打电话的需求。当我在拨号码的时候，便会莫明奇妙地打起寒战来。

"博比在家吗?"我问道。

"在家，可是他刚去冲澡……"

电话恐惧症，恰好是在博比在背上搽肥皂的那一瞬间，我莫明奇妙地打了一个寒战。这件事情最使人困惑不解的地方是：这种感应并不是通过淋浴器，也不是通过搽肥皂这个动作——而是必须通过人的背部来感受的。这是我经过无数次试验后才得出的结论。不管是用一块多厚的肥皂在身体的另外一个部分搽多久都不管用。刚在背上搽出一点点泡沫：滴





铃铃，滴铃铃的声音就响起来了。

我把这事情告诉了我的好朋友们，他们证实了我的感觉。显然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媒体，只要一站到淋浴器下面——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就有人会产生一种迫切的愿望，想拨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对此无法作出什么其他的解释。

我甚至想到官方机构去作一次检查，可最佳夫人则担心，这样一来，从此以后大家都会把我视为一个媒体。人们的不信任已经够我烦恼的了。昨天我还接到一个对我的肥皂理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打来的电话。

“亲爱的，”那个打电话的人呻吟地说，“现在我正在往背上搽肥皂，已经搓了十五分钟了，可我的电话铃一直没有响。”

“您用的是热水吗？冷水是不起作用的。”

“热水吗？那当然。我甚至还用了一块新的肥皂。”

“也许是您的电话坏了？”

“您不是自个儿听到了吗，我的电话好好的。怎么样，您的心灵感应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我一边惭愧地答道，一边擦去听筒上的肥皂泡沫，然后回到浴室中去。


家庭
内部事宜

父子俩收到的小礼物

一般说来，一个男人之所以要成为丈夫，就是因为要建立家庭和抚养孩子。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看，与教育孩子相比成立家庭简直是小事一桩。

我第二个儿子阿弥尔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长到了十三岁。根据犹太人的法典他已正式达到了成年男子的年龄。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在过了十三岁生日后的第一个安息日①——被叫到犹太教堂去宣读刻在约柜②上的律法书有关章节；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按照古老的传统我们做父母的要为他开一个晚会。为此我们邀请了许多朋友，特别是邀请了许多富有的熟人。

在欢迎仪式尚未开始之前，我走到我那已经成年的儿子身边，对他讲明这次晚会的重大意义：

“我的孩子，今天，你的父辈们都骄傲地看着你。从今天起，你将肩负起我们国家一个成年公民的责任，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两千年的磨难之后终于……”

“说到两千，”我那很有责任心的后代打断我的话，说，“你



觉得，我们今天能不能得到那么多呢？"

"谁在说钱？"我责备他说。"谁在说支票和礼物？什么东西更重要，是物质的结果重要，还是它的精神内涵更为重要，是……"

"我要以我自己的名义去开一个银行账号，"阿弥尔非常清楚而又响亮地道出了他的心思。

尽管如此，当第一批客人到来的时候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尴尬，有那么一点儿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自己该站哪儿。他开始出汗并不断地问我，他该说些什么。

我耐心地告诉他：

"你说：对您的光临我很高兴。"

"如果有人送给我礼物呢？"

"那你就说：非常感谢，可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如此这般地教了他一番之后，阿弥尔便站到了门边。他隔得老远便朝每一个新来的人喊道："谢谢！这是没有必要的。"当他收到第一张票面为 50 镑的支票时，我不得不制止他，否则的话他真会去吻他那施主的手；当他得到第一支自来水笔时，他几乎兴奋到了极点；当他见到第一个拉力器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真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他母亲说，"这么容易激动！"

我的小女儿蕾娜娜的房间变成了收集礼物的地方。我的大儿子拉菲担当起整理猎物的工作。

当一个爱摆阔气的商人带着一张面值高达 250 镑的支票

---

① 犹太人恪守的安息日从星期五晚上起到星期六晚上止。

② 约柜是指犹太人用来保管刻有摩西十诫的两块石板的木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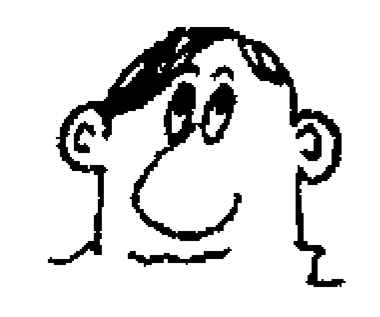
出现时，晚会的节日气氛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样一种慷慨之举的面前，指南针、《百科全书》等所有其他的礼物顿时显得黯然失色。打这之后，我们那位年轻的成年公民越来越漫不经心地嘟哝着："谢谢……没有必要……。"不一会儿，他向我抱怨两位刚到的客人。除了握手之外，他居然什么也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这确实是没有必要。我用眼睛盯着那两位厚颜无耻的吝啬鬼。我以无言的愤怒望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冷餐。

我的儿子十分恼火地站在我的身旁。"耐心一点，"我以安慰的口吻对他说，"回到你的岗位上去继续监视。"

总的来说，送来的礼物还是令人满意的，尽管送礼的人缺乏想象力，好多东西都送重复了。在堆积如山的礼物中有军用水壶、望远镜、指南针和自来水笔。拉力器越来越多，其增加速度之快犹如极易繁殖的家兔。谁会想到，这东西竟然会这么便宜。当泽利希一家带着一只可以收拢的塑料小船模到我们家时，我们感到了一种解脱。阿弥尔竟然没有像先前一样地说："谢谢，没必要，"而是忘乎所以地点了点头，以认可的口吻说："不错。"

我自己则时不时地从一个殷勤友好的主人的角色中脱出身来，去清点别人送来的礼物。这时候，送来的书已经堆得像塔一样高了：有廉价的《圣经》，旅游书，质量极差的影印版画册和一本题为《在无花果叶的后面》的小册子。这一书名一开始让人捉摸不定，实际上这是一本写给未成年的人看的有关性的指南。有一个傻瓜竟敢肆无忌惮地送给我儿子一本《幽默百科全书》，而在这本书中居然没有提到他老子的名字。我马上关照，叫人不要给这个家伙提供饮料。

在战斗的间隙，我尝试着去拉了一下拉力器并满意地发



现，我竟然可以拉到两级以上。除此之外，我还没收了一支自来水笔。反正自来水笔已经太多了。晚会之后，可以让阿弥尔挑选一支，依我看甚至可以让他挑选两支。其余的我们将移作他用。

顺便提一下，在我的眼睛里，我那红发儿子的性格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他早就不再向来宾表示祝贺了。他以默然的神情望着他们，似乎在问："礼物在哪儿？"他用以表示感谢的声音从由衷到冷漠，完全视情况而异。除此之外，他的行为完全像成年人一样。

当我再一次来到作为仓库的那间房间时，我发现那儿有两小瓶香水，男孩要香水有什么用。那些人在送礼物之前真该好好想一想。我还把一支金的圆珠笔和一只口琴占为己有。我在收拾这些东西时受到了妨碍：

"天呐！"最佳夫人咬牙切齿地轻声说道："还不快去招待我们的客人！"

我站到了阿弥尔的身边。他以一个拦路抢劫犯似的贪婪的目光望着正在逐渐稀疏下来的来宾。令人吃惊的是，他对他们的估计十分正确。

"最多 80 镑，"他小声地对我说，或者以蔑视的口吻说道："一把小刀。"

快十点钟的时候，他把家里所有的人都从那间储藏礼物的房间里赶出来，锁上了门。

"出去！"他喊道，"这些东西是我的！"

他在泽利希一家送的塑料船模上发现了价格牌，上面写着："7.25 以色列镑。"他气得从人群中找到了送礼的人，对着他两只眼睛的中间吐了一口痰。使我们大家感到困惑不解的

是，那只没有写明产地、带有水下耳机的晶体管收音机到底是谁送的？我们立即查看了由我们女儿蕾娜娜记录的来宾名单。在送礼人名单上没有出现的那两个人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对象。这两个人是我们的牙科医生和一个戴着红得耀眼的领带的陌生人。他们中究竟是哪一个呢？这种不明真相的情况使我们倍受折磨，因为我们必须得对其中的一个表示感谢，而对另一个进行惩罚。阿弥尔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直觉。他朝牙科医生走去，对准他的胫骨处踢了一脚。牙科医生挨了这一脚居然毫不反抗。毫无疑问：那一高贵的礼物是由戴红领带的那个人送的。

一个来自法兰克福名叫雅各布·辛斯海默尔的犹太人送的礼物引起了我们的极度不满。这一礼物是辛斯海默尔出生的那个城市产的一个软木风景雕刻。使我们感到生气的并不是因为这一木片毫无价值，而是因为这一礼物背面的题词："男孩成人仪式典礼，送给我亲爱的科比，叔父萨姆埃尔。"我们在辛斯海默尔先生的西装上浇了一点覆盆子果汁，然后向他表示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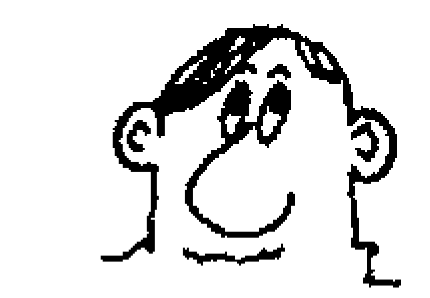
这时候，阿弥尔向最后到来的客人表示欢迎道：

"嘿！"他喊道，"多少啊？"

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怪物。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紧握的拳头因贪婪而颤抖着。他的样子看上去是那么可怕，以至于我转身逃到那间放礼物的房间里。最佳夫人正躲在那儿看《果尔达·梅厄的回忆录》[1]，被我当场拿获

---

[1] 果尔达·梅厄(1898—1978)，以色列总理(1969—1974)，生于俄国，1906年移居美国，1921年移居巴勒斯坦。



后她马上溜之大吉。

我一个人留了下来，舔湿大拇指和食指，开始数起支票来。善良的上帝，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在我们这样一个贫困的国家里这是一笔多大数目啊！我那个缺乏教养的儿子将拥有这么多钱的想法使我深感不安。我把一些票面小的支票留给他，把其余的支票都收在我这位做父亲的胸前。

不，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过意不去的。我所做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难道我没有在他的教育上投资了一大笔钱吗？今天这个昂贵的晚会是谁出钱举办的？是我还是他？好吧！他得去工作，去赚钱。再说，今天他不是已经成了一个男子汉了吗？

为什么这么吵

环境保护得从家里开始。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有那么一个政党把这一口号写到他们的旗帜上去了——如果没有的话，这一句口号可以供他们用。

至于我，我所说的主要是对各种各样噪声的环境保护。我所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噪音。这都是因为我太草率生了这么多孩子而引起的结果。

我伤心地想起了我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他每天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收音机关掉。这是那个年头的事情了。如今，情况恰好相反。每当我们家的头儿，我们的儿子阿弥尔从学校一回到家里，便马上打开他随手能触到的所有会发出响声的机器：晶体管收音机、唱机、电视机、电动搅拌器——总之，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会发出响声的东西。青年一代喜欢噪声，越响越好。据可靠的报道，耳朵里塞棉花的家长人数越来越多。

有时候，当我走进我家里的办公室时，只见圆珠笔和铅笔滚得满地都是。于是我便知道，阿弥尔又放过他那张新买的，



其音响相当于一架协和式飞机的《做事无恒心》的唱片了。协和式飞机是一种很有名的飞机型号，它的声音很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纽约才不允许它降落。

我那小女儿蕾娜娜竟然也变得那么有出息。当她放起她那些心爱的唱片时，窗上的玻璃会震得格格作响，挂在墙上的画会震落到地上。上星期四，由她所举行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歌曲回顾音乐会所造成的声波竟然把我们的冰箱门给震开了，冰箱里的霜也化了。

我的邻居费利克斯·泽利希在他家里发现，一张特拉沃尔塔的唱片也能引起与之相类似的效果。当屋顶被震塌下来时，他那对双胞胎儿子连眼皮都没有往上抬一抬。他们竟然无动于衷地蹲在一堆废墟中倾听他们心中偶像的歌声。

"当时，"费利克斯对我说，"我失去耐心，开始大吼大叫起来：'见鬼！你们不能把特拉沃尔塔的唱片放得轻一点吗？'"

"太妙了！你那双胞胎儿子说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我的吼声。"

我也对周围地狱般的闹声造过一次反。我非常生气地走到孩子住的房间里，径直向阿弥尔走去，对他喊道：

"够了！停下！安静！"

阿弥尔——已经提到过，我这个儿子已经成了一名男子汉——把他的唱机又开响了一档。

我拿来纸和笔写道：

"停止吵闹声！"

"停止什么吵闹声？"阿弥尔写下了他的回答。

我们的孩子，他们与我们完全不一样。也许，他们是带着加厚的鼓膜投胎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也许他们的身上有一种

我们所不具备的对于声响的感受力。因为使他们心醉神迷的并不是音乐，而纯粹是响亮的闹声。我从我那三个孩子身上已经多次观察到，他们可以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倾听一根嵌在唱片缝中的唱针：阿巴尼……巴尼……巴尼……巴尼……当打开晶体管收音机加上电视机，加上一张埃尔维斯的唱片，再加上他们用自己的拳头敲打桌子时所发出的声音时，是他们感到最最舒服的时候。《圣经·旧约》中早就已经记载了对此的先知先觉。《圣经·旧约》的《耶利米书》中写道："看哪，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这些话写在立体声音响发明之前。

昨天，我们家的猫逃走了。它是在我的大儿子拉菲倾听平克·弗洛伊德和他的乐队的演奏时逃走的。据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有许多耳朵被震聋了的猫。假如蕾娜娜提到"Abba"时——在希伯来语中这个词的意义是"爸爸"，她指的并不是我而是瑞典的四重奏爵士乐队。她根本就不会提到我。我的孩子中没有一个会理我。我至多是值得怜悯的对象。

"我需要好的音乐，"阿弥尔对我说道。"否则的话我根本就没法为毕业考试作准备。我必须集中思想。"

我的孩子们把我当作一块多余的、用旧了的抹布，当作一块毫无用处的化石。没关系！我知道，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认识许多父亲，他们的处境刚好与我相同。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家将会带上助听器，在一个被废弃的龙穴中相聚。

在美国，年轻人每走一步路都会随身带上震耳欲聋的晶体管收音机。也许他们都在为毕业考试作准备。

我的牙科医生认为，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必须用



心理学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他们是故意发出吵闹声的，”他说。“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受不了这种声音。他们看到我们受罪就会感到高兴。这一点当然是不能让他们看出来的。所以，我总是请我的丹尼把收音机或唱机开得更响一点儿。”

“那么丹尼是如何反应的呢？”

“他把收音机开得更响。”

必要的时候我的牙科医生还采取了一种被他称之为“治根”的防御性演习。他把坏东西连根拔掉。比如，他利用家里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发现的某个不良的接触制造短路。这种情况对于晶体管收音机来说虽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把家里搞得一团漆黑，使家里出现片刻的安宁也算是一桩善举。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认输。我本性好斗。上周六泽利希家的双胞胎儿子在下面的院子里举办了一次派对。一次派对？简直是一次协和式飞机集体降落。凌晨三点我已经处于那种即使是久经考验的间谍也会全线崩溃并把什么都说出来的状态。我明白，这时候我无能为力。如果我求助于警察的话，那么除了在这个世界上增加两位聋子警察之外不会有任何效果。到了第二天我积极地行动起来，找了一家最好的百货公司，直奔乐器部门。

“请帮我在你们的仓库里找一只音量最大的小号，”我请求道，“要最大的，最响的。我要用它来吓唬人。”

我在家里一直等到了举行下一次协和式派对的机会。我手里拿着小号站在敞开的窗户前。等到大约有十架协和式飞机同时降落时，我的肺里吸足了氧气，吹出的号声足以使一群成年的大象吓得没命地逃。吹号非常容易——每一个作父亲的只要肚子里有足够的火气都能吹——我紧接着又吹出了第

二声。

“嘟……嘟嘟……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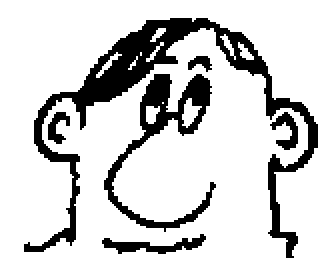
聚集在花园里的年轻人慢慢注意到了我，他们惊讶地抬起头来望着我的窗口。他们在我换气的时候向我抱以热烈的掌声。在这样的鼓励下我起劲地继续往下吹。我越能控制住自己的唾液便吹得越好。在大伙的一致要求下，最后那一段我不得不又重复了一遍。

第二天，我的儿子阿弥尔拍了拍我的肩膀，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我首肯道：“我的朋友们都觉得你很不错，你不像其他父亲那样讨厌音乐。”

“我确实不讨厌音乐，”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满足感，说，“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没有使你丢脸，是吗？”

“老爷子，你不错，”阿弥尔说。

我确实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人听到那么一点点儿吵闹声就会那么大惊小怪的。



警　报

对我们，即对最佳夫人和我来说，吵闹声已经不会再引起我们的气愤。即使是最近这次也没有引起我们的愤怒。外面有一头受伤的狮子在吼叫，我被吵醒了。吼叫声以同样令人恐怖的音调持续不断地响着。这声音是从我们这栋楼底楼的洗衣作坊中发出来的。

我唤醒了最佳夫人。

"你听见了吗？"我对着她的耳朵喊道。

"警报声，"她眼睛睁也不睁便嘟哝道。"他们在抢劫洗衣作坊。"

她的解释使我豁然开朗。我把头埋进枕头，想继续睡觉。可是，一想到洗衣作坊中可能也有我们自己的衣物，不知这些衣物的遭遇如何时，便怎么也睡不安稳了。

"老婆，"我又重新喊道，"我们该怎么办呢？"

"浴室里有耳塞，也给我拿一副来。"

我走到窗边。只见洗衣作坊前停着一辆亮着车前灯的白色客货两用轿车。警报器疯狂地吼叫着。我关上了窗户，看

到附近几栋楼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吵闹声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刚把耳朵塞起来，电话铃便响了起来，“请原谅，”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说道。“我看您刚才曾经在窗口站过，是洗衣作坊吗？”

“是的，洗衣作坊遭劫。”

“怎么又遭劫了？”

在最近几个月中，洗衣作坊已经四次被劫。有一回他们是用榔头把铁门砸开来的。用这种极其原始的办法砸门的过程整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发出的响声差点儿没把附近几栋楼居民的耳朵都给震聋。然后，那些抢劫犯把整个洗衣作坊都给抢得精光，直到最后一双脏袜子。

第二天，洗衣作坊的老板韦特海默尔老先生在大门上专门装了一根用钢材做的圆棍作为保险装置。第二次来的抢劫犯不得不非常费劲地把它锯开来。锯这扇门花了好几个小时，发出的声响可怕之极，但凡听到这声音的人其神经都受到了折磨。人们不得不问，这些抢劫犯怎么能承受得了这么可怖的声音。可是，他们却承受住了。紧接着韦特海默尔老先生又订购了一套带红外线光电管的最新式的电子警报装置。这一警报装置的监视系统特别敏感，只要稍稍触到它，警报器便会响起来。

“如果他们已经在洗衣作坊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赶紧把这可恶的东西关掉？”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嗓子嘶哑的人问道。“他们只须把电线剪断就可以了。我将到市长那儿去提出我的抱怨。我是纳税人，我需要睡眠。”

“那您去一趟药店，”我建议他说，“去买一些耳塞来把耳



朵塞住。"

"那玩意儿我已经有了，可是不管用。"

"那我就没有什么主意了。您究竟是谁啊？"

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把电话给挂了。要么是他不想被卷入到这件事情中去，要么是他不想与一个不能给他出主意的人打交道。

我又重新走到窗边。只见洗衣作坊前一个男人踩在另一个男人的肩膀上摆弄着一把卷尺。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进到洗衣作坊里面。警报器仍然在吼叫着。

"来一个三明治怎么样？"我问道，可是最佳夫人没有回答，她睡着了。我搞不懂她怎么能睡得着。我只能默默地羡慕她。

有人敲门，是我们的邻居。费利克斯·泽利希穿着粉红色的睡衣，眼睛红红地站在那儿。我请他进屋。

"费利克斯，你是怎么看的？整个夜晚都将这么给折腾掉吗？"

在电器方面费利克斯·泽利希真可谓是一个行家里手。比如，他会把烧断的保险丝换掉。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他向我解释道，假如警报装置是用电池的话，那么几分钟以后它就将会停止吼叫，假如它是接在市里的供电网上的话，那么这个夜里就别想再得到安宁了。

"几周前，特拉维夫北部一个大的家具厂遭劫，"费利克斯讲述道，"三个日本的警报器以最大的功率足足响了四十八小时。一直到电线被烧断后才停了下来。可这时候抢劫的人早就把仓库抢得一干二净，坐着偷来的卡车逃之夭夭了。"

洗衣作坊的那个警报器还在吼叫。

我从费利克斯那儿得知，有一种新的塑料材料，它不仅可以用来堵穿堂风，也可以用来防噪音。他说，他将为我搞一些样品来。他可以从他的小弟弟那儿搞到样品，他的小弟弟娶了一家超级市场一个部门负责人的女儿为妻。这一对年轻人不久前刚从远东旅行归来。费利克斯说，他们肯定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

外面除了警报器发出的声响外又增添了另外一种响声。行劫的人在用气焊机撬门。一些闲散的夜游神把手指塞在耳朵里站在一旁观看。

我问费利克斯，他认为保险公司将为这样的情况付多少保险费。他说，付损失的50%到60%，净的。

我们听说，韦特海默尔老先生想把洗衣作坊给卖了。他的损失太惨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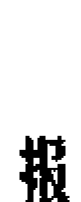
我们看到苏席茨基太太出现在我们对面的窗口。她向下面喊叫什么。因为太闹了，我们听不清楚她在喊什么。客货两用轿车的司机下了车，往上喊叫着。泽利希说他听懂了司机所喊的内容是："您在说些什么？"

我们看到苏席茨基又在大喊大叫些什么，然后她把窗户给关上了。

突然响起了一声如雷灌耳的爆炸声。火焰直冲特拉维夫的天空，随后便静了下来。确实静了下来。连警报装置也安静了下来。是到了该安静的时候了。

"来睡觉吧，"最佳夫人说。

我把被子蒙在脸上。外面已经亮起了第一道晨曦。我们将去寻找另一家洗衣作坊。





与亲戚保持距离

世界上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比发现从未见到过的远亲更能使一个富有责任心的丈夫感到欢欣鼓舞了。比如在较大的家族范围内突然出现了那么一个叔父或堂兄、表兄什么的，于是，生活又有了意义。那些近亲，如每日里吃惯了的饭菜，太无聊了。你知道他们的存在，你认识他们，他们都是家族的成员。但是，如果是一个联姻的姨妈所生的女儿，一个离了婚的大伯伯或小舅子的不知名的前妻，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知道，在我的周围就有类似的事情。

就拿我的邻居费利克斯·泽利希的父亲，住在里加[①]的老泽利希来说吧。有一天，他突然在本一古里翁机场的一张长椅上发现了与他失散了五十三年的兄弟。你设想一下，失散了整整五十三年！“格里沙！”他喊道，兄弟俩长久地拥抱在一起抽泣着。然后，他们俩便开始在各自的记忆中搜寻。泽利希的老爸在他的记忆中翻啊寻的，直到他突然记起来他是一个独生子。紧接着他的兄弟也泪流满面地承认道：他是在澳

大利亚出生的，他叫亨利·纳坦佐思。这是非常动人的一幕。谁也不会相信，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在失散了五十三年之后竟会以这种方式相聚重逢。

因为机场地勤人员举行罢工的缘故，他们俩坐在机场的长椅上聊了整整一夜。他们谈论着他们不同寻常的过去，谈论着他们命运中所走过的奇特的道路并决定继续保持联系。从此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关系，彼此用你来称呼对方。

从根本上来说，寻找失散的亲戚就是寻找自己的根，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寻找自己富有的根。特别是在受到战争威胁的时候或者是在银行需要一个担保人的时候，寻找亲戚的感觉便会更加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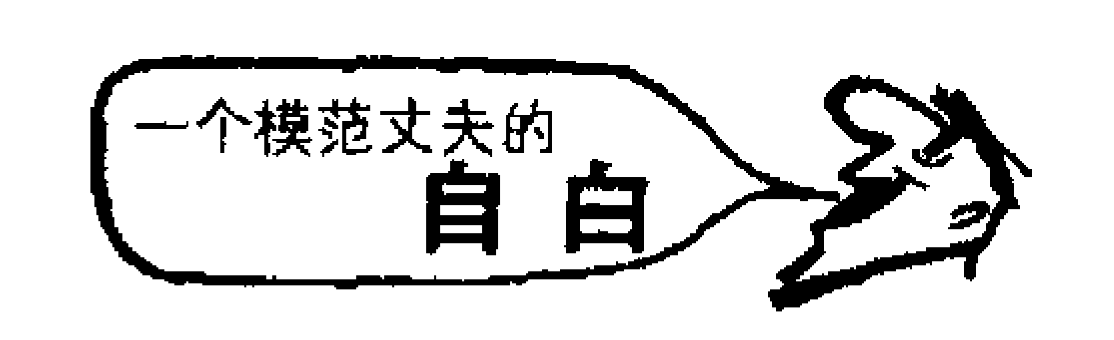
我想起了一个有关一位新到我们国家的移民的动人故事。此人名叫京斯贝格，他是个修理冰球杆的专家，在散居在外国的犹太人中小有名气。当他来到我们国家并稍稍安定下来之后，他便发现远东和近东很少有修理冰球杆的需求。于是，他便产生了一种想要寻找一位已婚的远房堂兄的迫切愿望，不管他在哪儿，都必须把他找到。京斯贝格到处奔走，寻问，调查，寻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果真找到了真正的线索。这一线索把他带到了巴黎。一到巴黎，他便马上去拜访多年不见的远房堂兄。当他因一时激动想上前去抱住堂兄的脖子时，男爵罗特希尔德亲自把他赶出了门去。

从德性上来说：穷亲戚比富亲戚的记性好。

---

① 里加是拉脱维亚首都。





就我个人而言，远房亲戚总会使我感到激动不已。当突然有人站在你门前，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是山多尔，是奥蒂莉厄最小的儿子。我母亲奥蒂莉厄嫁给了已故埃曼努埃尔·施穆勒维茨的侄子"时，这种刺激是无可比拟的。你的心开始狂跳，你的脑子开始飞快地转动：这位山多尔在这之前一直在哪儿？是谁派他来的？更重要的是：埃曼努埃尔·施穆勒维茨究竟是谁？

我的姨妈伊尔卡不知是什么时候嫁到我们这个家族里来的。她属于另外一种其来历不用让人太费猜疑的亲戚，只是有一点我还不太清楚：不知道她到底是我父系还是母系方面的亲戚。不管怎么说，我的母亲每年问我两次，你是否去看望过伊尔卡了。而我则每年两次回答说："没有，我还没有去过。可是，我肯定马上就会去的。"

对于姨妈伊尔卡我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只是她住在雅法近郊，去那儿很不方便，而且她已经是一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巫婆了。除此之外，每当我去看她时，她老是要抱怨我——我真的很少去看她，只有在最佳夫人的催促之后才会去看她，她总是用同样的话来欢迎我："到了你该想起你的老姨妈的时候了！"

"我实在太忙了，"我总是这么回答。"可现在我来了，伊尔卡姨妈。你好吗？"

我所得到的不是回答而是一项任务，为了那些地砖的缘故我得重新退出去，在外面把鞋子给彻底地擦干净了。姨妈伊尔卡患了一种少见的、但绝对没有生命危险的病，即所谓的

地砖病。对于她来说，地上得干净，这比什么都重要。她房间里的地砖看上去就像是用牙刷刷过了一样干净。你根本就不忍心用脚去踩，最好是能从这些地砖上飘过去。姨妈伊尔卡对她的每一块地砖都了如指掌。她按国际象棋棋盘的布局来称呼它们。她说："E4 上有污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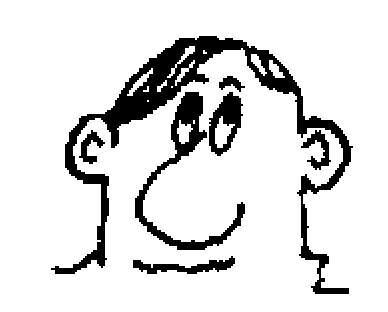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了"地砖"这一话题而转向"猫"的题材。姨妈的眼睛马上就变得湿润起来。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她伤心地轻声说道："比安卡……我可爱的比安卡……"比安卡是她最心爱的猫。这只猫是在一九五〇年左右死的，享有出奇的高龄。我没有见过这只猫，那时候我还在外地，不了解这只犹太猫的命运。为此姨妈伊尔卡要惩罚我。每次她总是要从放在地砖 G6 至 H8 上的那只古雅的、或者说至少看上去像古董似的首饰盒里取出比安卡的那张旧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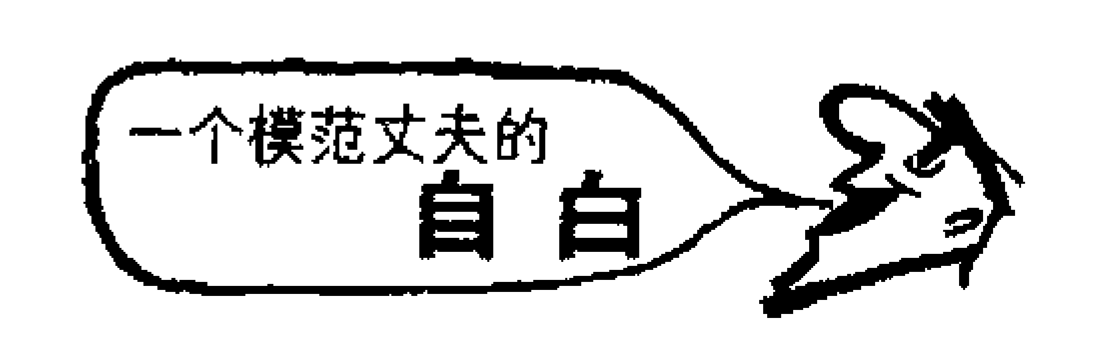
"就在你现在坐的地方，"这是姨妈必然要说的一段话，"就在这张圈手椅内……它总是在那儿蜷作一团。"即使我站着，这一段话她也总是要说的。"这是一只很好的猫。来，你来看看它。"我服从地走近去看那张照片。我看到了一只长着髭须，有着两只耳朵和一条尾巴的猫。我看到了一只猫，而我更喜欢狗。

"它很喜欢你，罗伯特，"姨妈伊尔卡说。"在这个世界上它最喜欢你了。"

我是不是已经提到过，姨妈伊尔卡已经八十九岁了。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她也许已经九十岁了。真是糟糕，我并没有见过比安卡，我也不叫罗伯特。

如果说姨妈伊尔卡是那种得去看望的姨妈的话，那么卡





尔曼叔叔则是一个得与他通电话的叔叔。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打电话问我，我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再说他患有慢性关节炎。众所周知，对于这种病特别适宜于进行漫长而又详尽的报道。正是因为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去买了一个式样特别的电话机。这只电话机的听筒设计得非常巧妙，可以把听筒放在一个架子上。这样我就不一定要把听筒贴在耳朵上，我可以腾出双手。当卡尔曼叔叔详细叙述他的痛苦时，我可以写一两个剧本，写信或者打个盹。我只须注意，每隔一刻钟朝听筒方向投去一句适当的话，比如："卡尔曼叔叔，真没想到！"或者"不，这是真的吗？"一切都挺好的，不过总是让人觉得有点累。

转机来了。有一天，卡尔曼叔叔在电话里特别唠叨。我想到屋子外面去几分钟，透透空气。我在外面遇到了我的邻居费利克斯·泽利希。他正在与一个看上去很忧郁的老头告别。他们俩无声地、但却由衷地拥抱，然后默默无言地各自离去。

"这个老头叫韦特海默尔，"费利克斯向我解释说，"我想，他应该是我的一位叔叔。"

"他是个哑巴还是聋子？"我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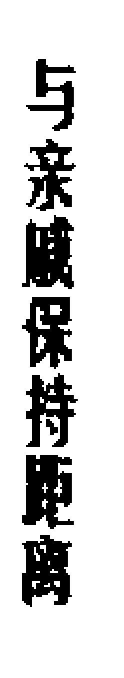
"他既不聋也不哑，只是不愿说话而已。这是一位世界上最沉默寡言的叔叔。我从他那儿连一句话也听不到，他让我感到无聊透了。"

我突然灵机一动："听着，费利克斯。我有一个年龄与你这位叔叔相仿并保养得很好的叔叔。我的这位叔叔刚好相反，他一点儿也不沉默寡言。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而且不太

注重别人到底是否在听他说话。只要让他说就行了。怎么样……?”

费利克斯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们俩交换了叔叔。打那以后韦特海默尔叔叔每周到我这儿来一次。他默默地在我工作室的角落里坐上一小时,呆呆地注视着天花板,然后满意地离去。而卡尔曼叔叔则每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费利克斯。所有与之有关的人士,包括我的母亲,都对这样的安排表示欣然同意。她说:“最重要的是,卡尔曼找到了可以聊天的人。”

毫无疑问:交换亲戚这件事情是有前途的。不久我准备在报上登一则广告:“用一个保养得很好的、有一只死猫的老姨妈来换一个二十至二十五岁、充满生活乐趣的表妹。”





您 请 坐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那样，近亲都是些地地道道的、令人讨厌的家伙，一无例外，在任何季节都是如此。

比如，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的岳父伯恩哈德——一个老犹太复国主义者，前不久才来到以色列——得到了一封给住宅建筑合作的"阿米达"的推荐信。写这封推荐信的人请求给我岳父分一套住房，房价最好不要太贵。

不用说，是我岳父非常明确地提出希望我到"阿米达"总部的办公室去一次，以便尽快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有人让我去314号房间，那儿有位名叫格施万的先生会出面接待我的。

314号房间里没有人。我从隔壁房间得知，格施万正在与施特恩谈话，马上就会回来的。隔壁房间的人友好地请我坐着等候。

我坐了下来。我坐了一会儿。我来回地走动了一会儿，我又坐了下来。这时候门开了。一个男人把头伸进来问道："格施万在哪儿？"

“他正在与施特恩谈话，”我说，“您请坐。”

那个男人似乎很着急，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几分钟之后又来了一个男人——此人显然是个公务人员，他非常焦灼地在屋子里四处环顾。

“别急，”我安慰他说。“格施万正在与施特恩谈话，他马上就会回来的。您请坐。”

“没有时间了。等格施万回来时，请您告诉他，迈尔正急着要找他谈话。他得马上去。”

“没问题，”我说。

不到十五分钟，又有一位公务员进屋来问道：“基施纳在哪儿？”

“他刚到这儿来过，”我答道，“只要格施万从施特恩那儿一回来，我马上就会让他过去的。请坐！”

“谢谢，您是不是知道，他是否已经看过拉马特·阿龙的建筑项目了？”

“很可能已经看过了，”我说。

“那我马上把这文件夹拿走。如果他问起法因图赫的话，告诉他，我在与迈尔谈话。”

几秒钟之后，基施纳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我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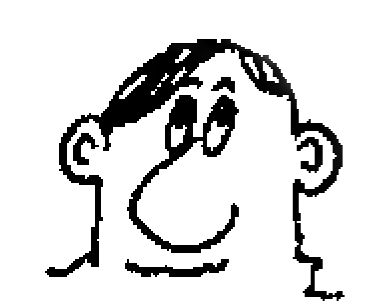
“有关拉马特·阿龙的那个文件夹在哪儿了？如果不马上找到的话，老头子会大发雷霆的！”

“天呐！”我喊道。“一分钟之前法因图赫拿着那文件夹去见老头子了。”

“那么格施万在哪儿呢？”

“他还在与施特恩谈话。我正在这儿等他。”

“好吧，”基施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您把有关格尔



德贝格的规划放到吉瓦特-塞伦的文件夹里去。"

"好吧,"我说。我接过文件,从书架上找出有关吉瓦特-塞伦的文件夹,把格尔德贝格规划放了进去。刚做完这一切,法因图赫冲进屋说: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控制不住自己地喊道,因为我已经慢慢地失去了耐心。"您怎么还没有去谈话?老头子的情绪本来就很糟,您想挨骂吗?"

"我正要去,我只是想来取格尔德贝格规划。"

"法因图赫,为什么您偏偏在这个时候需要格尔德贝格规划?我刚把它放进吉瓦特-塞伦的文件夹。是不是又要我把它拿出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所有的人都在利用我,而我这个傻瓜也让你们大家利用。"

法因图赫显然是被搞糊涂了。

"我只是想把格尔德贝格规划拿给迈尔看,"他结结巴巴充满歉意地说。"您觉得这个规划如何?"

"不错。不过,我很想知道老头子对此的看法。"

法因图赫接过规划,打算把它交给迈尔。出去之前他对我说,老头子很希望我能把舍克姆住宅建筑项目租赁人的名单看一遍并就这个问题给施特恩写个报告。

于是,我马上开始着手工作。

在我查看名单的时候,法因图赫来了。他说:我得马上到迈尔那儿去一趟。"怎么,难道我有四只手吗?"我理由非常充足地责备道。我收起文件去找老头子。迈尔想听听我对拉马特-阿龙项目建筑质量的看法。我坦诚地告诉他,房子与房子之间的距离太近,窗户太小。基施纳说话的声音开始结巴起来。"总是老一套,"他说。"那就更糟糕,"我严厉地反驳道:

这只是又一次证明了再也不能这么干下去了。

老头子认为我说得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他把基施纳调到另外一个部门(我想,从现在起他要开始恨我了)并委托我来负责拉马特-阿龙项目。我马上派人找法因图赫,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写出一份详细的报告。随后,我要了一辆车,驱车去拉马特-阿龙那里。我与建筑师详谈了一次,查看了图纸,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开除了一个爱发牢骚的工程师,连补偿费也没有付给他就把他给打发走了。然后我又开车回办公室。

那儿有人正异常激动地等着我。基施纳嫉妒我像气象表那样直线上升的升迁机会,开始在我背后悄悄地发动了一场反对我的运动。当他看到法因图赫来找我并告诉我,施特恩本人要我去作一次紧急商谈时,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

我非常详尽、诚恳地向施特恩汇报了这一项目目前的状况并毫无保留地对缓慢的工作进程提出了批评意见。

汇报结束时我说:“不过,施特恩先生,您得看到,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威的话,我是无法担起责任的。”

施特恩看到了这一点。他马上召集执委会特别会议。他告诉他那个班子的成员,他已经任命我为他的副职。迈尔小心眼地想对我极短的工作经历提出异议,可是,施特恩已经对这种反对我的阴谋习以为常。告别时他有意握着我的手,以大家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对我表示了他的信任。

当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想再看一下吉瓦特-塞伦的文件时,我遇到了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迈尔把他介绍给我。这便是格施万先生。我马上就把重要的登记注册任务分给了他。



“我肯定不是凶神恶煞般的上司，”我对他说，“不过，我要求准时以及工作认真。我特别注重的是，我的工作班子在办公时间，也就是说在我们接待来访者的时间里不能去参加任何会谈，否则的话难免会出现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把拉马特·加恩整整一组房子分给我的岳父，再从我的工资中预支了一小笔钱，然后便下班了。

看来，帮助近亲有的时候是很值得的。

探 病 时 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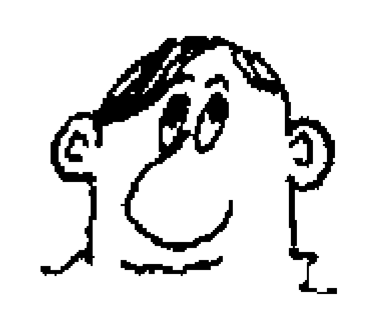
说到我这位做丈夫的责任心，自然要提到我的姨妈伊尔卡，也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老妇人。事情是在她正在擦地板的时候发生的。她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她膝关节的半月板或类似什么东西受了伤。姨妈伊尔卡被送进了医院，并被安排在第 14 病区。

刚一安顿下来，她便委托护士长给我们大家打电话，她要把我们召到她的病床边去。她提醒我们别忘了，她姨妈伊尔卡有喜欢吃奶酪面包的爱好，而在医院里只有心脏病严重发作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奶酪面包。

最佳夫人认定，我是完成这一任务最合适的人选。她交给了我一包在灰里烤过的奶酪面包，不一会儿我便来到了被双层铁丝网围住的医院外。

铁门关闭着。我很有礼貌地按了好一会儿铃，才出现了一个敦实的门卫。他说："探病房的时间是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到三点三十分。"

"十分感谢，"我说，"可是我已经来了。"



“亲爱的先生，”看门人说，“这是为病人好。来探病的人会引起病人的激动，从而延缓他们的痊愈过程。请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不停地放探病者进去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说：“您说得对极了，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可现在请您放我进去吧！”

“不行，”他说。“我得严格执行任务。除非是我死了，否则的话您别想踏进这栋楼。”

“我可不希望您死。我只是想去看望姨妈伊尔卡。”

“没门儿。不过，两点钟有人来换我的班。也许您能在接班的那个人那儿碰上好运。”

守门人不仅是个疯子，而且还很狂妄。我避而远之，怀恨在心，嘴里发出愤怒的诅咒声“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但愿这儿所有的病都同时让你给染上！”我诅咒道，“你一旦被炸得粉身碎骨，我便可以进去看望姨妈伊尔卡了。”

过了一阵儿我又去敲那扇大门，这一次可没有重犯刚才的错误。我对新换的那个门卫说：“我是《耶路撒冷邮报》编辑部的，准备写一篇有关你们医院的文章。”

“等一会儿，”门卫二世说，“我打电话告诉格本纳默博士。”

格本纳默是个礼貌周全，和蔼可亲的人。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并马上提议带我参观医院。

我说：“大夫先生。非常感谢。可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去。您知道，这是一种新的采访方法，叫做收集直接印象。请您别客气！”

“我一点也不客气。我很愿意这么做。”格本纳默说着友

好地把他的胳膊插到我的胳膊下面。“再说您需要了解一些专业情况，来吧！”

他拖着我来到第11、第12和第13号病区，一边非常起劲地谈论着报界的主要任务。他认为，报界的主要任务从总的意义上来说是要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医学，而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要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医院的规章制度。我一边听他的介绍，一边不断地点头称是，还时不时地作一些记录，诸如：“1到3,4到6，外婆是巫婆”或类似的什么的东西，大多是押韵的。

所有的病区秩序井然。这种井然的秩序因为探病的人太多而受到了一点妨碍。平均每张病床边大约坐着两大家子的探病者。

“可现在并不是探病房的时间啊，”格本纳默说，“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

“没关系，没关系，”我安慰他道。

突然，有一个老妇人的声音从一张病床上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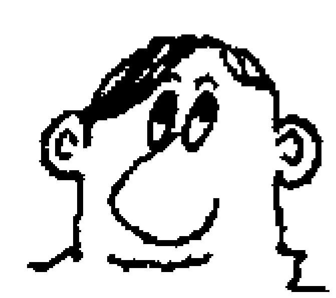
“哈啰，费利！你是不是把奶酪面包给我带来了？”

这情景实在叫人尴尬了。格本纳默博士望着我。他的脸上显出了令人不舒服的、寻问的神情。

“你好，姨妈伊尔卡！”我喊道，“这真是太巧了？”

“巧？难道那位护士小姐没有给您打电话？奶酪面包在哪儿啊？”

我迅速地把那包东西交给她，然后试图使格本纳默博士相信，我不管上哪儿总是随身带着一包奶酪面包。他默然无话地耸了耸肩膀，走了。



姨妈伊尔卡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那一包东西给吃掉了，她说，第二天她想要一包薄荷糖。还要我把伯恩哈德和米齐带来。米齐当然是指我的太太。我迟疑地插嘴道，明天不是探病房的时间。姨妈伊尔卡用意味深长的手势指了指云集在病房里的那些人，然后让我回去。

我们立即行动了起来。米齐用她的缝纫机缝了一顶小小的白色护士帽，然后从她的理发师那里借来了三件白大褂。随后，我们用两把扫帚柄做了一副担架。这便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东西。

第二天，一辆出租汽车把我们送到医院附近，我们在那儿化了装。我的太太被派去作侦察。她回来报告说，又是昨天那个丧心病狂的疯子——我曾经非常仔细地向她描述过那个人——在看门。我躺在担架上，盖上一块白被单。伯恩哈德和米齐抬着我。最佳夫人拉着我的手。这次入侵成功了。那位彪形大汉居然中了我们小小的诡计，让我们顺利地通过了。

为保险起见，我们绕了好几个病区。正当已经能看到14号病房的时候，突然有人用强健的手拉开了遮在我身上的被单：

"是您！"格本纳默博士说，"您发疯了吗？"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压低了声音说，"我快要死了。"

"我被毒蛇咬了。"

格本纳默博士听了脸色发白，亲自把我拖到他的诊疗室。我正好还来得及把薄荷糖塞给伯恩哈德。"快，"我轻轻地说，"替我吻姨妈伊尔卡……"

其他人逃之夭夭，只有我落入了格本纳默博士的魔爪之中。格本纳默博士正忙着摆弄他的针剂和玻璃瓶。他告诉我，现在他要给我灌苦拉拉，这是惟一有效的抵抗蛇毒的抗毒素。我听了有点儿不舒服。还不止是不舒服。我开始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必须得在这儿受虐待甚至冒中毒的危险？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姨妈伊尔卡一定要在开刀之前吃薄荷糖的缘故。我决定用不字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一跳而起，出了诊疗所直奔医院的大院。我跳上一辆来往于各病区之间的无轨车。

"快开！"我轻声地对司机说。"不管上哪儿，您开吧！"

等到了一个较远的病区后，我便混在探病人的中间逃走了。

晚上，我又回到了家里。我听说姨妈伊尔卡的心情极好，只是因为我没去看她而有点不高兴。她想要几本瑞士画报。米齐建议，在铁丝网下面挖一条通道，可是这至少要花三天时间。我们可不能这么长时间不去看望姨妈伊尔卡，不去给她送杂志。但是，另一方面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能尝试集体行动了。我们必须个别行动。于是，第二天我又披上了理发师的白大褂，就是从背后扣扣子的那种白大褂，戴了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并加上了一顶糕点师傅的白帽子，从而完成了我的化装。

在医院大门口站着的又是那个丧心病狂的彪形大汉。我马上在脸上绑了一条手绢，迈着正步从他面前走过（我们所有的医生几乎都是德国的犹太人），以严厉的口吻说了一声"是的"，他听到后立即把两只脚的脚后跟并拢，然后一鞠躬。我直挺挺地走着，视察了第 11 号和第 12 号病区。当我刚走进



第 13 号病区时，突然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

“教授先生，您在这儿啊，真是谢天谢地！快来，有一个紧急的开刀手术……”

“格本纳默博士，遗憾的是，”化了装的我含糊不清地说：“我已经退休了。”

“可是，教授先生，这是一个紧急情况啊！”格本纳默博士把我拉进了手术室。我还没有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洗完了手站在无影灯下。这时候，病人的病床也被推了进来。

“你是不是把瑞士画报给我带来了？”姨妈伊尔卡问。

“她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格本纳默博士说着马上使姨妈伊尔卡进入了昏迷状态。我觉得自己也快要晕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开过什么膝关节半月板的刀，更没有给我自己的姨妈开过刀。

当开刀室的护士问我，要小刀还是大刀时，我突然毅然决然地转向格本纳默博士，说：

“这刀由您来开！”

格本纳默博士因为骄傲和高兴的缘故而脸涨得通红。这是第一次由教授放手让他去开刀。他马上动手割开了姨妈伊尔卡的膝盖。这时候，我的感觉就好比是有时候我们在厨房里看别人剖鸡大腿，尽管我很喜欢吃鸡大腿，特别喜欢吃用鸡大腿拌的黄瓜色拉。

“对不起，”我吃力地说，一边有点步履蹒跚地走出开刀室。一到外面，我马上摘下伪装，拼命地吸气。这时候，那位丧心病狂的守门人正好从这个病区里经过，他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您瞧，今天您能来看望您生病的姨妈了

吧！”

我完全给搞忘了，今天是星期四，两点刚过一点儿。这一点其实我早就应该发现了。因为整个医院里连一个探病的人都没有。



打 嗝 儿

根据最近的数据调查，已婚的男人活得更长久些，而未婚男人则活得更幸福一些。所以，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一个生活在造福于他的家庭圈子里的已婚男人才会生病。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心静气和地坐在家里的桌子边上，说不出任何理由地突然有一股东西在我身体里向上涌来。我发出了“呃”的声响并以此为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打嗝系列奠定了基础。

我家里的人马上便采取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尝试过的对策。最佳夫人让人在我的耳边拍破了无数只吹鼓了的纸袋，孩子们为了想让我吓一跳，在我的背后大吼大叫“嗬！”直到精疲力竭为止。我自己则一直不停地发出“呃”的声音。

夜里我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便去了医院。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我竟然受到了优待，分到了在走廊尽头的那一张床位。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在我的颈脖子底下垫了一只枕头并使劲地要我放松。

“几分钟之后，”她说，“奥皮特教授会来查病房。您马上

就会被医好的。”

说着她把一只温度计塞进我的嘴巴里，走了。

过了一小时，我真的看到在走廊的另一头出现了教授和他的随行人员们穿着白大褂的身影。

奥皮特教授确实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目光深邃，声音隆隆作响。他首先让一个护理人员把我掉在地上的温度计的碎片捡起来，然后，他走到了我的身旁。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些谦卑恭顺的医生助理和一群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大学生。

“打嗝，”他以一位大医学家不容置疑的自信诊断说，“其拉丁文名字为‘Singultus exessivus’。这是一则非常典型的例子。请注意他哮喘似的吸气声。”

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拉了起来。我采取了坐的姿式，顺从地发出哮喘声。难道我能证实像他这种层次的权威人士在说谎吗？

“假如呼吸器官因为声带变窄而发生收缩的话，”他说，“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哮喘声便会转为呻吟声。”

“呃，”我答道。

教授让人难以觉察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并继续往下说：

“在某些情况下，由此而引起的反应会使一个病人完全无法用嘴巴来呼吸。”为了示范，他抓住了我的鼻子并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它：

“病人的脸色会变成青紫色，细胞膜会发生阵发性痉挛。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持续不断的缺氧会使病人的眼睛受到损伤，角膜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这个重要人物的随从像走火入魔似地观察我是如何在无



法呼吸的情况下试着活下去的。当我实在无法坚持下去时，我有礼貌地发出了几声咕噜声，紧接着便是一连串“呃，呃”的打嗝声。

“教授先生，”一位大学生说，“这样的打嗝发作会持续多久？”

“得视情况而异。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是几年。”

“会导致死亡吗？”

“也有可能。”

奥皮特教授脱去我的睡衣，把我按在床上。他把他的全部分量压在我的下腹上。我不得不发出一阵轻轻的呻吟声。我清楚地感觉到，床垫被压扁了。

“现在，”奥皮特教授又开始了他的现场实播，“我正坐在病人的胆囊上。如果周围的组织退化了的话，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那么过剩的氮便会进入肝脏，导致淀粉化。”

说到这儿教授中断了他的报告，站起身来，抓住我的脑袋，硬把它塞进我的两个膝盖之间。为了不错过任何对我进行观察的机会，那一拨人马上涌到了床的另一边。

当所有观众站好之后，奥皮特教授用一支铅笔撬开了我的嘴巴。他把手伸进我的嘴巴，把我的舌头拉了出来。我痛得急叫。这时候他终于感觉到了我的存在。

“哈啰，”他向我打招呼说。“您感觉如何？”

“呃，”我实事求是地回答道。

我仍然蜷曲着身子躺在那儿，舌头被拉了出来，舌头的周围都是淀粉。奥皮特教授的手指闻起来有股肥皂味并散发着乙醚和权威的气味。

“舌头干枯直至濒临萎缩的地步，”——说到这儿他让观

众们走到我的床边来仔细观察——“这是缺乏唾液分泌的后果。这种情况会导致60%患有这种症状的病人出现明显的瘫痪现象，并完全失去正常的反应。”为了证实他的论断，他又一次把我的舌头拉出来，把我的脑袋推到脖颈处。他在我的脑壳上敲了好几下，确实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一个医生助理急忙跳过来，如果这时候我的眼睛从眼眶中掉出来的话，他会马上把它们接住。

当我看到有人推着一具尸体从我床边走过时，生的欲望突然被唤醒了。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我的舌头缩了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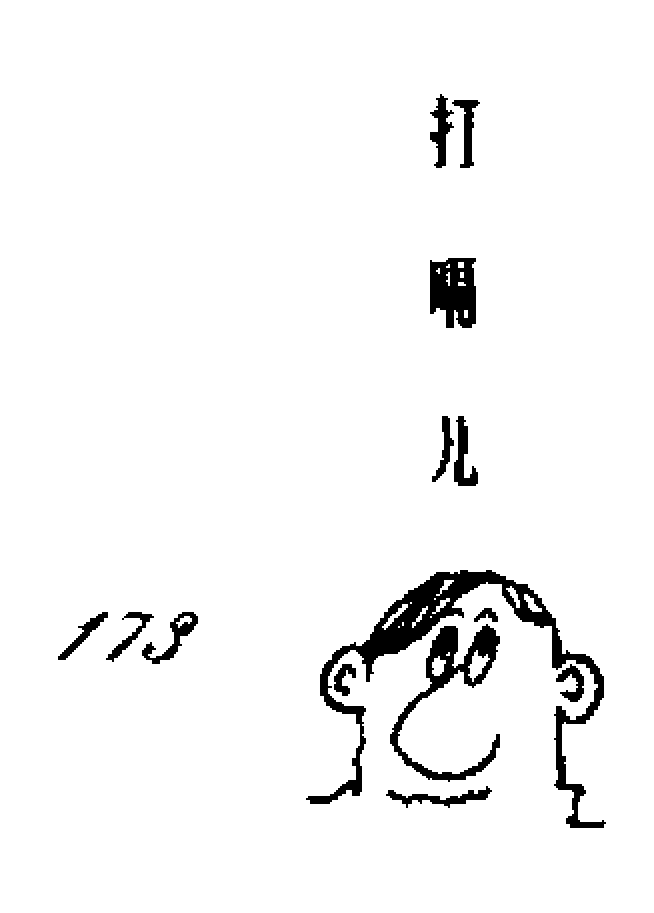
“打嗝结束了！”我喊道。“请您给我接通我们的大使馆！”

奥皮特教授放开了我的脑袋，让我重新躺下，我的肢体像散了架似的。

“先生们，你们在这儿目睹了由打嗝引起的惨状，”他结束了他的演示。然后，他转身嘱咐一名见习医生说：“把这个人送到矫形外科去。”在众人的掌声中教授向下一个病人走去。

我开始活动四肢，除了一只大拇指外都能动弹。一位年轻的女护士把我的手臂和腿放正了位置，然后小心翼翼地扶我站到地上。

“这是对打嗝惟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她陪我走到出口时不无骄傲地说，“震惊疗法，这是我们教授的专长。他是这个领域里孤独的顶尖人物。”但愿他一直是顶尖人物，而且越孤独越好。





天气预报:喜欢丢伞

今年的冬天真让人难以捉摸。你不知道冬天究竟是否终于开始了,还是已经结束了。天上时而堆起了乌云,西伯利亚来的冷风从这个地区刮过——十分钟之后,太阳出来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五分钟之后下起了一场小暴雨或者是整个地区下起了一场雷雨。在这种时候,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离开家门时是不能不带伞的。他会受到伤害的,当然不是指伞,而是指丈夫。我觉得,这至少是最佳夫人在我打算到"迈克车库"去取车——我们的车在那儿修理——时的态度。

"亲爱的,带上我的雨伞,"她说。"可别把它给弄丢了!"

我每一次带雨伞出门时她总像一只学舌的鹦鹉再三重复这种多余的提醒。她把我当成了什么?当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吗?

"最最亲爱的,"我的声音里带有明显的讽刺,"有哪一次我把我的伞给弄丢了?"

"大前天,"她立即答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让你把我

的伞也给弄丢了。”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得意的神情。碰巧我不知道把我的伞给放在哪儿了，现在不得不用她的伞，她就这么津津乐道地来指责我。再说，她伤害了我这位堂堂男子汉的尊严，因为她的伞看上去特别有女人味：小巧，易折，蓝得给人一种苍白的感觉，连正经的伞把都没有一个，而是用由大理石、象牙或其他什么材质雕成的狗头代替了伞把。我很不情愿地拿着这种丑陋的东西冒着倾盆大雨上路了。

不用说，当我下公共汽车时，天气又变得犹如夏天。晴朗的天空，树上的花都开了，小鸟儿在歌唱。太阳高照，我的腋下夹着一把女式伞在大街上行走。

我们的车还没有修好。迈克在驱动装置中又发现了一点儿问题，不过他需要的时间不多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顺便拐到银行去取了一点儿钱。

紧接着我又在一家名叫“加利福尼亚”的咖啡馆里呆了一会儿，与朋友们聊了一会儿关于现代戏剧批评中所出现的危机。十三点四十五分我准时到家。

最佳夫人迎着我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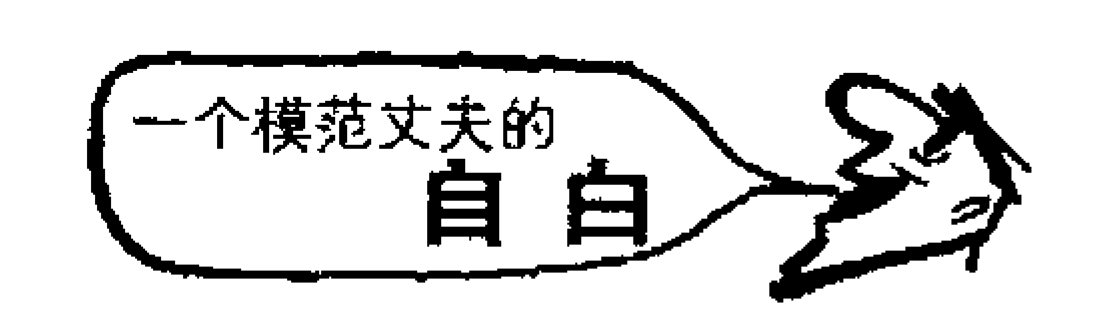
“雨伞呢？”

真的，雨伞哪儿去了？我完全把它给忘记了。但是忘在哪儿了呢？得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我马上就豁然开朗了：

“伞被忘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里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把伞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当然是在那儿了，亲爱的，我马上就去取。两分钟后我就回来。”

这时候天上又下起雨来了。我冒着雨奔向车站。在坐车的这段时间里我想到了英国人。英国人没有伞是寸步不行





的，可即使是雨停了，他们也不会把伞忘记的。他们以这种方式建起了一个帝国，也以同样的方式又失去了这个帝国。得好好研究一下雨伞和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我在头脑中考虑着如此广博的问题，车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直到最后一瞬间我才突然清醒过来，跳将起来，抓起雨伞就往出口跑去。

"嘿，这是我的伞！"

发出这一喊声的是一个很胖的胖女人，她一直坐在我的身旁。我一时走神竟然错拿了她的雨伞。那又怎么样呢？这种事情是经常会发生的。可这个胖女人竟然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她把我说成小偷，威胁我说要去叫警察。我徒劳地向她解释说，我对她的这把破伞不屑一顾。我自己有好几把雨伞。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我把这些伞给分散在全市的各个地方。那个胖女人居然对我的解释置若罔闻，她继续骂着。为了躲避她的攻击我只能逃之夭夭。

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里我马上就找到了最佳夫人的雨伞，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找到了她那把伞的残骸。它竟然被扔在一个角落里并被人以野蛮的方式践踏过了，脏得让人都认不出它原来的模样了。我太太会怎么说呢？确实，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生活变得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你瞧，"当我站在我太太面前时我强颜欢笑地喊道，"我找到它了！"

"你找到什么了？"

"你的雨伞啊！"

"这是我的雨伞吗？"

原来，这期间银行已经把那把蓝色的伞给送回来了。这时候我也想起来了，我是把伞忘在那儿了。当然我是把伞给

忘在银行里了。可这一把黑色的、满是油污的伞又是谁的呢？

电话铃响了。

“我是‘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的服务员，”“加利福尼亚”的服务员说，“您把我的伞给拿走了。您这么做很不好。我下午三点下班，外面正下着雨。”

“请您原谅。我马上就把它送回来。”

最佳夫人又一次显出神经过敏的样子。

“把我的伞带上，”她说，“可别又把它给弄丢了。”

“我为什么要带你的伞呢？我不是已经拿着那位服务员的伞了吗？”

“那么回来的路上呢，你这个傻瓜？”

尊敬的读者，您是否曾经在腋下夹着两把雨伞在烈日炎炎的天气里在地中海地区行走过？再说，这两把伞中一把看上去像一顶坏了的黑色降落伞，而另一把其伞柄是一只用大理石刻成的狗头。车站上等车的人老是盯着我看。这情形令人感到非常尴尬，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个药店，服了两片镇静药片，准备一直等到下起雨来再走。一阵让人难以忍受的饥饿突然向我袭来，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来到附近拐角处的快餐店，匆匆忙忙地在那儿买了几只小面包，然后在车上把它们给吃了。

那个等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门口的服务员以询问的眼光注视着我：

“我的雨伞呢？”

真的。他问我，他的雨伞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呢？他的雨伞干我什么事？我想知道的是，我太太的雨伞到哪儿去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世界上的雨伞都会落到我的手中，然后



又会从我的手中不翼而飞？

“再耐心地等上那么一会儿，”我安慰那位服务员说。“您马上就能得到您的那把伞。”

尽管天上正劈劈啪啪地下着大暴雨，我还是冲回汽车站。好了，我把最佳夫人的伞给弄丢了，这还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可我又怎么向那个可怜的服务员交代呢？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拉开了药店的门：

“我……这儿……几分钟之前……”

“明白了，”药店主人打断了我的话。“是它吗？”

我拿过伞又继续往外奔去。我当然不能发誓说，这便是我太太的那把伞。它看上去确实与我太太的那把很相似，可尽管如此，它还是引起了我的怀疑。它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怀疑，这是因为它是绿的，伞柄上并没有什么象牙的哈巴狗头，而是一个平平的鸟嘴，上面刻着字：“献给我的姐姐勒亚·皮克勒博士。”它看上去并不完全像是我太太的那把伞。可是我总得给那个服务员送回去点什么。为生存而奋斗是艰苦的。只有最勤劳的人才能生存下去。今天轮到你，明天轮到我，一点儿也没有办法。如果你不反抗的话，你就会突然没了雨伞。据说在这个市里的各公共汽车停车场每天都会发掉许多新捡到的伞。现在到那儿去对他们说：“我把我的伞给忘在 94 路汽车上了！”94 路是一条客流量很大的线路。“这是您的雨伞吗？”失物招领处的一个公务员问道。“就这把破伞？”我问道。“给我拿一把好点的来！”如果你有足够的幸运的话……

“哈啰，您！”

快餐店的老板在店里向我招手。那两把自由散漫的雨伞，一把是“加利福尼亚”咖啡馆里那个罪犯的，另一把是我家

那个寡妇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双双倚在一个角落里。

我眼睛望着地上，排在公共汽车站候车人的队伍里。在我的手里摇晃着三把雨伞，一把黑色的，一把蓝色的，还有一把绿色的。要是下雨的话还好一点！可哪儿来的雨呢？又成了阳光灿烂的夏天，稍稍有那么一点清凉的西南风。我把三把伞绑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正在四处推销新款式雨伞的推销员。但是，犹太民族已经从它自己悠久的历史中学会了不轻易受骗上当。猜忌的眼光朝我投来，一些半大不小的孩子用手指朝我指指点点并恬不知耻地窃窃私笑。这正是我们国家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优秀青年。

在公共汽车上我尽量往后靠，希望我那三把伞不致于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周围的人也确实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评论。显然他们已经对我习已为常了。

直到过了几站我才敢抬起眼睛。那儿——我的对面——正好在我的对面……天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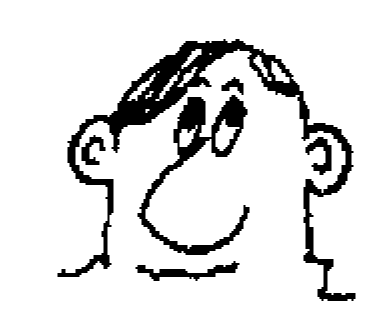
那个很胖很胖的胖女人，就是那个曾经碰到过我的那个胖女人。她的眼睛盯着我，盯着我的那三把伞。她说：

“今天过得不错，是吗？”

随后她转向坐在周围的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这家伙偷伞。见伞就拿，然后逃之夭夭。一个健健康康的年轻人，穿得漂漂亮亮的，不去干正经的职业，却专门偷伞。真是奇耻大辱！二十年前在我们的国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一类人。”

她的话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并把大伙给煽动起来了。有人说：“警察，得把他交给警察。”

大多数人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我找不到其他解救的办法，只能朝出口处逃去，得迅速离开公共汽车。我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了出去，然后一头冲进大雨中。我举起双手护着脑袋……

用手？用双手？

那三把伞在一辆5路的公共汽车上一去不复返了。

我闭着眼睛站在雨中，一个从上到下浑身淋得湿透的父亲，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李尔王的后裔。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雨水流进了我的衣领，流进了我的内衣，流进了我的鞋子。我站在这儿，并将永远地站在这儿，直到《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或春天来临为止。

满 则 裂

一般来说，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生来就具有组织才能，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特别是在独立日的清晨。五点刚过，尖锐的电话铃声便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哈啰，约斯克，”从电话线的另一头传来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声音。“好久没有见到你了，这一阵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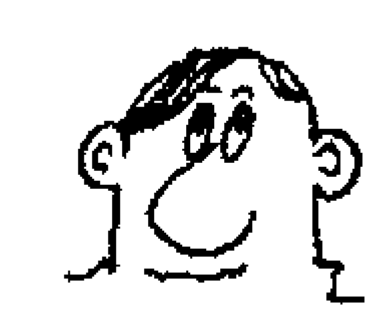
“谢谢，挺好的，”我打着哈欠说。“你怎么样？”

“马马虎虎啦。约斯克，我们一直没有会面，这真是一个耻辱。”

“确实如此。可是，我并不叫约斯克。我有幸与哪一位说话呢？”

“这个你还要问？我是米沙。你想不起来了吗？我与你的弟弟上的是同一个小学。”

我们慢慢地找到一个共同点。米沙答应我，大约在十点三十分左右来找我好好聊聊。真是巧合，这正是大阅兵的队伍从我们家窗口走过的时间。我请我太太为我兄弟小学里的同学准备一点儿小点心。



最佳夫人说，直到现在她才知道我居然还有一个兄弟。

我被搞糊涂了，不愿意对此事进行深究。六点钟左右我们的门铃响了起来，这时我被搞得越来越糊涂了。门外站着的是从日尔谢巴来的格林施潘一家。他们带来了三个孩子以及孩子们的伙伴，还带来了他们家的清洁女工。而清洁女工还带了她的一个孩子。

“我们早就想来看望你们了，”格林施潘一家说。“可总是有这事那事的。今天总算是来成了。”此外，格林施潘以及所有的随行人员都不想麻烦我们。他们只是想站在阳台上的栏杆边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里有一百十七个昔日的同校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的健康状况。现在我们才开始明白，为什么住在我们楼下的比亚拉楚尔克维奇一家两天前离家出走并在门上挂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注意，这儿有麻风病！”

八点三十分我们把电话机给关了。

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带了一封由波默兰茨女士写的热忱的推荐信。波默兰茨女士在信中请求我们，让她的侄子——她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地喜欢这位侄子——在我们的阳台上观看阅兵式。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请求。我深感荣幸，尽管我并不认识什么波默兰茨女士。

当我们把这位男青年安顿好之后，决定再也不放任何人进来了。米沙当然可以来，这是为了我兄弟的缘故，然后就此打住。最多是对我们的亲戚还可以网开一面，还有就是对肉店的老板以及他的太太和孩子。最佳夫人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有求于他们。我非常清楚地对送牛奶的人说，不准他带亲戚来，只允许他带他的父母。因为阳台上已经站满了

人，我们便把桌子和椅子推到窗边，像金字塔似地往上摞。

已经被关上的电话机仍然持续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响声，我不得不抓起听筒。

“这儿是电话局排除障碍的部门。您的电话正常吗？”

“我把电话给关了，在今天余下的这段时间里我不想用电话，就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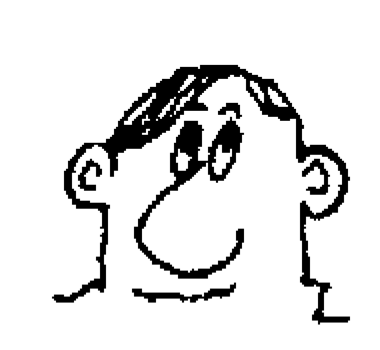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派人来检查。请您在十点三十分左右让人在家里等着。”

打完电话我转身去接待刚到的我们的家庭保健医生，请他别把沉重的衣橱推到窗边去。可他说，搬衣橱不费他吹灰之力。

十点钟左右，我们家的门被撞开了。许多声称是我儿子的同学的年轻人闯进我们家，撞倒了我们的书架。为了能有一个较高的眺望点。他们把剩下的椅子放到钢琴上。我以责备的口气问我儿子，他是否要把整个学校的人都带回家来。我儿子委屈地回答道，这一拨人中他根本就一个也不认识。我只能相信他。我儿子才八岁，可闯进来的这帮人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岁。

当米沙把一架梯子撞在格林施潘一家背上时，阳台上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了。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格林施潘家女佣人丈夫的兄弟，也就是孩子他叔叔，掉到楼下比亚拉楚尔克维奇家的阳台上。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受伤，因为楼下的阳台上挤满了麻风病人。吵闹声引来了正在下面马路上巡逻的警察。警察带来了他的两个女儿。

在这之后又有以下这些人到我们家来：一个来历不明的老妇人；波默兰茨女士，她是来打听她侄子的健康状况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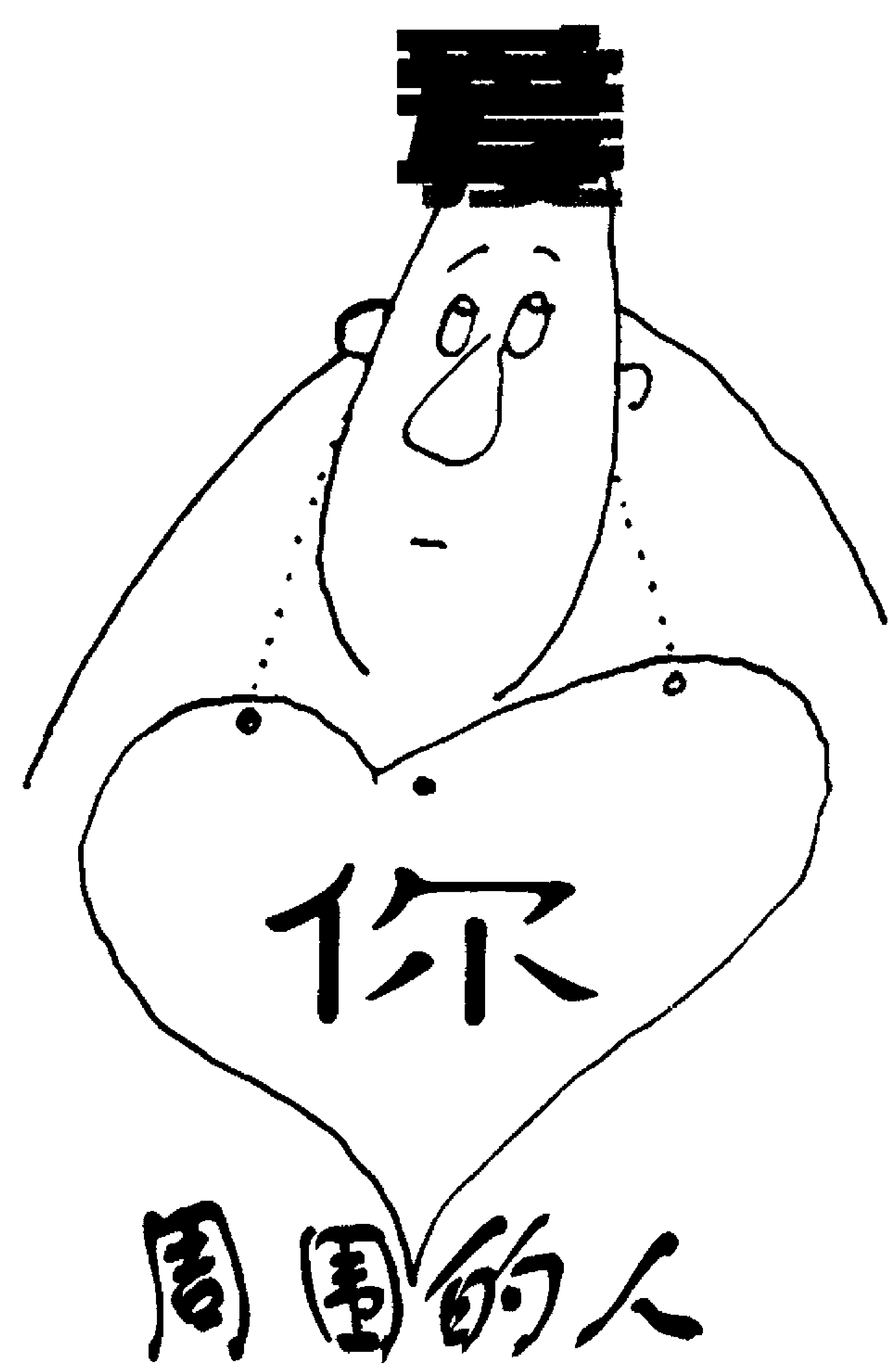
个也门舞蹈队；最佳夫人的理发师；某个约埃尔·芬克尔施泰因，至少他是作了自我介绍的；瑞典大使；一个叫尤迪的姑娘；埃塞俄比亚教育委员会的好几个成员；三人杂技团“飞行的科多纳斯”；我的姐姐；跳伞二队；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

客人们饿了。我艰难地穿过马路，在那些卖小吃的流动摊贩那儿买下了他们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一些摊贩，加上他们的一些失望的顾客都想跟我到我家去。可是，我只让三分之一的人进我们家的门。

市里面负责房屋建筑安全问题部门的一个官员向我提出了一个官方的警告：阳台，也包括地板在超载过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坍塌。紧接着他问道，是否能让他的太太留在我们家。

最后来的是修理安装工施图克斯。一九五二年的秋天我们曾经请他来疏通过堵塞的自来水管。

当阳台的右边开始开裂时，聚在那儿的人便跑到了阳台的左边。起居室的地板上出现了裂缝，于是聚在那儿的人转移到了厨房，然而这一解决办法也无济于事。一些客人很幸运，坍塌下来的废墟只到他们的胸口处，这样他们仍然可以毫无阻碍地观看阅兵式，而我自己则对阅兵式毫无兴趣。


[redacted]
你
周圍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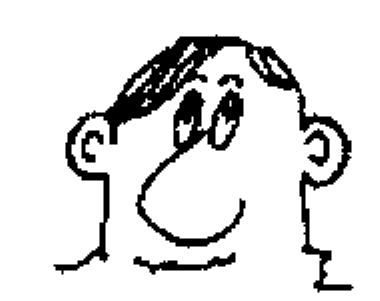
一次舒适的聚会

一家之长当然也要对社交活动负起责任来。比如像大前天，格尔朗在路上偶然遇见我，与我打招呼，说好久没见，得聚一聚了。为什么不在今天晚上就聚一下，到哪儿去走一走，或者到另一家饭店去。我表示同意，我们都还想找我们的太太商量一下，每个人找自己的太太征求一下意见，然后我们再最后定下来。

我得在这儿先提一下，我的太太和我与格尔朗和齐拉是朋友。每次与他们会面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根本就不讲究任何形式，只是为了与他们坐在一起愉快地聊聊天，别无他图。

当我晚上给格尔朗打电话时，齐拉还在上她的瑜伽课。他说，齐拉大约要到六点半才回来，等她回来后他马上给我们回电话，把我们约会的时间定下来。为了使事情简单化，我建议在一家叫"黑茨咪咪"的新饭店里碰头，可格尔朗说不，绝对不行。新开张的饭店一般总是很挤，找不到座位，我们还是去"巴巴路"，那儿的奶酪果酱馅鸡蛋煎饼很好吃。

正说到这儿，最佳夫人插了进来，她抢过话筒，提醒格尔



朗说：仅一只奶酪果酱馅鸡蛋煎饼就含750卡路里，“巴巴路”不能考虑，可以考虑的是“杜迪克牛肉汤屋”，通话完毕。瞎扯，格尔朗说，牛肉汤屋也已经今非昔比了。他本人嗜好奶酪果酱鸡蛋煎饼，管它含多少卡路里。于是便决定，把选择饭馆的事情先搁一搁，等齐拉上完瑜伽课回来再说。

不一会儿，弗兰克尔太太打了一个电话来。弗兰克尔夫妇是我们的老相识。他们住在秘鲁，是到以色列来作短期访问的。他们刚从耶路撒冷来到特拉维夫。如果他们今天晚上能与我们见面的话，将会感到非常非常地高兴。明天他们将飞回秘鲁。我告诉他们，我们已经与一对要好的夫妻有约会了。两个很有趣的人，肯定会讨他们喜欢的。那好吧，那就让他们一起来吧，弗兰克尔太太说。我答应她，只要我们一有格尔朗和齐拉的消息就会打电话到他们旅馆去的。我刚一放下听筒，最佳夫人便封给我一个傻瓜国王的头衔。她认为，格尔朗绝对不会讨弗兰克尔夫妇喜欢的，因为他对国外来客的态度一向很不好，特别是对秘鲁的犹太人。

亲爱的，我说，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可是不管你说得多有道理，现在都无济于事了。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为此而绞尽脑汁，因为格尔朗和齐拉方面还没有消息，他们也许会拒绝。

我为此而打电话给格尔朗，可齐拉仍然还没有回来，看来她得晚一点儿回来。另外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他家的小女儿米尔雅姆，这个没头脑的小家伙，又忘了带房门的钥匙了，必须得等她回来，她至少要到七点半才能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向他提弗兰克尔夫妇的事情意义已不大。不要着急。什么事都有可能会发生。有一句成语说，

只有当你过了桥，才能把身后的桥拆掉。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为即将到来的愉快的夜晚做准备。平时给我们家看小孩的女大学生蒂尔萨不在家，可她的弟弟说，我们可以打电话到她最好的女朋友塔玛尔那儿去找她。

这个电话先是没打成，因为弗兰克尔夫妇给我们来了电话。这一次是弗兰克尔先生打的。他问：九点钟在旅馆大堂见面对我们是否合适？我说，没问题，只是我们得先与我们的朋友说定了，我会给他们回电话的。

格尔朗那儿接电话的是齐拉。她很高兴，做完瑜伽她的精力更加旺盛了。她聚精会神地听我叙述：有秘鲁来的朋友要来看我们，非常有趣的客人，他们将在他们住的旅馆大堂里等我们。这两个客人肯定会使她喜欢，或者她也许更愿意改天与我们聚会？

不，这是为什么呢？齐拉说。她并不反对见我们的客人，格尔朗肯定也会同意的。他正在外面遛狗，过几分钟就回来。他回来后会给我们答复的。可是，为什么要在旅馆大堂里等候呢？旅馆大堂里又冷又不舒服。为什么不到"图齐"咖啡馆去呢？不行，我说。我与那儿的斜眼女招待吵过一架。她曾经把洋葱汤洒在我的裤子上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我们还是等格尔朗回来后再另外商量一个见面的地方吧。

现在我太太终于可以给塔玛尔打电话了。可是，蒂尔萨已经走了。塔玛尔说，蒂尔萨可能还会给她打电话的。我们可以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去问问。

接着是格尔朗如约打来了电话。齐拉已经把秘鲁客人的事对他说了。我怎么会想出这个馊主意来的，好像我不知道



他对旅游者最感冒似的。我安慰他说，弗兰克尔夫妇并不是普通的旅游者，更不是土生土长的秘鲁人，而是两个讨人喜欢的客人，他们肯定会让他喜欢。现在我们大家已经约好了，九点钟在旅馆大堂里见面。那么好吧，格尔朔说，但愿他那个没头脑的女儿到那时已经回家了。

然后是塔玛尔来电话说，蒂尔萨给她打过电话，她愿意到我们家来照顾孩子，可九点四十五分之前来不了。刚才她正在洗头。因为塔玛尔现在有一个约会要出去，所以我们必须马上作出决定，九点四十五分怎么样，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请她等两分钟。我打电话给格尔朔，告诉他要推迟约会的事情。幸运的是，这时候他女儿米尔雅姆的事情解决了。她和她的男朋友尤基一起去看电影了。据格尔朔估计，他们不会在外面呆到九点三十分以后，也就是说，他并不反对九点四十五分约会。

我刚想挂电话，听到格尔朔身后传来齐拉的声音：穿过半个城市去赴一次约会真是太蠢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某个供应浓咖啡的小咖啡店或附近的什么地方聚会。

紧接着从我自己的背后传来了最佳夫人的声音。她并不想在一个破旧的供应浓咖啡的小咖啡馆里度过这个晚上。她不想去，也许齐拉会去，可是她不愿意去。

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我把电话挂了。

我刚把电话挂了，又得拿起听筒。是弗兰克尔太太打来的电话，说要把我们舒适的约会推迟到十点十五分。我说，没问题，十点十五分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是我们要接待来自秘鲁的朋友，非常讨人喜欢的客人，我们要在他们住的旅馆大堂里与他们见面。这就对了，弗兰克尔太太说，她和她丈夫就是

我们的秘鲁朋友，这么说来所有参与约会的人都愿意接受这个时间。我说，时间是可以接受的，只是齐拉坚决反对在一个供应浓咖啡的小咖啡店里会面。出乎意料的是弗兰克尔太太听了非常生气，为什么要到小咖啡馆去会面。她与她丈夫专程到特拉维夫来见我们，我们总能找到一个比破旧的小咖啡馆好一点的地方吧。不错，我说，讲得有道理。可是，她得给我一点儿时间听听我朋友的意见。

我马上给塔玛尔打电话，确认九点四十五分的事儿。可是，塔玛尔已经被她的男朋友接走了。她只给她的女房东留下了一个电话，十点钟之后我可以按这个电话找到蒂尔萨。

然后是弗兰克尔先生打电话来。他想知道，为什么要让他们等这么久。因为从他的声音里听得出他很恼火，所以我建议他自己去解戈尔迪之结。我让他直接打电话给格尔朔去打听米尔雅姆和尤基什么时候回来，而我则想利用这段时间与蒂尔萨联系，把一切都安排好。接下去我们便可以在迪岑戈夫路或其他地方的咖啡馆舒适愉快地聚会了。

我试着打电话给蒂尔萨，可是打不通，因为塔玛尔给我号码的那个电话一直占线。相反我倒接到了齐拉的电话：她与弗兰克尔先生在电话里谈了很久，她对他很有好感。最晚十点半，等孩子们回家以后她和格尔朔便可以出门了。这时，格尔朔喊道：到大都会咖啡馆去。我说，大都会咖啡馆十一点关门。齐拉说，她不相信。不过，她会打电话到那儿去问的，然后把结果告诉我们。

接下去我们接到的电话是弗兰克尔太太打来的：她的出租车已经等了一刻钟，她忘了在哪儿与我们和齐拉夫妇会面了。我说，不，不是齐拉，而是尤基，是在大都市咖啡馆，如果



这个咖啡馆还没有关门的话。不过，她最好还是打电话去问蒂尔萨，蒂尔萨的电话号码在米尔雅姆的女房东那儿。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我想是这样的：格尔朗十一点半从电影院里回来，他得等到塔玛尔给狗洗完澡。塔玛尔的男朋友与弗兰克尔太太开车去大都市咖啡馆，可是因为那儿已经不供应吃的东西了，他们最后来到图齐咖啡馆吃辣味牛肉汤，那位斜眼的女招待把牛肉汤洒在尤基的裤子上了。

而我们自己，最佳夫人和我，则呆在家里。我们把电话机关了，倒在床上睡觉。然后给我们看孩子的蒂尔萨来了。我认为，所有参加瑜伽班的秘鲁人都应该到离得最近的电线杆上舒舒服服地去上吊。

来自绝对可靠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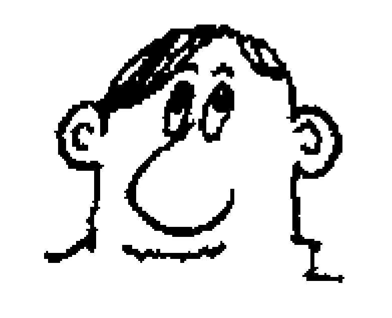
朋友是自己选的，近亲可以疏远，然而邻居总是邻居。我无法阻止曼弗雷德·施托克勒在太阳尚未升起的时候就来敲我家的门。尽管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可我必须得先提一下，当我们这个勤劳的国度里的其他居民都已投入到生产中去时，我正起劲地在床上辗转反侧，继续打呼噜。这样你就能判断，当有一天早上七点钟我被一阵激烈的、毫无顾忌的敲门声从睡梦中惊醒时，我那不稳定的内心生活受到了多大的震惊。我摸索着往外走去。如上所述，最佳夫人戴了防警报的耳塞。曼弗雷德早就已经把门给撞开了。他穿着睡衣站在我的面前。

"你听说了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没听说，"我睡眼惺忪地说。"我想睡觉。"说着，我转过身去，累得跌跌撞撞地朝我们夫妻的睡房走去。

我的邻居拉住了我的裤子。

"哎呀！"他喘着气说。"希斯塔德鲁特大厦被炸掉了。真是一大灾难！"



（希斯塔德鲁特大厦，亦称工会大楼，人们也习惯于把它叫做“克里姆林宫”，这是一幢相当有气派的楼房。那里具备了一个官僚所能梦想到的所有的一切装置和设备。）

“看来我们睡得太好了，爆炸声都没有把我们给惊醒，”我打着哈欠嘟哝道。

“我也没有听到，”曼弗雷德承认道。“可是，古格尔曼说，他的鼓膜差一点儿没被震破。他五点钟就来找我，然后到我们邻近的那些房子里去了。我则自告奋勇地来告诉你们这个地段的人，免得大伙儿受惊吓。古格尔曼确信，这幢房子是被恐怖分子炸掉的，废墟上还有成团成团的浓雾呢，时而还能看到往上窜的火焰。”

这消息使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很难想象一幢曾经一度骄傲地挺立在那儿的大楼突然变成了一堆被浓雾包围的废墟。同时，我注意到了，我的朋友曼弗雷德对他传播的消息所引起的效果是如此地洋洋自得，就好像是他的上司满意地拍了他的肩膀似的。为此我感到非常恼火。我并不怎么喜欢希斯塔德鲁特大厦，因为那儿的工会干部总是爱做长达几个小时的夸夸其谈的报告，事后谁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可这远远构不成因为工会大楼被炸而感到高兴的理由。

“曼弗雷德，你说说看——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你感到这么高兴？”我没好气地问道。“这幢楼房被炸了有什么好？”

曼弗雷德以蔑视的眼光望着我。

“在我曾经到过的那几幢房子里，还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么傻的问题。我并不高兴。我只是没有你这么狭隘而已。作为希斯塔德鲁特大厦昔日的成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时不时

地能够注意到，在这个国家里还有其他力量存在，这就很好……就这幢房子而言，当然可惜，这是一个灾难。”

这时候我已经变得异常清醒。我打开窗户，眯着眼睛打量着窗外的世界。阳光灿烂的新的一天开始了。从地中海吹来一股凉爽的海风。隔壁卡拉尼奥特家把他们的衣服晾在我们家的草坪上。两只小狗围着圈互相追逐。那幢雄伟的希斯塔德鲁特大厦挺立在市中心。送报的报童正好骑车从窗下过，像往常一样，他又迟到了。

“请原谅我的打扰——可是关于希斯塔德鲁特大厦的爆炸事件似乎还正在计划之中。那幢房子还挺立在那儿。”

曼弗雷德正试着用他的拖鞋在地毯上画着各种椭圆形，他没有看着我。

“这幢大楼丝毫也没有受到损害，”我又加重语气说，“你听到了吗？”

“我当然听到了，我的耳朵并不聋。”

“你不想自己来看看吗？”

“不，这有什么用。这幢房子已经在昨天夜里被炸掉了。这是一个灾难。”

“可是，你可以亲眼从这儿的窗口看到它啊！”

“够了。”

曼弗雷德突然大发雷霆道：“你真像一头骡子那样的倔强。好好听着，我的消息来源是绝对可靠的！”他又愤怒地瞪了我几眼，然后他的愤怒平息了下去，又带着充满了同情的语气和蔼地说：“好了，老头，别太在意了。抬起头来。必须得承受这种命运的打击。天知道，这一爆炸会使谁得利……一个灾难……浓烟……窜起的火苗……”





这时候，围绕在我周围的云彩里并没有什么烟雾，只有红色，血红色。

“见鬼！”我大声吼道，“你还站在那儿给我讲什么童话。你只须往窗口这儿走几步，亲自来确认一下……”

“我用不着什么确认。古格尔曼的话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古格尔曼讲上一百遍，那么……”

“等一等！”曼弗雷德生气地打断我说。“你是想说古格尔曼是一个骗子？太好了。我会把这些话告诉他，你可得小心啊！”

“谁——什么——为什么？这位古格尔曼究竟是什么人？”

“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了。你连古格尔曼是谁也不知道——可你却对全世界宣称他是一个骗子。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点儿？”

我瘫倒了，我嚎啕大哭。曼弗雷德充满同情地抚摩着我的头发。

“假如你很看重这件事情的话，”他劝慰我说，“我可以把那些曾经亲耳听到古格尔曼说整幢希斯塔德鲁特大厦都毁了，只剩下一些上窜的火焰的证人给你叫来。一个灾难。”

“可这儿……从这个窗口……”我呜咽着说。

“连收音机里也已经广播了，这大概可以使你放心了吧。”

“是哪个广播电台？”

“是古格尔曼广播电台。市场上最新上市的收音机，至少有九个电子管。”

有那么荒唐的几秒钟我差不多已经相信了他的话。人的

眼睛会看错，而古格尔曼毕竟是古格尔曼……然后，我扑向曼弗雷德·施托克勒，硬把他拽到窗边，喘息着用嘶哑的声音说：

“那儿，看！你必须看！往外看！”

“为什么？”曼弗雷德紧闭着眼睛，在我用铁钳似的手抓住他时，他缩成一团。“如果我想要看窗外的话，那么我从我们家自己的窗口就可以往外看了。可古格尔曼说……”

“看——往外看——看——往外看啊！”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头发，有节奏地把他的额头往窗框上撞去。“往外看啊，告诉我，他们到底有没有把那幢楼炸掉？看看那幢楼到底是不是还在那儿。”

“现在它是在那儿，”曼弗雷德说。

“这是什么意思——现在？”

“昨天夜里它曾经被炸毁过，今天早上它又被重新造了起来。”

我的双臂像瘫了似地垂了下来。曼弗雷德狼狈地从我身边逃走了。在这晴朗的早晨他急急忙忙地赶出去把这个灾难告诉给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邻居。我拖着身子吃力地回到床边。最佳夫人在我身边安详地睡着。我闭上眼睛，睡得很不安稳，还做了一个恶梦：由于某个差错，所有超级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储备同时爆炸了。全世界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希斯塔德鲁特大厦安然无恙地挺立在那儿。

我不能肯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发生。我得去问问古格尔曼。



值 夜 班

先是来了一封署名为韦克斯勒博士的通知，内容是：

“我们这一组房子里所有的男子都已经报名值夜班了。您呢？”

接着又来了封这样的通知。

然后是最佳夫人说话了：

“邻居们会怎么说？你得自愿报名去参加市民保安队。”

我给韦克斯勒打电话。

“哈啰，”我说，“我打电话来是为了那个……”

“今天三点钟轮到您值班，”韦克斯勒答道。“夜里三点钟。或者说是清晨三点。随便您怎么说。反正是三点。”

我的宣誓仪式进行得相当隆重。当我来到总司令部时——总司令部设在我们国民学校的工具棚里——在桌上找到一本几乎是崭新的笔记本和两支法国革命时期用的火枪。一位刚下岗的市民保安队员蹲在一旁打盹儿。他把指挥权交给了我，用睡意蒙眬的声音说：“一直围着房子走……等你值完班，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桌子上……晚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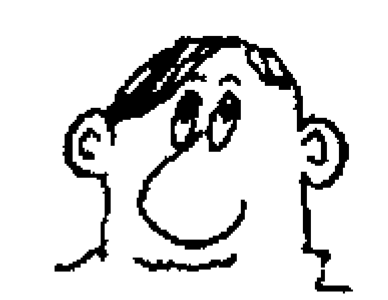
说到这儿他含含糊糊地骂了两句。一句是骂阿拉法特，另一句是骂我们的政府，然后又继续打盹。

问题是，我们值勤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整整四个小时。他们这么安排，是因为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是自愿报名参加的。我问，韦克斯勒在哪儿？别人告知我他在睡觉。在他自己的床上睡觉。他应该接三点到七点的班，可他还在睡觉。现在我想起来了，他应该与伊萨沙一起来接班的。说到这儿那个处于半睡眠状态的同伴把火枪递给了我。他嘟哝道："这支枪有两个弹盒。住在 8 号里的那个工程师知道该如何来使用它，就是那个光头的大个子，让我睡觉吧。"过了不多久伊萨沙来了。我对那本"值班日记"瞥了一眼。最后一条记录的是："1 点 35 分，逮住一个可疑分子。他声称是住在 14 号里的。查了一下，果真是住在 14 号里的。我想，就这一些了。结束。"

我们开始值勤。伊萨沙把他的那支法国大革命枪扛在肩上，我则把我的那支握在手里。这种枪的枪托朝外凸得很厉害，谁要是在脑袋上挨了一下的话，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们走一走吧，"伊萨沙提议说。"又不下雨。"

为了看起来更显得军事化，我们俩迈着军人的步伐。装在口袋里的子弹使我的裤子往下坠，而我的道德观念则不断上升。注意，我们来了。左右，左右，邻居们，高枕无忧吧，我们在保护你们。惟一使我高涨的爱国情绪受到那么一点影响的是这件事情的单调性。实在太无聊了。一个已婚的成年男子究竟能够围着一组房子转多久？一圈，又一圈，转完了一圈，再来一圈。"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踏步转圈走了大约一小



时后我问我那扛着武器的战友。他看了一眼他的手表说："还有三小时零五十四分。"也就是说，我们上岗才六分钟。真奇怪。我怎么感觉到，我们都该结束了。人是会产生错觉的。伊萨沙告诉我，他明天早上六点钟就得起床，他还有一件急活儿要干。他是在化学隔绝材料部门工作的。这就是说，他的工作是堵墙洞，不让雨下到屋子里来。

"现在有好多新的材料，"他以教诲的口气告诉我。"我们再也不用黏合剂了，而是用一种新的非常了不起的液体：聚胶，其主要原料为聚脂。真的棒极了。不会粘在刷子上，如果不下雨的话两天就干。"

我盯着他的口唇，时不时地提出一两个专业问题，比如有关聚胶——或不管它叫什么名字——的耐久性。总不能和一个人在一起走上几个小时而什么话也不说。

"是的，比利时人是向市场推出了一种没有气泡的隔绝材料，"伊萨沙承认说。"可是，据我看来它只适用于不密封的、不会直接受潮的地基墙。如果是大而通风的房间的话，我是不会用这种材料的，我是绝对不会用的。"

看来，即使有人白送给他一笔财产他都不会去动用比利时人发明的这种东西。他是一个专家，他得注重他的声誉，他是隔绝这一汹涌的波涛中的中流砥柱。能够被伊萨沙隔绝的人是幸福的。至于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有一点儿焦躁不安了。我对一切化学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可不能整个晚上都听这些东西。我偷偷地看了一下我的表：四十分钟过去了。也就是说，还有三小时二十分钟彻底隔绝的时间。

"杜布切克，"——我想彻底改变一下话题——"当年俄罗斯人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杜布切克准备提出抗议，你还

记得起来吗——”

我心里想把题目换到政治历史方面来。我希望逐渐地把话题转到斯大林身上。我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伊萨沙很乐意地接受了，他说：

“就在这附近住着一对捷克夫妇。上星期我为他们修了屋顶。用聚脂打底，上面罩了一层特殊的硅树脂。”

我绝望地期待着发生什么适宜于市民保安队管辖的事情。可是，这个地方竟然太平得令人沮丧。伊萨沙继续对我讲述他那些辉煌的隔绝手法。除了他自己的那张嘴之外，在这远近一带没有一个地方他没去堵绝过的。我又一次尝试着走杜布切克这一着棋，可是才走了两步便又回到了聚脂这个题目上。我的表上是四点十五分，太阳还不愿意升起。为了使我自己保持清醒，我不断地提问题，伊萨沙则不断地为我作出解答。

“有一回，”五点二十分时他讲道，“舍希特尔卖给我一加仑塑料水泥。在回里雄的路上我查看了一下——我看到了什么？这玩意儿硬得像花岗石。我知道，美国的聚脂不会是这副模样的。可是，你怎么去确认你买的液体究竟是不是从美国进口的呢？包装袋上没有任何标记，你怎么去确认呢？”

我根本就不想确认，早就不想确认了。如果夫妻双方有一天发现两人不般配的话，他们可以离婚。连生意场上的老搭档有时候也会分道扬镳。只有像我这样的市民保安队员才会像被水泥粘住了似的毫无希望可言。只剩一个半小时了。

“站住！”

我逮住了一只可疑的猫，把它赶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





然后我精疲力竭地靠在房子的墙上……

我一定是站着睡着了。伊萨沙拍了拍我的肩膀要我继续往前走。然而，他却沉默不语。显然是轮到我提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提。

"那么，"我问道，"如果那玩意儿不及时干怎么办？"

这是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伊萨沙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一直答到六点十五分。我祈求上帝派一些恐怖分子到我们这条路上来，让我终于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做，而不要没完没了地去忍受这些可怖的有关隔绝的废话。

"最妙的是，"伊萨沙毫不留情地继续往下说，"当舍希特尔又一次想把一盒东西塞给我的时候……"

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根据冲到马路上来的目击者说，我开始疯狂地朝天开枪，向每一个想走近我的人大声吼着各种各样让人无法理解的命令，比如像"把聚脂隐蔽起来！"，"水泥——开火！"等等。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我平静了下来。

此外，我还得知，我并不是市民保安队第一个牺牲者。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市民保安队员，他在与一个白铁工值完四个小时班之后，连连放枪打碎了周围几幢房子的窗玻璃，损失巨大。

清晨七点钟，我们把我们的装备送回总司令部。伊萨沙溜回家去。几天之后，韦克斯勒告诉我，伊萨沙再也不愿意与我一块儿值勤了。他说，我提的问题使他无聊透了。

谁有直拨电话，谁就有烦恼

技术的进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连以色列也可以以直播的方式与海外各国通电话了。不过，当我们亲爱的邻居们中有人打通了第一个直拨电话之后，破产的人数便不断增加。

第一次打直拨电话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一种乐趣。黄昏时分，当羊群回到羊圈里，从电视里传来阿拉伯语时，我这个百无聊赖的丈夫便产生了想直接与洛杉矶的姑妈弗里达通话的迫切愿望。我开始拨号码，直到把 001213957342189 这个数字拨完为止。我把听筒贴在耳朵上，高兴地听到耳机里充斥了嗡嗡声。接着嗡嗡声被一声短暂的“克里克”所代替，然后响起了铃声——然后，千真万确在 12000 公里远的地方有人拿起了听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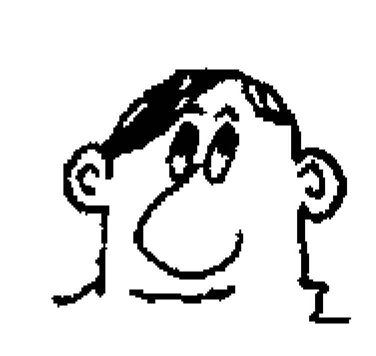
“是姑妈弗里达吗？”我屏住呼吸问道。

“不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答道。

“是 001213957342189 吗？”

“这儿是清晨六点钟，您这个傻瓜。”

不管怎么说，这是与加利福尼亚的直接联系。一秒钟十



四镑的费用还是可以放心地去付的。这个价格是由交通部公布的价目表规定的。从这本出版物中可以学到不少知识。从那上面其他的规定中可以得知，电话局在账单中对国际电话既不标明地点也不标明时间。国际电话费的费用是根据一个自动计数器的记录不加任何说明地写进通话人每月的电话费账单的。

因为是匿名的，于是这种情况便促使我这个极有意思的丈夫做出了极有意思的思考。我对最佳夫人说：

"我想给堪察加半岛打个电话。怎么样——我们今天晚上去看望泽利希吧。"

余下的事情便像儿戏似的简单。二十二点三十分——对于堪察加半岛的人来说刚进入下午——我从泽利希家的靠背椅上站起身来，充满忧虑地看了看手表，低声地，但还是以能让人听得见的声音嘟哝道：

"对不起，我得离开一会儿——我答应要给孩子们打电话的……"

"请吧，"埃尔娜·泽利希说。"电话在卧室里。"

这种情况是最好不过的了。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主人柔软的床上，不一会儿便与拉约斯·弗里德伦德尔接通了电话。他是我昔日的同学，现在是堪察加半岛很有成就的一位律师。

在一刻钟的闲聊里我们回忆了过去。然后，我回到了客厅，满意地宣布说，家里一切正常。

如此这般。

过了一段时间，当费利克斯·泽利希收到了他的电话账单时惊异地发现，电话费竟然比上个月多了百分之一千八百。我们在楼梯口不期而遇时他向我投来了一个默默的、充满了

谴责的目光，我对此不予理睬。他又没法向我证明什么。

过了几天，事情朝令人很不愉快的方向转变了：我们自己的电话账单上出现了二千多镑这样令人恐怖的数字，尽管在与弗里达姑妈通话的尝试失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类似的国际长途。毫无疑问，是有人以非常卑鄙的方式利用了我们的好客。但是，究竟是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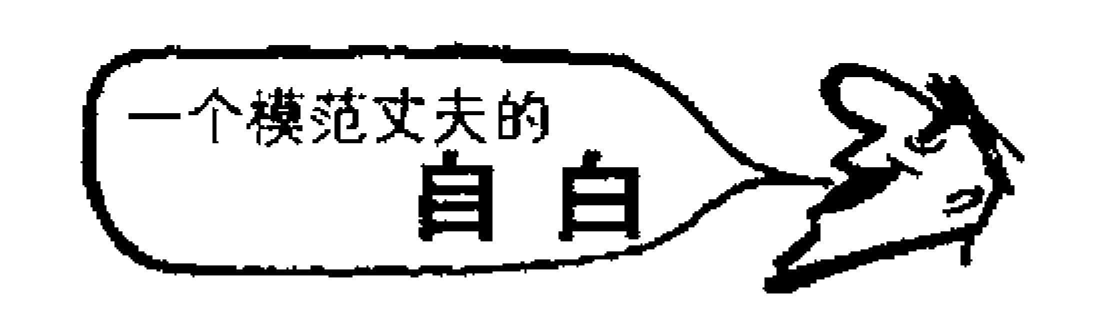
“等一下，”最佳夫人皱着眉头思索着。“上个星期皮克勒一家来我们家作过客。你还记得吗？阿基巴·皮克勒想与他姐姐通电话。不是吗？可你是否知道，他说的是意大利语？”我认为不是阿基巴·皮克勒，而是我们的邻居费利克斯·泽利希。是他向我们作了报复。有一天晚上他到我们家来，请求允许他借用我们的电话——据说，他们家的电话出了故障。

被列在值得怀疑的人的名单上的还有冰箱公司的一个职员。此人是来作所谓的定期检查的。他曾经给冰箱公司的总部打过一个电话，其总部有可能是在美国的费拉德尔菲亚。

这些卑鄙无耻的例子使我震惊不已。于是，我利用去施皮格尔夫妇家作客的机会与我们家族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成员进行联系。正当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远房亲戚通电话时，发现声音的质量突然下降。我推断是施皮格尔太太这个阴险奸诈的巫婆利用厨房里的分机在偷听。我以闪电般的速度转用希伯来语说了句：“好吧，那么我明天早上来取车，”并挂上了电话。用这么差劲的伎俩别想来对付我。

不管怎么说，自从有了直拨电话系统以来，以色列人民与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的联系比以前更密切了。当然，打这样的免费电话需要格外的谨慎和具有丰富的创新精神。比如，如果你与一个住在纽约看管小孩的保姆说话时声音不能太





响。最好避免用外语。再说，事实上这种电话并不是免费的，因为兜了几个圈子之后还是得由你来付钱。

可为了使这件事情不至于发展得太过分，我们在我们家的大门上挂了一块小黑板："电话坏了，有咬人的狗。请您留言，我们很愿意来拜访您。"

是温特尔尼茨太太重要，还是科拉姆波重要

情况是这样的：

英俊的建筑师在黄昏时分杀死了那个老麦克奥穆克，因为此人对正在建造之中的摩天大楼表示出怀疑的态度。科拉姆波[1]已经掌握了非常确切的线索，因为一看剧本他就坚信，这个恶棍酷爱古典音乐。清楚了吗？就是这样。

电视屏幕上的情节正在紧张地发展，我发现自己在咬手指甲，最佳夫人已经吃完了第三碗花生。主要的嫌疑集中在死者的金发寡妇身上。但是，我是不会相信的。我目睹了那场谋杀案，当然并没有看见杀人犯。一旦科拉姆波装聋卖傻……

叮铃铃！

电话铃在什么地方响了起来，而且是在我的手够不着的地方。见鬼！是谁竟敢这么厚颜无耻地在科拉姆波装聋卖傻的时候打电话来？我站起身来，在黑暗中被两个椅子绊了一下，然后拿起听筒，而眼睛则仍然盯着电视屏幕：

“喂，”我说。

“哈啰！”电话线的那一头传来了一个怯生生的声音，肯定是一位老太太。“我没有打扰您吧？”

“是的，”我说。

“我是加德的母亲。”

“是的。”

“是纳哈里亚的加德·温特尔尼茨。”

那个英俊的建筑师正在取笑科拉姆波。技巧高超。他的老板为他搞了一个天衣无缝的不在场证明。现在他甚至想取笑那个金发寡妇。而这时候全市的人所关心的是，他到底把尸体给藏到哪儿去了。

“喂！”我朝电话吼叫道。“哪儿？”

“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大忙。我那已故的丈夫总是说——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巴特贾姆——他总是说：如果我需要一个有艺术天才的人来帮我出主意的话，那么就应该来找您，因为您是画画的，而且又是加德的朋友，难道不是吗？”

谁是加德？尸体在哪儿？

“人们都说，”温特尔尼茨太太继续说道，“您总是那么忙，您是不会为别人做任何事情的。可是，我总是反驳他们。我总是说，不，不是这样的。即使他忙着画画的话，只要他能够，他还是会帮忙的。我总是这么说的。哈啰！”

“哈啰，”我说，“您是谁？”

“是您的朋友加德·温特尔尼茨的母亲。哈啰。我确实不想打扰您，可我的姐夫说，我们现在得施加一点儿压力，不然

① 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中一名料事如神的侦探。

的话您当然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您了解我们国家的情况，特别是了解我们的政府。假如我丈夫还活着的话，我当然不会来打扰你。肯定不会的。只是，您一定能理解我目前的状况，没有人商量，抵押完全得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好吧，请您给我出出主意，我是否现在就得这么做。还是最好再等上一阵子？"

我不敢肯定，她是否确实逐字逐句地这么说的，可这是我所听到的。当那个杀害了老麦克奥穆克的英俊的建筑师的家被搜查的时候，我怎么能逐字逐句地听她说呢？

"喂，"我对着话筒叹息道。"哈啰！您想要干什么？"

"我想知道，尽管如此我是不是还是得签字。"

"这得取决于别人。"

"取决于谁呢？"

"取决于那位金发太太。"

"哈啰，我是温特尔尼茨，加德的母亲。哈啰！"

凶手逐渐地暴露了出来，影片快结束了，可凶手还是很顽固。只要尸体找不到，科拉姆波便无法证明他的罪状。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是工程师把老麦克奥穆克砌到摩天大楼的墙壁中去了。

"哈啰，"温特尔尼茨太太又说了一遍。"您说的是什么水泥？哈啰！"

"您到底想与谁说话？"

"和一位给报社画画的先生。难道您不是吗？"

"是的，您所提到的这位您正是我。"

"那么请您告诉我，您以为，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签字。"

"那么科拉姆波的意见呢？"



"您在说谁啊?"

"我是说:在这件事情上谁是您的代理人?"

"格尔贝施泰因博士。"

现在我们知道了。一切都被搅得乱七八糟。难道得让科拉姆波去问格尔贝施泰因博士吗?这个错误肯定是从一开始就已经犯下的。当温特尔尼茨太太问我是不是愿意帮助别人时,我就得回答说:不帮,绝对不帮,而现在我这颗犹太人的心被软化了。那儿是科拉姆波,他刚派人去砸墙壁,把尸体挖出来。格尔贝施泰因当然是当面嘲笑他。不,不是格尔贝施泰因,而是那个建筑师。

"您能不能在下班之后给我来电话?那时候我很愿意……"

"别,别!请现在马上!我告诉您,他明天就要出门去旅行了。"

"谁?"

"格尔贝施泰因博士。"

在我的眼前正在发生一场闻所未闻的事件,一场超级谋杀案——而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得去研究格尔贝施泰因博士的旅游计划。他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恨他。他是一个罪犯。这一点科拉姆波会向他证实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会开着建筑师的车逃之夭夭呢?我放下呱呱呱唠叨不停的电话听筒,真让人受不了。就我来说,温特尔尼茨太太完全可以与那位建筑师一起出门旅行,她愿上哪儿就上哪儿。毫无疑问,尸体在行李箱内,不管出多少钱我都愿意打这个赌。科拉姆波……

"哈啰!哈啰!哈啰!"听筒里传出哇啦哇啦的喊叫声。

"喂?是谁啊?"

“我是温特尔尼茨太太，加德的母亲。但愿我没有打扰您。我那已故的丈夫……”

在印度，已故男人的寡妇是要被火烧的。或者曾经如此。那是以前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正如科拉姆波坐在飞驰的汽车里的感觉那样。格尔贝施泰因装扮成建筑师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会上他的当吗？

他们抓住了他！前面是科拉姆波和装着尸体的行李箱，两边是警察，建筑师被夹在中间。我的年轻人，这一切你都想得很周到，可是你却没有算到加德的玻璃眼珠[①]。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他显得有人情味。

“也就是说，您认为，”温特尔尼茨太太说，“格尔贝施泰因博士可以去旅行？”

“这一点毫无疑问。”

“谢谢。非常感谢。您帮了我很大的忙。请您原谅我的打扰。”

“最最主要的是我们抓到了他。”

“谁？”

“那个建筑师。”

“是这样。当然。加德向您问好。”

“不值一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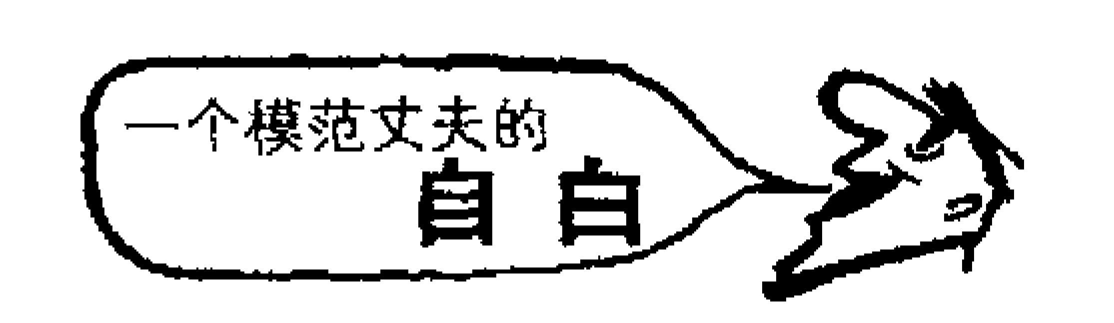
“晚安，基尔施特尔恩。”

“晚安，科隆姆波太太。”

---

① 扮演科拉姆波的演员的一只眼睛是假眼。





连锁反应

这是一个凉爽的星期天晚上，我们去施皮格尔家作客。在那两个小时里，我们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无聊。我很不愿意这么说，因为施皮格尔一家，特别是奥雷尔，是极其可爱的人，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主人。可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竟然找不到谈话的内容。到了晚上十点钟，我们的眼睛只能在拇指和食指的帮助下才能睁开。到了十点半，连我的手指也麻木了。我非常清楚，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不然的话，我都没有力气去唤醒最佳夫人了。我打起精神，对主人家说，现在我们得离开他们了。

“不，您不能走！”施皮格尔太太突然从她的瞌睡中惊醒过来说，“干吗要急着走？”

“我感到很遗憾，”我结结巴巴地说。“尽管如此……现在我们必须得走了……因为……是这样……我有一个重要的生意上的约会。我实在感到很抱歉。”

“别这么不痛快，”奥雷尔·施皮格尔说，“让那些人等一会儿吧。”

我成功地在我的声音里加进了一点儿稍稍能令人置信的悲伤成分：

“我也很想呆在这儿。可是，不行。如果我们不赶紧走的话，我们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这么晚了你们还要到哪儿去呢？”

“要到佩塔堪克瓦去，离这儿有七十公里的路。我在那儿有一个约会。可惜……”

“那么好吧，”奥雷尔妥协了。“那我就用车把你们送到车站去。”

“不用，不用！”我拒绝说，“我们不想麻烦你们。”

“别说这种可笑的话，”奥雷尔说着已经穿上了大衣。

我们在车站下了车，向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我们在那儿等了几秒钟，然后便朝家里走去。

我们没有料想到，奥雷尔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把车停下，跑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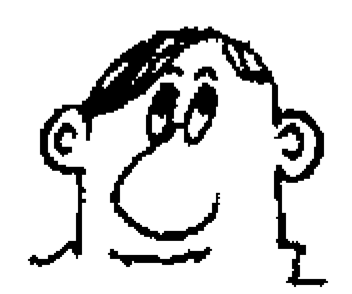
“你们这两个白痴，往哪儿走？这里根本就不是开往佩塔堪克瓦去的车站。”

然后，这个好心人挽着我们的胳膊，把我们领到真正的车站。那儿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奥雷尔不厌其烦地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地研究汽车时刻表。从他的嗓子里发出了一阵长长的叹息声：

“天哪，末班车刚开走五分钟。真可恶！为了我们的缘故现在竟然让你们误了一次重要的约会。”

“没关系，”我劝慰他说。“没那么严重。”

“不，不，否则的话你不会急着要走的。你知道吗？让我用我的车送你们到那儿去吧。”



"我不许你这么做！"我尴尬地大声说道。"再好客也总得有个界线！"

"别说了，"奥雷尔果断地说。"如果我现在不马上把你们送到佩塔堪克瓦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觉……"

于是，我们便坐车走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最佳夫人和我蜷曲在福特牌轿车内，眼睛呆呆地注视着特拉维夫逐渐消失的灯光，心里充满了黑色的绝望。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佩塔堪克瓦正沉浸在迷人的月色之中。

"究竟去哪儿?"奥雷尔强压着哈欠问道。

我的脑子开始飞快地转动着。我在佩塔堪克瓦所知道的惟一的地址是格里恩斯潘旅馆。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旅馆，是因为我的一个债权人曾经在那儿住过。我转身对奥雷尔说："让我们在格里恩斯潘下车吧。"

我们终于下了车，再一次对奥雷尔非同寻常的好意表示感谢，然后走进旅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心情恶劣的门房。

"只呆一会儿，"我一边说，一边朝他眨了眨眼睛，"我们马上就离开。"

我们站在那儿，等着汽车发动的声音。突然，我太太的身子开始摇晃了起来：

"他又回来了，"她呜咽地说。

这时候，旅馆的转门开始转动了起来，奥雷尔走进来说，他感到有一点儿太凉了，想要一杯茶。

门房又添了几分不高兴：

"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到底要找谁啊?"

"谁? 是说我吗?"

"是的,是说您。"

"如果您指的是我的话——我在这儿与某某……有个约会……好吧,总之……我得马上与他谈谈。"

"他叫什么?"

"他叫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噢……对了,您是想知道他的名字。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叫赫尔施科维茨。对了,就叫这个名字。赫尔施科维茨先生已经到了吗?"

"是的,"门房说,"他已经在这儿了。"

"请您再查一下,"我提高嗓音说。"他必须已经在这儿了。我与他有一个约会。"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在这儿,23 号房间。"

"真有他的,这个赫尔施科维茨。我曾经发誓他不会到这儿来的。"

"可是,他已经来了,"门房大声说道。"我得对你说几遍他已经在这儿了!"

"谁在这儿了?"

"赫尔施科维茨,23 号房间。我这就叫他。"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便已经拿起了听筒:"是赫尔施科维茨先生吗? 请原谅我的打扰……遗憾的是我必须叫醒你……这儿有人急于想与您说话。"他捂住听筒,转身对我说:"赫尔施科维茨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

"纯属私人的事情,"我答道。

"绝对机密。"

当赫尔施科维茨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从楼梯上走下来时,我感觉到领子似乎一下子小了两号。顿时,我太太的额头上竟然冒出了无数颗细小的汗珠,其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以



相信。我们俩都斜着眼睛望着门那边。只有奥雷尔坐在那儿，正惬意地喝着茶。

赫尔施科维茨带着灾难临头似的表情朝我们走来。可是，就像被一根魔棒点拨了一下似的，他的脸上突然之间露出了高兴的神色。

"哈啰，老兄！"他兴高采烈地朝奥雷尔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不过，这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惊喜！"

在接下去的几分钟里，这两个朋友忙于互相捶肩拍背的，而我们俩则目光呆滞地望着旅馆那几扇门。终于，赫尔施科维茨听奥雷尔说，原来是我们俩想与他交谈。

"您希望我能帮您什么忙？"赫尔施科维茨带着和蔼的微笑问我。

"是啊——这不好说。您抽烟吗？"

"不抽。"

"我也不抽烟。以前我曾经抽过烟斗，可是我的医生……"

"您希望我能帮您什么忙？"

"好吧，赫尔施科维茨先生……我有兴趣。"

"您对什么感兴趣？"

"您是知道的……"

"是对洗衣机感兴趣吗？"

"当然！"我欢呼道。"我对洗衣机感兴趣。"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能够理解您的急切心情，"赫尔施科维茨说，"我这就给查德拉的诺伊曼打电话。"

"请不要现在打，"我恳求道。"太晚了。我们可以明天与诺伊曼谈。"

“您疯了吗？诺伊曼明天就要飞回米兰去了！”

说着他开始拨号，他在电话里表示抱歉，显然诺伊曼对这么晚有人搅了他的好觉而感到生气——可是，特拉维夫的那个人刚到这儿，也许我们现在立刻就可以把那件事情给圆满地解决了。

一分钟之后，赫尔施科维茨回到我们的桌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立即驱车赶到查德拉去，奥雷尔肯定会乐意送我们去那儿的。

奥雷尔把我们送到了那儿。从各个方面来看诺伊曼是个性子很急的人。他马上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还剩下百分之三十的股票。

“您把它买下来，买还是不买？”

“我……能不能让我再稍稍考虑一下？”

“随您的便！”诺伊曼马上站起身来。“为了更加稳妥一点我们现在就去找魏因加腾先生。您一块儿去吧。”

“我不需要去找什么魏因加腾先生了，”我用嘶哑的嗓音大声说道。“这些股票我买了。”

接着我签署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晕晕乎乎的。等这一切做完之后我摇醒了最佳夫人。等我们回到特拉维夫时已经是拂晓了。

在上班的路上我买了一份报纸。第一版用像横梁一样粗的粗体字登了一条消息："诺伊曼-基雄托拉斯公司"在查德拉建立了一个本国最大的生产洗衣机的工厂。工会的股份占42%，诺伊曼的占28%，而我占了30%。那上面写着，这个工厂将马上投产并为整个中东地区提供洗衣机。



长刀之夜

这次是我接的电话。施皮格尔太太又打电话来请我们去喝茶。这还不够，她的丈夫还在办公室里给我留了一张纸条，内容是：

"您一定得到我们家来一次。施拉格勒从夏令营回来了。"

用不着否认：我们实在是太绝望了。我们并不是不看重施皮格尔一家助人为乐的精神，可是为此而捧着一杯茶与他们一起坐上三到四个小时？再加上那个施拉格勒？

不！

于是，最佳夫人对我说：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去的。如果没有其他办法躲过去，那么就你一个人去，就说我突然得了亚洲流行性感冒……"

简而言之，施皮格尔一家对我一个人光临感到非常遗憾，他们祝我太太病情有所好转。然后，我们坐下来讨论了有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并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块加了奶油的巧克力蛋糕。到这儿为止还挺好。

门开了，施拉格勒走了进来。

“施拉格勒！”施皮格尔对他的儿子说：“你对好叔叔问过好了吗？”

“没有，”施拉格勒清楚而又坦然地答道。他转身对我说：“叔叔，拿着匕首冲着我来吧。”

“什么？”我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施拉格勒，然后又望着他的父亲。“这孩子要我干什么？”

施皮格尔夫妇的表情里充满了做父母的骄傲。

“照他的话去做吧，”奥雷尔·施皮格尔高兴地对我说。“拿一把匕首冲着他上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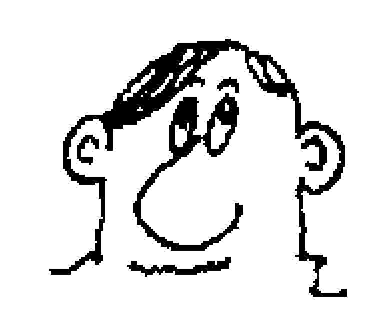
“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我拒绝道。“他又没有对我做什么……”

于是，施皮格尔太太耐心地告诉我，他们家的施拉格勒在夏令营里参加了一个柔道提高班。在这个班里他学会了一种本领：可以把每一个胆敢向他攻击的成年人打倒在地。所以，希望我能表示出更多的合作诚意。

我尽力想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我说，在这种事情上我从未有过什么实践的经验。我承认，我想不起来曾经有哪一次曾经持刀想对某个小孩子进行过攻击。

我的这些话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最后，奥雷尔站起身来，明白地表示出，他不愿意长久地等待表演的开始。他拿起一把水果刀，把它塞到我的手里并把我朝施拉格勒推去。

那男孩毫不犹豫地用力朝我左腿的胫骨处踢来，我痛得缩成一团。当我明白，他打算随后也如法炮制地来对待我的右腿时，我像一头被激怒了的狮子似地大吼一声朝施拉格勒扑过去。施拉格勒发出一声惊恐的喊声，从房间里逃了出去。



我猛地把插在门框上的水果刀又拔了出来，跟在他后面追去。他不是想让我这个叔叔持刀向他冲去吗？

我在大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抓住了施拉格勒。他哭着喊着从我的手掌中逃脱了，我只抓到了他的一件衬衣。我用刀只划了几下就把它弄破了。

这时候，施皮格尔夫妇因我的乱冲乱杀而陷入了极度恐怖之中。他们追上来对我大声吼道，问我究竟要干什么。

“我持刀向他冲去，”我气喘吁吁地答道。“你们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

接着，我紧紧地握着锃亮的水果刀在整个地区追捕施拉格勒。至于这件事情对他的性格形成和以后的生活道路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得在将来才能显示出来。

从附近赶来的人并不了解这些情况，他们终于在理发店前把我包围了起来。当时，我正想跟在施拉格勒的后面爬到电线杆上去。我几乎没有做任何反抗。

我隐隐地有一种感觉，施皮格尔夫妇再也不会向我们发出邀请了。柔道确实了不起。

到底有没有典型的以色列幽默？

用柔道与施拉格勒决一生死无疑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娱乐活动。不过，好邻居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会使人带来道义上的责任。倘若这一家的狗与我们家的狗相好的话，你就很难去拒绝这个邻居的请求。

曼弗雷德·施托克勒是我们文化和交际俱乐部今年的秘书长。前几天他出乎意料地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以下这番话：

“我们这个住宅区准备在下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轻松愉快的晚会。我们很高兴您能去那儿做报告，你在我们这个晚会上所谈的题目是：‘到底有没有典型的以色列幽默，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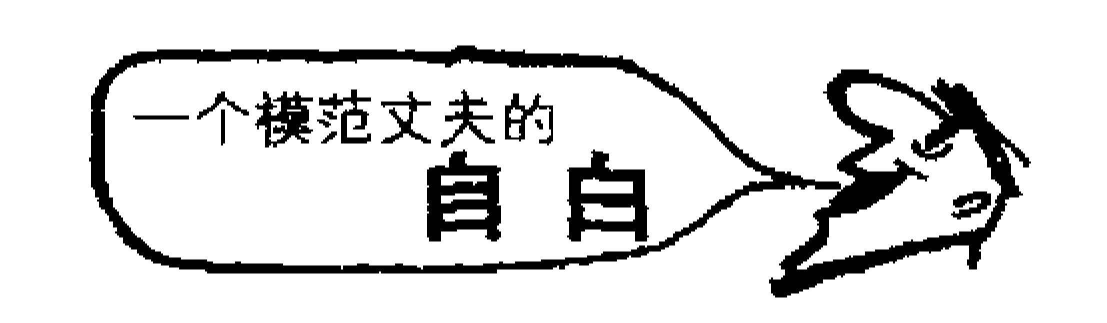
“我认为，”我拒绝道，“一个作家应该写而不应该说。”

“你说得很有道理。尽管如此，我们无法给你付报酬。”

“对我来说，问题并不在于钱。”

“那么一言为定。六点三十分开始。”





六点二十分，我来到了我们这个住宅区的俱乐部。这可不是吹的：来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组织者已经把铁栅栏门给关上了，为的是把正在不断涌来的人群挡在外面。我想挤进去，也确实挤到了大门的边上，然后便再也挤不进去了。一道铁栅栏门就是一道铁栅栏门，特别是当这扇门已经被从里面关上了。别无他法，我只能围着那栋楼绕到后门。据我所知，那儿还有一个入口，一扇很小的玻璃门。这扇门的里面挂了一块黑板，上面是有关我的报告的通知。一些乐天派年轻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骄傲——围在门边，希望能挤进去听我的报告。而现在，他们只看见大厅里观众席上人头济济，还能看见施托克勒正在来回踱步，他正焦躁不安地等待着我的到来。

我敲了敲门，没人开。我又用力地敲了敲门。一个又矮又壮的纠察人员从里面朝门边走来，把小黑板往边上推了一推，做了一个国际通用的手势，意思是："滚你们的蛋！"我用表情丰富的手势指了指我自己，告诉他我是作报告的人。那个纠察同样以表情丰富的手势告诉我，他想把我浑身的骨头都砸碎。周围那群乐天派的年轻人嘲笑我，因为我耍了一个老奸巨猾的诡计，可还是没能进去。我又重新开始敲门，这一次是用两个拳头一起敲。过了一会儿我又用脚来帮忙。门果然开了，尽管只是开了一条缝。来了一个纠察的头儿，他用扫帚柄敲我的头。

"票已售完！"他吼道。"滚吧！"

尽管我的头上被重重地敲了一下，身子摇摇晃晃的，可我头脑还是很清楚的。

"我是作报告的人！"我一边喊一边飞快地往旁边跳去。

“请让我进去。”

“连部长也甭想从这儿进去！”扫帚柄咄咄逼人地在空中飞舞着。“别惹我，不然的话我去叫警察了！”

他把门关上，上了锁，还不怀好意地用力插上了门闩。

我坐在附近的一个消防水龙头上，思考着。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屈服，这是肯定的。我准备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将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以色列式的幽默，因为当局并没有给幽默机构以适当的支持。

从大厅里传来了沉闷的鼓掌声。观众们不耐烦的情绪正在不断增长。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我从对面的药店给文化社交俱乐部打电话。

“票已全部售完，”一个闷闷不乐的声音说道。

“请叫施托克勒先生来听电话。”

“不可能，他正在里面作报告。”卡嗒一声电话挂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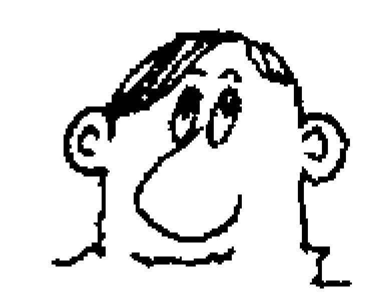
当我重新回到刚才的地方时，那拨乐天派年轻人都已经走光了。只有一个人还站在那儿，这人背着一只很大的手风琴。不一会儿便清楚了，他是负责这一晚会“综合性文艺节目”的，他也是在吊桥已经被拉起来之后才到达这儿的。

我们很快就成了患难之交。我们交流了各种各样如何来躲过纠察们的主意，可是连一点儿成功的办法也想不出来。

门德尔——这是负责今晚综合性文艺节目那个人的姓——开始用他的手风琴来演奏一首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可因为观众们的口哨声吹得太响而无法传进去。

必须采取什么强烈有效的措施。我又去了对面那个药店，请他们推荐可以用来在玻璃上写字的东西。

“您是对面作报告的人吗？”药剂师问道。



我说是的。

"作报告的人一般都用口红。"

我买了一支口红,这是在市场上久经考验的牌子"火一样的吻",我让那个负责综合文艺节目的人把我举到小黑板的高度。我在玻璃上写了几个很大的、闪光发亮的字:我是作报告的人。

那个纠察头和他那个又矮又壮的助手一看到我便去抓扫帚柄。可是,还没有等他们把门打开,我们便已经躲到了安全的地方。"你这个傻瓜,"我们一边跑,那个负责综合性文艺节目的人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你没有把那些字写成反写字。"

手风琴阻碍了他跑步。他告诉我,他早就想把这个笨重的乐器给卖掉了,可是,施托克勒对他说,为今晚的演出可以给他 75 镑。

当我们跑过一个邮局时,我的头脑里突然崩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冲进邮局,向坐在窗口的职员打听,送一封电报需要多长时间。他的答复是:

"我怎么知道?"

我并没有打消自己的想法,在一张表格上写道:我在外面的入口处句号快放我进去句号作报告的人。

我们马上赶回俱乐部,这一次是赶到前面的大门口。可是,送电报的人还没有到。以色列的邮政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这时候,里面的大厅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阎王殿。给人的感觉是,这栋房子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爆炸。

"我们得把大门撞开,"门德尔用嘶哑的声音说。

在前院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根废弃了的车辕。我们俩抱起这根辕木,往后退了几步,留出足够的起跑距离,然后我们用

尽全身力气向那座堡垒撞去。第一次我们被弹了回来。第二次,门被撞成了碎片。

格斗激烈而又短暂。门德尔在纠察头儿的魔爪下瘫倒在地。有人把一只椅子朝我扔过来,我巧妙地一转身,躲了过去。为了避免被枪弹击中我以之字形的线路朝报告大厅奔去。纠察头儿放下了那个已经不会动弹的负责综合文艺节目的人,从后面向我扑来。我的大衣被他的双手抓住了。我自己则跌跌撞撞地朝讲台走去。虽然鲜血淋漓,但仍然不屈不挠。

曼弗雷德·施托克勒一看到我便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到。我把经过告诉了他。

"是啊,是啊,"他向我证实道。"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也许是我们的纠察过于着急了一点。可是请相信我:不然的话情况将会更加糟糕。去年,著名的抒情诗人梅拉梅德-贝克尔差点儿没窒息而死。他试图从通风口里爬进大厅。"

接着,施托克勒把我介绍给观众。观众们向我报以热烈的掌声。站在主席台的侧面的是那个纠察头儿和他的助手。他们俩像着了魔似地鼓掌。

"女士们,先生们,"我开始了我的报告。"肯定有一种典型的、以色列式的幽默……"



硬 通 货

一般来说，我的身上总是备有不少 10 皮阿斯特的硬币，可是那天早上我身上恰好连一个 10 皮阿斯特也没带。我束手无策地站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最最残酷的机器——停车计时器——前。假如市里管交通道路的部门来检查的话，那么缺少一个 10 皮阿斯特的硬币就要花去我 5 镑。我试着把一个 25 皮阿斯特的硬币从投币口塞进去，可计时器又把它退了出来。

“需要 10 皮阿斯特吗?”从我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我们马上就会有的。”

我转过身来，认出是工程师格利克，他起劲地在他的裤子口袋里搜寻着。

“有了！”说着，他亲手把那个救命的硬币从那个贪得无厌的投入口扔进去。我不知道该如何来感谢他。他拒绝接受我马上塞给他的 25 皮阿斯特的硬币。

“您别这样。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我们不是邻居吗?”

“如果您能等一会儿的话，我去换钱，”我坚持说。

"您别这么让人见笑。您会找到一种合适途径来回报的。"

说完这话他转身走了,而留下的我则心事重重。我讨厌负债。我不喜欢这样。"您会找到一种合适的途径的"这是什么意思?一种什么样的途径?为什么?

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一家花店,让人给格利克太太送十支红色的丁香花。如果我了解的情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一位具有骑士风度的男子应该做的。

为什么要否认呢?我至少期待着格利克一家给我来一个电话。这并不是因为我送花的举动有什么特别值得感谢的地方,可尽管如此……当黄昏时分仍然没有电话时,我便打电话到花店去打听我那些丁香花的命运。是的,一切正常,丁香花已经于十六点三十分派人送走了。

我又等了一个小时。当我的神经濒临崩溃的危险时,我给格利克家打了一个电话。

是格利克本人接的电话。我们谈到了阿什杜德港口的新设备,谈到了新的税收制度,并谈到了各种各样的新闻。整整谈了一刻钟。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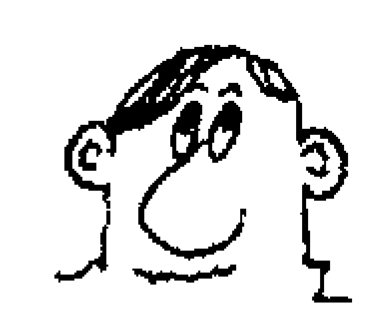
"我想起来了,"我说,"您太太是否收到了我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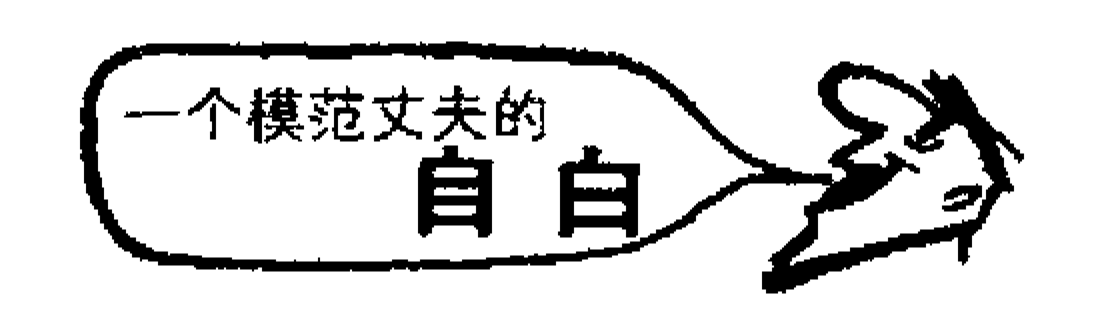
"是的。我认为,联合政治不应该屈服于教会的压力。他们有足够的人支持……"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到底怎么了?毫无疑问,我送的花有点儿不对劲。

等这次荒唐可笑的谈话结束之后,我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最佳夫人。她对此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奇怪。

"那当然,"她说,"连我也会感到委屈的。今天还有谁会





送丁香花呢？这是最最便宜的花。”

“可是送了十支！”

“那又怎么样呢？这一定会给格利克夫妇留下一个极坏的影响。现在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当成吝啬鬼。”

我紧紧咬着嘴唇。不管别人把我叫做什么，就是不能把我叫做吝啬鬼。第二天早上，我到最近的一个书店去买了一套温斯顿·邱吉尔所著的四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并派人给工程师格利克送去。

到了晚上，没有电话来。我两次拨了格利克家的电话号码，两次都在最后一刻又放下了听筒。

难道是格利克没有看出来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吗？

“不可能，”书店营业员向我保证说。“我在一起送去的一张卡片上清楚地写了您的名字。”

两天过去了。这是非常可怕而又折磨人的两天。到了第三天，邱吉尔的四卷本被装在一个包装简陋的包裹里退了回来。随包裹一起寄来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请您明白，我对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九点钟为您提供的帮助既不要感谢，也不需要付出报酬。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向一位陷于困境之中的邻居伸出兄弟之手的良好愿望和需求。就是因为这些。我敢肯定，要是您处在我的位子上也会这么做的。我所得到的最好的报酬是，我意识到，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在一片自私自利和残酷无情的丛林中，我自己依然保持了为人的本质。致以最衷心的祝愿！您的格利克。又：邱吉尔的这套书我已经有了。”

当我把这封信念给最佳夫人听时，她又一次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惊讶：

“这是明摆着的。有些东西是不能用可鄙的钱财来偿还的。有时候一件小小的纪念品往往要比一件贵重的礼品更有价值。不过，我担心，这个你是不会明白的，你这头笨牛。”

什么是我不会明白的，究竟是什么？就在同一天工程师格利克收到了一套有最好的独奏演员参加演出的交响音乐会的票子。

在举行第一次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埋伏在胡伯曼街的拐角处。他会来吗？

他来了。他们俩一块儿来了。工程师格利克和他的太太出席了这一音乐会。这套票子是我送给他们的。

我轻松地回家了。几天以来我第一次摆脱了沉重的压力，第一次又重新成为我自己。夜里十点正电话铃响了。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退场了，”格利克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音乐会糟糕透了。节目糟糕透了。指挥糟糕透了。”

“我……我太绝望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您能原谅我吗？我是出于好意，真的，我只是想对你那次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哈哈，老兄，”格利克打断我的话。“是这样，给予是一种艺术。有些人是学不会的。你不能过多地考虑，不能过多地去算计。要么是全心全意地给予，要么就别给。如果允许我以我自己为例的话——您也一定还记得。那时候，当我看到您极其绝望地站在停车计时器前面时，我完全可以对自己说：‘关你什么事，你又没有车，你根本就用不着向一个有车的人表现什么团结互助的精神。装作没看见他，他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可这么做并不符合我的风格。‘这儿有一个邻居陷



入了困境,'我对我自己说,'他需要你。'然后马上——您可以回忆一下——马上就为您把 10 皮阿斯特塞进了停车计时器的投币口。只是一个小小的姿态而已。然而……"

在这么多的人道主义面前,我觉得自己真的无地自容。一个小小的姿态。亲爱的上帝。为什么我就压根儿不会做出这么一种小小的姿态呢。无需思索,无需算计,只是给予,全心全意地给予……"格利克说得都对,"最佳夫人讲道。"现在,事情已经被搞得一团糟了。现在只有通过一项非常之举才能拯救我们。"

我们考虑了整整一夜,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给格利克夫妇买一套私人住宅吗?送给他们绝对可靠的有价证券吗?把他们指定为我们的单独继承人吗?我们真是绞尽了脑汁……

最后,在工程师顺便提到的那句话的启发下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获救的主意。他在他那段洋洋洒洒的独白中是怎么说的?我没有车,他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答案,"最佳夫人满意地说。"你知道你该怎么做了。"

"可是,因为职业的缘故我没有办法舍弃我的车啊,"我呜咽地说。"我需要它。"

"这就是典型的你。你现在是,将来还是一个地中海东部欧洲人和亚洲人混血的小气鬼。"

我派人把车送到了格利克家并加了一张纸条。"祝行驶愉快!"我写道,"再一次表示感谢!"

这一次格利克的反应很积极,第二天早上他便给我打来了电话:

“请原谅我这么早就把您吵醒了。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千斤顶。”

血一下子涌到了我的头上。一年多前，我的千斤顶被偷了，我一直没有买新的。现在，格利克很可能是在一条偏僻的公路上，车轮的内胎坏了，为此直到临死的时候格利克都会诅咒我的。

“我马上就来！”我对着电话喊道。我以飞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买了一只千斤顶，准备马上把它送到格利克那儿去。

在罗特希尔德大道上，在由市政府允许的停车场上——其允许停车的标志是那儿有停车计时表——我看见了一辆车，这辆车我很面熟。

是它。我的那辆车停在停车计时器的前面，而工程师格利克正站在停车计时器的前面，绝望地在口袋里掏来掏去。

我让出租车停下来，用嘶哑的嗓音大喊大叫地冲向格利克：

“缺 10 皮阿斯特吗？我们马上就会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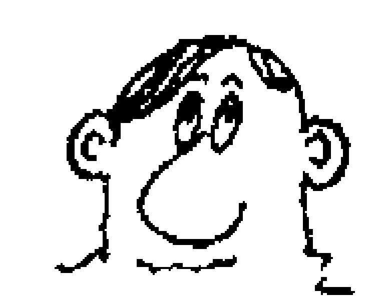
格利克转过身来，脸色苍白地说：

“谢谢！我不需要。我自己有，我自己有。”

他继续紧张地找着。我拿出了我的 10 皮阿斯特。我们俩紧张地喘息着。因为我们俩都很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格利克翻遍了他所有的口袋，仍然找不出一枚 10 皮阿斯特。

我绝对忘不了他那因为惊恐而变得苍白的脸色。他看着我慢慢地、得意地把我那枚 10 皮阿斯特硬币扔进投币口。我说：

“这儿，请吧！”



我眼前的格利克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他缩成一团，一边从他裤子口袋里掏出我车上的钥匙递给我。他轻轻地抽泣着，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那一套交响乐音乐会的票子还给我。晚上，有人给我太太送来了花。让他自作自受：我们的邻居是个很好的认输者。

婚姻——

私人

企业中的丈夫

总 是 太 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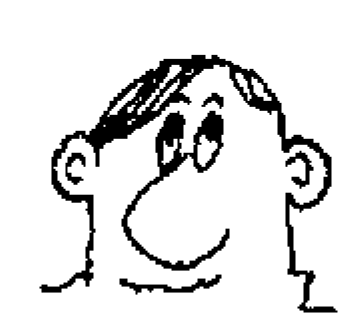
我喜欢喝汤。

当然，这一类烹调上的小事情并不会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引起什么决定性的变化，可是，它对人的作用则万万不可低估。

据我观察，丈夫们截然不同地分化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的人喜欢在主餐前喝汤，而另一阵营的人则不喜欢在主餐前喝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游离于这两大阵营之外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汤就是主餐。我便是这一小部分狂热偏激分子中的一员。一碗浓浓的、漂着金色油花的肉汤向我飘来各种诗一般美味的扑鼻香气。如果汤里面再加上两三只由未经发酵的面包做成的丸子的话，那么对我来说，最佳夫人的烹调手艺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人曾经说过："喜欢汤的人不可能是坏人，"我想，这是生产汤的老板坎贝尔说的。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麻烦：汤是烫的。汤不仅仅是烫的，如果讲大实话的话，汤实在太烫了，而且总是太烫了。这一断言



出自本人艰辛的经验，也是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在家里，在餐馆里，在别人家里，在寺院里，或者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得到过那么一碗第一勺喝下去嘴里或舌头不起泡的汤，就像三级烫伤时出现的水泡那样。这真是一种极其糟糕的情形。汤就放在你的面前，冒着热气，香气扑鼻，吊人胃口，你所有的胃液和胃神经都被调动了起来，你为汤而感到高兴，急不可待地想喝——可是，却不能喝，因为它实在太烫了，会烫伤你的嘴唇。

早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已经为此尝到了苦头。那是一碗鲜红的西红柿汤，它酿成了我一生中的第一次烫伤事故。那时候，我那善良的母亲便向我传授了古老的搅拌仪式。打那以后，我见汤就搅拌，有时候搅拌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以致于我右胳膊的肌肉都痉挛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件事情就发生在那座好客、以牛肉汤而闻名遐迩的小城基什孔费莱吉哈佐。有名的牛肉汤在我搅拌的作用下变成了坚固的、水泥般的物质，连匙也拔不出来。这是一次极其可怕的经历。

种种与此相类似的经验使我变成了一个胆小、容易受惊吓、性格内向的孩子。在整个青少年时期我一直向往着能够喝到一碗温度适当的汤，可是，我的这一愿望一直没有如愿以偿。我所得到的每一碗汤都太烫。我瞪着惘然若失的大眼睛望着世界。我问道：

"这是为什么？"

我从未得到过任何回答。

现在也一直没有得到过。显然，男人们已经习惯了由女性放在他们面前的、像火山爆发那么烫的汤。同时，他们也已经习惯于搅拌这个动作。他们像机器人似地自动搅拌着，脸

上流露出像监狱里的犯人在放风散步时那种漠然的表情。根据保守的估计，每个人一生中总共有一年的时间是用于搅拌汤的。对于国民经济来说，这意味着几百万工作小时的损失。那么政府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它所采取的措施便是提高税收。

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我老是爱回忆这件往事，这是在一家意大利小饭馆里，只有惟一的这么一次，有人给我端上了一碗马上可以食用的汤，一碗意大利的浓菜汤。这碗汤不太烫，是温的，正好。也许它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温度便是如此，也许是我洒在汤里的磨碎了的巴马干酪起到了降温的作用。反正，我不得而知并永远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奥秘。我还没有来得及把第一勺汤放进嘴里，服务员便冲到我面前把我手里的汤盘子抢走了：

"由于疏忽，汤还没有热过。先生，请您原谅。"

当他把汤重新端回来时，我看不见他的脸。他的脸被一层浓浓的雾气给包围住了。当我把第一勺热过的汤送到嘴边时，我痛得轻轻地叫了一声又把它推了出来。汤流在桌布上，把桌布给烫出了一个大洞。

那么在家里呢？假如有一只苍蝇不小心飞过最佳夫人煮汤用的锅的话，这只可怜的昆虫便会垂下翅膀掉进汤锅内，就像曾经飞得离太阳太近的伊卡洛斯① 那样。

我们从物理课上得知，水到了一百度便会沸腾。最佳夫人最近为我煮的蘑菇汤放在阴影里的温度也有一百五十度。

---

① 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之子；在逃离克里特岛时因飞得离太阳太近而其用蜡粘住的翅膀被熔化，坠海而死。



"天呐,你为什么总是把汤烧得这么烫?"每顿饭的开头我总要提出这一绝望的、但却毫无结果的问题。"汤一定要烫,"这便是我太太一成不变的回答。"如果你觉得太烫的话,那就搅一搅……"

有时候,在我的梦里会出现尼安德特人①。他用两块石头互相碰击,发现了火。当火苗往上窜起时,他便用肉鼓鼓的嘴唇口齿不清地说道:"汤……汤……"

然而,我并不愿意放弃。我继续与众人一致的意见作斗争。在饭店里,每当我订汤的时候,总是不忘记响亮而又清楚地叮嘱服务员:

"请不要太烫。请不要给我沸腾的汤。汤得在厨房里烧,而不能在餐桌上烧。"服务员目光呆滞地望着我,然后离去。等他回来时端来一碗像火柱般滚烫的汤,放到我的面前。

"我刚才不是请求过您别给我滚烫的汤吗?"

服务员的声音透过烟雾般的热气传到我的耳朵里:

"烫?您说这汤烫吗?"

我要求他用手指伸进去自己来试。他拒绝。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手是用来干他的工作的,不能让它去冒有可能会被烫伤的险。

最近,我试着往汤里放冰块,在订汤的同时我也订冰块,或者,我在汤盘里加一点儿冷的啤酒。这样一来汤自然就不成其为汤了,而成了不知什么颜色、不知什么味道的、非常难闻的流汁了。可是,这样的汤至少不烫。

---

①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特发现的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一带。

就这样，我越来越老，我脸上因痛苦而起的皱纹越来越深，我曾经挺直过的腰板因为那些无谓的、小小的斗争的缘故而弯了下来。我几乎得到了我所想要得到的一切：成功，荣誉，国外的承认，最佳夫人，三个可爱的孩子和同事们的嫉妒。只有一件东西是我没有得到的：一碗不太烫的汤。

在我的墓碑上将会有这样一段墓志铭：

“在这里安息的是埃弗赖姆·基雄，一位重要的讽刺作家和一位模范丈夫（1924—2013），他的一生都在搅汤。”



怎样戒烟

“请原谅——您是否能给我一支烟?”

“很遗憾。我已经不抽烟了,自从我读了报纸上那些警告的报道之后……”

“我也读了那些报道。可我对它们置之不理。”

“那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靠毅力,没有别的办法。刚开始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能顶得住。假如你每天所读到的内容都是抽烟会给人带来肺癌、胃溃疡、血红蛋白异常等诸如此类的疾病的话,这可不是一桩小事情。有一天,我那忧心忡忡的太太提醒我注意,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刊登了一篇由美国卫生局撰写的有关吸烟对人体的危害作用的鉴定报告,我顿时感到惊慌失措。就在这一天,我下定决心,停止看报。”

“一个绝妙的主意!”

“您等一下。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熬过了一个星期。我不看社论,不看体育报道,连大标题也不看,反正是什么也不看。可是到了第二个星期的当中我顶不住了。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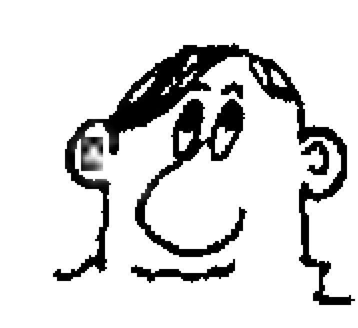
感觉是，如果我现在再不马上读报的话，那么我的神经就要瘫痪了。一个人总不能完全与社会隔绝开来，你说是吗？我动摇了。我到邻居家里去借了一份前一天的报纸。我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说了什么：我读了报。不，我是把它生吞活剥般地吞下去的！这是一个多星期之后我所读到的第一张报纸。”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想象。”

“您根本就不能想象。就在第三版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英国的尼古丁专家所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真是当头一棒！这篇文章中写道：每天抽三十支香烟的话，男人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阳痿的现象。可我，每天要抽两包香烟。”

“唔。那当然……”

“我很清楚，我必须得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才能完全摆脱这一梦魇。就这么简单地放弃读报是不行的。我对自己说，你必须得有自制能力。你必须要做到，看你想看的东西而不去读那些你所不愿意读的东西。一场可怕的内心争斗开始了。在我自愿戒报过程开始的第一天我听从了我太太的建议，决定把报纸给烧了，否则的话，我会经不起诱惑，去读那篇由一个受到普遍认可的美国权威人士所发表的有关所谓‘吸烟者的大腿’的文章。请相信我，这样做并不容易。可是，过了几天我的情况便有所好转。我读政治报道，读社论，很快地把下面几张翻过去，然后再来读有关戏剧和体育的报道。有一段时间，这种方法的效果很好。一天夜里，魔鬼又重新来试探我：我的目光落在一篇由巴斯德研究所撰写的有关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由血液循环障碍而引起死亡的统计报告。诱因是那么的可怕。我多么想不顾一切至少是对这一表格瞟上那么



一眼啊！但是，我挺住了。我把嘴唇咬出了血，在嘴巴里塞了一块手绢，继续往下翻。这篇文章我连一个字也没有看。一个字没看，连一个数字也没看。"

"我对您真的很钦佩。"

"这便是我下的决心。现在我什么都能经受了。假如我现在在报上看到类似的文章的话，我便会毫不在意地跳过去。我对此再也不感兴趣了。请您相信我：打那以后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

眼镜，一样陌生的东西

成熟的丈夫需要一副老花眼镜，而单身汉则不需要。这或许是因为单身汉没有时间看书的缘故。

我不戴眼镜。更加确切地说，我无法戴眼镜，因为只要我一摘下眼镜，它准丢。有时候在这之前就已经丢了。镜片，边框和眼镜架，它们似乎会蒸发似的。这真叫人难以捉摸。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我急于想记录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是近视眼——我一生下来就是近视眼，所以我总是把眼镜推到我那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高高的额头上，只要一推上去它就丢了。当然是指眼镜，而不是我的额头。如果我在睡觉前把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或者是下水洗澡前把它放在澡缸边上某个保险的地方，事后它便不翼而飞了。它或许是躲在屋子里的某个地方，或者是到屋子外面去了，我不得而知。如果我知道了，也就不必去找它了。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它恨我。

真正的痛苦，或者说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一个丢了眼



镜的人，只有在眼镜的帮助下才能找到它。丢了眼镜的人成了半个瞎子，只能不知所措地在附近摸索，活像一条患近视眼的蛇，一口咬住自己的尾巴，一点儿不剩地把尾巴吃了个精光，或者说把它自己给吃了个精光。

我找眼镜店里的人给我出主意，他们向我证实说，眼镜属于那种很容易丢的东西。特别是希伯来眼镜喜欢闹独立，而那种边框狭的眼镜尤为喜欢闹独立，它们在鼻梁上根本就搁不住。假如想用一根链条把它们拴住，让它们像勋章一样地在胸前来回晃动的话是毫无用处的。它们认识自己的卡尔·马克思：全世界各国的眼镜团结起来！除了链条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失去！于是乎，它们便突然消失了。

我的情况更糟糕，这是因为我的度数不深的缘故，即便是只用肉眼我也能看得见一些。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模模糊糊地开了一刻钟车，然后突然发现，我没有戴眼镜。或者我绝望地在圈手椅椅垫的缝隙中找眼镜，结果却发现它就架在我的鼻梁上。眼镜片很厚的人是不会遇到这种事情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老是在找眼镜，要是发现它又给弄丢了的时候便会生气。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这个人便习惯于用凶牙利语来诅咒它并用拳头使劲地敲墙壁。之后我才会冷静下来，努力去回忆整个过程：

“最后一次我是在哪儿看到它的？”我使劲地眨巴着眼睛问自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没有了眼镜记忆就靠不住，我是在读晨报时戴过它的。接着我开了一罐罐头花生，然后我刮了胡子。慢！”

我觉得刮胡子是一条很有希望的线索。我急急忙忙地走进浴室，到处找，到处寻，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还是

找不到。连花生和报纸也弃我而去。我只得继续习惯于眼前的一片模糊。

中午时分，我的眼镜突然出现在钢琴上，而且是在钢琴上面的那一排琴键上。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会跑到那儿去的。我最后一次弹钢琴的时候是七岁。

讲到这儿我那富有批评精神的太太打断了我说："你是想说，你的眼镜在与你玩捉迷藏?"

是的，这正是我所要说的。我的眼镜喜欢我行我素，它的日子过得非常愉快，非常自在。我只要稍稍把它在旁边一放，它便踮着脚尖溜走了。它知道我会生气。正因为如此它才会这么做。假如我在它不应该去的地方找到它的话，比如在窗台上窗帘的环扣上或冰箱里的大排下面，它便会朝我做鬼脸并且毫不掩饰它那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回，我甚至在我们电视机的机壳里面找到了它，它把电线给搅得乱七八糟。当最近一次热浪袭来的时候，它竟然跑到屋顶上去了。它会插翅而飞。

有时候，为了预防它溜走，我把它扣留起来。睡觉之前我把它夹在我写字台上的铅笔架和最佳夫人的照片之间。我躺在床上时还在默记："放在铅笔和最佳夫人之间，放在铅笔和……"

第二天一早我便首先来到写字桌旁。铅笔和妻子都在，惟独没有眼镜。几个小时之后我坐到汽车的方向盘前，准备开车进城——我听到汽车后座上有人轻轻地喊了声"哈啰!"原来是我的眼镜。

有时候，一连好几天不见它的踪影，我把墙壁上的墙纸都撕了下来也找不到它。惟一有效的防卫措施是，马上去配一



副新眼镜。旧的眼镜往往是在眼镜店的营业员打电话来通知说可以去取新眼镜的前五分钟才会出现。这样的安排很管用，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副不翼而飞为止。两副眼镜同时存在的时间往往是短暂的。它们互相仇视。

尽管证据确凿，可最佳夫人硬是声称，这种不幸并不是由眼镜，而是由我自己引起的，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她根本就不懂眼镜心理学，于是我只能单枪匹马地去斗争。

有一天，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准备把我们那条杂交的母狗弗兰齐训练为专门猎眼镜的狗。我让它练嗅觉。我把镜片反复放在它鼻子前面来回地磨擦，接着我把眼镜藏在花园里，然后我摸索着走到弗兰齐的跟前，领它走到我的眼镜那儿，我给它一块糖以示对它寻找的奖励。这样的过程重复了几次之后，昨天我对它进行了一次测试。

"弗兰齐！"我喊道。"去找眼镜！"

弗兰齐竖起了耳朵，在空气中嗅了嗅，拖着我径直地朝糖罐走去。我可以把糖罐藏起来，不管我把它藏到哪儿——弗兰齐总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它的踪迹，得相信狗的嗅觉。狗是不需要眼镜的。

经过长期的思索我现在终于找到了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再也不把眼镜摘下来了。我洗澡时戴着它们，哭泣时戴着它们，睡觉时戴着它们，连做梦也梦见它们。我梦见我把眼镜给弄丢了。

一早醒来——我发现了什么？我把眼镜给弄丢了。

一个吹毛求疵者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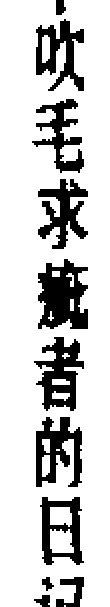
7月9日

今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侦探科亚克时不禁放声笑了起来。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男演员，怎么会是个秃头？看上去与一只抛光了的桌球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况一定得避免。

在特利·萨瓦拉什的影响下我走到镜子前观察了一下我头发的状况。经过几分钟的仔细察看后我发现，我两鬓的发端好像少了那么一点。可这只会增加我脸上富有思想的表情。这对于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于一个幸福地结了婚的、戴眼镜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除此之外，“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并不存在。

7月10日

今天早上，盥洗之后我的目光偶然落在我的梳子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二十三根头发。可是，我并不担心。我的理发师——我偶然在他的店里遇见他——认为，一般来说，每天掉十至二十三根头发是很常见的。“不足为奇，”他说(这一点





他一定知道得很清楚),"秃头是遗传的。只有那些其祖先是秃顶的男人才有秃顶的危险。"

在家里,我偶然找到了一张我祖父和他八个兄弟的照片。照片上所有的人都是秃顶。我认为,我的理发师应该多去关心他的生意,而不应该去讨论什么遗传问题并胡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9月3日

真是奇怪。自从我特别关注我的头发以来,它开始掉了。当然,除了我之外谁也没有注意到。是我,给它们以这么多的关注。不管怎么说,上周每天落发的平均数竟然达到三十根之多。没有任何可以使人感到不安的理由,只是得引起警惕而已。我给我最心爱的报纸写信并在"恋爱者顾问"栏目中得到了以下的答复:

"警惕,特拉维夫。毛发是生长在哺乳动物身体某些部位的、柔软的线状赘生物。根据经验来看,一些哺乳动物身上某些部位的毛发会脱落。对于男人来说,毛发脱落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当其数量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时,才应当引起重视。请您找医生咨询。"

我去找医生咨询。他为我检查了心、肾,外加肺、盲肠和脾脏。他给我量了血压,还为我做了 X 光透视、基础代谢测试以及心电图。他宣布我一切正常。至于我的头发,他说,可惜他无能为力。它们要掉,就让它们掉去吧。

2月11日

我的新发型与我脸上狡黠调皮的表情极为相配。我的全

部头发仅剩下一小撮，它们滑稽地连在一起。我把它们往两个耳朵中间一条想象中的中线梳。可它们却懒懒散散、别出心裁地往下掉，遮在我那余下的一毛不拔的头皮上。

在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中——这篇文章是在参考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我读到，一些重要的人物都是部分或全部的秃顶，比如像成吉思汗，尤尔·布林纳和赫鲁晓夫。有一个法国皇帝甚至叫秃顶卡尔。

5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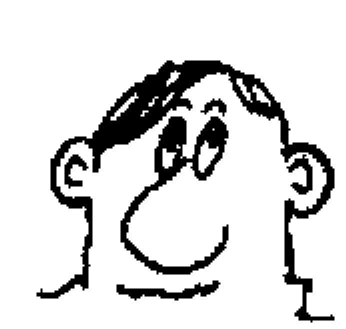
我的理发师说，与不秃顶的男人相比，绝大多数秃顶的男人更有天赋，特别是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可是尽管如此，我用不着害怕会秃顶，他说。他建议我剃个光头，以便使太阳光能够更好地照到我的发根上。这样做能促使头发生长，使头发重新获得青春。我并没有这种需要——可出于好奇，我让他给我试一试，剃完之后我在镜子里照了一下，差一点儿没晕过去：一张年轻、残忍的歹徒脸凝视着我。我躲在理发店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天黑之后我才悄悄地溜回家。最佳夫人脸上那副嘲弄的表情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参孙① 啊参孙，我现在是多么地理解你啊！

8月27日

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敢在白天出门。在我隐居的这些日子里，我读了许多有关赫鲁晓夫以及他伟大功绩的书籍。赫

---

① 古犹太人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由于被他的情人剪去头发而丧失了过人的力量；事见《圣经·士师记》。



鲁晓夫在他年纪还是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掉了头发。

这期间，我的大部分头发都已掉完了，其原因大概是它们三个月没有晒到太阳。我的脑袋就像月球的表面，只有近赤道的地方有那么一小部分长着茂盛的植物。正当我绝望到了极点的时候，我在报上读到以下的广告：

我曾经绝望到了极点！

我的脑袋就像月球表面，只有近赤道的地方有那么一小部分长着茂盛的植物。

现在我已经不再绝望！

我用美国的灵丹妙药特效生发灵来护理我的头发。现在，我的秃顶已经完全治愈了。我成了一位幸福的父亲，有了三个孩子。

有专门卖给吝啬鬼的用极小的小管包装的特效生发灵，其价格为 1 镑 20 皮阿斯特，也有专门为喜欢经济实惠的丈夫设计的超级大管包装的，其价格为 9 镑 80 皮阿斯特。

为了加快治疗过程，我买了一管超级大管。

11 月 17 日

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特效生发灵确实加快了速度。

我的头发迅速减少到二十七根，我开始用清晰的目光来看待世界。亲爱的人们，这并非出于偶然：几乎所有工业界的巨头、经济界运筹帷幄的人、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都是秃顶，特别是当这些人已经结过婚并且过了一定的年龄界线。

不管怎么说，人们还发现不了我的头已经秃了，因为我非常巧妙地把后面的头发往前梳，而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好像我把前面的头发往后梳了。这一小小的诡计至多在游泳池里会被人拆穿，因为这时候我的头发是湿的，贴在肩膀上。我的这副模样常常会使孩子们笑得抽筋。

1 月 29 日

今天，一件可恶的事情破坏了我的情绪。我排队买电影票。一个小无赖问他的女朋友——她刚好站在我前面几米的地方：

"波戈在哪儿?"

这个姑娘——一个极其幼稚、楞头楞脑的姑娘——指着我说：

"就在这个秃顶的后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前提当然是这个蠢丫头确实是在说我。由于我那发型的缘故，我宁愿怀疑她说的不是我：八根波浪起伏的头发从左往右，还有三根——古斯蒂，莉莉和莫德谢——从右边的角落里向它们迎去，左右的头发斜着交叉在一起。后脑勺还有乔西。不，我考虑的时间越长便越是确信，这个蠢丫头说的肯定是另外一个人。

她指的是另外一个秃头。

3 月 2 日

我变得越来越明智、越来越成熟。我对宗教问题的兴趣日趋浓厚，这在我身上唤起了一种新的生活乐趣，而传统的伟大影响也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我发现了我们的戒律和法律



的更深层的意义。再加上我更严格地恪守我们的安息日，并始终把脑袋遮起来——一如人们所知，这是精神上优势的一种表示，在我那被遮掩的脑袋里装着铁一般的纪律。

今天早上阅兵时少了古斯蒂。我又重新点了一次名，发现出席的总数为四根。之后我发现古斯蒂了无生气地粘在我的衬衣领子上。这是我曾经有过的头发中最长、也是最粗壮的一根。命运是玄妙莫测的。我把莫德谢放到空档里，把它稍稍地往上梳一点，以便使它看上去比它本身要多一点。亚比该变成了灰色。

4月13日

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乔西了。理发师对它大肆颂扬并建议我把它剃了，以便它以后重新长出来时能变得更加茁壮。我不同意。我可不愿意第二次再做光头。为了预防头皮屑，我为乔西用了叶绿素香波。等它干了之后，我把它曲曲弯弯地放在我的脑袋上。它愿意要多少地盘就给它多少地盘。

7月28日

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乔西不见了。它缠在我帽子的衬皮中被连根拔了起来。这使我联想起伊莎多拉·邓肯的悲惨结局。是自杀吗?

7日29日

我对秃顶有那么一点偏爱，最佳夫人必须对此加以忍受。

灰细胞的秘密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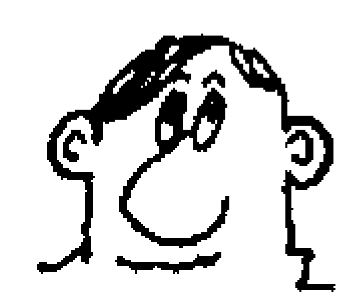
一个马上要与最佳夫人一起庆祝银婚的模范丈夫是可以戴眼镜的，也可以时而秃顶。

惟一无法克服的障碍是过早地出现老年痴呆症的现象。

在翻阅我们订阅的日报周末增刊时，我读到了一篇医学论文。五十岁以上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有关老年痴呆症的各种具有启发性的知识。根据作者的说法——这是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五十出头的医生——人只要一超过五十岁，大脑中每天要死去几百万个灰细胞。这位大胡子声称，喝酒会加速灰细胞的死亡。

因为我已经超过五十八岁了，所以我马上求助于我的袖珍计算器。我把我的岁数乘以 365 天，然后在后面加 6 个 0，得到的结果是，我的灰细胞几乎已经丧失殆尽。这使我感到震惊不已。

我的天哪，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具有威胁性的灰脑细胞消失呢？每当我喝啤酒的时候，我的眼前便会出现那个留络腮胡子的老年痴呆症研究者的身影，他竖起手指以示警告，



并轻轻地对我说：

“又有几千个灰细胞去见阎王了……”

事实上，我已经在我身上发现了非常明显的老年痴呆症的症状。比如，电视节目里有人在接受电话采访。我听到铃声后会马上跳起来去抓我自己的电话机听筒，当我耳朵里听到嘟—嘟—嘟的响声时，我会马上表示道歉。或者，我给别人打电话，可还没有等对方开口说话，我那些尚存的灰细胞便已经忘记我想要与谁通话了。

“哈啰，”我说，“我是基雄，您是谁？”

“真见鬼，”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说。

“难道您不知道，您想给谁打电话吗？”

“很遗憾，我不知道。我患有老年痴呆症。”

在坐出租车这件事情上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显著。自从我发现坐出租车比我自己使用燃料来得便宜之后，我经常乘坐出租车。再说坐出租车比自己开车来得舒服。我非常惬意地坐到一辆一九五四年制造的美国车的车垫上，请司机把收音机开得轻一点，然后满足他没好气地提出来的别抽烟的要求，余下的便是无限的幸福。这就是说，假如没有与出租车中心的无线对讲机的话，本来是可以享受到无限的幸福的。

每一辆出租车都装备了这种可怕的装置。这一装置使得出租汽车中心能与司机保持联系，不管司机在哪儿，都能通知他，他该开到什么地方去。这种装置会发出一种爆发性的由咕噜，咕噜，喀嚓劈啪和爆裂声所组成的混和的响声，透过这一片嘈杂的声音可以听到断断续续地传来的人的声音。估计我一共乘过八百个小时出租车，尽管如此，除了每次广播通知

开头和结束时一成不变的"Zipp"之外，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听懂过。我把自己所有的智力都调动起来，紧闭双眼，按照瑜伽信徒的方法集中精力，动用了几十个灰色细胞——一点也没有用。我连一个字也听不懂。

而司机则完全不同。他都能听懂，并且不费吹灰之力。

"嗞噗"，我听到前面座位上传来的声音。"格格格尔——克利克——波波——卡特还特尔——卡嘭卒——格尔格——嘭嘭——嘭嘭，鲁克——鲁克——嗞噗"。

这便是我所听到的。我只听到这些，其他什么也没有听到。司机把麦克风移到嘴边，极其潇洒自如地说道：

"嗞噗——门德尔——市中心，34——没问题——嗞噗。"

因为我连这一镇定自如的表述也听不明白，于是便俯身向前怯生生地问我的司机，总部给他的通知内容是什么。

"这些混蛋！"他答道，"他们分配我做夜班。"

我嘟哝了一句："真是恬不知耻。"我感觉到头脑中有几百个灰色细胞产生了厌世情绪而消失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否过于草率地把一切都归结于我的老年痴呆症。也许，这种通过无线传递的难懂的语言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也许这只是出租汽车司机们所搞的一种阴谋诡计，目的是要镇住我们这些具有自卑感的、恶劣的顾客。他们要使我们对自己清晰的感官产生怀疑。除了车钱和小费之外我们还必须付出自己的自尊。

"嗞噗——格格尔，施隆克——扑克——无尔茨——特——嗞噗"，这是从无线麦克风中传出的声音。

司机答道：

"很乐意这么做，莉娜。嗞噗。"





接着，他把头稍稍转向我说：

“让我把加班费交给她，我才不干呢！”

“说得有理，”我支持他说。“她不是总部的吗？”

“根本就不是。她是舍希特新交的女朋友。您的耳朵不管用吗？”

我下决心要学会这种秘密的语言。下一次坐出租车时我带了一盘录音带，准备把这一套舍希特节目全部录下来——从第一声“咕噜咕噜”的声音一直到最后的“噗噗”声。接着我在家里把磁带放出来听，一遍又一遍地听，先是很慢很慢地放，然后越放越快。我准备一直要放到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时能像所罗门国王那样听懂动物的语言为止。

当然，前提是，我的脑子里还得有那么一些灰细胞。

没有一条路是通往奥斯陆格罗尔斯的

假如苏尔茨鲍姆不是想入非非地把我视为这一职位的合适候选人的话，这件倒霉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好久以来，苏尔茨鲍姆一直期待着能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他真正能信得过的人。好像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灰色脑细胞这件事。现在，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洽之后，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是否把这个职位交给我。

当我在那个性命攸关的夜晚给他打电话时，他告诉我，不想再拖了，准备马上结束我们的洽谈。他请我马上到他那儿去一次。我的高兴劲儿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苏尔茨鲍姆毕竟是苏尔茨鲍姆，这是无庸置疑的。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了他的地址。“赫尔辛福斯大街 5 号，”他答道。

“好吧，”我说，“几分钟后我就到您这儿。”

“太好了，”他说。

我立刻上路。可才走了没几步我便遇到了一个障碍，一个比任何路障都更难逾越的障碍：我把路名给忘记了，忘得一



干二净。我只是依稀记得，第一个字母是 P。我当机立断地走进一个电话亭，准备从电话簿上来查明苏尔茨鲍姆的地址。

电话簿上没有苏尔茨鲍姆（德文原名为：Sulzbaum）的名字。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查了字母 Z 打头的那一栏。可是，电话簿上也查不到祖尔茨鲍姆（原名为：Zulzbaum）的名字。

我想，这个电话也许是他新装的。幸运的是我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我给他挂了电话。

我说："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把您住的街名给忘了。"

"赫尔辛福斯，"苏尔茨鲍姆说，"赫尔辛福斯大街 5 号。"

"多谢！"

吃了亏我变聪明了。我一个劲儿地轻声重复着"赫尔辛福斯……赫尔辛福斯……"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最北部，我终于看到一个可以向他打听这条街准确位置的行人：

"对不起，这儿是否有一条……"

"很抱歉，"被问的人打断我说。我自己对这儿也不熟悉。我在找乌齐尔街。

"乌齐尔街……我刚好知道这条路在哪儿。笔直走，然后到了第二条马路往右拐。"

"多谢！我对您真是感激不尽。对不起，您要找的那条街叫什么来着？"

"我？我找的是……不，怎么会这样！"

真是的：这条该诅咒的乌齐尔街把我自己要找的街名给弄忘记了。我只是还依稀记得，这条路名是以 K 开头的。门牌号码是 9 或者 19，这个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很不愿意给苏尔茨鲍姆打电话。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也

许会把我看成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把我看成那种即使把街名告诉他两遍也记不住的人。我绞尽脑汁使劲地去想那个被遗忘的街名。可老经验再一次得到了证实——一如那些智力很高的人——我无法解决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面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种可能：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下来使自己放松，等待着突如其来的灵感。可灵感并没有出现。我所能想到的惟一的路名是“施玛尔雅胡·列文街”（至今为止我从来就记不得这个路名，真是见鬼）。可是我知道，我要找的那个街名不是“施玛尔雅胡·列文”，而是一个外国的名字，是这样的，我要找的那个名字是以字母L打头的。再往下我就记不住了。

于是，我又给苏尔茨鲍姆打了电话。

“哈啰，”我说，“我已经在路上了。您是否能告诉我，怎么才能最快地找到您住的那栋房子？”

“您现在在哪儿？”

“我在本·也胡达街。”

“您已经离我们家很近了。随便让哪一个行人给您指一下路吧。”

“我会这样去做的。您住那条街的名字怎么拼？”

“怎么念就怎么拼。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这儿的人好像不太熟悉这个名字。这好像是一条新街。”

“这条街并不是很新的。”

“尽管如此，这个路名很长……”

“什么？还有更长的路名呢。比如像高牧师-马蒂亚胡街，或者托雷·冯·尼卡诺尔街，再或者像阿基巴-科尔诺米策



尔科大街。"

"当然,当然。可是您住的这条街念起来绕口。"

"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会习惯的。再说,您为什么突然之间为一条街名伤这么多脑筋?我在等您。您到底还来不来?"

"当然来啦。过五分钟就到。"

"好吧。"

苏尔茨鲍姆挂上了电话,我站在电话亭里。这一瞬间也许是我结婚以来最尴尬的时刻。"高牧师-马蒂亚胡街","托雷·冯·尼卡诺尔街"和"阿基巴-科尔诺米策尔科大街"等名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而它们对我连一点用处也没有。

过了一会儿,我还是决定拿起听筒,用手指去拨电话拨盘。

"苏尔茨鲍姆,"我轻声地问,"亲爱的苏尔茨鲍姆,您住的街名叫什么?"

"赫尔辛福斯。也许您还是把它写下来的好!"

我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摸圆珠笔,可是没有找到。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苏尔茨鲍姆,我过五分钟就能到他那儿,他便已经把电话给挂上了。

这一次我再也不会重复以往的错误了。这一次我运用了记忆法。我对赫尔辛福斯这个名字进行了分析。其第一部分使人联想到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其第二部分几乎与众所周知的美国汽车牌子福特是一样的,而这两个部分是通过字母表中第七个字母"g"连在一起的。非常简单,赫尔辛(基)福(特)(原文为:Helsin(ki) - g - ford(d) - s)5号。

正好来了一辆出租车,我对司机随便说了一句"赫尔辛福

斯街5号"。

"赫尔辛福斯街5号,"他重复了一句,开足马力。

我往后靠在汽车的靠垫上,一边沉思着,这是一桩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一个像我这样智力发达的人,一个连以往中学时代一次考试中比如像"达齐安[①]"的首都是"萨尔米塞格吐查[②]"这样非常冷门的答案都还能记得住的人——一个几乎可以把自己称作电脑的人,怎么连这样一个对小孩子来说都非常简单的街名都会忘记,等等……等等……

"对不起,"司机转过身来对我说。"那条街叫什么来着?"

我的眼前顿时模糊起来。我所能想起来的只是"萨尔米塞格吐查",可是这条街肯定不叫这个名字。我所做的最最简单的事情便是咒骂司机。他诅咒发誓说,直到菲施曼大街他还记得那条街的名字。

"那好吧,"我又重新恢复了与我这样具有智力优势的人身份相符的镇静自若的状态。"我们可以试着把这条街名想出来。我们系统地来回忆一遍。您还记得什么?"

"什么也不记得,"这便是我从这位开车的拦路抢劫犯那儿所得到的恬不知耻的回答。"最多还记得门牌号是173号。"

"您这个家伙,集中精力!好好想想!"

"泽利希贝尔格路……萨尔魔诺夫斯基路……或与之类似的什么名字。"我突然想起了记忆法。我得救了。挪威的首都叫奥斯陆,中间的字母是g,然后是那个闻名遐迩的英国汽车牌子的第一部分。

---

①② 拟系作者虚构的地名。



“奥斯陆格罗尔斯路，您这个白痴，”我以尖刻嘲讽的口吻说。

司机感激地点了点头，马上来了个急转弯，飞快地朝南驶去。在下一个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说道：

“很遗憾，没有这条路。”

坦率地说，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有这么一条路。可司机刚才突然启动使我又有一些吃不准。现在我甚至知道我的错误在哪儿了：应该是中间没有 g 这个字母，它叫奥斯陆罗尔斯……或者叫奥斯陆伊斯……

“现在怎么办呢?”司机问。他确实是这么问的“现在怎么办?”

我一句话也没说，带着鄙视的表情把一张钞票扔在他的脸上，从车上跳了下去，迈着有弹性的步伐急匆匆地向最近的一个电话亭跑去。我给苏尔茨鲍姆打了电话。

“我马上就能到您这儿，”我加强语气地对他说，“可是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我……”

“赫尔辛福斯!”苏尔茨鲍姆的吼声震动了电话亭的四壁。“赫尔辛福斯!! 您根本就不用来了。”

乓的一声，他把电话给挂上了。

那又怎么样呢? 我还觉得挺好的。我只是一个拥有几十个精疲力竭的灰细胞的极其普通的一家之长而已，又不是电脑象棋。

我离开了电话亭。这个电话亭刚好位于一块路牌的下面。路牌上写着：赫尔辛福斯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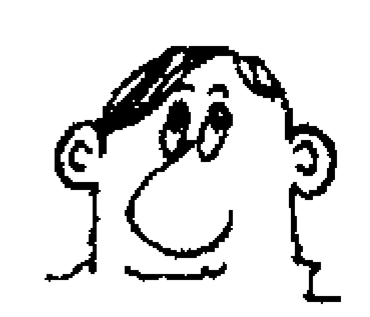
我的表兄埃贡

他与我之间的敌意是在我孩提时代或者说当我还是一个单身汉的时候便开始的。那时候，我发现在我的后脑里有一个转椅，转椅上坐着一个极其淘气的小技术员，一个控制睡眠的人。他最乐意干的事情莫过于把我脑神经节中的线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再把它们错误地连接起来。比如说，当我特别想睡觉的时候，那上面的小鬼便扳动他的开关使我突然变得非常清醒。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当保持清醒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时候，他又扳错了开关，让我马上睡着。

也许他并不恨我，这个扳开关的小侏儒：也许他只是——与议会中的反对派一样——笼而统之地反对我这个执政党想做的一切而已。不管怎么说，他与我有一点儿亲戚关系，他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兄或与之相类似的什么亲戚。

我把他叫做埃贡。

他是一个机警的小家伙，他总是非常戒备，非常警觉，特别是对我。如果他在哪儿发现一张床，一张长沙发，一只沙发或一只躺椅的话，他马上就会使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在相



反的情况下，他也同样能以绝对保险的方法发挥他的作用。他会强迫我在非常不合适的场合肆无忌惮地打哈欠：比如当我们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当我坐在写字台前想工作的时候，当我去拜访伊尔卡姨妈的时候或者当我的目光落在某一个作家全集上的时候。连像《圣经》这么激动人心的书也敌不过他。

不必说，在夜里二十一点到凌晨三点四十分是我最最清醒的时候，偶尔他会让我在夜里打个小瞌睡，有好多次我发现自己总是在凌晨三点四十分的时候准时跳起来看钟。这时候钟的指针总是指在三点四十分上。假如它例外地指在三点四十四分上的话，我就把钟往回拨四分钟。埃贡比钟更可信。只有当我必须很早起床时，我才会睡过三点四十分这个坎。遇到这种情况时我经常会一直睡到中午。

埃贡的前身可能是个患有神经官能症的蝙蝠，是一颗睡眠药或者恰恰相反，是一杯黑色的咖啡。

我早就打算要到埃拉特去旅行，一位最佳夫人所不认识的女士为此而感到非常高兴。当我几个星期前成行时，因为睡过头而去晚了，于是我决定，用埃贡自己的武器去反对他。我为自己买了一个很大的、非常漂亮的金属闹钟，它闹起来声音特别响亮。

考验它的时候马上就到了。我最小的儿子阿米尔从学校带回了一张给所有父亲的通知，要求父亲们第二天一早六点钟到学校去履行值勤义务。我把闹钟拨到五点三十分，结果是到了中午十二点才准时醒来。看来是我没有听到按时闹的闹钟睡过了头。问题不在于闹钟，而在于埃贡。

对于我为什么会睡过头的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

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必须要到学校去，所以我的下意识便受弗洛伊德教授的委托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又重新坐到了学校的书桌旁，正好是上数学课，我们得作一个有关正弦和余弦的书面作业，而我对此一窍不通。

离下课只剩下五分钟了。我的额头上直冒冷汗。

"真见鬼，什么是余弦?"我问我的邻座。我的邻座不是别人，正是阿尔贝特·爱因斯坦。

"不知道，"他轻声答道。"也许是颗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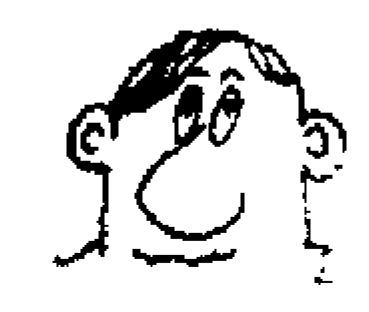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候铃声响了，这是下课的铃声。数学教授来收本子。我的本子上空白一片。铃声一直响个不停。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埃贡把两条线给接错了，他把闹钟变成了学校的铃声。结果是我从床上跳起来，一直奔到学校里。到了那儿才知道，施托克勒咬牙切齿地替我值了班。

埃贡总是一再地表现出他那使闹钟的铃声与我正在做的梦的要求相适应的能力。就这样我错过了一个观看一场精彩戏剧的机会，因为由于埃贡的干涉我的闹钟声变成了舞台化装室里的第三次铃声，而坐在化装室里的正是我自己，这时候的我变成了演员劳伦斯·奥利弗爵士。

我给自己买了一只新的闹钟，可还是没有用。埃贡把它——根据我做梦的内容而异——变成了火车的鸣叫声，变成了防空警报声或工厂的警报声。

我去向一位心理分析学家讨教。"埃贡? 别让人笑话您了!"这便是他的判决。"您的下意识对尖锐的声音具有敏感的反应。我能告诉您这是为什么。在您出生的那一刻医院的门口刚好开过一辆有轨电车。这辆有轨电车在拐弯的时候发出了一阵非常尖锐刺耳的响声。打那以后您便产生了一种潜



在的、想与一辆有轨电车一起上床睡觉的愿望。因为这一愿望难于实现，您就把它压抑下去，并把它投射在放在您床上的闹钟上。”

这当然不是真的。有轨电车对我一点儿也没有吸引力。再说我已经与最佳夫人结婚了。不管怎么说，这位心理研究学家那一番明白易懂的话促使我去买了一个镀铬的电子石英闹钟。其数字报警系统所发出的是长达六分钟之久的嘀嘀嘀的响声，而不是那种尖锐的闹声。

埃贡可不会上当受骗。第一天夜里他在梦中把我引到美国堪萨斯市，我成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小邮电局里惟一的职员。在我的闹钟发出嘀嘀嘀的响声之前不久，县行政司法长官出现在邮局的门口。

“有一份电报得马上发到阿拉巴马洲去！就是这篇！”

我顺从地坐到电报机旁，按莫尔斯规定开始发报：嘀，嘀，嘀，嘀，嘀，嘀。我那闹钟所发出的全部电子警报通过电缆被传到了阿拉巴马洲。这一天我根本就没有醒过来，而是处于一种临死前的挣扎状态。

上一周在我与埃贡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我买了一张从法兰克福起飞的机票，起飞时间是早上七点。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市里的专业店里买了一个所能买到的最大的闹钟。这是一个真正的庞然大物，上了红的漆，其报警装置足以把整幢房子里的人都吵醒。

这天夜里，埃贡采用了一个毒计，他带着一群女人来找我。他在梦中把我变成了帕夏[1]。我坐在自己的后宫里，在

---

[1] 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高级军官和官吏。

我周围站着一大群数不胜数的东方美女和姨妈伊尔卡。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到我的怀里，在我的身边是一个嘀嘀嘀作响的节拍器，因为我拥有每一个美女的时间都是有限制的。正当我们的狂欢达到高潮时，后宫入口处突然响起了地狱般的喧哗声，我被吓懵了。

一个正在值勤的太监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殿下，请您别在意！这吵闹声是由您那只愚蠢的闹钟发出来的。您尽管享乐，它马上就会停下来的。”

也许，我最好是不要停止睡觉。我这个年纪的人……



你看上去有多老就是多老

以下的浮想联翩是我在电影院前排队买票时所产生。我看到站在我前面的一位老先生头发灰白，有那么一点饱经风霜的样子。刚开始时我觉得他有点儿面熟，可不知道是在哪儿见到过他并且怎么会见到他的。我突然想起来了，冲到他的跟前。“我亲爱的老先生！”我大声喊道。“您不记得我了吗？在文理中学？”那老头挣脱了我的拥抱。“你疯了吗？”他低沉地吼道。“什么先生？我们是同一个班级的。我是你的同学……”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充满青春活力的想法不断地向我袭来，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并不想说，这是因为我突然而至的生日使我感到束手无策的缘故。在我看来，生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已经度过那么一些生日了，它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令我讨厌的是那种夸张的，也可以说是不符合实际的生日的总数，也就是说那些用于表示生日次数的数字。今天我五十八岁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有达到五十八岁过，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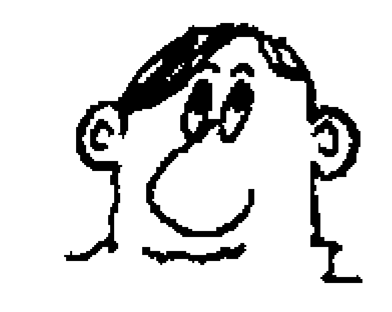
直比五十八岁更年轻。肯定是哪儿搞错了。这一点户口登记处的人特别要注意。根据我自己的感受，我是说：根据我对我自己的印象，我还没有超过三十这个数字。甚至还有可能，在即将来临的十一月份我将会变成二十九岁或与之相接近的岁数，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对我极其有利的一个关键性的理由是，我的身体目前正处于一种极佳的状态。无论是坐，站，还是走，我都与最年轻力壮时没有什么区别。我的眼睛，耳朵都还俱全。我的鼻子还在老地方。至于官方强加给我的年龄显然是由于登记上的差错而造成的。

我在这些年中所发生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好吧，我当然不会再跟在出租汽车的后面跑，而是站着招呼出租车；我宁愿坐电梯，而不会去登天晓得的几层楼。不能否认，每当我们外出旅行时，最佳夫人所必带的家庭药箱的规模越来越大，品种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我们这一带气候的关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曾经横渡过巴拉顿湖①，为的是与一个特别聪明的姑娘去约会。昨天，当我带孩子们去海滨浴场时，我太太要我下水去游泳，我对此不感兴趣。就是没有兴趣。根本就连一点儿……老实说，我很绝望。我最后一次经历类似的绝望时是十九岁，那时候我知道：从现在起我将变老。

我经常会回想起那一次的尴尬境地。几个星期前我坐公共汽车时看到一位憔悴得让人觉得可怜的老妇人。她坐在那儿，瘦骨嶙峋的双膝夹着购物袋。她那丑陋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当我突然认出，这个面目可憎的老妇人就是我年轻时曾

① 位于匈牙利西部，亦称匈牙利湖，是中欧最大的湖泊。



经向她献过殷勤的那个姑娘时，我着实被吓了一跳。我暗自想，她好可怜。这便是那位曾经非常富有魅力的姑娘给我留下的一切。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正当我因为油然而生的同情心而感情汹涌澎湃时，那位曾经那么富有魅力的姑娘站起身来给我让座。

再比如说我的女儿蕾娜娜。我们坐在家里看电视，我们看的是电影《宾虚》①，众所周知，在这个电影里出现了大量的罗马士兵和基督教早期的信徒。"妈咪，"响起了蕾娜娜的声音，"那时候爸比也在那儿吗？"

毫无疑问，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即使是把我用来拨老是占线的电话号码的那两年工夫减去的话，我也还有足够的岁数。当然，这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只是一个灰色脑细胞不断减少的丈夫进行抽象思维的机会。他想啊想，突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经常会把人的脸给搞忘了。好朋友，老相识，甚至是家庭成员在路上碰到我，我竟然会不知道我是从哪儿认识他们的。自然我会以友好的微笑或由衷的挥手来回答他们的问候。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欺骗他们，而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还记得一九五五年夏天吗？"曾经有那么一个人带着受了伤害的表情对我说。"我叫布林第斯，你怎么样？"

"啊，对了，是你啊！"我欢呼道。

"布林第斯，老兄，你这一向过得怎么样？"

不等他回答我便连忙走开了。他是何许人也？布林第斯

---

① 系一九五九年好莱坞的一部著名影片。

是干什么的?

我连我的敌人也记不住,于是乎我便得了一个宽容的美名。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我觉得记名字也越来越困难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一无例外地用同一个名字"娃娃"来称呼那些与我打交道的年轻姑娘,为的是避免因为把她们的名字搞错而产生的不愉快。

我所遇到的更大的困难是阅读文学作品。我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都快读了一年了,可每次我都只能读完开头的五页。在第 5 页上有这么一段:"'加鲁普奇克,'弗拉基米尔·普鲁钦科说着转向帕尔斯雷耶维奇·楚普奇克。后者正倚在花园的篱笆上与皮约特拉·尼古拉耶维奇·库斯内耶茨维奇闲聊。"每次读到这个地方我必然要停下来,这些人名在我的眼前变成了模糊的一片。我无法把故事中的这些人物区分开来,只能再重头读起。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事情像铅字一样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比如讲一九三〇年匈牙利国家足球队的阵容,即使是有人半夜里把我叫醒的话,我也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出来:科胡特,托尔迪,沙罗希博士,当然还有图拉伊第二,那时候他使奥地利的中锋欣德拉尔完全失去了威力……可除此之外,我的脑子里一片浆糊。一如我以前所提到的,尽管别人看不出来。没有人会认为我已经超过五十七岁了,人们最多把我看作五十七岁又二分之一。也许这是因为我穿网球鞋的缘故。

就在昨天,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冒昧地想来安慰我。我对她说:

"亲爱的小姐,我宁愿今年二十六岁,但看上去像六十二岁,也不愿意处于相反的状况。"



人们像是存心要跟我过不去似的。比如说有那么一个傻瓜跑来找我，他对我说，你自己感觉有多大岁数就是多大岁数。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无稽之谈。年龄是一个人生命年限的总和，根本就用不着你去感觉。只需打开护照看看生辰日期就行了。如果你看上去与你护照上的照片开始相似时，那你便可以想到退休了。

不管怎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会变得富有智慧并会把一切都看得相当淡薄。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不会在任何方面去嫉妒别人，我不会的。唯一会使我感到恼火的是，一个像我一样年纪的人会看上去比我更年轻。我说这话时脑子里所想到的是某个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他至少要比我大两个月，却没有一根白头发，与我满头的银发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问他："您究竟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才依然保存了您年轻时的那一头黑发？"

"得遵守纪律，"他狞笑着答道。"人一过了四十岁有些事情就必须得去做。您看我。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是的，六点钟，用冰凉的水冲一个澡，在海滩上长跑，至少得跑三公里，是的，每天都得跑，每隔一天去洗一次桑拿浴，多吃水果和酸奶，打网球，骑马，读《花花公子》杂志，参与生机勃勃的生活，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我紧张地问道。

"除此之外，我让人把头发给染了。"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下赌的地方

现在，当我从理论上来说已经成了祖父时，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我周围的人透露一个秘密。迄今为止我总是将这一秘密深藏起来。从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不起眼的、理智的、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可是我有一个恶习：爱与我自己打赌。比如我赌某一件事情是否会圆满结束。

假如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它为什么要欺骗我呢？——我内心好打赌的热情早在我九岁时就已经开始了。上学的路上我总爱在人行道的边缘上走。于是有一天我与自己打了以下这样的赌：假如我迈着像往常一样大的步子而不碰到人行道边缘镶边石的横线的话，那么老师便不会发现我忘了做数学题。简短地说一下，我没有碰到横线，而那天老师恰好生病。我打赌的嗜好就是这么开始的。

当我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关头，有一次我从我们五楼的家里往下走，我孤注一掷地想道：如果我们楼梯的最后一级是奇数的话——我与自己打赌——那么，我所向往的对象，对面洗衣作坊老板的金发小女儿便会神



魂颠倒地爱上我。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楼梯最后一级的数字是 112。从此以后我不敢走近约兰卡，我们那含苞待放的爱情就这样因为被楼梯判了死刑而夭折了。

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于与自己打赌的热情竟然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雨天的下午，我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码头上，狂风吹走我的帽子。我一边跑，一边打赌，假如我的帽子没有掉进河里，而是被我抓住了的话，那么希特勒将会死去。我抓住了帽子，没让它掉进河里。余下的事情已经成了历史。这并不是说，第三帝国的命运是由我来决定的。可是不管怎么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势有所缓和，我只是偶尔与自己打赌。比如，我必须闭着眼睛穿过一个门洞，假如能顺利通过而不碰到任何东西的话，一个前途未卜的计划便能实现。砰的一声，我的脑袋撞到了门框上，于是一切罢休。最糟糕的是，这样的打赌是不允许重复的。假如撞到了墙壁，就算输了。这便是游戏规则。

我希望，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会戒掉这一嗜好，可实际上情况越来越糟糕。即使是其他人也有这一嗜好的话，我并不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我的一位朋友把一个生命攸关的决定维系于他这天早上所买的公共汽车票上是否有 7 这个数字；另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总是把第二天的议事日程托付给电视机上的一个按钮：如果他能在电视节目结束，国歌开始之前把这个按钮开关关掉的话，他便去做某一笔金融交易，如果不能及时把它关掉便放弃这笔交易。

在各种各样的打赌形式之中也会渗入人的因素。比如，我在散步时看到另外一个散步的人正朝我走来，我从骨子里

感觉到：如果我第一个走到我俩中间的那根电线杆旁的话，以色列镑便不会贬值。这种打赌必须是在绝对公平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不允许加快步伐，至多只能加大步伐，也就是说，你可以迈出“飞机场的步伐”。所谓飞机场的步伐就是当你想第一个上飞机去占一个靠窗的座位，但又不想让别人看穿你的心思时所迈的步伐。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开车的时候。我所说的是“开车的人很喜欢打的那种不准踩刹车的赌”。打这个赌要求司机在红灯时以缓慢的速度向十字路口驶去并恰好在红灯转绿灯的那一瞬间到达那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司机便不必为他最近几年的健康而担忧。顺便提一下，做这样的试验要有坚强的神经。有一回——我恰好在为我们家的幸福而打赌——我开车不停顿地朝着红灯驶去，一直到最后一刻红灯才转成绿灯。在交叉路口我不得不擦去额头上的冷汗，可是我那些孩子的未来却因此而有了保障。

还有一种有关“大众轿车的打赌”。一如其名字所反映的，这个赌的内容是能否猜出在特拉维夫和海兹利亚之间所能遇到的大众轿车的数字。打这样的赌如果赢过几次之后，你自然事先就会知道其结果(843 辆)。那又怎么样呢？那便是为了证实而打赌。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偶尔耍一个小小的花招也是允许的。比如，当我因为红灯的缘故而不得不在交叉路口停下来时，我垂下眼帘，希望在抬起眼睛时红灯恰好变成绿灯。这时候，谁也不会禁止我眯着眼睛偷偷地朝红绿灯方向投去一瞥。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会盲目地去冒险的。人只能活一次。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呢？我提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



要提高公众的道德。

上个星期一发生了以下这件事情：我乘电梯上沙罗姆大厦——这幢摩天大楼被我们引以为豪——的11楼，我打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赌。我按了电梯的按钮，然后闭上眼睛不去看那些闪亮的数字而自己开始来数楼的层次。我所赌的东西不偏不倚恰好是我们国家的命运："假如到11楼为止我数得正确的话，"——这是我的赌注——"那么我们将最终与我们的阿拉伯邻国达成和平。"我注意力非常集中地数着。真的，当我睁开眼睛时，电梯刚好停在11楼，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说的话也是对的：当电梯停在11楼时，我刚好睁开了眼睛。结果是非常恰当、非常令人信服的：我们获得了全线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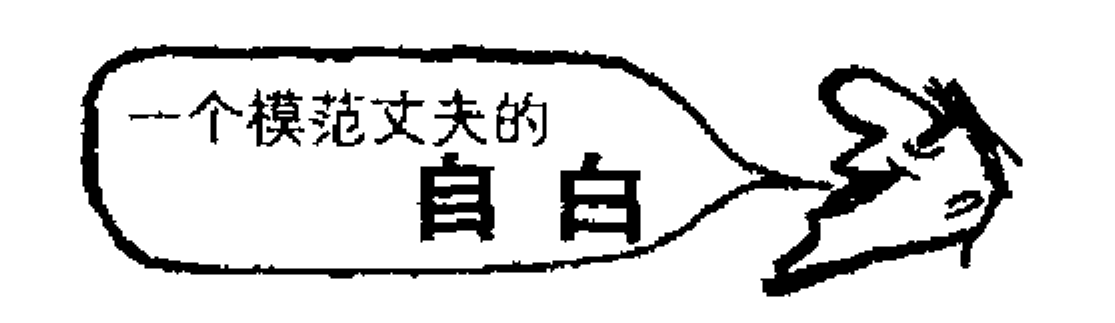
我希望，我们的后代将懂得尊重我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讽刺幽默大师、以色列作家
埃弗赖姆·基雄
（代译后记）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是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讽刺幽默大师、以色列作家埃弗赖姆·基雄（Ephraim Kishon，1924—　）的七十五大寿。从欧洲大陆向他表示衷心祝贺的，除了有名的作家、记者和其他媒体方面的同仁外，还有许多德语国家的政府首脑。他们中有德国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前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格、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以及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奥地利总理维克多·克利马等。这些欧洲政治界的头面人物都是基雄的忠实读者。

基雄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现居以色列。虽然他的母语是匈牙利语，但却用希伯来语写作。从一九六一年至今，他一共写了五十本书，其中大多为讽刺小品集，也有长篇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他的作品在全世界的发行量为四千一百万册，其中仅德语版的发行量就为三千一百万册。迄





今为止，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近四十种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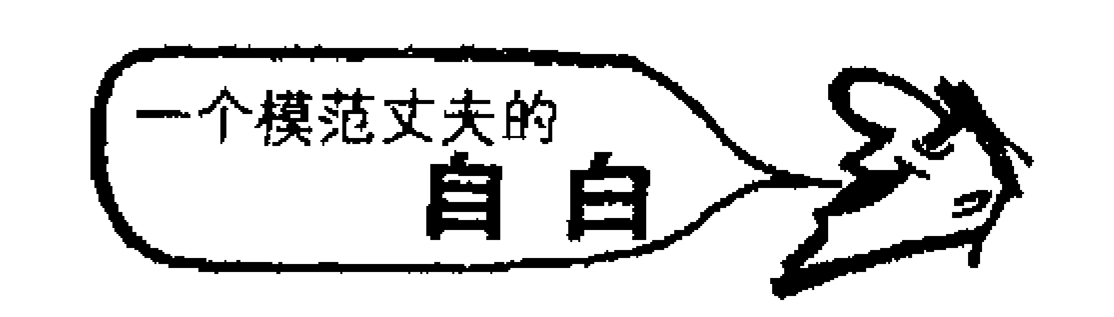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一位用希伯来语这样稀有语种写作的讽刺作家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如此显赫的成就，会在欧洲，尤其是在德语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并享有这么高的盛誉呢？纵观基雄的一生，这既归功于他过人的天赋与勤奋，也可归咎于他作为一个经历了希特勒时期的犹太人的坎坷身世。

基雄的原名为霍夫曼·费伦茨，于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其父德西代·霍夫曼是一家银行的行长。基雄在布达佩斯上了小学、实科中学和经济学校。一九四一年，他取得了中学毕业文凭，因为当时匈牙利法西斯统治正在实行的犹太人法而无法如愿上大学深造。一九四四年，德国占领匈牙利后，基雄被迫进了匈牙利的劳动集中营，以后又被作为有待于杀戮的死囚运往波兰的集中营。在运输途中，基雄得以死里逃生。在一次采访中基雄曾经提到过这段往事："那时候我之所以能逃脱厄运，全靠我长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有一次我遇到了检查，有人要查看我的身份证。我对他们说：去你妈的。犹太人是不敢这么放肆无理的。就这样，我一走了事，什么问题也没有。这时候我发现，我有编造故事的能力。于是我便成了作家。"(引自《您一直想知道的有关基雄的事情》，慕尼黑朗根·米勒出版社(Langen Müler)，第 30 页)这话听起来有点像传奇，可事实上，基雄能成为一名作家，确实是与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与杀戮有关。他的处女作，一篇揭露纳粹法西斯的短篇小说，便是在一九四五年为了躲避法西斯的迫害而藏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地窖中写成的。根据基雄的回忆，在那六个星期中，番茄汁是他惟一的食物。他是为了打发时间才动手写作的，要不然他真担心自己

会无聊得发疯。那时候，基雄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篇小说为他以后的作家生涯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因颠沛流离而把这篇小说给忘了。有一天，他突然在匈牙利的一张报纸上读到了自己的小说。原来是这家报纸在举行全国性的文学征文比赛。基雄的一位姑妈找到了他当年的手稿，没有经他本人同意便把它寄到报社去应征了。这篇小说竟然得了一等奖。对于基雄来说，这真是一次特大的惊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好比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匈牙利当局发现小说中的一位主人翁与莫斯科正在追寻的一位布达佩斯公民之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结果这篇得奖小说从此便在匈牙利销声匿迹。但是，这次得奖对于基雄本人来说，其意义是非常大的，它是基雄职业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社会的承认使基雄坚信自己的写作才能，他鼓起勇气告别了在大学里所学的雕塑艺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作家生涯。一九七七年，基雄把上述有关揭露法西斯的短篇小说改写成了一部题为《我的梳子》的长篇小说，它的德语书名《Mein Kamm》影射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这部长篇小说一发表，德国的报刊杂志便争相报道并对此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汉堡晨报》等报纸把它称为基雄的毕生巨著。

如上所说，基雄所写的很多书都是讽刺小品集。在这些小品中，基雄用极其幽默的笔触以日常生活为例来暴露人类的弱点和愚蠢。作为一个讽刺作家，他在其作品中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但是他的冷嘲热讽是善意的，不带丝毫恶意。他的批评往往使人有所触动，但并不伤人。总之，他的作品能起到让人在笑声中反省自己并“改邪归正”的效果。这正是基雄能够在世界各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为上至国家政界要人，下





至普通百姓所接受的奥秘所在。

与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基雄在刚步入文坛时也并非一帆风顺。基雄回忆说："在我文学生涯刚开始的时候，曾经遭到许多出版社的拒绝，如果把这些拒绝的书信收集在一起可以出一本书。"他的第一本书《转过身来，洛特太太!》写好后，好长时间找不到出版商。德国的金德勒出版社(Kindler)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他们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可遗憾的是这样的书是不会有销路的。一九六一年，这本书终于被书林艺术出版社接受了。一九六二年这本书出版后竟一炮打响，成了发行量为几百万册的畅销书。迄今为止，他的作品中销售得最好的要数《一个模范家庭的趣事》(Beste Familiengeschichten)，这本书成了全世界除了《圣经》之外希伯来语书中最为畅销的一本书。

基雄在德语国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要归功于他那已经去世的德语翻译弗里德里希·托尔贝格和他在慕尼黑朗根·米勒出版社的出版商赫伯特·弗莱斯纳博士。

几十年前，基雄曾险些在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送命，可几十年之后，他的作品却恰恰是在德国最受人青睐并拥有最多的读者，这真是对历史的最大讽刺。当有记者问及基雄在几十年之后作为犹太人亲临德国的感想时，他的回答是，每当他回忆起自己在纳粹时期所过的非人生活时，每当他想起他那漂亮的母亲被剥光衣服、剃了光头在纳粹集中营中受尽凌辱的场景时，他的心里便充满了咬牙切齿的仇恨。但是，他仇恨的是纳粹，是他的刽子手，而不是纳粹的子孙。他说："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是惟一应该感到心满意足的人。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得以在运往集中营的途

中逃脱，从而免遭最恐怖的残杀；另一方面，如今，刽子手的子孙们为了见我而排着长队。我可以想象，如果地狱里的戈贝尔之流知道了这件事会多么地恼火。”

基雄是个多才多艺、天赋极高的艺术家。他不仅在讽刺小说和小品方面，而且也在戏剧和电影的编剧和导演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戏剧创作甚至早于文学创作。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本书出版之前，基雄便已经写了五个剧本。一九五九年他在特拉维夫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剧院，取名为“绿色洋葱”。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他亲自担任剧院的领导。在这三年中他自编自演了十个剧目，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演出。几十年来，他的一些剧目，如《百灵鸟》、《水开了，把插头拔掉》和《结婚证书》等，始终是德语国家舞台上的热门剧目。基雄之所以坚持自编自导，一方面是因为他热衷于戏剧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指导演员排练的过程中他总是不断地对剧本进行修改，其结果往往是最终的定稿与原来的初稿面目全非。基雄说，自编自导的好处是，他不会因为修改剧本而与作者发生争论。

与戏剧方面的成绩相比，基雄在电影界所取得的成就更加辉煌。由他自编自导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一共有九部。其中电影《萨拉》于一九六四年被提名为好莱坞最佳外国电影，并在一九六五年再次获得好莱坞的两项金球奖，即一九六四年最杰出的外国电影奖和最佳演技奖。仅几年之后，基雄以他的另一部电影《安睡吧，警官先生》又一次赢得了一九七二年好莱坞最佳外国电影的提名并于同一年再一次获得了好莱坞的一项金球奖：一九七一年最杰出的外国电影。至于他在其他各个世界电影节上所获得的各种各样奖那就更多了，恕



不一一列举(详见附录:埃弗赖姆·基雄获奖一览表)。

如上所述,基雄是一个蜚声于欧洲、特别是蜚声于德语国家的集写作和编导为一身的多才多艺的讽刺作家。值得中国读者欣喜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把向中国读者介绍基雄这样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幽默大师列入了他们的出版计划。这次出版的是基雄的两本讽刺小品集《一个模范丈夫的自白》(Bekenntnisse eines perfekten Ehemannes)和《一个模范家庭的趣事》(Beste Familiengeschichten)。希望广大读者通过这两本小品集能了解基雄,喜欢基雄。

王佩莉 2000 年 6 月于上海

附录：

埃弗赖姆·基雄获奖一览表

1953 年　获以色列诺尔道文学奖

1958 年　获以色列索科洛夫杰出新闻成就奖

1964 年　电影《萨拉，或以女儿换房子》获三项以色列戴维电影奖：最佳剧本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男演员奖

1964 年　电影《萨拉》获好莱坞奥斯卡最佳外国电影奖提名

1964 年　电影《萨拉》在美国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两项金奖

1965 年　电影《萨拉》获美国好莱坞两项金球奖；1964 年最佳外国电影奖、最佳表演奖

1965 年　电影《萨拉》获美国发行人奖大奖：最佳外国导演奖

1966 年　电影《萨拉》获维也纳电影狂欢节奖；获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特别奖

1969 年　电影《蓝色牛奶运河》获第十一届塞梅纳国际彩色电影节奖

1969 年　电影《蓝色牛奶运河》获美国好莱坞金球奖提名：最佳外国电影奖
1970 年　广播剧《酸橙上帝》获以色列广播电台奖
1970 年　获以色列赫兹尔文学奖
1970 年　《对不起，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书获以色列约博廷斯基奖
1971 年　电影《蓝色牛奶运河》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的世界国际电影节上获国际特别影评奖
1971 年　电影《安睡吧，警官先生》获第十三届塞梅纳国际彩色电影节奖：最佳外国电影奖
1971 年　电影《安睡吧，警官先生》获以色列戴维电影奖：最佳男演员奖
1972 年　电影《安睡吧，警官先生》获好莱坞金球奖：1971 年最佳外国电影奖
1972 年　电影《安睡吧，警官先生》获好莱坞奥斯卡提名：最佳外国电影奖
1972 年　电影《安睡吧，警官先生》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电视影片节上获杜卡奖：最佳制片奖
1972 年　电影《安睡吧，警官先生》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电影节上获金奖
1976 年　《转过身来，洛特太太》一书因其袖珍版畅销量达到一百万册而获德国袖珍书籍出版社金奖
1977 年　获美因兹狂欢节幽默小丑奖
1978 年　获德国亚琛幽默勋章
1979 年　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校长奖
1980 年　获德国汉堡蒂尔·奥伊伦施皮格尔奖

1981 年　获德国美因兹探索文学奖

1981 年　获法国巴黎国际事务幽默促进协会诺贝尔奖

1984 年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幽默大会上，基雄因其为世界幽默所作出的贡献而获国际科学协会颁发的诙谐幽默奖

1984 年　基雄因其文学成就而获以色列耶路撒冷约赫夫特·诺伊奖

1984 年　基雄因其最佳电视片而获德国柏林电影节金摄影奖

1984 年　获以色列特拉维夫沙洛姆·阿莱赫姆文学奖

1985 年　获德国慕尼黑卡尔·瓦伦丁奖

1988 年　获欧洲蓝色绸带烹饪勋章

1988 年　基雄因其在推广幽默方面所作出的成就而获德国米尔海姆市狡猾的家伙金奖

1990 年　获德国萨尔布吕肯狂欢大学幽默小丑博士奖

1990 年　获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奖

1993 年　在波恩获德国一级联邦大十字勋章

1993 年　基雄因其全部作品获由以色列科学院授予的奥斯卡奖

1995 年　在维也纳获奥地利国家文化及文学一等奖

1996 年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获文学大奖

1998 年　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比亚莱克奖



由埃弗赖姆·基雄撰写剧本并担任导演的电影

1963 年　《萨拉，或以女儿换房子》

1968 年　《埃尔温克》

1971 年　《蓝色牛奶运河》

1974 年　《安睡吧，警官先生》

1975 年　《您爱基雄吗?》(36 集电视连续剧)

1978 年　《鸡圈里的狐狸》

1984 年　《结婚证书》

1987 年　《水开了，把插头拔掉》

1988 年　根据基雄最成功的《一个模范家庭的趣事》一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萨拉和埃弗莱姆》

由埃弗赖姆·基雄撰写剧本并担任导演的戏剧

1953 年 《被保护的人》
1956 年 《白纸黑字》
1959 年 《结婚证书》
1960 年 《启明星前无言以对》
1961 年 《她和他》
1968 年 《水开了，把插头拔掉》
1972 年 《百灵鸟》
1988 年 《扎拉·沙巴蒂》
1989 年 《夜莺》
1989 年 25 个独幕剧
1998 年 《关于约瑟夫·齐默尔曼父亲身份的诉讼》

